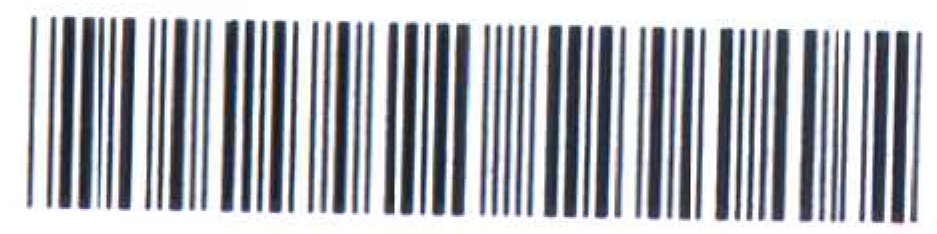
自己的角落

洛扎诺夫文选

李 勤 译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自己的角落

——洛扎诺夫文选

作　　者　洛扎诺夫
译　　者　李　勤
责任编辑　曹坚平　李　东
封面设计　王晓阳
版式设计　应黎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 万
印　　数　5000
ISBN-7-80616-478-2/I・175
定　　价　13.50 元

编辑说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其中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文豪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勃洛克、蒲宁等，也包括近年来在俄国被重新发掘和评价的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洛扎诺夫等，他们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哲学思想、宗教研究等广泛的人文领域，贡献了一批卓越不凡的精品。这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期，与 19 世纪 20、30 年代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相辉映，被文学史家、文化批评家称之为“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的作品，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白银时代”的作家，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在过往的历史时期，“白银时代”作家的作品大多被禁，它们的“开禁”在俄罗斯也是近些年来的事，然而一旦开禁，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新阅读和阐释的热潮。

本文丛收入随笔、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多种文体的作品，尽量多侧面地展示“白银时代”作家的本真面貌及其艺术与思想的丰富性。

正像诗人勃洛克所预言的，上个世纪之交的“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

当然，本文丛的推出，也旨在重新唤起中国读书界，对于俄国著作的阅读兴趣。

中译本序

瓦西里·洛扎诺夫，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教育家，白银时代俄国文化品格的塑造者之一，俄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狂人、怪人。

洛扎诺夫 1856 年生于旧俄科斯特罗马省的一个小城维特卢加。虽不无贵族血统，但家境贫寒。3 岁丧父，14 岁丧母，靠长兄抚养成人。曾先后辗转就读于科斯特罗马、辛比尔斯克和下诺夫歌罗德。从小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位伟大作家，18 岁那年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妇、比他大 16 岁的阿波里纳利娅·苏斯洛娃为妻。这是一场失败和不幸的婚姻。一边是凶神恶煞般的半老徐娘，一边是多愁善感的柔弱少年。洛扎诺夫从她那里既得不到母性的爱，也得不到健康的爱，他能得到的只有自私和病态的占有欲，没完没了的跟踪和监视，无缘无故的妒忌和猜疑。两个人“动不动就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洛扎诺夫痛苦不堪，经常“以泪洗面”。1878 年，洛扎诺夫考进莫斯科大学文史系，1882 年毕业，先后执教于布良斯克、叶列茨和白城等偏远市镇的中学，讲授史地。多年的分居，使洛扎诺夫本来就缺乏基础的婚姻名存实亡。就在这时，洛扎诺夫结识了另一个女

人——瓦莉娅·布加吉娜。根据东正教教规，夫妻离婚必须经双方同意，只要有一方不同意，离婚请求就不会得到允准。由于苏斯洛娃拒绝离婚，洛扎诺夫只好跟布加吉娜秘密举行婚礼，过起"非法"婚姻生活，并生下5个孩子。凡是了解洛扎诺夫私生活的人都认为，他的真正的妻子并不是苏斯洛娃，而是布加吉娜，"一个谦虚纯朴、举止高雅的女性"。但从法律上讲，苏斯洛娃始终是洛扎诺夫的"合法妻子"，而布加吉娜只能是"情妇"，孩子也只能是"私生子"。这种戏剧性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无疑对洛扎诺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关注和探索婚姻、家庭和性的问题，不能不说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洛扎诺夫在外省的从教生涯长达10余年，他的不少著作就是在那些人烟稀少、时有野狼出没的荒凉小镇写出来的。1886年，洛扎诺夫自费出版了哲学著作《论理解——对作为整一知识的科学之属性、界限和内在结构的研究尝试》。这是他的处女作，被认为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变体，没引起什么反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已显露出洛扎诺夫后来许多神秘观点的雏型。给他带来普遍声誉的是1891年发表的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该文为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等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阐释为宗教思想家奠定了基础，同时，作者的研究方法也为后来的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开辟了道路。1893年，洛扎诺夫携家人迁往彼得堡，到国家监察机关任职，同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教育的黄昏》(1893)和《箴言与观察》(1894)对现行教育体制发出猛烈抨击，引起强烈反响，也因而激怒了当局。1894年起，洛扎诺夫应著名报人和政论家苏沃林之邀，加盟《新时代》，开始了与这家著名报纸长达18年的合作。1899年发表《宗教与文化》，次年发表《自然与历史》，试图在教会的宗教性中找到解决社会和哲学问题的出路。在《当领导退席

时》(1906)一书中,洛扎诺夫用同情的笔调,描述了1905年革命期间大众中间的骚动。1906年出版的《在教堂的高墙下》则反映了他对东正教的复杂和矛盾的态度。迁居彼得堡,使洛扎诺夫很快进入首都文化圈。由于对宗教和性问题,对脱离正统基督教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洛扎诺夫结识了一些著名的象征主义者,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费洛索弗夫等人,还有《艺术世界》的画家们。洛扎诺夫也是1901—1903年间宗教一哲学协会的积极成员之一。这些年,他写了许多关于教会与家庭的关系、婚姻与性爱、古代宗教等方面的论著,如《模糊和迷乱的世界》、《俄罗斯家庭问题》等,都是名噪一时之作。1900年代末,由于受到知识界激进派和保守派两个阵营的双重排斥,洛扎诺夫脱离了以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彼得堡文化圈,皈依教会。然而,没过多久,1911年出版的《一张黑脸》和《月光下的人们》又掀起轩然大波。作者的立意在于探讨"基督教形而上学",抨击教会的禁欲主义,肯定性爱的神圣性,因而激怒了教会,被目为罪在不赦的"异教徒"。在世俗和教会的双重压力下,洛扎诺夫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并在孤独和自省中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隐居》(1912),《落叶》(第一篇,1913)和《落叶》(第二篇,1915)三部曲;同时,对困扰他一生的犹太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于1914年出版了《毗邻所多马(以色列之源)》、《耶和华的天使在犹太人中间》和《欧洲与犹太人》。1917年秋,洛扎诺夫举家从彼得堡迁入莫斯科近郊的谢尔吉隐修院,次年发表《当代启示录》。这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作品,在诸多方面具有总结性质。1919年2月5日,这位俄罗斯历史上最容易引起争议,也最容易让人困惑不解的文化巨匠在孤独寂寞和贫困潦倒中溘然长逝,时年63岁。

洛扎诺夫死后,立即被"盖棺论定",打入冷宫,直到70年后

方才解禁。尽管近年来他的著作被俄罗斯各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已形成一股方兴未艾的“洛扎诺夫热”，但在苏联(俄罗斯)80年代以来的“回归”和“开禁”浪潮中，洛扎诺夫仍然是姗姗来迟的一个。

洛扎诺夫是位多产的思想家和作家，仅生前就出版过30本书，内容几乎论及所有的人文学科领域，可谓包罗万象。他去世前不久还曾计划将自己的著作(包括未发表的)编成50卷集，足见其著述之宏富。

这里推荐给读者的，只是洛扎诺夫庞大的精神遗产的一小部分。虽然篇幅有限，却可以使我们对洛扎诺夫非凡的创作和渊博的知识略见一斑。读这样的文字，相信读者不会无动于衷。洛扎诺夫堪称俄罗斯的一位不可多得的文体家，人类精神历史的崇高与低俗奇迹般地造就了他的内心世界。

洛扎诺夫不喜欢用思辨和推理形式表达思想，他的文体很独特。有人称这是一种艺术哲学文体，与正襟危坐、枯燥刻板、令人望而却步的所谓学术文体大相径庭。他善于从生活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以具体生动的事例阐述深刻玄妙的道理，语言生动，文学性强，可读性强，因而很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

洛扎诺夫属于“我手写我心”的那类作家。“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洛扎诺夫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我想，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要知道，从洛扎诺夫的笔下流淌出来的每一个字，他的每一句“充满肉欲”的话，都是“写作”与“人性”的惊人结合。洛扎诺夫是一位非凡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不倦的政论家和教育家，读他的作品，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他独特的精神生活，还可以进而认识他独特的个性。

知道洛扎诺夫的人中，有不少只知道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隐居》和《落叶》几部名著的作者，殊

不知，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坛上，洛扎诺夫首先是以教育哲学家的身分风靡一时的。他对俄罗斯当时的教育体制的抨击，他提出的教育的三项主要原则（个性原则，完整性原则，类型统一原则），即便是在今天（或许尤其是在今天），对我们仍有现实意义和启迪意义。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他有关教育的若干代表性著述介绍给我国读者（中译本《隐居》已经出版，《落叶》也即将问世，《教育的黄昏》由于篇幅原因，这里未能收入）。另外，我们还有意识地选收了他的一些政论性和文艺性随笔。这些随笔的题材范围相当广泛，有哲学、宗教、文化，也有文学艺术，都是一些精彩的，不可多得的文字。

郑体武

1997 年 10 月于上海

目　录

论象征主义者

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尊敬的编辑先生阁下：

在我过去所写的所有出版物中，我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迫不得已的必要性，它虽然难以解释与论证，但是在主观上却能明确感受到：我思维过程中显而易见的偏差和我有时措辞极为尖锐的表达甚至都始终与周围的思想体制以及整篇文章藉以出发的最初的感情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我可以毫不痛惜地删去几行文字，但使我痛心而且无能为力的是我无法用其他的文字来替代它们。如果在谢德林[①]的文章中嵌插一段普希金[②]的散文，会使这篇文章较前大为逊色，尽管这段散文本身确实要比上下文中的文字更优美。这个比喻能够解释我的想法。文学作品中有一种连续性、密实性和完整性，它取决于激发创作的情绪的统一整体并使文学作品无法修改，即使作品中缺点遍布。我的文学活动是十分幸运的，不仅我的文章从未被修改过，而且编辑们也从不对我的文章作片言只语的改动。这些编辑的权

威性对我来说是不容置疑的，他们是B. Г. 瓦西里耶夫斯基[3]和Л. Н. 麦科夫[4]院士，A. A. 阿列克山得洛夫[5]、B. A. 格里格穆特[6]、H. Я. 格罗特[7]和C. A. 彼得罗夫斯基教授[8]，作家Ф. H. 贝尔格[9]、H. M. 伏尔康斯基公爵[10]和A. C. 苏沃林[11]。我以一种作家所特别珍视的满足感看到我的文章完整地、未加修改地反映了我所有的或丑陋、或正确、或哀婉、或明快的心绪及其细腻之处，虽然这都是过去的，但却是活生生的，因为被反映，当然是准确地被反映，是作家首要的目的，而其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附带的。但是，这么多的权威人物不约而同地、也无需我的要求对我的文章从不作修改，这就是一种证明，说明客观上没有修改文章的必要。很有可能，在我写作时指引我的完整性思想也在他们审阅时指引着他们，他们感觉到了这个思想并认为对文章甚至无法再加以润笔。不能据此指责他们都对校订工作漫不经心，对所主持杂志上的文章放任自流。

毫无疑问，我所提出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怪诞不经的，而且它毫无争议地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可修改性”问题来处理的。但是，它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肤浅。我总是感到奇怪，为什么文章被回绝只是使我感到略微不满而已，而任何擅改文章的企图则会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度精神刺激。已故的H. H. 斯特拉霍夫[12]对于我是绝对的权威，我也很爱戴他。他在审阅我的一篇手稿(《无序自由的捍卫者们想对创作自由的原则作何驳斥》)时，为了更清晰地表达思想，在经过我的同意(但是痛惜的同意)之后作了些不外乎添加代词、更正标点符号之类的修订。但在阅读校样时我察觉到了所有的更改之处并一笔删去，恢复了原稿中的模糊性和句法错误，虽然我意识到因此我将失去四分之一的读者，而模糊性是可以完全掩瑜的瑕疵。我的《宗教审判者的传说》一书的出版在我看来是文笔的修改，在我感到薄弱的地方

都换上了新的、经过仔细推敲的、更有分量且浅显易懂的论据，但是在重新阅读全文时我又把它们删去，再次换上了原先那些更为逊色的词句，尽管这与印刷规则是大相径庭的。有一个地方一个简单的思想（比较《传说》与挖苦歌曲）是用一个残缺的、错误的长复合句表达的，前后作了十处校订，直到我无奈地确信没有一处校订能反映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没有其他任何句子能表达既成事实的心理运动为止；而能够完整地、不加变动地表达的只有一个句法上错误的句子。文学，甚至全部文学都是对活生生事实的记载。虽有一系列类似化石的东西，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曾经有过生命。正是对它的形式、构造特征、逗号和句法的改变意味着抹杀那古老的事实并用虚构和不曾有过的东西来取而代之。但是，如果活着的心灵对那个事实还记忆犹新的话，仍保留着那虽已暗淡、却仍明确的形式的话，它会对修改这个事实作全力的反抗并把所有的"更好"作为虚构加以推翻，因为虚构可能是美仑美奂的，但却从未产生过。

再打个比方，举一个众所周知的怪事，这样，我们就可涉及文学创作的深处。哈姆雷特问自己：他是"死"呢或是"活"，但是他从未问过，他将怎样对待波洛涅斯[13]，是敬重还是鄙夷。看来，如果他自己的生存都有问题，那么他的真实性和仁慈也会成问题，如何能不更加怀疑自己同这个人关系的真实性呢？但这里他没有动摇，他会认知所有从假设存在中产生的事物并把它作为某种无条件的东西加以实现。例如，决心投河自尽的人不会赤身裸体地从家里跑出去，他会做所有体面的事，以免自己的形象使家人蒙受耻辱。我有许多思想得到了表达，虽然我自己也怀疑其正确性，但我却毫不怀疑我写的每一行字。人能得到自由吗？他应不应该偏执？说到底，谁又能知道这些事呢？在我的作品所有涉及这些伟大而有争议的问题的地方，我正是这样感受和体验

的，有时候激发愤怒，有时候唤起希望。我的思维就像这几页文字一样模糊、断断续续和不完整。对此，我的开诚布公是毋庸置疑的。对读者而言，作为作家的人在这方面是坦率的：思想内容本身，思想的真实或谬误是他对自己的文采和力量的态度，也是对自己非人手所能创造的本性，我想说，即对上帝的态度。这就是他的真实性或虚伪性的秘密所在。这是他最困难的任务，最紧张的思维，也是他的动摇之所在。我现在的思维正确吗？这些思想是光明还是黑暗的果实？说到底，我的灵魂受谁的控制，是上帝和光明，还是魔鬼和黑暗？这是一个读者完全不明就里的谜，也是作家往往不能解答的谜。作家对它是百依百顺。当他一拿起笔，他对读者的义务，他的自由和责任就开始了；就是说，它属于写作手法和方式的范畴，属于被称之为“语言”、“音节”和“细节”的范畴。再强调一遍，这就是不能修改的原因。

但是，上述一切毫无疑问都与文学的伴生现象，即所谓的刊物无关，——没有完整性，没有情绪，没有确切表达的人物。这类文章是可以修改的，但是修改并不能增添任何新东西，甚至什么都不能增添，而没有任何人物的、作为智慧成果的东西仍在继续、移动和缩减，但全无个性的表达，即所有人都具有的在逻辑和语言方面的才能，它很少像亚里士多德[14]的三段论或他的“隐喻”那样仅仅属于个别人。我没给这类“刊物”和“日常读物”“干过”任何事。1886 年我初登文坛时出版了一本哲学书，就其内涵来说是我国文学中最博大精深的。后来，每当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时，我总是要用这种色调和感情色彩来表达我所感受到的思想，任何人都能推翻它，但没有人能修改它。我认为，不通知作者就擅作修改是最大的不敬。上面提到的许多权威人物从未做出这种大不敬的事来，虽然他们对词义差别的敏感是不容置疑的。

尊敬的先生，这就是我请求您不要拒绝在贵刊重发我的《论

象征主义者》一文原始稿的原因，这篇文章在四月号的《俄罗斯学报》中已作了多处修改并删去了三段包含我对这种现象解释的重要部分。其实，我深信，除了删改的重要性外，您会赞同我所阐述的观点的实质的，不会认为我的愿望有唐突、顽固之处的。Honny soit qui mal y pense. ⑮

请将我的这一信念作为对您的尊重。

B.洛扎诺夫

圣彼得堡，96 年 7 月 8 日

一

象征主义和颓废派不仅是诗歌，而且是诗歌创作艺术中的一种新的类型。它同现有的其他各种文学创作类型在形式与内容上有天壤之别。虽然它只产生于 10～12 年以前，但却以极快的速度风靡文明世界各个国家，而且到处都遇到了良好的土壤和一般的先期条件。现援引两段诗歌作为这种艺术的范例：

汽灯照耀下的死者！
罪孽的未婚妻身上的红绦带！
噢，我们去亲吻窗户！
看到了死者苍白的脸吗？
这是孩子们服丧的医院……
这是冰上的夹竹桃……
这是无言的浪漫小说的封面，
亲爱的，窗户中看不见月亮，
我们的灵魂是你胸前的一朵花。

（B.达洛夫）

下面这首诗略显欢快：

未造的造物的影子
在梦中游荡，
宛若蒲葵的掌状叶
摇曳在釉面墙上。
釉面墙上
紫红色的手
在嘹亮的内心深处
朦胧地刻划着声音，
仿佛在浅蓝色月光下
光斑在不断地扩大。
在浅蓝色的月光下
升起了一弯裸月；
声音在蒙眬地翱翔，
声音在抚爱着我。
未造的造物的秘密
在亲昵地抚爱着我，
在釉面墙上
蒲葵的影子在颤动。

（《俄国象征主义者》，第2卷）

上面两首诗歌是我们俄罗斯的，现在这首是梅特林克[16]写的：

我的心灵终日疼痛，
我的心灵因离别而疼痛，

我的心灵在同沉默斗争，
我的眼睛看到了阴影。
我看到了狩猎的幻影，
依稀记得的足迹
指引着秘密愿望的狗群。
狗群奔向雪青色梦幻的
健忘之林的深处，
黄色的责难之箭
射杀着假寐之鹿。
啊，啊！处处是愿望，
处处是归梦，
还有湛蓝的呼吸……
月亮的容貌在心中消逝。

在象征主义诗歌中毫无争议而又浅显易懂的是渔色倾向，仿佛被从50—70年代的诗歌中彻底扫地出门的苍老的自然母亲之神重又回到了属于它的、自古钟爱的领域，但是以丑陋怪异和寡廉鲜耻般赤裸裸的形式：

噢，温柔至奇、情欲勃发的疾病！
你是我的全部生活和可爱的理想！
你灿烂地拥抱着病如霉土的我，
就像铁锈裹着久经沙场的铁剑！
你给了我自由，我威严而伟大，
但不是凭火爆的粗鲁、力量和知识：
我被清除的舌头上溃疡遍布，
我一口呼气就能

使老处女、老人和无助的孩童染病；
我能把赤裸裸的疾病赏赐给所有人，
我鄙夷生活、自然和人们，
我嘲笑忧伤、痛苦和泪水。

（叶梅里扬诺夫-科汉斯基⑰）

在下面这首甚至连形式都极其乱七八糟的诗歌中亦是如此：

别进来，仆人们！
难道我没有白净的大腿？
难道我的手没有交错胸前？
别进来，仆人们！
在貂皮帘后面
我在疯狂，我在瘫软……
我交错着弯曲的双手，
勾搭我赤裸的双肩，
去亲吻黑色的双眸……
别进来！……

（A.多勃罗柳波夫⑱）

这种情调也清晰地体现在散文中：

光明，你在祈求什么？你莫非在渴求神情莫测的明眸和难以遏制的情欲气息？莫非在渴求涟涟泪水中的笑容和洒满露珠的青春心灵？

我把勇不知耻的处女之身委献于你，大胆的双腿和醉人的双唇……威严，你走近清晨的床边吧！

我不年轻？弯曲的双手交错着。苍白的白夜在我们的拥抱中愈显苍白，它越窗而去，奔向自由。

光明！我很舒适……光明，我又痛苦！白夜以深邃的目光注视着你。它不会离开。像寡妇一样彻夜哀思……像哭丧的女人哀恸。它哭悼墓地的清晨。我害怕……光明！

（A.多勃罗柳波夫）

爱神在这里没有穿上诗歌的外衣，无遮无掩。作爱所藉以出发的全部意义、全部的美、所有无尽的痛苦和欢乐随后又以另外一种诗歌性质、带着其他的烦恼从作爱中产生出来，但这一切在这里都被抛弃了；喜爱的人物被抛弃了，因为他像被操纵的人物在新的"诗歌"里被披上了罩布，使他无法以痛苦、恐惧或祈祷的神情妨碍某种可能正在他身边但又被完全忽视的"主要东西"。在这种"诗歌"里，女人总是无形象、无姓氏地出现，描写对象的头脑几乎同描写主体的头脑一样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这在下面总共只有一行、以简炼而成为经典的诗歌中可见一斑：

噢，合上你苍白的大腿！

（勃留索夫[19]）

在散文中亦然：

我感到孤寂。听见了吗？有人敲门……我老了……我累了……

是你吗，女郎？

基拉，你在哪里？——这是你！
　　进来吧，小伊拉！
别忧伤！

（A.多勃罗柳波夫）

看来，这里对人的视角，对人们所有关系，即生活的视角不是自上而下展开的，不是由脸部开始，充满的不是意义，而是从下面某个地方，从大腿向上推去，充满的是同意义毫不相干的感觉和欲望。

二

众所周知，象征主义和颓废派起源于法兰西。它们在这种新“诗歌”里几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不是以他人的思想和欲望的解释者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某种新的“品味”的指路人和教师爷的面目出现。德·萨德侯爵[20]的祖国最终明确地表明了它在所有文明国家中不容置疑的主宰地位，而且在其他国家中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东西。同时它又突然地、完全出乎意料地表达了它当时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在其表面，在躁动并常表惊叹的世界面前拉响了政治、宗教、经济等方面的警报。文艺对未来最为敏感，它能更明确地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四年前，在莫斯科举办的法国展览会上的所谓“艺术”馆里，迟钝的俄罗斯人如果更敏锐些的话，就能看到“颓废派”文艺——当然，不是用无韵律、无格式、无意义的诗歌表达的，而是用“大腿”表达的——在不加衬托和布景、没有白昼甚至夜晚的光线的许多画作中描绘着永恒的一丝不挂的女性胴体，因为这种艺术是从脚跟开始的。当你跨入画廊的门槛，徜徉在目不暇接的画作前，就会产生奇怪的印象，因为

它们不表达任何其他的情节;没有大自然,没有高山大海,没有阳光花朵,没有街景,也没有家庭场景,只有几乎以一种手法勾勒的女性身体、臀部和其他细节,而脸部却是令人作呕地干瘦,仿佛是在画家们的“艺术想象”里抻长了似的*。显然,对于它们而言,历史已经死亡,人已经死亡,大自然也已经死亡;甚至在可爱的“情节”中人物、姓名及其过去和未来都已经死亡。对当今的颓废主义者来说,在这鸦雀无声中,在这虚无的黑暗中只能看到根本不想从病态想象中引退的“苍白的大腿”。

这个赤身裸体的画廊的主要特点还不在于缺乏理性表达的人物甚或美貌年轻、青春勃发的人物。令人惊讶的是想象之勉强,虽然在不断地加强,但在“赤裸裸”的环境里却不能表达更多的东西。例如,我记得有一幅描绘阳光透射海洋深处的画作,在仔细端详之后你会发现是一种长角的贝壳同旋转的水流纠缠在一起,沿着这束光线攀援而上,把光线搂在怀中,然而当你更仔细地审视时,会略带惊讶和恶心地发现,攀援而上的既不是水流,也不是弯曲的贝壳躯体,在它们的形象中看到的是抽搐弯曲的女性透明胴体在拥抱着光线。“画家的左手在哪里?”看着这类画时你会这样想并且在每幅画前不断地重复这个问题,直到离开展厅。

即便不是人类文化的哲学家,也不难从这类画作中揣度出这个国家文学作品这几年的状况。我(很遗憾)未曾拜读过莫泊桑[21]或左拉[22]的任何作品。下面是一篇批评文章中援引的莫泊桑作品的片断(H. Л. 先生:《居易·德·莫泊桑》,《俄罗斯通报》,1894年11月),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颓废派文艺的氛围,

* 展览会上人们传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来参观展览会时首先来到了艺术馆,当他刚走到门口瞥了一眼,即刻就甩袖而去,不想再看这“法国艺术”。

虽然这篇文字早在著名的《学校》问世之前就已写好：

……只有在看不见自己所爱的对象时才能爱，狂热地爱。看见意味着理解，而理解意味着鄙夷。爱女人要醉酒般地陶醉，醉得不知究竟在喝什么，喝呀，喝呀，一口气地喝，不分昼夜地喝。

这是（据书评家说）一个短篇小说主人公婚前在日记中的记载。婚后他仍然记日记：

娶了她之后，我服从了使我们追求女人的无意识的爱好。

她现在是我的妻子。当我过去倾心于她时，她是我没有实现但即将要实现的幻想的化身。但当我把她拥入我的怀抱中时，我发现她是本性用来欺骗我的期盼的工具。

她（即妻子）是否欺骗了我的期盼？否。但她令我生恶，厌恶得不能碰她，再也感觉不到心中难以言表的厌恶，或许，不是对她的厌恶，而是更高级的厌恶，对爱情结合更深刻的厌恶，因为它厌恶得令高级动物应遮掩这羞耻的行为，只能红着脸悄声地谈论……

当我的妻子走到我面前拥抱我时，当她以微笑和眼神挑逗我时，我再也不想看到她了。不久前我还以为她的吻会使我飘入九重云霄！当她有一次患了几天寒热病时，我从她的呼吸中感到了轻微的、细微的、难以捕捉的腐烂气息；我感到不寒而栗！

噢，短命的身躯，迷人的活生生的粪土！噢，会走动的、会思维的、会说会笑的腐烂物，就像灵魂一样，是如此的粉

红、迷人、美丽而又不可信！

在这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到作者身心疲惫得不愿再有实际的接触，而从以上加着重号的一些话语中可以看出，这种疲惫不是充沛精力消耗殆尽后的结果，而是对某种过早来临、过早现实接触的某种"情节"冥思苦想的结果。这个假设自己属于"高级"动物（见上文）的行尸在同一本《日记》中继续写道：

> 我像生物一样喜欢花。我日夜泡在花房里，像后宫藏娇般地藏着花。我有许多花房，除了我和花匠外，别人不得入内。
>
> 我走入花房，仿佛来到了秘密享乐的地方。在高大的玻璃长廊里我先穿行于两排从地上拾级而上直达屋顶的花冠状花丛。它们给了我第一个吻。
>
> 这些点缀着我秘密后宫的前厅的花朵是我朴实的女仆。它们可爱、娇媚，竭力以光采和芳香来欢迎我。它们在两边各占八个台阶，簇拥在一起，犹如花园一般从两边延伸至我的脚下。一看到它们，我的心就加快了跳动，两眼燃烧着欲火，热血奔涌，双手颤抖着，想采撷这些花朵。但是，我走了过去。在这高大的花房尽头是三扇紧锁着的门。我可以选择，我有三个后宫。

批评家继续写道，他经常去看花：

> 它们在花茎上微微颤动，似乎要展翅飞去。它们还会飞回到我身边吗？不，我的心，备受情欲折磨的神秘的好色之徒的心，将向它们飞去，在它们上空盘旋。

……花啊，花——一些花在自然界散发着如此奇异的芬芳，这些明媚或苍白的花，它们温柔的色彩使我的心如此剧烈地跳动，使我的视线模糊不清！它们是如此美妙，柔情万种，多愁善感，半遮半掩，比女人的朱唇更诱人，——它们丰满，长着外翻而肉感的齿状嘴唇，孕育着生命的胚胎，使每一朵花都飘逸出特殊的芳香。在整个大自然中，它们，也只有它们的繁衍是无愧于自己神圣的种类，在自己的周围播散着爱情和爱抚的奇异芳香，独特的肉体的香味，而这种肉体充盈着莫名的美丽，具有非常丰富的形式和花朵，以各种各样诱人的香味令人陶醉。(《俄罗斯通报》，94 年 11 月，第 269—271 页)

这种对僻居后宫花廊的花朵独特的"求婚气魄"酷似古代确曾发生过的一件事：一个古希腊人对一座大理石雕像充满了类似的情欲，神魂颠倒得竟偷偷地玷污了雕像。历史记住了这件事，这个故事也流传到了今天。显然，古希腊多神教徒对此大为震惊，不能保持沉默，无论在日常谈话或大庭广众，甚至在书籍中对此都有物议。现在一个基督教徒作家也在想象中对此类动物本能顶礼膜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崇拜非动物的自然物种；而且他不仅崇拜，甚至加以法则化，披上了华丽词藻形式的外衣。最后，他还在各国"批评家"悉心听取无数听众和读者褒奖的意见时对此大唱赞歌，只可惜这样做对自己的健康不无伤害。然而，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此。

以上从《日记》中援引的两个片断分别是拟人和拟动物的。它们是人及其想象力鲜明表达的华彩诗章。当其作者来到长着外翻而肉感的嘴唇、"孕育着生命胚胎"的花朵"之前"时，他还暂时保留着某些人类的形象，还没有脱离人类社会，他的想象力和

那些把画作运来莫斯科给大人物们观赏的画家的想象力都遵循着同一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没有细节,不加装饰;所描绘的也不是人物。只有对历史的沉默,对自然的无知;没有市井的喧闹,没有家庭的场景;既没有它的过去,也没有它的需求和希望,比方说,对子女的希望。古罗马的箴言"matrimonium liberorum quaerandorum causa"㉓不复存在了。《圣经》所说的"生儿育女吧,繁衍子孙吧,让他们遍布世界并拥有它",和《福音书》所说的"人不能拆散上帝恩赐的结合"也死亡了。人死了,只剩下了裤子。接踵而来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画作中我们看到的是对描绘成吸收阳光的贝壳化的女人体的崇拜,而在小说中则是在女性化花朵旁游手好闲的"神秘的好色之徒。"这里和那里的丑陋都变得空无意义。在读完上面的散文后我们再读下面的诗句,不再会感到惊讶,也不会发现有何新意:

在浅蓝色的月光下
升起了一弯裸月;
声音在蒙眬地翱翔,
声音在抚爱着我。

又如:

汽灯照耀下的死者!
罪孽的未婚妻身上的红绦带!
噢,我们去亲吻窗户!

最后:

我的心灵终日疼痛，
我的心灵因离别而疼痛，
我的心灵在同沉默斗争，
我的眼睛看到了阴影。

这些统统不过是花“在花茎上微微颤动，似乎要展翅飞去。它们还会飞回到我的身边吗？不，我的心，备受情欲折磨的神秘的好色之徒的心，将向它们飞去”(居易·德·莫泊桑)。

可见，象征主义和颓废派并非是产生于法兰西并风行整个欧洲的特别新潮的流派；这是结束，是顶峰，是环节很长、植根于本世纪初叶的另一流派的开端。它毫不费力地产生于莫泊桑的作品，接着又出现在左拉、福楼拜[24]、巴尔扎克[25]以及对立于早期发展的超理想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浪漫主义和“复兴”的古典主义)。正是这个ultra[26]的成份一俟闯入文学后就再也难以清除出去，就像生活中、生活道德中以及思想、爱好和欲望中ultra的结果表现为如同颓废派和象征主义这样丑陋的现象一样。颓废派不具备颓废派应与之有关的ultra。这是无夸大对象的夸大，是内容消失后形式上的矫柔造作，因为它没有韵律，没有格式，而且没有“诗歌”的意义——这就是decadence[27]。

三

人类延续了十个世纪的伟大的自我约束精神在14和16世纪产生了被称为“文艺复兴”的精华，这如同根通常不像果实，但在根的力量和汁液同果实的美丽和芳香之间存在着毫无疑义的联系。中世纪文学看起来同文艺复兴毫无共同之处，是完全相对立的。然而文艺复兴时代人类力量生机盎然的基础既不在虚假

“复兴”的古典文学世界，也不在仿冒的维吉尔[28]和柏拉图[29]以及脱离老教堂地下室的手抄文学，而正在于这些严厉的芳济派修士[30]和残酷的天主教多明我修会的修士，在于博纳文图拉[31]、坎特伯雷的安瑟勒姆[32]、明谷的伯尔纳[33]。中世纪是人类力量的巨大仓库，因为在他们的禁欲主义、自我制约、对自身的美貌、力量和智慧的鄙视中这些精力和智慧得以适时保存；文艺复兴时代则是对这个仓库的发掘：薄薄的一层覆土刹那间被除去，下面是闪闪发光、耀眼夺目、数不胜数的宝藏，这甚至令此后好几个世纪的人都感到惊诧。昨天的穷光蛋、潦倒的乞丐过去只会在十字路口用不登大雅之堂的嗓音叫喊着赞美诗，如今突然以诗歌、美貌、力量和智慧令人刮目相看。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自身已消耗殆尽的古代世界里来的吗？是从发霉的羊皮书里来的吗？难道柏拉图在写谈话录时和后来批注它的马尔西利奥·福契诺一样如痴如醉？或许古罗马人在阅读古希腊文献时也吃尽了苦头，像彼特拉克[34]一样因为不懂古希腊语只能把珍贵的手稿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不时地吻吻它们，忧郁地傻看着这高深莫测的文献？现在这些羊皮书都以方便、准确的出版物形式放在我们面前，但是它们为什么没能使我们也“复兴”？为什么古希腊没能“复兴”古罗马，或者说，古希腊文学没能在高卢[35]和非洲产生类似意大利 Renaissanse[36]的东西？14 至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之秘密不在于古代文学，这种文学不过是一把清除宝藏上泥土的铁锹，秘密在于宝藏本身，在于在 4 至 14 世纪人类受严厉的禁欲主义理想、禁绝肉欲和限制情欲思想的影响，除了储藏，没有消耗任何东西。在这伟大的千年沉睡中人类的灵魂为创造 Divina Comedia[37]而成熟了。在这强制对毕竟仍很有趣但也罪孽的世界视若无睹的时期，产生了伽利略[38]、哥白尼[39]和培根[40]创立的慎重实验学派；在同摩尔人的斗争中冒出了穆里

奥[41];在 16 世纪以前的千年祈祷中画就了本世纪我们面对着祈祷、但没人能够临摹的圣母神像。

从 14 世纪到 16 世纪我们只是消耗了当时发现的无数宝藏,消耗了在此之前积聚的巨大能量储备。因此,近代史只是同中世纪相对立的。人们不再默不作声,任何细微的感情,任何萌动的新思想都急于想披露给别人,用颜料描绘出来,用声音加以修饰,而且一定要用印刷机记载下来。可以说,正因为人们在 14 世纪前竭力隐讳,才能在一进入 14 世纪以及以后的几个世纪时变得滔滔不绝。人们对智慧和高尚的、甚至可笑和愚蠢的东西赋诗、撰文和谱曲,甚至非常想、只可惜不善于用大理石来表达或用建筑线条来镌刻。值得注意的是,建筑是一种没有人物的艺术,是创作者同时代和人民融于一体且并不凌驾其上的创作形式,但它在我们一进入近代时就堕落了,再也没能走向辉煌壮美。

这是一种极其无私的艺术,然而近代的人们却根本不知如何、以何种方式和通过什么来感觉自己是无私的。他们越来越疏于祈祷。祈祷是灵魂面对上帝,但他们的心灵却只面对自己。所有的一切使他们感到拘束和受排斥并妨碍他们独立发现自己的我,无论是低贱的我还是高尚的我,是否内容丰富或空洞,对他们来说愈发难以忍受。16 世纪时人把身上的教会推翻说:我是国家(souverenité du peuple, suffrage universele[42]);他宣布了这个我的权利(革命);他深刻地诗化了这个我(《浮士德》和拜伦的《维纳》);他说,即便整个世界也只是这个我的反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直至这个被吹捧得天花乱坠且受法律庇护的我于 19 世纪末在诸如教会、国家、家庭及其他所有息息相关的伟大制度的废墟上对下面这个突如其来的、简短而又含情的愿望感

到不知所措：

> 噢，合上你苍白的大腿！

这时我们可以在诗行句号的后边以及周围空白的页边上写下结论：在这个愿望里某个"主体"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全部的内心世界。

四

自己的我的宗教，这个我的诗歌以及同样的我的哲学，在自波乔[43]和非列福[44]到拜伦[45]和哥德[46]的时代里，创作了一系列深刻而鲜明的惊世之作，最后穷尽了它的全部内容。在颓废派的"诗歌"里我们也看到了急欲推翻这个我的空壳的愿望。上面我们提到过这种诗歌中无夸大物的夸大和无主体的矫揉造作，这不过是就形式而言；就内容而论，尽管是否定表达的，颓废派首先是晦暗无光的利己主义。在这种"诗歌"里，世界作为爱情和兴趣、甚至愤怒或鄙视的对象消失了。它消失了，不仅作为能使空洞的我产生某种兴趣的客体，而且作为观众和这个我的可能的裁判，或只作为一个在场者：

> 这是冰上的夹竹桃……
> 这是无言的浪漫小说的封面——

这就是世界在这个空虚而堕落的我的模糊的、缺乏爱心的、也无求知欲的回忆中所剩下的东西。在这段文字里很难找到专有名词：城市的名字、地点和时间的名词；在空洞的我的面前掠过的

纯粹是抽象的幻影，既没有某种现实依据，也没有任何现实世界的内容，除了个别无序交替的词语、事物的名称以及场景的片断。这些模糊回忆中的场景、事物和词语是从现实世界中信手拈来的，毫无意向和意义飞掠而过，从中也流露出了似被抛弃、似被遗忘的思想，没有发展，甚至没有一丁点必要的联系：

我看到了狩猎的幻影，
依稀记得的足迹
指引着秘密愿望的狗群。
狗群奔向雪青色梦幻的
健忘之林的深处，
黄色的责难之箭
射杀着假寐之鹿。

加着重号的两行诗就是仿佛溶入毫无关系的现实场景的思想；而这些场景本身也并非现实，而是对它不甚确实、本身就不太必要而且回忆者本人也似乎不需要的片断。我们在这个语无伦次的语流中可以观察到主体本身就缺乏某种规律。我在同伟大的客观制度斗争的三个世纪的历史中用自己的主观主义瓦解了它们，推翻了其中某个对自己必要而神圣的法律。

没有理由可以认为颓废派是极其必要、极富意义的历史现象，而且它仅限于诗歌。在或远或近的将来我们还会看到哲学的颓废，最终还会有道德、政治、日常生活方式的颓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尼采[47]是人类思维的颓废主义者，至少在这个程度上，就像根据莫泊桑艺术的某些关键特点可以认为他是人类感情的颓废主义者；和莫泊桑一样，尼采也是以发疯而告终；和莫泊桑一样，尼采的自我崇拜已无任何限制界限。世界、历史、人物、他

的著作、他的合法要求都从两个人的观念中消失了；两个人看来都是相当程度上的“神秘的好色之徒”，只不过一个人更想“盘旋”在颤动的花朵之上，而另一个人喜欢在某个洞穴或在某座山上以复活了的查拉图什特拉[48]的身份向人类宣扬新的宗教，“超人的”宗教，他解释说……但他们，包括莫泊桑，就完全缺乏“人性”和人类所需的某种必要的东西而言，已经是“超人”了。在这种人类文化新的 nisus formativus[49]中我们会看到大怪事，大丑陋，或许还有大灾难和大危险……

关于象征主义我想再说几句：我们不能十分明确地把今天毫无意义和丑陋不堪的象征主义同像《浮士德》这样思想丰富、色彩艳丽的作品作起源上的联系。两者虽都表达过且正在表达“自由的人性”，只是在一种作品中人性是喷薄欲出，力大无穷，而在另一种作品中人性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是，“自由”和“人性”的本质正是两者的主调和典型特征。再说两句：《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一样，出自同一个主观精神，但有江郎才尽之感，整体结构虽然表现了象征主义和颓废派的所有特点，但两个部分之间却毫无联系，只是矫揉造作地连接在一起，就像象征主义诗歌一样。那里已经有一些“涂釉蒲葵……”。我们想说，除了“同情者”，所有的人对象征主义和颓废派都毫无疑问地持否定态度。它们同自文艺复兴到电气技术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化“不受束缚的个性”和“自由的人性”所创造的所有天才和高尚的东西有着起源上的联系；相反，它不可逾越的界限在于当人把自己理解成“受束缚”的时候。大量的历史和现实事实以及实际需求甚至还有“世代相传”的宗教和“既成的”教会——这就是这个令人厌恶的怪物永远不可企及的彼岸，我们想说，正是在那里人可以得到拯救。这个历史上错误波浪的运动无论获得多大的力量和普及，终将在教堂高墙矗立的地方终止前进并退潮。

译 注：

① M. E.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 俄国讽刺作家，文学批评家。

② A. C. 普希金（1799—1837） 俄国诗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③ B. Г. 瓦西里耶夫斯基（1838—1899） 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④ Л. H. 麦科夫（1839—1900） 俄罗斯文学家，民族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893 年起任副院长。

⑤ A. A. 阿列克山得洛夫（生卒不详） 莫斯科大学副教授，俄罗斯文学史专家。

⑥ B. A. 格里格穆特（1851—1907） 俄罗斯政论家，新闻工作者。

⑦ H. Я. 格罗特（1852—1899） 俄罗斯心理学家，哲学家，新闻工作者。

⑧ C. A. 彼得罗夫斯基（1846—?） 俄罗斯法律学家，新闻工作者，社会活动家。

⑨ Ф. H. 贝尔格（1840—1909） 俄罗斯作家，诗人，新闻工作者。

⑩ M. H. 伏尔康斯基（1860—1917） 俄罗斯作家，新闻工作者。

⑪ A. C. 苏沃林（1834—1912） 俄罗斯出版家，新闻工作者。

⑫ H. H. 斯特拉霍夫（1828—1896） 俄罗斯哲学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⑬ 波洛涅斯系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的御前大臣。

⑭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前 322） 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

⑮ 法语，意为“心存此念者可耻”。此系嘉德勋章（英国爵士最高级的勋章）上的一句箴言。

⑯ M. 梅特林克（1862—1949） 比利时法语剧作家，诗人，作品多表现象征主义。191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⑰ A. H. 叶梅里扬诺夫（笔名科汉斯基，生卒不详） 俄罗斯 19 世纪

90年代的散文作家。

⑱ A. M. 多勃罗柳波夫(1876—1944) 俄罗斯诗人。

⑲ B. Я. 布留索夫(1873—1924) 俄罗斯诗人。

⑳ D. A. 萨德(1740—1814) 侯爵,法国作家。

㉑ G. 莫泊桑(1850—1893) 法国作家。

㉒ E. 左拉(1840—1902) 法国作家。

㉓ 拉丁语,意为"自由的婚姻在寻找机会"。

㉔ G. 福楼拜(1821—1880) 法国作家。

㉕ H. 巴尔扎克(1799—1850) 法国作家。

㉖ 拉丁语,意为"超"。

㉗ 法语,意为"颓废"。

㉘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 古罗马诗人。

㉙ 柏拉图(公元前428/427—前348/347)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㉚ 13世纪初期西欧创立的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修士。

㉛ S. 博纳文图拉(1217—1274) 原名乔瓦居·菲丹扎,生于意大利。神秘主义哲学家,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芳济派会长,红衣主教,曾在巴黎大学任教。

㉜ 安瑟勒姆(坎特伯雷的,1033—1109) 宗教活动家,神学家。

㉝ C. 伯尔纳(明谷的,1090—1153) 法国神秘主义神学家,明谷修道院院长。

㉞ F. 彼特拉克(1304—1374) 意大利诗人。

㉟ 古代地名,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瑞士的一部分以及意大利的北部地区,公元前58—51年被罗马征服。

㊱ 法语,意为"文艺复兴"。

㊲ 拉丁语,意为"神的喜剧"。

㊳ G. 伽利略(1564—1642) 意大利科学家,精密自然科学奠基人之一。

㊴ M. 哥白尼(1473—1543) 波兰天文学家,日心体系说的创立者。

㊵ F.培根(1561—1626) 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创始人,主张在科学研究中采用实验法。

㊶ B.E.穆里奥(1617—1682) 西班牙巴洛克时代著名画家。

㊷ 法语,意为"民主政治,全民普选"。

㊸ B.波乔(1380—1459)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作家,历史学家。

㊹ F.菲列福(1398—1481)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作家,诗人。

㊺ G.G.拜伦(1788—1824)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㊻ J.W.歌德(1748—1832) 德国作家,现代德国文学的奠基人。

㊼ F.尼采(1844—1900) 德国哲学家,非理性主义者,唯意志论者,"生命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㊽ 查拉图什特拉(又名琐罗亚斯德,公元前10至前6世纪上半期之间) 古代波斯拜火教的创始人,宗教预言家和改革者。

㊾ 拉丁语,意为"形式上的努力"。

泛斯拉夫主义的晚期阶段

1. Н. Я. 丹尼列夫斯基[1]

《俄罗斯与欧洲》。阐述斯拉夫世界对日耳曼-罗曼文化和政治关系的观点。第 5 版，圣彼得堡，1895 年。

这部在作者生前几乎毫无影响的书如今已是第五版了。如果我们说这部书正在成为俄罗斯有教养的高层圈子人们的案头必备书，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启蒙的俄罗斯人都知道这部书，但是可以推测，所有正在思考和犹豫、在部分是土生土长、部分是西方输入的思想海洋中求索真理的俄罗斯人是知道这本书的。

当然，任何自诩为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拥趸者在看到这部宣传他们所推崇的学说的书广受好评时就会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们也应有自知之明，应该努力向公众说明，在这部备受推崇的书中所表达的并非是全部学说，甚至也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一

Н. Я. 丹尼列夫斯基推出的文化—历史类型的理论根本不像它的批评者和追随者所说的那样，是泛斯拉夫主义理论的顶峰和最高阶段。更确切的是应当把它定义为一个能包容在泛斯拉夫主义初创者之后再也没人能加以修改和诠释的脆弱内容的外壳。在初创者的著作中很少有自成体系的东西，以至于可以认为它们是偶然付梓的手稿，但它们也反映了我们迄今为止在泛斯拉夫主义学说中可以看到的所有正面的东西。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并未得到充分的普及，于是我们担心，抑或是为了提醒大家，把丹尼列夫斯基的书说成是泛斯拉夫主义理论的顶峰意味着读过此书的人可以不必了解该学说的前期不成熟的阶段。

И. 基列耶夫斯基[②]、A. 霍米雅科夫[③]和 K. 阿克萨科夫[④]在即将过去的本世纪的 30 至 50 年代间奠定了泛斯拉夫主义学说的这个宝贵的、未被破坏的、而且我们确信是不可破坏的核心。基列耶夫斯基在《十九世纪》、《答 A. C. 霍米雅科夫》、《论欧洲启蒙及其同俄罗斯启蒙的关系》、《论哲学新基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品选录》*等著作中列出了西欧世界同东斯拉夫、尤其是俄罗斯世界文化构造上最一般的区别特征。我不便于在这篇短文里一一列举这些特征，我们只随便研究其中一个特征，以此说明他的思想意义多么深远，多么正确。

"告诉我，你如何评价真理，我就会讲出你心中所想的一切。"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向亲人、政党、民族以及整个民族群

---

* 他的文章已于 1868 年由 A. И. 科舍列夫[⑤]出版，遗憾的是质量极粗糙，以后也没有再出版。

提出这样的问题。基列耶夫斯基是对整个罗曼-日耳曼民族提出这个问题的。“真理是被验证的东西”，他们的哲学和精密科学、教义*与教会以及他们的法律和政体如是回答说。当三段论的线索还没有中断，当他们从观察出发并经过经验验证时，从培根到威韦尔⑥，从加尔文⑦到费尔巴哈⑧，从学者、牧师到手工业者都不会怀疑真理正包容其中，就在这三段论中，在经验中，在这人类知识的曲颈瓶中。

我们在布伦奇利⑨的新法历史中可以看到，此书洋洋六百页，只有三至五页是思想家写的。而思想家可谓不计其数，他们的名字是多么的伟大而光辉。当书页在我们面前翻动并且随着新的一页我们进入新的思维网络时，我们感到多么的忧伤和疑虑重重，因为它具有不可捉摸的感召力，其正确性又是我们无力驳斥的。噢，看来，征服所有的民族并以一法治天下也比使这无私探索真理的众多头脑归顺于一个真理、统一于一个意见要容易得多。但这将会是什么尚无法预知：“我不承认你是一个有产者，或是穷人，或是人，也不尊重你，因为我需要你。我认为盐能使食物添味，所以就加盐；我把鱼看成营养的东西，所以就吃鱼；我发现你有点缀我生活的能力，所以就选你为同伴。或许，我用盐来研究结晶，用鱼来研究动物，用你来研究人，等等。你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客体，就像我的财产是我的客体一样。”**

这不是摘自于密信，也不取自于狂热者的散佚札记。不，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学者在其1845年发表的《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⑪一书中所表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我们

---

* 例如，信条的变化是以三段论为基础的；在三位一体中圣父和圣子是平等的；但按照信条的说法，圣灵来自圣父；可见，圣灵也应来自与之平等的圣子。

** M.施蒂内尔⑩1885年死于柏林，他的书于1882年再版。

道德本性的观点。但这本书并没有被遗忘："只要读一读这本书，就能立刻感悟到罪孽已洗尽，不会再迷惘，挣脱桎梏获得自由，就会成为像可能是本世纪唯一的作者一样自由的人"，四十七年后发出如此感叹的不是他的同胞或朋友，而是一个外国论敌。*

这样，如果这是真理（再比较一下尼采的哲学），如果这些话是作为某种知识说出来并被无数读者作为知识接受的话，那么谬论与真理的标准就丧失了，制作科学和哲学的曲颈瓶就有了某种弊病。这里，在这个三段论的曲颈瓶里可以产生伟大而光辉的真理；但是，既然我们不仅仅是依据它们从曲颈瓶里产生这一点而承认它们是真理，那么，区分善与恶、衡量真理和公理就有了另外一种手段。

"思维者的内心构造是否正确，他的力量和能力是否协调？"这就是我们应在评价不幸的尼采、兴奋的卢梭[12]及其他诸多思想家可能病态发展的心理活动前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心理活动极其狂热而又怪诞，不得不使人们思索再三并对天才和疯狂的亲缘关系提出疑问。当然，在阅读牛顿[13]、里内[14]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是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的。

基列耶夫斯基尚未能预见许多奇怪的学说在当代的胜利。在他那个时代没人能预见会产生龙勃罗梭[15]学派，但他却是欧洲第一个以自己的一席话不仅使我们理解了这些在我们眼前发展的奇异学说，而且使我们洞察其根源并对之持有正确观点的人。这个观点之所以牢固，是因为它不属于基列耶夫斯基一个人，不是他个人思索的结果：他只是指出了评价我们民族以及我们更早的历史和古代文献中的真理和谬误的方法。他处处把概念的错合看成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思维者

* 参见：Teodor Randal，《Journal des Débats》，1892年。

完整的精神及其正确的状态上。新的文献中的两处说明能更鲜明地向我们揭示他的思想。我们很难相信Л.Н.托尔斯泰⑯《愚昧的统治》里罪犯的母亲以及罪犯本人颇明事理的话语，也很难相信那些思维虽然连贯、但处于《愚昧的统治》下的人。相反，罪犯严守教规的父亲(阿基姆)以及他那有名的“嗒耶-嗒耶”虽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任何思想，但对我们都是意义明确的，我们愿意听他说话，相信他的话。他不仅仅在书本知识方面是愚昧无知的，而且口齿不清，几近哑巴，但在我们看来，他理智清晰，是真理的代表者……如何得到的真理？根据什么逻辑的规则？对于培根、亚里士多德，即《Novum Organon renovatum》⑰的作者而言，他不过是个只值得扔一块面包的乞丐。杜勃罗留波夫⑱在《黑暗王国》里演绎卡杰琳娜性格时，指出她特别珍贵的特点在于她不是理智地悟出对周围“黑暗势力”的抗议，而是以其身心和真实的心灵感悟到这些势力的虚伪和丑恶。上述几位作家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有他们血管里流动的共同的民族血液使他们能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真理，视之为完全不是脑力活动、也不是概念的理性迭合的成果。

二

我们涉及的只是泛斯拉夫主义崇高而光辉的奠基者们的学说中的一小部分。霍米雅科夫在《一个东正教徒就劳伦斯先生的小册子简论西方信仰》(1853年)、《就巴黎大主教的一封信再论西方宗教》(1855年)、《就各种拉丁语和新教文献三论信仰对象》(1858年)、《致帕默⑲的几封信》以及《教会学说手册写作经验谈》等著作中，在同两个西方宗教的对比中首次揭示了东方宗

教体系的特点。宗教的本质是爱，是和睦，因而它的自然外形是共同性。这在东方得以保留，而且谨小慎微地不违反原则，以至于东方教会在脱离西方教会后从不敢参加教主的普世会议，尽管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普世的前提是全体成员的出席，而西方教会的成员对东方教会仍不依不饶。东方教会不想、也没意识到它未讲和就能“参会”；它在千年隔绝状态的生活中接受了暂时的恶，当这个恶满“期”到“限”时，基督的教会将同分离的成员和安静的羔羊们重新“举行涂圣油仪式”。我们想说，这个爱与和睦的原则在东方悲惨的历史战乱时代被罗马教会背弃了；在灾难深重的时刻它既没有怜悯、也没有同情东方，而是鄙视东方，虽然它这种感情的理由可能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感情是不对的，在此支配之下再无是非可言。我们甚至无法以最简炼的线条勾勒霍米雅科夫世界观中所有意义深远和美妙的发展过程，但他解释说，新教一样不过是对教会的这种关系的延续，只不过是西方教会中已经形成的反对罗马的分支。在罗马，路德[20]、兹文格里[21]和加尔文已经追究了罗马不能宽恕东方的罪过，很久以后，在我们的眼前这些分离仍在继续，因为在“自由的思想家”看来，新教充满了信仰，于是出现了把基督教作为错误理解的神话加以抛弃的蒂宾根神学派[22]，出现了把所有宗教乃至一切精神的东西加以推翻的唯物主义。

三

K.阿克萨科夫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对索洛维约夫[23]的巨著《俄罗斯历史》第七卷出版后进行的批评分析最为精彩，它使俄罗斯的历史结构得以统一。他首次指出不能把俄罗斯历史仅仅归结为从外部并用暴力改造因循守旧的人民的俄罗斯政府

的历史。国家因素只是历史上起限制、制约和保护作用的形式方面；然而就是在这方面作过描述的只有卡拉姆津[24]和索洛维约夫。军队的高官和公文式的命令，征敛税赋的公爵，把国家利益置于家族关系之上的莫斯科大公以及作为启蒙者和改革者的皇帝，这就是以前历史学家永恒的主题。他们在研究这个主题时未必能偏离主题，适当兼顾站在舞台后排默默无声、无所作为且缺乏决心的人民。于是读者不禁会问人民站在那里干什么，表达什么思想。

村社因素就像西欧的家族因素一样根深蒂固地贯穿于俄罗斯历史。这就是K.阿克萨科夫在《论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古代生活》这一精辟文章中的主要发现。这个村社因素表现为古俄罗斯的市民议会制度。大公们的意志以及国家的因素左右着诺夫戈罗德市民议会的决定。人民并没有默不作声，没有干站着，不只是空占着东欧广袤的地域，而是作为生气勃勃的道德力量在作用着，思维着，创造着。市民议会根据大公们的意志在各个城市保留了下去，即村社以各种变化的外表形式继续存在，其中有些显然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使历史上响彻了枪炮声，充斥了大公们之间关系的变故。后来，随着莫斯科统一各公国，城市的村社生活融合表现为全俄缙绅会议。这是召集选举者与会并将国家置于自身之上的缙绅会议。第一个沙皇召开了第一次全俄缙绅会议。缙绅会议赋予沙皇在活动、法律和暴力方面不容争辩、但须拥戴确立的权力，而沙皇又赋予缙绅会议倾听民意、反映实情和精神信仰的不容争辩的权力。沙皇按上帝的旨意行事，缙绅会议只能以自由表达的思想附合沙皇，而采纳与否是沙皇的自由。市民议会、和睦与爱的最高因素就反映在这些关系中。

这个因素在历史上还表现在俄罗斯时时处处的日常生活

中：只要提一下米尔㉕和我们的土地公社，只要想一下俄罗斯人所钟爱的合伙方式之简单易懂，就可明白这个因素的公正性了。

这就是 K. 阿克萨科夫最言简意赅的解释。在这三个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奠基人的周围还有一些少数派和后来者，如 П. 基列耶夫斯基，Ю. 萨马林㉖，И. С. 阿克萨科夫㉗，诗人丘特切夫㉘以及略微远离他们、人们尚不太理解且很少评介的 Н. П. 吉里亚洛夫-普拉图诺夫㉙。他们所有人在泛斯拉夫主义中的作用都要小得多，因为他们既没有使这个学说产生分支，也没有使它变得更复杂或更深奥，他们只是加以细化并把它运用于许多个别情况和重新产生的现象以及以前未曾注意到的老现象。

四

Н. Я. 丹尼列夫斯基给所有这些学说披上了严实的外套，在这个柔嫩、脆弱的生命中心做了个外壳——仅此而已。由此产生了老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代表人物（如 И. С. 阿克萨科夫）同他的分歧；准确地说，是泛斯拉夫主义富有活力和成果的本质方面的表达者。他实际上没有指出、也没有说明我国历史构造的任何特点，对泛斯拉夫主义未增添一砖一瓦。他的作用是另外一种，更微小，但更拙劣，只需三言两语即可弄清楚。

有机体有类型之分，这不是属，也不是种，更不是器官不同的种类，而是差别更深刻并与机体藉以建立或产生的构架有关的类型。人，鸟，蜥蜴，鱼，它们的外表看起来无论有多大的差别，其本质上的构架是一样的：它们有一条从机体前肢伸向后肢的理想线条和对称排列其左右两侧的一系列器官。但海星却不一样：它的外形呈中心散射状，看不出有上述所有生物机体的构架，因此，这种动物的构造靠的是第二种构架，需要创造性思维

新的努力，而构造蜥蜴或鱼时只是在材料上作了新的工作，套用了同人的构造一样的构架。同样，在研究双壳贝壳的内部或提到过去所熟悉的动物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有机体的另一种类型。"仅仅表达了惊讶、困惑以及对大自然突然展示的非常之物所感到的措手不及。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的话，在世界历史上也可看到某些类似的现象：有一些民族群的差别并不在生活的细节和活动的形式上，也不是某种东西的增减或转换，就像哺乳动物和鱼类的某些功能和器官能转换一样——有的民族和文化是世界历史性的，仿佛在发展和构造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另一种构架。对同一种需求他们的回答是不同的，碰到同样的事物他们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就像伤口的疼痛会使菲罗克忒忒斯[30]叫喊，而使约伯[31]惶恐不安：莫非自己造了什么孽？亚皮斯·克劳笛斯因强占维尔吉尼娅[32]被判有罪，在监狱里撞墙而死；而大卫[33]因强占维尔萨维娅被判有罪后，却谱写了忏悔和悲伤的圣诗乐曲。整部《圣经》里没有一个三段论，虽然训诫、解释和劝善如同我们使用"因而"一词一样俯拾皆是，几乎从第一页开始到最后一页结束——这不奇怪吗？这些人周围是同一个世界，但他们不是同类型的人，他们内部琴弦的音阶是各不相同的，即他们的概念迭合是不同的，感情方式和概念内容也不尽相同。他们只是外表上相似，虽然都是做买卖，打仗，周游世界，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实现的是不同的东西，经历的是不同的事物，因而相互间很少理解或要很费劲才能理解。阿拉伯人和罗马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就是这样——一种人喜欢喧闹的论坛、雄伟的卡庇托林山[34]、克尼都斯城的阿佛洛狄忒雕像[35]，而另一种人恪守遗教，没有祖国和疆土，为世界而悲痛伤心。斯拉夫人就是这种历史命运。他们同罗曼人、德国人和英国人有渊源关系，从他们那里学到和引鉴了许多东西，但

最终仍未完全掌握,感觉不到、也理解不了他们构造形式的内在必要性,在内心隐私、气质、笑容和讽刺的微妙差别方面和在悲伤、不由的失望及冲动创作的祈祷中学到的东西则更少。这就是不同心理构造类型的人,由此而产生他们不同的生活构造——其历史的内部构架。

基列耶夫斯基、霍米雅科夫和K.阿克萨科夫所观察到的事实使他们惊讶之余又感到难以理解。丹尼列夫斯基给这种现象起了名字并指出自然界也有相似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他没有指出这种现象新的特点,没有用自己的东西来补充早期泛斯拉夫主义学者所作的观察,对作为关于俄罗斯民族及其历史特征的学说的泛斯拉夫主义更是毫无贡献。他的作用仅仅是形式分类。他说:"这些特点的组合是特殊的文化历史类型,是世界历史分解的类型之一,这些类型在历史上并非以继承方式互相延续,而是在互相交替、互相依存的同时构造了不同的东西。"

《俄罗斯和欧洲》的读者现在如此之多,他们可以从这本书中很容易地看出他们为什么、根据历史的哪些一般规律不同于德国人、法国人、罗马人和希腊人,但是,究竟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祖国在历史、生活和文化方面同那些国家究竟有什么不同,从这本书里是了解不到的。这只能从基列耶夫斯基、霍米雅科夫、K.阿克萨科夫以及其他一些泛斯拉夫主义的初创者的著作中找到答案。"我是谁?""我的周围不同于我"——这就是简炼的表述,这就是同一学说中心和边缘部分的公式,是这个学说极其富有成果的部分和硬性的、只能用于区分的外表方面。

2. K.H.列昂契耶夫[36]

K.列昂契耶夫,《东方,俄罗斯和斯拉夫民

族》，第 2 卷，莫斯科，1885—1886 年。

C. 特鲁别茨科伊公爵[37]，《绝望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以及：《我国文化的矛盾》（《欧洲学报》，1894 年）。

П. 米柳科夫，《泛斯拉夫主义的分化》（《哲学和心理学问题》，1893 年 5 月）。

Г. 基列耶夫，《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盟友》（《斯拉夫慈善协会记录》，1894 年）。

Л. 季霍米洛夫，《俄罗斯的理想和 K. H. 列昂契耶夫》（《俄罗斯观察》，1894 年 10 月）。

И. 福杰里[38]，《K. H. 列昂契耶夫的文化理想》（《俄罗斯观察》，1895 年 1 月）。

泛斯拉夫主义不仅是可以表达的真理，也是某种道德需要；这不仅是学说，也是生活中的一种准则，是我们用来判断和处理实际需求的法则和规则——就是在这微不足道的方面自最后一位杰出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故世后展开了不停的斗争。我们理解1892 年去世的 K. H. 列昂契耶夫。他生前几乎无人知晓，死后却立即引来了大量而热烈的评论。这些评论可同他的 opera politica[39] 等量齐观，也远远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评论。他是泛斯拉夫主义者吗？莫非是西欧崇拜者？西欧崇拜者讨厌地拒绝了他，而泛斯拉夫主义者也害怕他加入自己的行列——他的地位是唯一特殊的，而这特殊性表明了他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大学者，表明了这是一种在我国文学和历史中尚未明确地位的巨大力量。

一

丹尼列夫斯基把诸如中国闪语族、古代世界、罗曼-日耳曼欧洲以及斯拉夫民族在历史构造上独立的、封闭而有特色的世界称之为文化历史类型。K.列昂契耶夫没有对他的思想作任何修改，称同一个事实、同一组历史现象为文化历史风格。前者的思想和名称借自于生物学；后者以自己特殊的天赋和爱好在保留原有概念的同时改变了名称：他把艺术界的法则和思想扩展到了历史学中。他在泛斯拉夫主义历史上的地位要比丹尼列夫斯基更微不足道，更没有独特性，而且仅仅是形式上的作用而已。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表明其作用不十分重要。

《东方，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人》——他给自己的文集取了个这样的书名，以此表明其主要研究、崇拜和热爱的客体间的递进关系。斯拉夫人在他那里完全退居末席；其主要思想是论述新文化，既不是欧洲的、也不是资产阶级和实用主义的文化。俄罗斯是有关这个文化的思想中最大的希望，但它也仅仅是相对的一个部分。其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东方上，这是其他的、完全新颖的、不同于欧洲的文化因素的代表。土耳其人和鞑靼人，雅典的僧侣和我们的古老信徒派教徒——这一切在吸引他的形象中占有一席之地；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高卢人则在他的史学分析和爱好中不占任何地位，虽然他们也曾师从我们，或曾以巴黎和柏林为师。根据他的文章及文章中表露的狂热、绝望和令人惊讶的大胆，他不仅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希望之星（如同所有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文化的代表者，幻想国的唯一公民——哥伦布[40]式的人物，虽已登上了新大陆，但目标远非在此；就是在这新大陆上，他对古老的、被遗忘的、半生半死的世

界(如他所想的那样)也很少感到拘束,似乎他不会对祖国西班牙的信仰和偏见感到拘束一样,如果他不再想回国的话。

他的历史、政治观点的出发点体现在他的三阶段思想中,其中贯穿了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如同田野里生长的初露尖角的萌芽,或如同人、民族以及天体的胚胎,原始而单纯,随后才会繁化;是重又单纯的混合物的萌芽,是谷粒长成麦穗又再成谷粒;是民族实体以及从中产生的阶级、地位和权力的层次,然后在堕落时重又蛮化的庶民的纯朴(如中世纪前的希腊和意大利)。恒星起源于混沌无形的斑状物,在其周围产生了行星,行星上又分出了大陆,覆被了植物,生活着动物,随后冷却的世界又没有了生命,变得苍白、赤裸裸、纯朴——这就是世界进化伟大而普通的事实。在生与死之中,没有什么能违背这三阶段的法则。如果我们要问其中主要的是什么,那么会看到,这就是边缘、界限和分离的因素。显然,它既作为外部因素,同时又是每个事物的内部准则及生活压力和生存能力的标志。既然我们热爱自然,想要保护大自然中的生命,就应热爱这个区分和分离自然事物的法则。由此可推导出善与恶的标准,有利和危害整个大自然和历史的标准。这是同以往政治和道德中已经形成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标准,它鲜明、艳丽和美妙(都是边缘的表现),本身并不珍贵,但却同健壮和长寿的保障一样,是我们在研究每个历史对象和所有政治、社会和艺术现象时都不用担心会出错的衡量标准。K.列昂契耶夫就是以这种形式的、因而不会出错* 的标准来评价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我们把西方文明生气勃勃和强劲有力的活动称之为"大革命",由此开始我们的历史以及思想和追求的历史。但它只是欧洲进入的最后发展阶段——重新纯朴的混合。

* 即不掺杂任何主观的东西。

我们如此热爱自由，努力追求它，但自由只是把个人——这个社会的原子——从曾经把它活活束缚于强大的、但现在已经崩溃的机体中的法则里解放出来。在这个机体中，所有的一切都丧失了独立性，都混合在一起，彼此模仿，融为一体，吃大锅饭*，因为万物都在灭亡。然而我们却感觉不到这个过程的灭亡，因为我们正是其代表者。我们对愿望、智慧和信仰的追求不仅仅属于我们，而是我们的时代赋予我们的，而这个时代的意义及其普遍且不可抗拒的趋势就是灭亡。无论是教会的雄辩，抑或是暴力及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遏止这个生物过程：欧洲在半个世纪以前还到处色彩缤纷，风格各异，但现在到处都是同样的资产者，同一的行政体制，几乎相同的法律和生活方式。伟大而古老的历史大厦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塔楼倒塌了，突出部分消蚀了，区分线条变得模糊不清，留在神圣和壮美的庙宇废墟上的只是大堆的砖石和依稀可辨的轮廓，这可是我们曾经非常热爱并从中受益匪浅的庙宇啊，可现在……我们是爱它还是恨它？谁还会像我们在自身区分这两种感情？

几乎无需解释俄罗斯在这欧洲文明伟大趋势中的作用，即无需谈论它的对外或对内政策，因为对它的全部愿望和对其国内的全部现实的评价由此已不言自明。

二

我们已经说过，丹尼列夫斯基和列昂契耶夫对泛斯拉夫主义的作用具有外部和形式的特点，但同时又有另外更大的重要性。可以说，泛斯拉夫主义正是以他们为代表首次超越了民族价

* 用列昂契耶夫的术语来说，是“财产平均的过程”。

值的范围并获得了普遍意义。基列耶夫斯基、霍米雅科夫、K.阿克萨科夫等泛斯拉夫主义的创始人的学说是我们的家事，是我们的自我认识，不具有全人类性，但是，文化类型的理论和边缘、界限的理论作为整个大自然生活压力的标志却是历史的哲理，是高级的政论文章，它在两个文明之间挣扎、忧虑和痛苦，它同时爱着两个文明，但在爱它们的同时更爱生活和人类，厌恶和害怕衰败与死亡……恕我们斗胆地指出上述作者的名字应在马基雅弗利[41]、孟德斯鸠[42]、J.伯丹[43]、E.波尔克、普鲁东[44]等的名字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呼唤着新的学说，否定涵盖广泛的学说，事实上是在依靠涵盖广泛的哲学在否定和呼唤比那些伟大天才的理论更广泛、更新颖的东西。

K.列昂契耶夫比丹尼列夫斯基更神秘，更复杂，不是那种观点简单明了的学者，而是个性和本性很强的，即只表达自己观点的学者。最近几年所发表的评论他的诸多文章以及他去世后我们所看到的愤怒、不解和醋意的自卫的大爆发是令人震惊的。几乎没人从内心中对他感到彻底的、不附保留意见的满意，然而，几乎又没有人能在否定他的同时，内心中又掩饰不住对他的些许惊讶和赞赏。当然，我们指的是有洞察力的人。

他的精神实质由三个成分组成：自然主义，审美观和宗教信仰。这制约了他的判断，也促成了他的世界观。他学的是医学，成年后是一个政治家和作家，死时是亚丰山的隐居修士。他力图使自己的其他意志服从于宗教信仰。但服从得怎么样？服从了多少？这是一个谜，也是他的论述的答案。如果摆脱他文章中的表层意义，仔细听他说话的语调，仔细观察他在谈论这些或那些事物时的兴致，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上述三个成份在他的身上并未得到协调的联系，我们想说，它们没能在自身的法

则和本质要求的依存性上联系起来。他的审美感是自发的，奔放的；他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个评价以及他所表达的每个要求、否定、希望和悲痛都飘逸出这种审美感。可以感到，作者在这里的本性毫无掩饰，但在想要或需要克制时又无法克制*，他也不想克制自己的内心情感，因为它像流水一样，奔流不息地泻下山坡，拍打着岸边，退回去，过了一会儿又涌向岸边（关于他把华丽和道德及宗教信仰作对比的例子参见《致 И. 福杰里的信》)。这种感情就是他的生活，是他盛放悲伤的陶罐，是他全部喜悦的源泉。他对边缘、界限基础或者形式基础的理论的理解是如此之深之广，因为它首先是美的基础，是整个世界的美学方面。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他身上被称为自然主义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他对历史和政治的分析是冷静和自如的，就像医生在病人的床榻边只想了解、别无他求一样**。他的判语是无情的***，他的说明和劝告常常是直言不讳的****。这有时会使读者暂时弃他而去，直至他后来身不由己地服从于智慧的力量和语言的真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宗教……语言是多么流畅，而

* 参见他给 О. И. 福杰里的文笔精彩的私信（几乎是一篇文章的篇幅）。此信由后者发表于 1895 年第 1 期的《俄罗斯观察》中。这封信对评价列昂契耶夫的内心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信中所展示的一切可以更早地猜测到。

** “未来的和所期望的科学应充满对自身利益的鄙视”(冷漠无情，不奉迎人，不取悦也不安慰人)。毫无疑问，列昂契耶夫本人达到了这个要求。上述话见《致 И. 福杰里的信》。

*** 例如，在论及斯拉夫人、甚至俄罗斯人及俄罗斯时，他说：“我们，生活得很长久，但精神创造很少”；“我们所有独特的和有意义的东西都属于拜占庭，没有任何东西源自我们自身的、斯拉夫的血脉。”(《拜占庭和斯拉夫民族》是列昂契耶夫观点的核心文章，刊于《东方，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第 1 卷)

**** “俄罗斯民族就是这样——当他们头上不再呼啸国家的鞭子时，就成了‘上帝的司书’。”(引自《Л. Н. 托尔斯泰伯爵长篇小说分析，其风格和影响》)。

想象又是多么贫乏，书写和思维是多么呆板！但那里有使我们震惊的天才思想的火花和伟大政论家的激情，当他谈论人间的事物、世俗形式的美妙、政治的尴尬和历史潮流危险的曲折时，他的激情是多么炽烈，多么酣畅，多么诱人。* 这里他不作深究，不作深思，也没有探索；他在不会更多玩弄字眼的言语中失去了生命，引用了与实际相应的典范词语，仅此而已；只有某种外部形式上的东西、外来的要求和他难以理解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确实，他生前皈依了宗教。我们又会问自己："是如何皈依的？"怜悯在哪儿，喜悦在哪儿，对信仰对象可信而又单纯的冲动又在哪儿？他把宗教所要求的东西献给了它，他服从于宗教，但无所行动，只是消极地服从，尤其是在美学和思维的领域里；他在这里不感到忧伤，不感到愤怒，就像他看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灭亡时或人们对世上万物的状况愚昧无知时一样。他甚至同自己的信仰背道而驰，并不十分恐惧；他说："……人间生活的诗歌(NB[45]：是首先能记起来的)和死后的超升条件都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的不断的爱，也不要求不断的恨……而客观地说，要求的是从最高目标出发的对恨与爱仿佛协调的斗争。为了使萨马拉人有值得可怜和包扎伤口的人，我们必须落草为寇……"

当他把这个二律背反扩展到整个历史和全部生活时，他进一步说，世界上的残酷和不公正像温柔和善良一样，是必要的，实际上同样不可避免，也无可指责。我们过于聪明的朋友是这样或可能会这样审判一个人，但值得为此这么做吗？如果救世主在谈到萨马拉人对残废的过路人持这种想法时，仍会讲述我们在

* 参见《民族政治是世界革命的工具》；试比较这部小册子的语言和宣传神学的文章《我们的新基督徒》及《克利蒙特·杰德尔哥尔姆教父——奥普丁修道院的修士祭司》一书的语言。

教堂里听到的且不加分析就接受的感人故事吗？而列昂契耶夫出家后在教堂里听到过这样的故事，并把它运用于对历史奇怪的附录的解释中去。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在他所论及的无数事物中，有许多可笑的、畸形的和丑陋的东西，它们会令人掩面而去，而且带有不仅仅是法律性的“奴隶的标志”，但是其中没有一句话、一个事实或一件事情是靠他的其他优点（诸如好的、真实的和伦理方面的优点）赢得人们赞许的。相反，他在其极富鼓动性的著作中表现为美、甚至是美和恶的混合物的思路灵活的辩护人，就像上面所举的萨马拉人和强盗的例子一样。受鄙视的收税人，实际上可笑又可怜的收税人，不是古老的寓言故事中的收税人，而是就在身边某个地方、就在街角旁的收税人——这就是他始终没弄明白、也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他甚至还想和上帝一起来反对他……*

这些贫困的村庄，
这个贫瘠的自然……
外星自豪的目光
看不清也弄不懂
你那温顺的赤贫中
所神秘透射的东西——

这个象征泛斯拉夫主义的必要成员失去了他最后的信仰。

---

* 参见 И. 福杰里所著的《K. H. 列昂契耶夫的文化理想》一书及其中列昂契耶夫论阿尔基维阿德[40]的话。按照基督教的观点，古希腊人的善行不过是“美丽的缺点”；相反，从列昂契耶夫的观点来看，古人的缺点有些是“善行”。

三

以上通过对他内心的远眺和近视使我们对他晦涩的理论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再重复一遍：这些理论的组织是明确的，他的否定和肯定之间的联系也是明确的；只是他本人，他的悲哀和忧郁是神秘莫测的，使想彻底看清他面目的人不由地感到难堪。在多年的各种活动中，他不断地提到西方和东方的民族及其可能或必然的命运；但在他的言论里总是漏掉些他作为僧侣应事先有所考虑的话，而我们或许会期盼他事先能有所考虑。教会及其所许下的特殊诺言——这就是他完全遗忘的东西，在他的恐惧、怀疑和因之引起的愤怒中未占一席之地。* 他没记起它来，并且因此感到不快。他对历史的理解和对人类命运的预测不过是自然主义的。上面我们已经指出了他的思想的出发点——三阶段理论，即所有生与死的发展均需经过这三个阶段。但它们同教会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们以前在惊人的周期性的再生中没有

---

* 这就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忍受吧！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将过得更好，一部分人会过得好些，另一部分人则会差些。这种状态、这种悲哀和痛苦的沉浮——这就是世上唯一可能的协调！不要抱有更多的期待！记住：万物皆有终；就是花岗岩山崖也会风化和消蚀，就是巨大的星体也会消亡。如果人类是活动的有机现象，那就更应该有末日。而如果会有末日，我们有何必要去关心遥远的、我们甚至难以理解的后代的幸福？……如果我们至今对理论真理或人世生活的谜底一无所知，我们怎能指望会有万能的道德或实际的真理呢？"(《我们的新基督徒》，第 23—24 页）又例："……乐善好施的宗教团体要使人们主观上长久地满足，但这同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经验是不相符合的。"(同上，第 34 页）在这两个例子中他却没有想到上帝，似乎地球上根本就没有教会，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基督，更没有"上帝"这个词："我活着你们才能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 19 页）他仿佛只是在需要时才会抓住教会，不需要时甚至都忘了手中攥着的是谁的衣角。

看到过这种永恒性？如同基督教社会在无神论的文艺复兴后和18世纪崇尚理智后所经历的再生？如同在本世纪40—80年代后，在如此坚决似乎又很彻底的否定后我们正在经历的再生？作为伟大的美学家和政治家，他看到了历史上群情激愤的人民大众，他热爱他们，钦佩他们，但也就是作为美学家和政治家，他根本看不到那个指引、保护、支持前进者的神圣的运动中心。他只是区分了蹒跚的人群——根据“人头”的自然群；他这里所发现的一切是准确的、真实的、科学的；他始终不清楚的是神龛中的圣像，就是它选择了这些人群并指引他们走向开放的、期待发展的教堂。他所热爱的历史上的一切——这点点烛光、激动人心的神幡和缭绕盘升的香烟——并不是以自身美的力量而存在，而是以自己侍奉和膜拜黑色小圣像的长期义务而存在：

上帝以奴隶的装束
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祝福着走遍了你，
祖国大地。

从这个奇怪的、几乎是多神教的沉思中产生了使我们感兴趣的作者的第三个特点：他的否定甚于肯定，厌恶的感情甚于爱情*、希望和激情。美学因素实质上是消极的，它呼唤我们深刻

* 我们只谈其作品、思想和世界观的结构。他两年前(1896—1897年)在《俄罗斯观察》上发表的致古巴斯托夫先生①的(私)信反而证明了他作为个人、有家室的人及社会的主人和成员，内心充满了非凡的温暖和同情。(同其铁石心肠的理论相反)他的善意和温柔已臻可笑的地步，例如，他因喝“亚里”牌汽水欠了几十卢布的债，几十年后他虽仍一贫如洗，可仍可笑地念念不忘地要还这笔债，甚至不知道那位土耳其公民是否还活着。许多类似的情节足可以勾勒出其内心感人和温柔的特点。

反省，它制约我们，使我们厌恶他所反对的一切；而使我们去立功，去牺牲——这是它永远做不到的。人们不愿去参加十字军远征，不愿去革命，去流血……为了人间的阿佛洛狄忒。K.列昂契耶夫只知道也只热爱她——天上的阿佛洛狄忒，人类的伦理因素——这就是推动、鼓舞和完全征服人类的东西；也正是因此人类流了血，而且永远不会停止流血。列昂契耶夫对将来不抱希望，这是因为他为人们担惊受怕的同时没有看到他们身上值得尊重的唯一的东西，而且也没有尊重它。由于他对伦理运动的起源的无知就像味觉衰退一样，他也没有感到人的不同于其服饰、运动美等东西的品味……其自然结果就是对现实的奇怪而消极的态度，因此而被叫作了“反动派”。热爱生活中残留的美，收拾其碎片并想方设法拼凑起来，这就是他号召人们去做的全部事情，这出自他著名的学说的基本理论和话语。强大的智慧和坚定的观点告诉他这一切不会持续很久，生活不会停顿；同时他又不能冲锋向前，因为他说不出、没看到、也不理解历史上人是凭什么为力量冲锋向前的。

四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我们说过，他是一个新人，是某个幻想国的唯一公民；这是说，他彻底地抛弃了西方的成见、信仰、习惯、希望和概念的破衣烂衫。但是，他抛弃了之后又没有穿上足够新的衣服。线条有表达力，色彩艳丽、斑斓——这就是他对未来文明的想象：宏伟的大门，耸入云霄的旗杆，但世间已没有神甫，没有圣礼，没有信条，没有恐惧，也没有死后的期待。“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夜晚”，他会就所有的一切都说这番话。他知道，他预感到，他看到人们不会因为他那诱惑力

不大的线条美而放弃“功利和平均财产”的舒适生活。

但这是在东方吗？他思索良久的且只能从外部理解的历史以其外表的群众运动能够向他指明历史上隐含着的美学和宗教原理。一切又都向耶路撒冷运动——世纪的意义，历史浪潮的意义就是这样。历史的浪峰离开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冲刷了地中海的整个沿海地区，在西班牙稍作停留后，又在法兰西大放异彩，转而涌向了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然而在西欧和中欧低落的时候，又在我国辽阔的平原掀起了波澜，击皱了一潭死水，几乎与那些运动起源的古老国家擦肩而过。谁能揣度到这个运动的意义？谁能推测未来？然而很清楚，我们并不是为了反省某些美才走向那里，也很清楚，也不是为了死亡。

他一切都弄错了；他错了，而我们却毫无痛心地一再怀念他。“如果有时以无可争议的论据使我确信我迷了路的话，我会庆祝伟大的快乐节日的。”这个杰出的人物就是这样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这样述说其学说的构成。他确实崇高、伟大，他把自己的思想当作重负和疾病来承担，然而命运令人嗟叹，疾病和重负是子虚乌有的，这直到很晚才弄清楚，以至于不能向他报告重负已释的消息。是的，高尚的灵魂，你错了；但如果你热衷的是真理，而不是这个迷津的话，你不会沮丧地走入坟墓的。真理是永远令人喜悦的，而所有悲伤的 eo ipso㊽都是迷津，这难道不能聊以自慰吗？难道这不能保证上帝和生活是一体，生活像上帝永恒一样永不灭亡吗？

1895 年

译 注

① Н. Я. 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 俄罗斯政论家，社会学家，自然科学家，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家。

② И.В.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 俄罗斯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政论家,泛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

③ A.C.霍米雅科夫(1804—1860)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诗人,政论家,泛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

④ K.C.阿克萨科夫(1817—1860) 俄罗斯政论家,历史学家,语文学家,诗人,泛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

⑤ A.И.科舍列夫(1806—1883) 俄罗斯社会活动家,政论家。

⑥ W.威韦尔(1794—1866) 英国科学家,哲学家。

⑦ J.加尔文(1509—1564) 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宗的创始人,继M.路德之后新教改革的主要领袖之一。

⑧ L.A.费尔巴哈(1829—1880) 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

⑨ 布伦奇利(1808—1881) 瑞士法学家,国家法、国际法和法学历史专家。

⑩ M.施蒂内尔(1806—1856) 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

⑪ 德语,意为"《唯一及其特性》",系M.施蒂内尔所著。

⑫ J.J.卢梭(1712—1778) 法国作家,哲学家,自然神论者,感伤主义文学代表人物。

⑬ I.牛顿(1643—1727) 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经典物理学创始人。

⑭ C.里内(1707—1778) 瑞典自然科学家,布拉格科学院院士。

⑮ C.龙勃罗梭(1835—1909) 意大利司法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犯罪学和刑法学中人类学的创始人。

⑯ Л.H.托尔斯泰(1828—1910) 俄罗斯著名作家,伯爵,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名誉院士。

⑰ 拉丁语,意为"《工具论》",系亚里士多德所著。

⑱ H.A.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 俄罗斯文艺批评家,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⑲ W.帕默(1811－1879) 英国神学家,宗教活动家,政论家。

⑳ M.路德(1483－1546) 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宗创始人。

㉑ W.兹文格里(1484－1531) 瑞士宗教改革家,政治活动家。

㉒ 蒂宾根学派系18—19世纪德国新教理论的一个流派,起始于蒂宾根大学并因此得名。

㉓ C.M.索洛维约夫(1820－1879) 俄罗斯历史学家。

㉔ H.M.卡拉姆津(1766－1826) 俄国作家,历史学家,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㉕ 俄语МИР意为"俄国农村公社"。

㉖ Ю.Ф.萨马林(1819－1876) 俄罗斯社会活动家,政论家。

㉗ И.С.阿克萨科夫(1823－1886) 俄罗斯政论家,社会活动家。

㉘ Ф.И.丘特切夫(1803－1873) 俄罗斯诗人。

㉙ Н.П.吉里亚洛夫-普拉图诺夫(1824－1887) 俄罗斯政论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㉚ 菲罗克忒忒斯系古希腊神话中的弓箭手,曾参加特洛伊战争。

㉛ 约伯系《圣经·旧约》中的乌斯富人。

㉜ 维尔吉尼娅(公元前约450年),卢齐斯·维禾吉尼斯的女儿,受荒淫无度的罗马执政官亚皮斯·克劳笛斯强暴,其父为解救她而杀死了她,这导致了十大执政官被废黜,而亚皮斯·克劳笛斯则锒铛入狱,最后在狱中自尽。

㉝ 大卫系《圣经·旧约》中以色列国王。传说《旧约·诗篇》系大卫所作。

㉞ 卡庇托林山为罗马城发源的七座山丘之一。上有卡庇托林神殿,是元老院和民众聚会场所。

㉟ 克尼都斯系小亚细亚西南地区的一座城市。城内有一座十分著名的古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的雕像,系古希腊雕塑家伯拉克西特列斯的作品。

㊱ K.H.列昂契耶夫(1831－1891) 俄罗斯哲学家,政论家,政治活动家。

㊲ C.H.特鲁别茨科伊(1862－1900)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

㊳ И.И.福杰里(1864－?)　俄罗斯神学作家。

㊴ 拉丁语,意为"政治活动"。

㊵ C.哥伦布(1451－1506)　西班牙航海家,探险家,美洲大陆的发现者。

㊶ N.马基雅弗利(1469－1527)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作家。

㊷ C.L.孟德斯鸠(1689－1755)　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反对专制主义。

㊸ J.伯丹(1530－1596)　法国思想家,法学家。

㊹ P.J.普鲁东(1809－1865)　法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㊺ 拉丁语 nota bene 的缩写,意为"注意"。

㊻ 阿尔基维阿德(公元前450－前404)　古希腊政治、军事活动家。

㊼ K.A.古巴斯托夫(1845－1913)　俄罗斯外交家,外交史学家。

㊽ 拉丁语,意为"他自己去"。

在B.C.索洛维约夫的祭祷仪式上

1901年7月30日，已故的索洛维约夫的一小部分朋友和崇拜者聚集在铸工街上的谢尔吉耶夫教堂，举行祭祷他的仪式。这个奇怪的东正教仪式的词语是多么符合亡人的个性和命运。真想再多听几遍唱诗和祈祷中的词语，以便把它们同他某个难忘的生活特点或生前的希望联系起来。果真联系起来了！“好像祭祷礼仪是为他发明的。”当我站在教堂里时，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闪回了两三次。我进去时是冷漠的，出来时却大为感动，不禁想表达如下的愿望：索洛维约夫这周年的、形式上也需要的祭祷仪式不应仅仅限于其亲朋好友，以后每年应预定这样的祭祷仪式并公诸报端。显然，人们热烈地怀念他，显然也将长久地铭记他。对于他来说，为了展现他的精神和生活的面貌，任何对其著作的分析或文字宣传都不能像普通的安魂弥撒那样实在，那样热情洋溢。

这就是智慧、思想，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漫游者？

他是教授的儿子，而且原本极有可能要接任教研室主

任，却因"无能为力的原因"而未能接任；他是神父的孙子，而且为了纪念爷爷写了《善的见证》，极少自愿地在神学学术杂志上抛头露面；他是记者，带有宗教和教会的思想，但几乎从不把它流露于笔端。他钻进一条小缝，像手足无措的客人一样坐着，准备马上带着含义双关的笑声振翅飞去。他的这个笑声是多么奇怪和嘹亮，可能遮掩了他永远的忧愁。如果说有谁实在没有理由"在俄罗斯过好日子"，那就是索洛维约夫。他住在哪里？莫斯科，彼得堡，自己的家里，还是朋友那里？或许，他只有在他经常爱去的伊玛特拉那里才会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也许，瀑布的声音及其奇异的景色，尤其是冬天的景色，使他很有感触而且感触极深。他对瀑布极尽歌颂之能事，并且把它同自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甚至想把芬兰那个天气阴沉的小地方改名为"索洛维约夫瀑布"。

祖父神父的血脉，父亲大学学术的事务以及我国 60 年代的整个精神面貌，包括跃跃一试的思想、鼓噪一时的否定和素来就有的俄罗斯"憨直"的性格，这一切在索洛维约夫身上都表露无遗。他是一个不专的神甫，只承担一些义务，即承担弥撒义务，这在他的心理学中可以发现，仿佛他跟你们长谈之后，回到家里披上项巾，开始准备明天真正的、职责之内的"神事"。他的言语中始终有《圣经》、教会和神甫的观点，有苦行修炼的"长老"的引语。同时他还对教育界、科学现状和学术团体感兴趣，虽然这不是他的主要兴趣，其中还包括他（不长且偶然的）授课经历。他喜欢授课，而且深有造诣。我们的教育界失去了他这样一位潜在的巨星，失去了可能对学生产生的巨大影响，失去了对思想和哲学的影响。这里应抱怨"学术界的不良倾向"。在那里，人们认为讲课的甚至可以是骑兵司务长，但不能是可能鼓惑人心的思想家。"宁静致远"——这就是俄罗斯的智慧。最后，由于神父和教授的

家族因素，在他身上冒出了记者的气质。这是一种变幻无常、时而讽刺、时而哭泣和呐喊、刚愎自用的气质，是真正的安息国[①]的骑士，他使睡意蒙眬、自满自足的古罗马不得安宁。在他的思想形象，尤其是他的生活和活动方式中存在着“60年代”的无底深渊，不容置疑，虽然他在《西方哲学的危机》中反对“实证主义”，反对60年代，但他却热爱和尊重这个年代，把它当作“亲身的”、“自己的”东西加以爱戴。他只是极富天才、多才多艺的“60年代人”，这么说吧，是混在扑克牌J和7之间就认不出来的时代大王。索洛维约夫身上也有相当程度的著名的改革时代的精神结构。

他70年代开始著书立说，同80至90年代的人已有相当大的分歧。改革后的第二代人比他更有意识。索洛维约夫曾意图鲜明地想同他们建立关系，但没有成功，尽管另一方也很愿意。第二代人很少有行动的愿望，但索洛维约夫不会生活，也不会行动。有一次他对我谈起他自己，说他“不是心理学家”。他是用其他词语来表达的，但是可以看出，他很惋惜自己在这方面才气不足。确实，他身上有一种骑兵式的盲目冒进，缺少步兵和炮兵的缓慢和谨慎。但他毕竟是个枪手。他开创的东西很多，但没能样样做好、做完或回头再做。虽然说他的“结局”不圆满，但他的出山、“萌动”和最初的几步对祖国以及对他个人而言都是天才的、必要的，而且是功名显赫的举动。

可见，他的形象在逝世后正在改善并得到净化；他在逝世前迅速地变好了，以致于他已准备好去死。这里我们理解他弃绝“合并”教会及迅速民族化的狂热而又欠缺准备的企图。神父的孙子突然从身上抛去了哲学家的外衣和政论家的滑稽角色。“受苦行戒律吧，快受苦行戒律！”仿佛他只来得及像古俄罗斯人和莫斯科人那样说完这句话。幸好他死于莫斯科附近，那里对他很

合适，就在俄罗斯的心脏附近。

我们不会忘记将一再地纪念他，正是在教堂里纪念他。相信这是他生前最强烈的愿望。

1901 年

译　注

① 安息国　公元前 250 年至公元前 226 年，在伊朗山地的东北部。

教育的三条主要原则

（与Д.И.伊洛瓦伊斯基[①]商榷）

很遗憾，拙文《教育的黄昏》(《俄罗斯通报》,1893年）在某些章节中尚阐述得不够明确，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说服力，此外，还可能导致对文章基本思想的错误理解。写作者有时不能使那些自认为内容最正确和最重要的思想具有最佳的表达形式，一些完全次要的、个别的情况会使他在最紧要的关头手软，而满怀希望开始的著作可能给他带来最大的失望。当然，他的读者中不会有人像他本人那样痛心疾首；他希望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以脑力劳动为生的圈子里引起关注，但却未能如愿以偿；他在一开始就用自己的双手把自认为最好的事情给毁掉了。

拙文中阐述的观点对所有在我国或在西欧为某种教育体系斗争的派别一视同仁。我有一点小小的希望，愿它们对所有的派别都有助益，因为它们揭示了众皆忽视的问题的一个方面。我既不想说教育的实科主义，也不想提教育的古典主义。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古典主义

的教育下年轻的受教育者却很少充满古典主义？为什么他们在实科学校毕业后，却对实用科学这一欧洲三个世纪运动的成果鲜有兴趣？我不想否定任何学派，我只想研究，为什么所有的学派都很少能达到既定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是人们多么鲜明和崇高的期望，为了实现它们，人们又是多么地锲而不舍。

一

窃以为，所有的学派以及所有正在斗争的教育体系都违反了教育的三条原则，因此它们的所有成果都是有争议的，而且对教育者本身也是很痛苦的。但是，毫无疑问，这对于那些对他们的努力作壁上观或横加指责、本身又一无所长、于事无补的人来说是无关痛痒的。这三条原则如下：

1. 个性原则。它要求无论是受教育者（学生）还是施教物（教材）尽可能地保留个性，因为这是人及其创造中最可珍贵的东西，是其中最美好的东西。正是通过对它的接触（互动影响）教育才能得以实施。哪里的个性没有得到保存、受到压抑或被忽视，那里的教育就完全不能实施——这就是我的思想。只有作为个人，作为这某一个人，而不是“一般的人”，我才能在思想和感情上有所建树，才能坚持不懈地追求。如果只把我看成“一般的人”，只是施教并采用一般的方法，那么就会把我培养成一个一事无成、不学无术、毫无特色的人；你虽然没有忘记许多东西，但却失去了你身上最好的东西；你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但永远不能唤醒我天性中已有的、但正在沉睡的东西。同始终只是种、属、类的动物相反，人始终是特别的。“个性”就是他最高级、最深刻的定义。无论哪个学派，只要能符合这个定义，其教育体系才能成为不违反这条个性原则的教育体系。这怎样才能做到呢？这意

味着什么?

让儿童尽可能长久地处于家庭环境中,然后使他尽量接近宗教,这就是这条原则对受教育者的要求:家庭和宗教本质上在施教方法和待人观点——别人是怎样对待他的——上是因人而异的。它们擅长此道并非出自义务的意识,也非出于忘我精神,更非由于它们比其他所有事物更好,而是因为它们能从内心和主观上去了解个人,而不是一种或一群人。它们的教育是最佳的。相反,不要太迷信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大学校,因为它无论给你什么,在这同时又剥夺了比给你的东西还要珍贵的东西。

不要抖落花朵上的花瓣:把历史文献的教学和研究减少到最低程度,把直接钻研增加到最高程度——这就是这条原则对施教物(教材)的要求。不要去死记硬背有关科托希欣[2]的两页文字或两个片断,而要去研究他写的四个片断——这就是这条原则简单而明确的使用方法。不要在读了荷马[3]四百首诗并开始有所掌握、有所习惯、且能毫不费劲地理解其语言时转而去读希罗多德[4]的作品,像以前读荷马的诗那样缓慢而一小篇、一小篇地学习,而应该完全放弃希罗多德,把荷马的诗钻研上一年半载——这是这条原则的另一条类似的使用方法。如果在钻研后尚未对所读作品产生愉悦感和爱不释手的兴趣,就不要过早地放弃任何钻研。最后,不要去死记脱离形象和意义的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日期资料,而只要记四分之一的人物和事件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及其意义——这是此项原则的第三个使用方法。现在的学校里很少读《波里斯·戈东诺夫》、《吝啬的骑士》、《伊戈尔国王远征记》以及《福音书》和《圣经》,相反却数以千页计地大量阅读不知何人、如何编写的同样是关于戈东诺夫、《远征记》、《福音书》、《圣经》以及世上万物的蹩脚文章,甚至还逐行逐页地研学。这种做法令人难解,极不明智,甚至会败坏风气。所

有的人都毫不怀疑，这里没有任何有教益的东西。

在指出(各类和各级)学校的这个缺点后，我自然应期待劈头盖脸的反驳。作为事先说明，我援引一个我认为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我曾借了一本由颇有名气的同行——何止是同行，而是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人——编写的教科书；后来，我又借了一本我国历史书和据此改编的教科书。改编的教科书中昭然若揭的抄袭使我们相信它对历史还有一丝兴趣和尊重，还有点忠实原著，但明显的是，类似的著作已排除了在教学中使用的任何可能。伊洛瓦伊斯基先生认为我的话是对他的“微词”。实际上，从我的摘录中他完全可以找到某种引以为豪的理由，随后，他会神情严肃地承认我的话是公正的，并毫无保留地同意说，就是他对此也无能为力。事实上，他现在也同意了。但是，由于担心不理解实际情况并认为人们指责的正是他，特别是他的某个方面，他极力想把这个实际上更针对其他某人而不是他的指责推卸掉。他说：

“洛扎诺夫先生实际上建议我们的学校抛弃历史教科书及其纯朴的俄语，回到8世纪时用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混合写成的艰涩难懂的《选编》去。他认为这种混合语是‘严格的文化的’叙述，甚至是艺术的、更适合于‘农民教育’的叙述。但如果他只谈农村学校，为什么要指责在中学高年级使用的由我编写的教科书？”

稍候他又说：

“洛扎诺夫先生显然读过几页我的书，但是根本没看过我的主要著作，即我所写的多卷本的《俄罗斯历史》”，云云。

他指出了自己对俄罗斯历史学的功绩。他想表明，我似乎很孤陋寡闻，没有看到“纯朴的俄语”的优点——似乎问题就在这里，似乎争论的是“通用性”，仿佛我不甘心让某人过份专美于

前。谢天谢地！什么专美于前！我关心的是成千上万从15岁至19岁的青少年，他们不得不教什么就背什么，什么图表啦，我们对现实世界观察的抽象成果啦，而这种把对世界的观察先入为主地灌输给学生的做法是违背事物发展的有机规律的。我们拼命地把（历史上）这些名字、运动、事件和远征在脑海中同千万个细节联系起来；而有些人则根本不去联系，没有一个名字是有血有肉的，对于他们来说，俄罗斯、法兰西、希腊或任何民族的历史不过是成千上万条大腿莫名其妙地簇拥在一起，看不见脚足，也看不见上面的头和身躯，但是，为什么又必须记住哪条大腿是谁的呢？我想要的正是形象；我不知道还有不按民族居住国、发展方向、编年资料、按多神教或基督教区分民族等材料编写的历史书。我可以肯定，这不是历史书，既不是法国的，也不是俄国的或其他任何国家的。不能这样研究人，不能这样谈论人；这样谈论上了年纪的、通过历史书了解人类的人并装出一副同时尊重人、尊重年龄的样子是不可宽恕的近视，或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进行败坏风气的犯罪。事实上，在看见这一连串生活得如此之久、变化不大、各地都是同样的面孔、在生活中除了由南向北或由西向东不断来回迁徙外其他什么也没学成的人们时，会不由地产生一种 odium humani generis⑤。

这就是我引自《选编》的资料。在这部书里——如同无数那时撰写的书——人们的形象尚不模糊，可以根据其气度而不是迁徙的烙印加以区别。读这本书时，我了解到，死于库利科夫田野的是我们的祖先，而不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也不是波斯人或法国人——这在教科书里是了解不到的，尽管那里也写着："这里是俄罗斯人。"但是我很担心，我是否能记住这句碑文，是否能正确地运用它。伊洛瓦伊斯基先生对"斯拉夫俄语"感到难堪，但他却对《伊利亚特》中的希腊语处之泰然，在发展自己的思路时，他

却不说，在这里讲过的短暂而美好的史实尽可以用更便捷轻松的现代转述来记住，而不是以荷马的元音步扬抑抑格诗来记住。伊洛瓦伊斯基先生也料想不到由我推出的教育方面的个性原则是有关古典教育事实的一般理论，而古典教育除了这条原则外没有任何其他基础，它正是不可动摇地建立在这条原则基础上的。但是，我想强调说，这条原则应表现在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上，而不只是一两个科目中的偶然现象。应该像我们用直接历史文献研究古代世界一样，用这些有深刻教育作用的直接历史文献来研究《福音书》和《圣经》的历史，来研究我们国家以及每个国家的文学史。我对教学改编书的仇视盖源于此，也仅源于此。我的一位论敌说，我正是以这种仇视态度在《俄罗斯通报》二月刊中即使没有提到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至少也讲到了与它很相似的东西。现在我请他再想一想，有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它无所不能，在它的面前，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它天生盲目无知，而且毫无恻隐之心；至于是我的文章还是伊洛瓦伊斯基先生的改编教科书在为它效劳，这或许是他要考虑的另一个题目。

二

现在我们从各类各级学校都应视之为基础的个性原则转到另一个在其他的方向和方面同样应深入学校的原则。

2. 完整性原则。它要求任何正在进入心灵的印象在未深入和未完成同心灵的相互作用之前不能被其他的印象所打断，因为只有平静、安闲的大脑才能开始接受一系列富有教益的印象。在知识板块之间，在艺术感情和意志追求中不应有断裂，这就是这条原则的要求。它指出不能过于细碎地分割知识和感觉；这种分割的知识虽然也能被接受，但已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不

是它们的本来面目，失去了完整性。这样，它们就缺少了文化和教育的意义。

如果说“改编教科书”和“用自己的话转述”是对历史文献的艺术美的摧残，那么，这种分割则是对其力量的摧毁。违反了个性原则，学校就不是在培养和教育；违反了整体性原则，学校就不能传输任何信念，不能传授任何信仰。在新的耶稣学校、中世纪经院式学校以及古希腊学校，青少年毕业时都怀有信仰，都忠诚于粗枝大叶教授给他们的一点东西，即信仰当时的文化、教育以及国籍。但是，现代学校对学生如此精雕细琢，而且毫无疑问，完全是以慈父的精神和世界观教育学生，可孩子们却不知为什么对父辈的信仰、宣传以及教育的一切内容无动于衷。这种现象难道不奇怪吗？为什么学生在学校里没能形成任何强烈的爱好、兴趣和嗜好，比如说智育、美育、宗教或国民教育方面的？我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受过同等智力教育、但信仰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我们偶遇时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会起改造我们的作用？但为什么学校，尤其是现代学校不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因为类似的作用以前已经产生过了）？差别究竟在哪里？产生影响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我以为，秘密在于影响的完整性。须知，如果一个朋友在说话、论证了一半就被打断了，他应该离开，上别处去，让“新的朋友”来替代他，因为他一个人是不能说服我们的；一本书如果抄袭了其他许多我们曾专心读过的书的内容，是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的。对一件事物应长时间地思索，才能使我们觉得它重要，才能使它在我们掌握它之后掌握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完整性原则要全力反对学习许多科目，反对现在已实施的极为简短的课时（$\frac{5}{6}$小时），反对每天太多的课程。它指出，以这种方法获得

的知识，无论是多么齐全，不过是堆砌在无所用心的基础上的。一个人这时候无论掌握何种技能或知识，他仍然只是个未受教育、没有教养的人。

这里我们重又回到了一系列最简单、但最有实效的道理上，我们所作的评价与通常对学校的评价完全不同。最好的学校，或小学，或中学，不是用增设一些新课程来扩充基础课程的；最好的学校是削减并深化课程的学校。这两级学校的理想教育应是所学知识领域中的最基本的知识，但这样的学习须非常仔细、严谨。这要求在一天时间里充其量只学一两门或三门课程；我们讲得太多，违反了自己的信仰——大量的实际情况是每天已上10—12门不同的课，其中没有一门课占用学生的注意力超过$1\frac{1}{4}-1\frac{1}{2}$小时(学校里上午听5—6节课，傍晚准备第二天的5—6节课)；这不是在7—13岁年龄段，那时接受的印象虽然短小，但可能很多，而是在17—19岁年龄段，这时智力不仅能够、而且要求追求个别的印象，这时智力正在成形，但每天却在智力成形的努力中后退。能够想象出由此产生的内心痛苦吗？能够说这种痛苦是毫无结果的，对任何人和物都无关紧要的吗？因为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每天上三节一个半小时的课，可使每堂课都充满大量万无一失的信息，使我们获得许多东西，因为把《伊利亚特》中完整的一幕作为一个半小时的课来上是不同于把这一幕或小说、论文分割成几部分来上的，因为在分割性的授课中，没有结尾的开篇是难以理解的，而结尾在开篇被遗忘时又是没有意义的。

伊洛瓦伊斯基先生忽视了我类似的言论，同时又抱怨期刊发展得太多太快并把这种发展解释成社会上严肃读物的堕落。他反驳我说或自认为在反驳我说："现在的期刊已置书籍于死

地……在欧洲像格拉斯顿⑥这样还在同潮水般涌来的报刊杂志作斗争并继续读书的人已经不多了。”我尊敬的论敌看到了事实，但没去寻找原因。他没有觉察到社会由严肃读物转向肤浅读物时的一般条件，它隐藏在这种读物问世之前以及这种读物推向每一个人时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看到二十岁以上的人都在从流水般的报缝中寻找稍纵即逝的印象，而对较为长时期的连贯的智力劳动感到累赘，如果他不是被迫的，或出于工作的需要，或为寻求生活的经济来源。我敢说，其原因正在于如此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印象中，而各地的学校教育就是由这些印象命中注定地、不由自主地、毫不间断地组成并且继续存在着的。学校教育同样是印象的不断更替，同样对某一事物缺乏长时间的关注，这在刚从学校毕业的人不可遏制地、范围过广的阅读中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期刊根本不是当代的产物；也不只是在我们的时代它才成了几乎所有人唯一的精神食粮。为什么在19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前25年以及18世纪报刊没能占据首要的位置，而是完全藏身、消失在书籍、文集（文选）以及政治性抨击文章之后呢？就社会的繁荣和日常感兴趣的恐慌性事件的数量而言，革命前的年代或拿破仑⑦发动战争的年代并不逊色于当今时代。但就是在当今时代，我的想法也有极具说服力的论据：今天的报纸也并不是到处都发行的，并不是在所有的阶层都有销路，即便是在受过教育、但未经过新型的强化性学校培养的人中亦是如此。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大学生（幸好不是），并非人人都读报纸或认为读报要比读书及谈论书籍和日常生活更好，他们甚或什么都不读。报纸是充满琐碎肤浅的、实际上并不能给人以乐趣的、被动感受和不切实际的印象的新玩艺儿，读报的需求则是在学生时代形成的消极接受大量印象的习惯——如（早晨）翻阅或（晚上）不加深究的浏览——的继续。如果在16—19岁时课程不

是一天 11—12 个前后不一的科目的话,如果每次都要用 2—3 天或一星期来教授一组完整的知识的话,毫无疑问,这种授课法不会使人后来产生每天上午接受有关世上万物的稍纵即逝的各类混合信息的愿望。

三

3. 类型统一原则。这是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原则,在此基础上可以达成真正的教育。它要求施授给某个个别学生的教材必须从某个具体的学校出发,必须是同一个类型,而不是不同的、甚或对立的。换言之,它们必须以同一个历史文化为依据,这样它们(作为史实、资料、观点等)能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或相互脱节,而这在互相交叉、先后交替的文明史上是曾经有过的。应该放弃把基督教同古典历史或把圣人生活同代数联系在一起的企图,以为这像把代数书和教义问答手册放入孩子的书包一样,可以很随便地塞入孩子的心灵——一切此类希望都将成为泡影,因为孩子会悄悄地、厌恶至极地把教义问答手册和代数书扔掉,成为头脑空空如也、对任何影响都来者不拒的的人——这实际上我们已十分恐惧地目睹过,但没有想到正是我们的双手制造了这种恐惧。

自然界有一条法则:以一定方式射出的两束光线相互干扰时,不仅不会产生更亮的光照,反而会产生黑暗。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教学印象是互相对立的类型,那么也会互相干扰,不仅不会启迪心智,反而会使之陷入彻底的愚昧。这是混沌的愚昧,因为这时信息是有的,知识也很多,但其中没有一个是有价值的,没有信仰和信念,也没有意愿和追求——谁如果不能在自身中发现这些就不会说:"这是我吗?这是我的空

虚?"

寻找这个空虚的起源并解释其由来就是我们分析现代学校的任务。在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将对现代的人加以剖析。在他崩溃和痛苦的心态中我看到了违反人类灵魂可塑性教育规律的表现。但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我坚信应抓住重心来完成任务,而不是解决其边缘难题。我认为,脱离学校对历史和历史形成的主要社会体制的关系,诸如同家庭、教会、国家等的关系,对学校的研究将会毫无成果的;我认为,为互相竞争中的某个教育体系而斗争也是同样目光短浅的,因为很清楚,其中任何一个体系本身对新人的精神结构培养都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很显然,精神结构是从两个教育体系同样具有的非常一般的基本条件中发展出来的。

我以为,教育属于细腻的、极难在历史上实现的东西。如果符合规律实现的话就是非常崇高的,而违反了规律它就变得无关紧要、甚至令人生厌。仔细看一下淫荡之徒和白痴的脸:这可都是人,能发出动物所不能的清楚的声音;但同时,其有缺陷的、粗劣的机体像动物的体形一样,对每个人来说不是很漂亮或无关紧要的,而作为不配人的称号的人,他们的面部表情是令人厌恶的。一切就其天性都是完善的,但其意图作为对这种完善的补偿却比平庸更堕落。这条法则对所有非常高尚的东西都是公正的,对教育也是公正的。教育在其符合规律的形式中是人类历史给人的最高赏赐,但在不符合规律时则是人的真正的不幸。

译 注

① Д.И.伊洛瓦伊斯基(1830—1920) 俄罗斯历史学家。

② Г.К.科托希欣(约1630—1667) 莫斯科外交事务衙门的书吏。曾编写有关俄罗斯的书籍。

③ 荷马(约公元前9至8世纪) 古希腊诗人，四处行吟的盲歌者。相传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他所作。

④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5世纪) 古希腊作家，写了第一部西方历史书。

⑤ 拉丁语，意为“仇视人类基因”。

⑥ 威·格拉斯顿(1809－1898) 英国国务活动家。

⑦ 拿破仑(1769－1821)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1812年发动对俄战争并以失败告终。

箴言与观察

一

对事物艺术观的缺陷是各地——欧洲和我国——教育和教学组织犯错误的根本根源。艺术观与实践、科学及其他任何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分解自己的对象，对于它来说，任何部分只是在同整体有关时才有意义，如同使整体增添美感与和谐一样。生理学家可能只对机体的神经分布和作用感兴趣，物理学家可能只对大自然里的声音和光线感兴趣，每个讲求实际的人可能只对自己特定的行业感兴趣。但是，我们不能想象艺术家只靠观察背部曲线就能雕刻出手臂来；完整的雕像才是兴趣所在；完整的人才是艺术教育家的兴趣所在。这不同于手艺师傅或学术导师，他们只顾加工“腿”或“手”，而不考虑把它们安放在什么地方。

人应该无限感激天性或其他某物所赐予的一件伟大礼物，这件礼物传赐于他只是为了留传，无需他的努力，无需他的请求，也无需他的期盼：这就是每一个人就其自身而

言、或任何直接接触他的人对他而言都始终是无意识的艺术教育家。我们想以此说明，在直接接触时我们总能完整地、而不是支离破碎地评价一个人，对一个人做出完整的评价，而不是只评价其细枝末节或其特殊的技能、技巧和能力。如果我们只评价某人的这些东西，这无异于我们在走马观花。我们不喜欢这种走马观花式被评价的人，我们对他没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只是估摸着他凭自己的技能和能力能做些什么。我们不需要他，而需要的是他身上的东西。我们闭眼不看他的脸就从他身上取来才能。例如，国家对人的态度就像这种走马观花；而家庭和教会则不同，它们是主观地对待人。这就是后两者具有教育优势的原因。

这种反艺术的观点到处运用于教育的对象和任务上，从而产生出我们在教育中所观察到的令人震惊的特点。

二

这个真理只是对于不接触教育的人仍然是个难解之谜：一些不是极有天赋、甚至智力并不发达的人，而实际上恰恰是平庸的且往往是天资不足的人，能够顺利圆满地毕业于到处都是一种类型、而且稳如磐石的学校。我们所了解的并要加以分析的就是这种学校。* 那些能圆满毕业的人只是在18—20岁

---

* 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位中学同学写给我的一迭信。他因所谓的“第三十四款”（能力欠佳）被我们的中学开除了。信是在开除后写的，这时他已承担起父母双亡的家庭的重任。这些信说明他智力程度极高，才华横溢，在后来的高中乃至大学里我再也没遇到如此出众的才子。当我执教后，我发现因这一把学生定性为懒惰无能的条款而辍学的人正是求知欲极强的人（但总是对一组内部密切相关的科目），对此开除者也是十分清楚的。

前，* 即完全成年之前从不对任何事物表现出强烈而认真的兴趣的人，甚或只是那些对学校里经常亲身经受或屡见不鲜的不公平和欺侮人的事情漠然处之的人。** 前者对所有的功课是同

* 同以前相比，大学生活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可以解释为现在上大学的人在年龄上起了变化。以前上大学的是知识不多、但极其渴求新的感受的最朝气蓬勃的青年，他们富有创造性，敢于独立思考，对所有的事都充满了热情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现在入学的人知识要丰富得多，但对进一步的深造漠不关心，却在未来实际生活的意向上心事重重。顺便指出，这是证实我如下的观点：现在组织学校的人很少理解人和年龄分开的原则。在他们的学校里，18－20岁的男子汉同9－10岁的儿童在学习和"品行"上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自然希望，社会也应希望，教育和教学，即教育成长者，只应占用成长的年龄段，即男性至20岁，女性至15岁，任何小学、中学或大学都不能违背自己的存在目的收留超过这个年龄的学生。可以确信，任何教育和教学体系——我们指的是国内学校的整体机制——如果不能在此期间完成自己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人从小到老交给它，它也将一事无成。学校的学习周期过长尚不是严重的问题，无论从某种艺术的意义或对其事务的简单理解上来讲，学校只是不擅本行。小学教学的对象是儿童，应该传授健康诚实的技能；中学教学的对象是青少年，应该通过数量不多、但紧密衔接的科目激励智慧，促发兴趣；大学则应满足智力和兴趣的需要，不只是灌饱——生活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是培养学生对真正能使人充实的东西发生兴趣。

** 例如，把最有才华的人逐出校门，对每个人的道德品质始终漠不关心，还有一个俯拾皆是的事实：学校应教人求知，而实际上却对表现为喜爱读书的求知欲加以排斥、制约甚至以粗暴的形式予以压制。由此产生了边远省份风波中称之为"纸的兽性"的事。有这样一件事（是叶列茨基中学的教师C先生讲给我听的）：一个学生正在答毕业考卷，并且已经做了一多半了。这时，一个女仆从家里跑来说：老爷快死了。此事很快报告给了校长和整个考试委员会，同时也马上转告了学生。考官们匆匆地看了一下尚属"草稿"的卷子，该生及格了，即将就及格，而学生实则很差劲，"勉勉强强"……写的东西不够"计分"，即交到区里去这份卷子的分数是不够的。当然，该生能立即中断考试，而且校长也提议他这么做，但这样他得做备用考卷，谁知道那封在信封里的考题会是什么呢？而眼前这个考题较容易，毫无疑问是明摆着的容易，况且主要的是已做得差不多了。所有的人都感到为难和头疼。我想，校长和考试委员会更为难。但是，没有时间再考虑了。"你看，父亲你是救不活了，而你得生活，"有一位教师说。我相信这一定是最好的一位教师，就是说，他观察了学生的努力已有八年，而

样努力的，因为没有一门能引起特别的兴趣；后者却圆滑地通过了、有时是绕过了所有的规则，但没有故意明显和粗暴地触犯任何一条规则。*

有时我在想，我们在历史书上所读到的许多人物是否能从现在这种机械而苛刻的新型学校毕业？他们用自己的晚期活动营造了新型学校，但关于他们的早期活动我们从学校里了解到的是极富吸引力、别具一格的东西，以致于不想、不能、也不应服从任何"规则"——同时也不应戕害他们，把他们扔进生活的后院，封闭于窄小、霉烂的活动空间……普希金讲他自己生平不擅长数学，甚至连那些当时学校里只能教授的基本数学知识也一窍不通；我们知道，席勒①在读书期间有一次为了欣赏一场戏剧演出，未经许可偷偷地去了另一个城市。如果把他们放到今天的

且这时能联想到这些努力。虽然他没见过学生的父亲，但在这种时候解决这样的问题是要有些魄力的，要根据活生生的形象和眼前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义务概念。于是学生留下来继续答题。没有罪犯，却有犯罪；没有肇事者，却有受害者……但主要的是我想问：教育这时在哪里？在这些俯拾皆是而且被添油加醋的事实中吗？它们能教育人吗？巴西斯托伊编辑的文选中有个故事讲述了不久于人世的母亲是如何祝福"小尼古拉和瓦洛佳"的，Л.托尔斯泰的《童年与少年》中也讲了父子离别之重要性，是不可错过的。这个"谢苗诺夫·尼古拉"同父亲的告别也很重要，如果父子能见上一面，那么所有的"规矩"都做到了，但是他们却没能见面，没能"弄成"的原因当然最终还是"可以错过"之说。

* 从我知道的许多此类事情中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叶列茨基中学）七年级学生Б在所有科目上的成绩都名列班级前茅。我在了解他的经历时惊讶地得知，在未升入八年级前，俄语老师不许他上课。一问我才知道，他七年来在书面表达自己知识这方面是最后一名，更不用说表达自己的思想了，其实他根本也没有什么思想。由于他七年级的卷子要送到区里去检查，于是那位一直掩盖这个学生完全不会正确表达、更不用说正确思考的老师考虑到学生这方面的才能，并且为了不给整个学校丢脸，向校委会解释了事情真相并上交了练习册，于是所有的人才都恍然大悟：原来在完整地、精确地、牢固地掌握知识的同时可以完全不去掌握这些知识藉以支持或为之服务的东西。

现实中来，他们肯定会被开除的，一个是“成绩不佳”(根据“第三十四款”)，另一个则“行为不检点”——这有许多条款。我这个想法总是和另一个想法联系在一起：如果那时或只注重天赋，或只注重热情和不安分的个性，那将会如何？若非如此，那他们会在哪里？他们的命运会如何？我们只能回答的是，当我们成年后肩并肩地工作并相互观察时，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些天才而充满热情的人了。

总的来说，可以这样问：如果个性发展的道路已如此详细地规划好，甚至在千百个只与人的天性一般的粗俗特点相应的细节上都已规划好，但完全没有考虑其天分或者至少其独立的、完整的个性方面，那么该如何处置早期的幻想、热烈的想象、敏捷的反应和诚实的自豪呢？*

就是在骑术中，好的骑手也决不只会骑萎靡不振的平常马，而能驾驭桀骜不驯的烈马。难道对学校的要求就应更低吗？对教育者和教师放低要求不是对他们的侮辱吗？但是，正是对前者和后者的要求到处都是很低的。

人们会对我说：“您在破坏学校，您在破坏所有的原则……”是的，但以什么在破坏？以揭露这些原则的犯罪意义和不恰当性？当然，我在以此肯定正确的原理。

我不认为学校的严厉是多余的；我不反对(恰恰相反，我认

---

* 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学校，至少是古老的教会学校，很善于对待这类天性并使之保留下来(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和听到的那样，甚至珍爱这些明显有天赋和不安分的天性)；以前的军校也能做到这一点。看来，其原因在于这些学校能不断地修正细节，有明确的生存目标：发挥道德影响的作用，发扬英勇顽强的精神等等。只是纯“学术”的和“国民教育”的学校丧失了自己的生存目标，本质上是反求知的，体制上是反文化的。所有文化的东西、任何爱好和活动能力都会遭到压制和排挤，被泼上一盆冷水。

为应在学校里恢复)体罚。这种忍耐不是削弱性的：谁追求更多的东西，谁认为自己在追求更好的东西，应该学会为此做点忍受。我反对的只是削弱性的教学法，因为常常有许多极有才华的优秀学生就是因此而自愿地、无需强迫地离开学校(我就知道许多这种情况)。我是说，应该使用一切方法保护这些优秀的天才，应该去寻找这种保护的方法。*

家庭会爱护自己优秀的成员和柔弱的嫩芽——它不怕惩罚他们。诚实的家庭几乎总是有些严厉的，这是因为它是劳动的家庭。诚实的、劳动的学校应是严厉的学校，这就是我们面前可以替代甜咪咪的、** 外交式的*** 学校的理想。

要爱护学生的未来，而爱护应是诚实的爱护。有时可以而且必须在转眼即逝的事发当时不予同情。折断腐烂的树枝并不会危害树木；舍不得这些树枝、不敢折断它们倒会葬送树木的昌盛、繁茂和尚未凋谢的花朵。

我们正是把学校领导描绘成这样的严父，虽然这不是在他自己的家里，但是在已经成为他的、劳动的、有莘莘学子的家里。在这个家庭里不容许明确表示不愿做什么事，此外，也不能容忍完全彻底的无能。但对有良好的愿望而能力稍差的人，对知识偏

---

* 事实上，僧侣能明确忍耐的长远目的，战士能认清吃苦的意义；但学生从千百件小事中看到的是这个目的的虚伪性，他的求知欲是没人需要的，智慧在任何事情中都是多余的，最后，他很清楚砸碎这些“本事”、这些课程和教科书的代价是什么，并准备为某种更伟大的东西而承受这个代价，可是他又看到，那种伟大的东西也并不存在。

** 其实，教师(有时甚至是老教师)对1－2年级的学生，即9－13岁的儿童以“您”相称，担心用粗鲁的“你”会伤害他们的“个性”。

*** “任职”好的通常不是那些教得好的老师，而是那些很会同周围的人和上级搞好关系的人。这对同市政当局、学校当局以及社会处于微妙关系中的校长尤为明显。他即使想好好地“任职”，也无暇去想还有学生在等他去上课。

科但成绩突出的人，对热情极高、精力充沛的人，应用弹性的变通方式来保护和塑造他们的才能，使之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学校如果不能为民族保护其杰出的人才，蔑视洁白无瑕的、但常常因淘气使在这种或那种才能上兼存缺陷的心灵，那这种学校就是不可理解的，也是我们不需要的。

在我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曾无数次地看到这种奇怪的、令人扼腕的兼存现象。最令人惊奇的就是被除名的学生不仅性格上谨小慎微，在他们身上还可以看到完全清醒的头脑；所欠缺的只是次要的习得能力：记忆力，解数学题时的悟性，口、笔语能力；但学校极机械地不要求注重智力，只要求衡量记忆习得，学生也就不发展创造能力，只培养逻辑技巧。正是这些次要的能力成了衡量一切主要能力的标准，而一个少年若没有这些次要能力，虽然他才智绝顶、温顺而感悟性强、求知和爱钻研、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只谈智力），也会被认为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在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有多少诚实的劳动者被这个似是而非的要求体系毁灭了，而这种似是而非多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性格和历史，它最大的特点在于所有似是而非的东西已经（或将要）销声匿迹，像微微吹皱池面的风一样，其中所有重要的东西会比当初出现时更快地消失在人们的眼前。

三

学校应完整地评价人，应评价他的未来。平凡而贫穷的小学校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它就将具有教育作用，将成为有艺术教育作用的学校，最终将是民族的学校。

如果学校能像家庭、教会或所有的有机体一样注重日常生活，而不是拘泥于规则和机械惯性式死板运作的体制，就可以找

到适用于各种个性发展的灵活而有弹性的教育形式；如果不能创造这些形式（这是不可能的），就应当促进这些不用语言、不靠教诲、而凭本身的气息和意义起到教育作用的日常生活方式自发地出现在学校里——这就是全国教育组织的头等大事。从学校里辞退官吏式的教师则应是这个组织的第一把火和最初的要求；因为这些人同学校毫无关系或者同学校的关系甚至还不如工人同其操作的机器的关系。如果他们不去了解所任职的城市，却拉关系、通路子，直达管理千百所同类学校的行政机构（州教育局办公室），并希望从那里得到一切——奖励或惩罚，那么这种官吏究竟能给其工作的学校带来什么直接的东西？当然，只能是把学校悄悄地变成自己剥削的对象，只能是恐吓它，要求它不越雷池一步！这种官僚式的贪婪的学校在所有摒弃了落后的无纪律状况的地方早已成了主导性的学校。学校校长从不过问问题的实质，对学校所在地区*的痛苦和忧患也不关心。他们关心和担心的东西在更远的地方，在那些监视着他们的地方，那里人们只是瞎乱估测是否所有的制度都得到落实并据此决定悬赏或惩罚。这种机械、盲目和残酷的体制应当尽快从现实中取缔。学校应以此时此地为重，每时每刻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当前的这个时刻，把全部关注投向这些个别的需求和期待关照的幼小心灵。它的担心（如果需要的话）应就在那里，在校内，也就是在那里，在校内，应该有对它的全部奖赏。

---

* 有这样一所四年制初级中学（在 B 市，现已关闭）就是这样的。我就是在那里开始我的执教生涯的。这个学校的弊端人人都看得十分清楚，以至于它所在的城市年年向教育部申请关闭它；但始终遭到了回绝。结果居民们不再把孩子送往该校，而是送到邻城去上学。于是该校因没有生源而关闭了（该市市民为 15000 人）。

四

因此本地特性应以最高的程度表现在学校里，表现在它的日常工作*和隶属关系**中，不仅表现在学生中，还要尽可能地表现在教师中；更不用说教育者了。学校绝不能是全国性学校的地区复本，或起遥远的中央机关在本地区的功能。第××中学的学生来自各地，但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气候条件的学生制定了一视同仁的方法。这所学校充其量从外表上看起来很威风，实则无血无肉，对学生永远不会有教益。它至多不过是一个机关，是当地生活的表率，但这种生活在校内或通过学校不会得到发展，也不会得到发扬光大。

只要看一下教师是如何"塑造"的，就不难理解这样的担心：什么是学校？它就每个地区而言应是什么样子？人本来受的教育是很一般的，由于长期的学习形成了抽象的兴趣；一般他生于一个城市，高中在另一个城市读，大学则在第三个城市上，工作却在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城市。他是没有根的人；实质上，他

---

* 在我们的高级中学，有一些东西对本地学生很不方便，但其存在只是作为每所学校，甚至是最落后的学校的一般特征；这些东西毫无疑问应予摒弃。最近几十年我们学校里"漫游"的学生增多了，他们想寻找一所教学质量差且毕业可能性大的学校；这种与父母搬迁无关的"漫游"也同样应予以制止。

** 每个家庭在看到教师对自己的孩子施加不良影响时有权拒聘他。那么一组家庭、教区、市和县就不能有这种权利吗？当然，能有这种权利的人必须保证对孩子在学校所受的影响能像家庭那样立刻明察秋毫并像家庭那样关心孩子的命运。但是我们敢肯定地说并随时准备用事实来证实，整个帝国八九个大教区的行政机构都缺乏这种明察秋毫的能力和爱心；而没有这些，它们如何能行使尚未履行的职责所赋予的权利？

没有故乡，因而也没有亲人。他的亲人在哪里？暂时的同事关系是他所有的唯一关系，即共事、共同工作的关系，但绝非是联系。他在待人接物方面，在对待别人的生活、特点、需要和缺点等方面没有长久不变的兴趣，别人对于他就像他对别人一样，不过是几朵因临时需要而互相靠拢的浮云。实际上他只是教育的 commis-voyager②；谁也不需要他，需要的只是他所携带的东西；如果他很聪明，是个有心人——这很常见——他几乎就是教育的敌人，因为教育向他索取得太多，而回报得太少，至少他会变得冷漠而自私；他不敢成家(大约有 50%的教师是单身的，这是教师不会安排生活的最主要的标志)，他忧郁地把钱存入银行，病态地幻想有朝一日生活一旦有保障，就有了自由，就能独立。但常见的神经衰弱早早地、在他工作的第十五个或第十八个年头就光顾了他；于是，存款又取了回来，交给了大夫；当望眼欲穿的二十五年期限(退休)一到，等了那么多年的他已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了，除了护士、头上的湿压布和药水，而这些也只能短暂地减轻他最后的痛苦。

任何学校都应自我补充教师。教师应是本地人，是学校慧眼识中的得意门生，而且从童年就开始观察、考验，直至送入大学深造。他的调动*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如果选聘他时的一切预期都落空了的话，如果他品行恶劣或变得品行恶劣，为何要用另一个城市来惩罚他？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品行不端，他要么就像难免的祸害一样就地受罚，要么就干脆开除。

---

* 这是对渎职教师的常见做法。

五

我们已经指出了学校最重要的、而且完全被忽视的一个因素。须知教科书和教师是学生所接触的一切。学生根本不知道那些在国家生活中地位显赫的中央教学行政机构,学生也不了解为他编制"教学计划"的美妙意图,不晓得与之配套的"解释性文件"。这一切都是我们上面的事,都是表面文章;在学生那里,在下面,只有煤油灯和绿灯罩下的一片灯光,灯光里是一连串一连串的词语,他要背出来,第二天让脾气暴躁的、不可爱也不爱他的、不学无术的教师检查。

再重复一遍,教师和教科书,一个是教书的人,一个是他所教的东西——这就是一切;组织机构所要做的事就是培养教师,建立学校,从形同虚设的机关故纸堆里找一些规章制度,然后就无所事事了。

值得注意的是,非常好的教科书并不适合新型学校,至少不适合中学;我们经常听到有经验的老教师抱怨说,教科书逐渐变得越来越糟糕。如果问校方领导为什么选择了差的、而不是好的教科书,总能听到这样的答复:"好的东西会吸引兴趣,滞留注意力,因而妨碍了别的东西;再说,要掌握它也很慢:需要耐心和注意力,这是最大的不便;差的东西更易于通过,它已经以这些形式写就——这就是它到处都能通过的原因。"

在我国出版的书籍中有一本极好的几何基础教科书:《艾弗克利特[3]的原理》,是基辅大学教授瓦申科-扎哈尔琴柯翻译与注解的。他的工作——我们指翻译和几何学注解——极为出色。书一出版就受到法国学术界的注意。众所周知,法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知识是欧洲最丰富的。书中讲的就是我们中学几何课程

中讲的东西;我们这些课程用的是自编教科书,艾弗克利特的著作不仅未被采用,而且学生都很少知道,甚至在教师中也鲜有人知。在小学和中学物理教科书中有一本是柳比莫夫教授写的,他是我国这门学科历史发展中的著名资深专家,当然,他现在也是完全内行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物理课程没有采用这本学科学术性较强的著作加以扩充。最后,历史学方面迄今唯一严肃的教科书是舒尔金教授编写的,一直未得到应用,结果成了馆藏珍本,其价格已令有见识的学生咋舌。不知为什么,为了普及教科书就必须做些蠢事;它无论如何只能是该科目的表层知识;需要的是使编写者对这门科目或学科不太感兴趣,最好是编写者都对这门学科不甚了了。而以爱心、兴趣和细致的理解写就的教科书一定会被反对使用此类教材的学校拒之门外。

我们可以根据以下事实来判断这类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进展有多快:当 1890 年在中学教学计划中做了某些修改后,春季一到,这些修改就已众人皆知,而到了同年秋天,教科书的编者就已向各校的校长和有关科目的教师寄去了征订表格并通知说,根据新的教材分配方法他们改编出版了以前的教材或编写了新的教材。例如,在 1890 年以前,三年级还有一门普通历史和俄罗斯历史大事记课程,从阿斯提亚格④、波斯居鲁士⑤直到塞瓦斯多波尔保卫战,而根据新的计划,现在这个年级只上俄罗斯历史课。这样,只需三个月就足以把世界历史改成俄罗斯历史并删去前者以扩充后者。教科书的编者(贝利亚尔米诺夫先生)在仓促的扩写中跳过了蒙古人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侵袭:第一次是朝卡尔卡河⑥方向,第二次到了亚速海沿岸草原,他还把蒙古人的进袭写成是从乌拉尔山方向来的,而不是通过高加索,实际上乌拉尔山是三十年后拔都⑦经过的地方。

但这没多大意思,我们不谈它。我们极为痛心地想问:是什

么促使这位编者及其同事仓促忙碌了几个月？除了担心同其他编者竞争和撞车外，还有其他什么思想支配了他们手中的笔？在如此编就的书中教师读到的只是贪心，而学生读到的只是一行行对智力和心灵毫无裨益的文字。书读起来有一种感觉，似乎再也读不到《鲍利斯·戈东诺夫》、《吝啬的骑士》以及所有崇高和高尚的天才创作的作品了；讲授的对象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是谁，反正不是这里的、学校里的正处于敏锐感知和积聚将终生受用的力量的年龄段的人。这是人类创作中最糟糕、最马虎、也最欠考虑的作品，它对自己的对象毫无积极的兴趣，对读者毫无热情，这在欧洲各国的教育中成了唯一的智育手段，这个事实极为令人震惊，同时又很少有人能觉察得到，以至于能使每一个有头脑的人会产生极度的惊讶和强烈的不安。为了使人在其最佳年龄（这是时间）学会最好的东西（这是目的），而让他摄取最差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这些形式粗制滥造的精神食粮，他会问："有没有什么思想更深刻、更生动、更能鼓舞人心的东西？"——这意味着只能让所有人露出困惑的微笑。问题提得很自然，但在这种困惑中有令人极为震惊的东西，似乎我们距离把"不理解的东西"理解成相对于某个时刻的、在时间上空泛的疯狂仅一天、甚至历史上的一分钟之遥。*

---

* 五六年以前，我们的报刊中曾有人大声疾呼，要求采取措施制止"十分妨碍教学过程"的"逐行注解读物"；但相对于教科书，逐行注解读物该是什么东西，是否类同教科书和严肃而有创造性的书籍的关系？而被注解读物征服的学校又是什么，注解读物对真正的教育和教学是首要和主要的吗？一开始就很明确，为了使一切东西都有所减少并加快进程：大纲在加快进度，为了赶上它，教科书也在加快，而注解读物更是匆匆忙忙地在追赶教科书。如果教科书——法定的教科书——中采用《死魂灵》中的一两个情节，而其他内容则"用自己的话"简述，如果大纲规定维吉尔的歌词只能用一半，因为在那个年级的课程里除了维吉尔还有奥维德[8]和贺拉斯[9]，那么

六

谁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实：在“兄弟单元”（有这种单元）里住着三四个男孩，他们在灯光下努力学习《白津草原》——草原上那两个男孩的对话，一个说了些什么，另一个答了些什么，他俩对什么感到害怕。屠格涅夫随意给男孩起的名字，是米佳还是彼佳，必须牢牢记住，因为如果明天瞎说名字的话，就会得不到“五分”，或许只能得个“三分”。这么简单的功课，明天必须得五分，就是说应提前修好“这个月”可能甚至大概的分数。这几个男孩对此记忆犹新，他们已经四年级了，三年多的学习已使他们变得有些滑头和调皮，有点先见之明和“熟巧的技艺”。他们努力地记着，记得连头都疼了，因为这是他们为第二天准备的第五门功课，——草原上的男孩害怕“淹死鬼”，正在谈论“淹死鬼”——记得不太好，但明天他们不能出错……

但这时这三四个男孩发现在“兄弟单元”里“监视”他们的老太太睡着了，于是就悄悄地踮起脚尖穿过前厅，走出栅栏上街去了。跑过几条街后，他们真正地感受到了白津草原——当他们刚刚跑入阴森森的森林，马上就万分恐惧地尖叫着逃了出来，然后

注解读物为何不能考虑到学生的时间，以各种方法中止、缩短、减少或删除如此珍贵又如此杂乱、陈旧的东西？问题的实质在外壳，不在内核，不在于每个文化都具有号召力的美好理解，也不在于搞清、理解、弄懂它及其秘密的方法。这个理想是支离破碎的，已经被扼杀；看来，它在这里从未被感觉到。于是只剩下这些文化的粗陋事实，就是这些文字，尽可能多的文字，就是这些法律、远征和姓名，尽可能多的姓名、远征和法律，最主要的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教完。注解读物则只是发现了一般的、普遍的趋势，迫不及待地“凌驾于”“中学课本”之上，凌驾于尚未形成的“美好形象”之上，并且向整个体系大声吼道：“我来也！”

在真正的湖里游泳，水温暖得令人奇怪，就像刚刚挤出来的牛奶似的。这三四个男孩诗意大发，真正感受到了温暖的秋夜。当然，这个湖不是《白津草原》里的，而是在波利索格列普斯克市附近……第二天东窗事发：惩罚是最严厉的，开除出校，当然，"俄语文学课"的"分数"也就……

其实，无论"教科书"的编者还是布置功课的教师，从所有的文学"材料"中挑选出《白津草原》是有一定目的的。它被选中决非只是因为"体裁"，看中的是表达生活场景文字中的诗意，能感受到这个场景中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是，这所有感受到的东西只是作为课堂讲解和书本"叙述"的内容，迄今为止一直如此。这是一个死结，它缢死了新的教育，而新的教育也用它缢死了所有活生生的东西。看来，这里起作用的除了有偏重书本的因素，还有对所有未知因素和不可知因素的担心。

现在我们再看看千万个绿灯罩中间的一个——14—15 岁(四年级)学生的课桌——在宿舍里、公寓里或家里都一样；随便这是星期几，假设是星期五——如果这天只有五节课，这一天是很轻松的，如果明天有六节课，那将会很吃力。这个男孩的注意力已集中到五门不同的功课上：高加索地区的地理情况、气候和产业，教会斯拉夫语的副动词形式，《福音书》的一个片断，希腊语词源学中所谓的无声动词以及两篇翻自拉丁语和德语的译文。午饭结束了，在院子里活动了一个小时，现在这个学生结束了游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有历史、古希腊语、神学、拉丁语、代数和俄语。* 一星期只有三天是如此艰难的。级任教员即使不懂古希腊语或拉

---

* 我们分析的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例子。但是，在统一的教育体系中，这个例子当然是千百个其他例子的重复；我们所举的科目数量和功课名称是取自现实的。

丁语，也会劝导学生从主要的科目开始预习，以使这些科目能得到充分的准备。赛诺芬[10]所著的《远征记》中的一个小片断——一万希腊人伟大而英勇的撤退，但不管它！——只需在词典里查9—10个生词，而这些生词里只有一个是早被遗忘的，它的过去时短形体很怪，查了三四次还会弄错。现在它的词根找到了，如释重负似地把它和其他九个词一起抄入长方形的希腊语生词簿。现在可以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走，背一背查好的单词；这十分钟都不要，但在查找和抄录生词时又对其他二十个生词发生了兴趣；希腊语功课预习好了，第二天学生就不会惊慌失措地面对老师；但现在需要把这个片断翻译出来。有些句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懂，随后有一个很长的复合句，结构挺复杂，当然，对14岁的他来说是复杂的；意义似懂非懂，老是些长句子和那个克利阿胡斯[11]，完全弄不懂句子之间的关系；然而时针在动，响起了慢悠悠的钟声——四点半了。男孩钻研了一番，复合句还是没弄懂。至少得看看后面是什么？后面要稍好些。在读完没翻译的地方后意思虽然没搞懂，但单个句子的结构弄清楚了，这是必要的。他完全是从语法上来理解句子的，并且从未弄错过。这样，只有一个地方，中间的四行字没有翻译过来，但其中的词已经知道了；需要照着范例再复习一下这个名词和两个动词；通过努力语法搞明白了，五点钟还没到，古希腊语可以结束了，该开始预习俄语了。

拿出复合句的造句本，仔细地阅读语法中有关像葡萄串似的复合句的部分，读了一遍又一遍，想出了一个句子，抄在本子上，然后在脑子里再复习一下其他类型的复合句及其成分。语法部分结束了，还差《波利克拉特斯[12]的宝石戒》中的十二行诗没背。“他高高地站在屋顶上，/把自豪和愉快的目光/投向了富庶的萨莫斯。/“神灵多么慷慨地赏赐了我，/我是多么幸福的皇

帝",/他对埃及国王如是说……"等等。这已经够难的了,而老师还要他再查对一下精心编写的文选中俄语译文之后所附的德语译文。学生笑了,因为他在想起这个要求时感到一阵快慰,而舌头仍在机械地重复着双眼在书本上扫视到的诗句"神灵对你很友善,而对你的敌人很严厉"等等。不,这很难;只有五行诗复习得很扎实,而其他的诗句不是漏掉这个词就是那个词。当他好不容易地啃完了第六行和第七行时,时钟早就过了五点一刻,可一共有十二行呢。传来了匆匆的脚步声,母亲在隔壁喊道:"茶煮好了。""等一会儿,妈妈。"五点三刻时,诗歌预习好了,颇感疲倦的"天性"喝了2—3杯茶。六点钟了。"去学完功课吧。"母亲怯生生地说,因为上星期得了两个糟糕的分数,这星期得补一补。学生回到了隔壁房间。

翻开了科内尔·内波特[13]的书,把词典挪到了跟前;还要找12—13个单词,在六点半时背了出来;应该翻译一下,但这是什么呀,一开头就看不懂,词都认识,但整篇文章却不知所云,毫无疑问,查的不是那些词义;于是把手指插入了词典3—4处地方,每个词又重新查了一遍,把词典列出的6—7个词义逐个放到课文里试了试,然后把它和其他词的意思组合起来;天气热了起来,可课文还是没弄懂,甚至连单个句子也没搞明白,就是说,还没弄懂哪个句子和哪个句子是怎样联系的。学生看了一眼钟,胆怯地放弃了第一个复合句,去读第二个复合句。不,这比古希腊话难得多,每个句子都要费很大力气;虽然有短一些的句子,但也完全看不懂;如果三行长的句子不费太大劲就能翻译出来,那该有多好啊!可这种快乐太少了。七点钟了,都做了些什么?只有几个单个的句子翻好了——是整篇意思看不懂的课文里几个看得懂的句子。但还不能完全放松,他还没做代数。他开始预习历史,明天大概会问历史的,要准备李锡尼-塞克斯都法律[14]和

第一次萨姆尼特战争和拉丁战争。老师课上讲了些什么,但这不用讲解也能看懂:盖伊·李锡尼·斯托罗和卢锡·塞克斯都·拉特兰在公元前376年向人民议会提出了三条动议:1)撤销有执政权的军事长官并像从前那样选举两名执政官,其中必须有一名是平民;2)谁也不能动用超过5000由格尔[15]的公用土地和在公共牧场上放牧100头以上的大牲畜或500头以上的小牲畜,剩下的所有土地应分给平民,每户平均7由格尔;3)支付债务的利息应计入本金,余下的债款须在三年内偿清。当然,这很长,就像执政官的名字一样,但只要背一背就行了,但如果把他们同萨姆尼特人和拉丁人混淆起来就糟了:一场战争硝烟未散,另一场战争又烽火重燃,每场战争中都有指挥官的名字,而且似乎是为了对称,每次都是两个。老师说在预习功课时不要去背,而是要完整地阅读课文,然后再一遍遍地读,不要分开来读,但很难相信这样做会更好。如果前读后忘并因此而忘记了前后联系和一些概念,读它干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零碎,那么杂乱无章。于是学生开始一块块、一段段地死记硬背。史实写得这么简单,几乎只有名称,当然,这里的单词可以用句子来表达,但不能忘了每一个句子,以免弄得不伦不类。应该记住每个段落,不能有改动,顺序也不能搞错,就像地板上的正方形木块一样,否则它们会七零八落,变成毫无意义的一堆词。现在总算背出来了,要记住它们可难啦!现在还要看古希腊的编年史和同时发生的事件,这是老师始终要求"记住"的:史料表明,"锡韦[16]的崛起和派洛比德[17]和伊巴密浓达[18]"是同时的。匆匆地把教科书中的这些部分读了一下,这时已经八点半了。功课准备得很扎实,于是又翻开了教义问答手册,看信条的第九个部分。

"教会的概念是天上人间最紧要的",使徒保罗深信不疑地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19],永生之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

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希伯来书》，12，22－24） 这些斜体字……为什么课文要用斜体字印刷？没有斜体字的书是多么可爱啊，而有斜体字的书是多么可怕啊！ 不，这要比《波利克拉特斯的宝石戒》更难，虽然这是散文——九点钟了，腰酸背疼……灯移到了床边，学生躺到了床上，皱着眉头，记呀背呀，记呀背呀……“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以弗所书》，1)……这个使徒对教会的牧师们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为什么教会只有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圣体，一首，一主，受一个上帝的感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以弗所书》，4)当然，课文只有一页半，但这有多难啊！ 指针在不停地走啊走啊，说一句：“太阳，停下吧！ 月亮，不要走！”这该多好啊！ 但那是约书亚[20]，而这是有《旧约》的教室；让他们来读读教义问答手册，不也越读越难读吗？十点钟了，母亲叫他吃晚饭。当然，功课还没有掌握，课文还八字没一撇呢。但明天在历史课上可以准备一点，后排的同学也会提示的。现在还要准备代数。

十点半吃完了饭，不是很想睡觉，但是很想躺一会儿或散一会儿步，或用力地活动一下手脚，然后才能准备代数。明天会问最新学过的公式；新课还没学，除了解二次方程式的题目，就是说，要先编题目，然后解题。比如，一个桶有三个龙头开着，大的一个龙头出水，小的两个龙头进水。“为什么总是水，而且这么奇怪地流进流出？大概，只是为了出题目而出题目。”神经质的动作使疲软的脑袋从床上抬了点起来，打开了厚厚的草稿本，x 和 y 作为分钟和桶数的代号开始闪烁。题目很快解完了，接着又是一

道：两列迎面对驶的火车；这绝对不可能。这时睡意已浓，蒙眬中把第一道题抄到了练习册上，第二道题准备明天抄同学的。学生脱下衣服睡觉了，没有梦呓，没有可笑的回忆，也没有祈祷，只有执政官和水桶、“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和克利阿胡斯的长句子在脑海里咚咚作响。

这一个晚上的事实表明了什么？它在漫长的冬天、秋天和春天的傍晚又会怎样？它中断了9—10岁的儿童游戏，然后又渗入了17—20岁时的初恋和苏醒的求知欲。这就是不断移动的时针控制着的时间，时针就是时间的原形。这就是要加以思考的问题。

七

伟人——在气质、尤其是才智方面伟大的人——是如何受教育的？这个问题一直使我很感兴趣。有意思的是，无论他们的教育条件有何不同，有两种东西是他们身上所没有的：印象的交替性和不同性。无论多么杰出的人总是专攻一门的，他们的注意对象总是很狭窄的，因此他们的注意力不会被分散，反而会更专注，并有严肃的兴趣和爱好；就是从这里、从这个兴趣后来产生和扩展出其他多种兴趣，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兴趣组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兴趣在成年后，有时甚至在老年时期，会扩展到无所不包的地步：现代诗歌，古代世界，精密科学，哲学，神学，政治热情——这一切都能在一个奇才身上看到；但这若是在老年阶段，则已是花朵和果实，而我们所寻求的是能长出奇花异果的树干，尤其是根茎。而这棵树的种子、最初不起眼的嫩苗就是童年对事物的专一兴趣；有时无人过问的儿童会对某个科目、对偶然得到的书、对被命运差遣到此地的某个人或者对到处都同样美妙、人人都能接受的神学世界表现出聚精会神的注意力。我现在尚举

不出恰当的例子,还需要再了解,但我建议读者在儿童偶然或出于好奇去看历史书和传记时关注一下我所指出的教育的那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还看到,拥有丰富的教育参考书籍的孩子无一能做出超出平庸的事;他们面对丰富的藏书感到寂寞,在书的包围下却对书中所写的东西毫无概念*,如果这些概念和知识不是灌输给他的话,不是教师硬教给他的话。于是,虽然这些概念和知识能记住,但没有掌握,没有完全进入心灵。在多年的观察中我几乎不记得有哪个拥有丰富教学参考书的孩子,男孩或女孩,表现出一点求知欲;相反,在半文盲家庭,在小市民、小业主、退休且贫穷的小公务员、教会的低级职员和神职人员的家里,我倒碰到了求知欲极强的孩子。每一个直接观察生活的人,每一个不是从远处、从行政管理中心或从学究的圈椅高高在上地判断生活的人对此都洞若观火,无需加以证明和解释:一边是光着一只脚丫的男孩,学习上落在许多男女同学后面,但他又是一个普通的读书爱好者,喜欢捧书独处;另一边是衣饰精美的男孩,在地球仪、地动仪及有插图的书籍的包围中无忧无虑,但对它们而言,他是第一个、有时是终生的懒人,我不说是敌人。

八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从教育中清除"贫困的",即"不认真的"班级,才能使教育变得"认真",这种想法不仅是不道德的(因为已忘恩负义),而且幼稚得出奇。优秀的学生正出自贫困的班级,他们能遵守任何严格的纪律,克服学习中的各种困难,无论

* 例如,受奖励的学生从来不读"奖品书",倒是从未受奖的中等生或差生会向他们要来读。

这是古代语言、数学还是其他学科。他们是勤奋的学生，然而，他们富有的同学却往往在学习中不知所措，勉勉强强地跟在穷学生后面学完课程。* 这里有许多原因，其中一部分是机体上的：以前使不完的劲只能用于体力劳动上，从不用于精神学习上，他们的祖辈正是为精神学习完整地保留了精力，而孩子们也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一旦用于精神开发，就会结出如此优良、丰硕的果实，就像长久以来前辈们用其他精力在田野、作坊和小公务员、神职人员的低级智力劳动中产出果实一样。处女地不仅在农业中很重要，它在精神播种方面和在谷物播种方面一样重要。除了用之不竭的精力和让被开垦的处女地结出累累硕果的愿望，在播种的规律上有一点也很要紧：种子要不慌不忙地、疏密有致地撒向田野，以使每粒种子周围都有大量的土壤；有些地方可能连行家里手都是一把把地撒种，这样地力就不够营养一堆堆的种子，这种播种法在神秘的教育事业中是不明智的。我想

---

* 记得有一次在我上课时，校长走进了我这个全校成绩最好的班级，问学生中有没有人负担不起学校规定的七十戈比一月的早餐费。有6—7个人站了起来，他们全是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并被树为全校榜样的学生。我以前也知道一些非常贫穷的学生，但有些学生穿戴非常整洁，对同学和老师彬彬有礼，很有教养。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很穷。校长走后，我把这些学生挨个叫到教研室问他们家长的职业。科诺诺夫说他是"铁匠的儿子"，瓦西里耶夫是"农民的儿子"，波格丹诺夫（成绩第一的学生，任何课程从未得过"四分"）是"鞋匠的儿子"，巴塔绍夫和克休宁是"市民的儿子"；其他学生的名字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但他们也是穷摊贩的子女。结果所有的学生毫无例外地因品行和学业优秀被免除了学费，有些人还用上了公家提供的服装和书籍（学校里的慈善协会捐的）。众所周知的不从"社会底层"招收学生的《通知》在这里因地区遥远、中央监督削弱而未被聪明且体恤民情的校长所执行。与这些学生相比，另外的学生则勉强而痛苦地跟着。这所初级中学的督学是一个拥有三万俄丈土地和四通八达关系的商贾，但他两个儿子却令教师大为头疼。虽然所有的《通知》都号召他的孩子学习……但学习于他们有何益？为什么不能把学习给那些追求学习且才华横溢的人？

说，在低文化家庭中，男孩在8—9岁就能自有见解，经常能对许多事物提出问题，但总是得不到回答。他对任何可能的回答自然会比其富有的同龄人倾听得更仔细，自然会更贪婪地捕捉它；而家境富裕的同学的问题时时都能得到解答，但其问题只是在想玩耍时才会产生。前者能长久地期待和贪婪地倾听，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后者则对听到的东西感到厌倦，不仅不会提新问题，甚至对别人想同他说的东西或不屑一顾，或漫不经心，至多也就是记一下，但从不会提问。

穷困和因之而来的勤奋是对教育更有助益的氛围。没有书读，但渴求读书；有时渴望读书，却找不到书，这时就会在院子里、街道上或树林里玩起令人振作的益智游戏，它既增强了体质，又独特地、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了智力。书一旦找到后，就会贪婪地阅读：需要的正是这个。需要的是适时地、在大学里或生活的其他舞台上使孩子们不要在听到生动的话语和各种严肃的书籍时就打瞌睡。

那么针对上述现象，家境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应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呢？任何时候都不应使他们有富足感，也不要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家庭关心和照顾的主要对象；他们可以使家庭为自己的成绩喜怒哀乐，他们的意志或淘气制约着家庭的幸福或不幸。家庭富裕或不富裕在特定劳动（孩子只是观察这种劳动）的范围里有一定的悲伤和喜悦；孩子们暂时只是对这个劳动、忙碌的家庭有义务和严格的责任。他们是有义务的，仅此而已；他们不是家庭的幸福和骄傲，这个秘密要使他们尽晚知道；在他们的意识里暂时只能有家庭负担他们很困难和因此得想方设法加以补偿的想法。在他们的观念里不应有不道德的想法，似乎他们是家庭应承担并应忍受一切的目的。事实上并非如此：每个家庭都是为自身而生存，既为眼前的幸福，也为遥远的期望。

孩子的智力发展应符合现实:他们已为家庭带来了许多麻烦,使之付出了许多辛劳,在他们不谙人世时在他们身上已倾注了无限的爱,现在他们觉醒了,现在他们应以自己的努力对得起这个爱,想法报答这些操劳,以自己的劳动来抚慰衰老的父母。

开始学习之日是义务降临之时,是意识、责任心和义务感苏醒之时;当然,他可能只是受到家庭的要求甚或苛求,而这样的家庭是能在其他方面、在对待其他高尚的事物时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的。

在一些不幸的家庭中,这一切都被破坏了;这些家庭并不算十分糟糕,只是家风败坏,不能再承受劳动和履行义务。还有完全糟糕的家庭,其老一辈成员间的关系都已破裂。这种家庭应该怎样对待孩子?应或早或晚使他们脱离家庭,脱离败坏的风气,把孩子的教育托付给穷亲戚,或把他们送入寄宿学校,或请家庭教师,或虽把孩子留在家中,留在恶劣的环境中,但使其喜欢他人并以此仿佛与家庭隔离。让男孩和女孩们在类似的、自我感觉糟糕的家庭中营造自己特殊的世界并使它尽量不同家庭氛围溶合。

九

儿童世界总是比成人世界更纯洁,即使是完好的成人亦是如此;这就是最好使孩子们稍微远离大人的生活并形成自己的独有世界的原因,但两名大人带一名孩子的家庭例外。这同时符合道德教育和智力发展的需要,如果大人很多且地位复杂(这里说的不是双亲,而是双亲接触的整个社会圈子),孩子们置身其中会看到难以理解的关系,其复杂性孩子们是不难感受到的。小小的奉承,小小的吹嘘,各种虚伪等等——我们能看到完全没有

这些习气的成人吗？空洞无物的谈话几乎是他们最不可宽恕的弊病，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听这种谈话，如果不谈更有意义的东西？无论这多么令人惊讶，我们可以毫不困窘地说，儿童世界总是比成人世界更严肃：这里的游戏确实让人开心，而伤心又确实能使人掉泪甚至争吵——从其原因和起因上来说是真正的争吵。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很少有伪装——这就是更好的原因。成人在场只能增添矫揉造作、虚伪和勉强——历来如此。

当大人参与时，孩子们总会感到难为情并中止游戏，这准确地表明他们要么不愿在大人面前公开表现自己，要么在克服天生的羞怯后、在感到同大人无拘无束的关系之前，即没有同成人溶为一体时，不会对他们加以注意，即尊重他们。成人一般把孩子们对自己的"好感"当作"信任"，但这只是天真的推测，因为孩子们无法同他们沟通：他们可能不再尊重大人，认为这些大人没有自己的事业，没有自己特殊的世界，他们不过是游手好闲，精神空虚。

上面所说的一切同道德方面有关，但智力方面在这里也几乎同等重要。孩子们应该保持严肃*，同时又应该享有自由，即周围的事物和人物不应过分凌驾其智力之上，不应压制其智力。上面我们已经说过，马上得到全部回答或总得不到回答以及不追求回答对智力发展是何等的危险。现在我们分析这个危险的另一方面——意志方面。如果派一个非常聪明、知识渊博而且经验丰富的教育家去教一个儿童，他不管后者理解与否总是进行长篇的解释，对任何草率和多余的东西都予以制止，始终寓教于一切——这种手段只能使儿童变得更愚蠢，即不仅智力上不发达，

---

* 上面我已谈到，严肃并不排除欢笑和游戏；儿童只有在引他发笑的事物实际上并不好笑的时候才会不严肃地笑，当游戏不能使他开心时他才会不认真地玩。

而且思想上极其谨小慎微，缺乏自信，反应迟钝。实际上，在一个偏重知识和智力的人身边，儿童总是在智力方面感到如临深渊，而其边缘高不可攀，看不到真理的阳光，即实际情况。他在身边和眼前看到的总是过分崇尚智力，而对他以及教师难以理喻的正是这种智力崇尚压制了他；他永远得不到改进，虽然他能被改进；在事先未弄清可能结果前，他从不敢判断或行动；他始终消极懈怠，无所作为，而实际上在生活中，在今后获取知识时，要求他的正是有所作为。

密涅瓦[21]曾装扮成门托耳[22]，想把乌利西斯[23]的儿子带往别处并在途中尽可能地教会他些什么。毫无疑问，她这种做法是最没有结果的。但历史学、神话甚至后来的劝诫性作品都没有推翻这一点：在它们的叙述中忒勒玛科斯[24]是很有学问的，但都缄口不提其学问所产生的后果。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甚至也没人能预料到这一点），他一点也不像他英明的父亲，而他父亲当时身边并没有什么门托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关于密涅瓦和忒勒玛科斯的故事实际上多次发生过，但显然的结果都是闭口不提后来可能的毫无结果性。康德[25]、狄德罗[26]，似乎还有罗克[27]，都带有学生，毫无疑问，他们履行职责丝毫不逊色于古代的密涅瓦。但是，他们的学生在哪里，历史关于他们又讲述了些什么？他们有哪些功绩和明智之举，哪怕任何突出的事情，彪炳于史册？大概，他们充满了对自己伟大导师的崇敬之情，终生重复导师的思想，运用导师的理论，仿佛不在生活，至少对自己而言，对别人也不过是难以觉察的过眼烟云。

每一个成人在孩子面前自然想做出一副像门托耳那样的解释者和训诫者的样子；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当然不会有什么危害，但是，即使他的训诫是无害的，如果儿童不能反对和抵触，那也只能产生危害。大人的生活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特殊的、非儿

童的目标，如果他们的生活以美好的形式朝着这些目标认真发展时，儿童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训诫将是严格而美好的。

通常一般规律的力量会尖锐地反映在一些极端的现象中。下面我们试举其一。有一些家庭以不容置疑的病态偏离常规，父母只关爱一个孩子，而对另一个孩子则表现出生理上的厌恶。有谁不知道（或没听人说过）这种奇怪的家庭？再重复一遍，确有这种难以解释的父母偏爱（最常见的是母亲对女儿），我曾两次亲眼目睹过这种现象。* 结果如何呢？被遗弃的、几乎不许抛头露面的、在厨房里和佣人一起成长的孩子不仅是温柔和高尚心理的典范，而且身上荟萃了出色的聪明才智；而另一个须臾离不开心爱的父母、有专门照管的保姆和家庭教师的孩子虽然得到了不断的关爱和助长，但其道德和智力却钝化得近乎反常。

这种现象很有证明力，但毕竟较少见。还有更普遍的、人人都能检验的事实，这就是几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几乎所有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勇敢无畏性格的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改革家都出身寒门。须知，他们正是从学习的最初年代习得勇敢和独立精神的，那时候他们就意识到别人并不比自己高一头，相反，在童年的这个方面、那个方面甚或所有方面自己要比别人略胜一筹，在智力上比周围高贵的、受尊敬的人更强。这就培养了他们的勇敢精神，其中同时充满了对现实的热爱、对理想的信仰以及在这评价很高、实则扭曲的现实中实现理想的愿望。除了那个严厉得近乎残酷的神父，我们不知道路德是否还有其他的教师；我们的彼得大帝[28]是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在知识浅薄的教师

---

* 不知道这类现象是否有过记载，更不知道这类现象是否得到过解释。这里的病态是毫无疑问的，它表现在完全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过错，甚至在以后，在长期分离之后，哪怕在婚姻祝福时都依然如此。

教育下成长的。几乎所有真正伟大的帝王在童年或受放逐，或被抛至一边，遭受这种或那种鄙视。如果真是不幸、失落和无人照管的环境使诸如法国的亨利四世㉙、我国的伊凡四世㉚、瑞典的古斯塔夫·瓦萨㉛、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㉜等人殊途同归，成为伟人，那么这中间就有以前未曾发现的教育因素。

对这个因素我们已经尽力作了解释。它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不可估量。我们只能补充说，若无这个上帝在人不能或不会保护自己时保护人的奇妙法则，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就不会这么明智，这么光辉。

十

这样，劳动和贫困能培养健康和强壮的品质，灾难、飞来的横祸和长期的痛苦可塑造智力、尤其是性格上的天才。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心智，创造理智，使理智具有伟大和骇世惊俗的洞察力，使心智具有摄人魂魄的灿烂光辉。从凡夫俗子那里我们可以听到许多精妙有趣的东西，但有洞察力的东西只能从那些曾经以某种不为人知的形式经历过特殊事物的人那里听到。由于这种特殊事物有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况且求索也是白费劲，我们应该把历史上的伟大和天才理解成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根据上苍的预见在人需要时、在某历史时刻的意义超乎寻常时的赐予。

但是，在历史上有某种类似于我们所指出过的促进个人发展的环境，它促进的是整个一代人或几代人。有的历史时代是有教育意义的，而有的历史时代起的是败坏道德的作用。在研究某个时代或国家时，我们能看到，许多毫不突出、才智平庸的人的一生却是十分紧张地度过的，这掩盖了他们中等或低下的智力

水平。有时在同一个国家在两个世纪之后可能会看到同样多的旷世之才，但他们却碌碌无为，偶有惊人之举。作为前一种时代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德国和法国的改革动荡年代和整个欧洲的人道主义时代，作为后一种时代的例子，可以指出法国路易斯王朝的最后几个朝代。梅兰希顿[33]是个只求太平的学者，而路德是个追求个人解脱的人，但在充满崇高的追求和否定的时代他们顺应时代，做出了多么伟大的壮举！另一方面，狄德罗、伏尔泰[34]和卢梭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可算绝顶聪明的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亦是如此；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之意义是如此卑微，理想不远大，否定不深刻，以至于过了一个世纪后虽然人们仍念念不忘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作用已在人们的心目中荡然无存。前者能力不过中上，却成了伟人，真正的伟人，而且是各个时代的，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伟大的，他们在时代中的作用虽像一座被终年积雪覆盖的小山丘，但它却屹立在巨大山脉的顶峰；而后者无论本身有多么高尚，却像低洼地或沼泽凹地里的高塔，很快消失在时间的地平线上，虽然始终是那么高，但却随着所处的时代被渐渐地淡忘了。

作为伟大或渺小的品质反映在时代杰出人物身上的东西反映在历史上无名的同时代人身上就是教育。在主要是生存的时代，当生活的主导原则变得软弱无能、人们变得惊慌失措、每个人的生活岌岌可危时，生存只能用个人超常的努力来维持。这时，劳动确实是人们唯一可指望的东西；它本身不能拯救人，但至少也不会让那周围腐败的环境来侵蚀人，而这个环境在人一无所事事时就会充斥其身心并使之同整个世界一起死亡。时间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扶助人；就是对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而言，时间中也没有绊人的绳索；使人振奋的意义无非是生存的权力、耕耘的犁耙和使孩子们过得比自己更好的愿望。在我和我的之上没

有一种伟大的、我能隶属的精神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我或许能生存，能有用，并且在把自身、自己的力量和能力献给它的同时又为自身、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从它那里获得崇高的启蒙。

我们终于说出了我们关于教育想说的话。寻找它就是寻找这个精神机制；对它的批评和否定只是对失去这个机制的悲哀，失去的似乎是我期盼在自己和大众头顶上出现、但又未看到的屋顶。噢，当然，个人有求助上帝的意义，只有他是高贵的，只有他的价值是永恒的。但是，也有起源于上帝的永恒法则，他把这些法则与人相结合并与人类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这些法则对所有的人来说是不可动摇的、显而易见的，这就是真实的教育，现实的教育，与此相应，可以推导出那些不太重要、在个别地方略作修改的附着物，我们称之为“学校”。一个时代能否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精神机制——这就是决定几代人命运的东西，它或使人们在历史上如过眼烟云，或相反，使人们在历史上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时代有所信仰吗？人承认和感觉自己是什么？他怎样看待自己的一生？如果把它看成偶然的、擦肩而过的现象，看成父母的欢乐所不可预见的奇异结局，那他还要什么？要教育有什么用？他能活到老年，然后死去，然后蚯蚓会处理他以及他的子孙……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需要。

在类似的时代为教育所做的任何事都是没有意义的、闭眼不看未来的游戏——等于是把墙建在精心铺设于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口的基石上。就算基石铺设得很牢固，就算铺基石的人劳动很高尚，但一分钟后他们及他们的劳动将不复存在。

十一

能以宗教严肃性理解自身及历史意义的时代——这是唯一

有教育作用的；绝对的、有能力使我们身后的生活永恒的东西——它也能使我们和我们的劳动永恒，使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孩子的童年幸福。没有它，我们的孩子就会被烙上白痴的印记，就像我们身上已有的印记一样，无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济于事。我面前的绝对是：我很清楚我该做什么——为上帝效劳；我很清楚我为何生育和教育子女——按上帝的法则生育，为继承我的劳动(它是正确的)而教育。一切都很清楚，没有不清楚的地方，这不是靠个人的思维和努力所能获得的。血液流向肺部，在那里新陈代谢并回到全身，使身体精力充沛，这种循环的重复是非个人努力所能做到的。同样，我，他人，我的子孙，我们都有生命，都明白死亡将来临，但死后仍将留在整体的生活中，因为这个整体仍在积极地呼吸，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其界限。

当然，只有一个绝对，当人把这个绝对的意义赋予时代，当人受他人欺骗而不是受自己——他认为自己是永恒的集大成者——的欺骗时，时代可能是光明的，它会感到幸运*，虽然不能在历史上保持永恒。而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能够受到教育，当然是对自我、对自身的力量和形式美的教育**，这与他们所效力的事无关。这些形式将被打碎，这个美将逝去，力量将衰弱——这是暂时的，就像反射的光斑在几代人生活中一扫而过一样。只有于人于己的欺骗不会发出任何光芒；只有认为人周围的万物

* 不能否认，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人们有追求幸运的欲望，当人们(如罗兰夫人[33])走向断头台时仍坚信时代的意义和绝对的重要性，认为自己的死是偶然和暂时的错误(参见C.居斯特、丹东[34]以及整个吉伦特派[35]中的人物)。

** 否定上述时代的人所具有的丰富深刻的性格、“形式美”、“力量”和“伟大的人性”同样是徒劳的。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受到过一定的教育，我们可以肯定，受到过彻底的教育，尽管教育他们的东西是相对的、虚假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的产生是伴随着信仰的复苏的，这在卢梭时代以来变得特别明显。

及人本身是偶然的、暂时的和没有用的观点，才会使时代变得没有用，使教育成为不可能。

在这种愚昧的时代能对人说什么呢？历史和未来的朋友能对他讲些什么呢？“离开你的土地，离开你的家族，离开你的祖居。”(《创世记》,7)按上帝指引的方向走往更好的时代，直至你、他人及任何独居的人能使荒芜的土地重现辉煌。

人的个人主义和孤僻性格是腐败时代的产物，但其中孕含着新时代重生的可能。新生活不同于我们已知的、理解的、仇恨并鄙视的东西，其根源不在于接二连三的伟大的历史运动，不在于大规模的群众骚乱，也不在于使我们恐惧和惊骇的政变；它的根源在于个人孤独的良心的不安中：在某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有时在受迫害的人身上，一种新的情绪成熟了，从未亮过的灯点燃了，它的光辉撒向了四方，但不会溶于正在熄灭的旧灯的光芒里。只有当旧灯发出臭味，而且人们被这臭味呛得难受时，这孤独的、纯洁的、却又微弱的新灯光才会吸引所有人。他们都向这里走来，围着它温暖心灵，照亮从不愿忍耐、至少不能长期忍耐黑暗的智慧。于是新时代来临了，带来了新的信仰，而不是从前的热情。

在生活着的、而不仅仅是存在着的东西中，所有新的事物不是由部分拼凑而成的，而是以完整的形式从整体中诞生的。身体不是由肌肉、骨骼和神经拼凑而成的，即使拼凑后也输不进血液。历史更是如此，它是一个活的整体，不是由单个的制度、法律、科学和艺术拼装而成的，也不是所有新事物中都能有新人参与的。人在历史上是最渺小的，同时又是我们徒劳无奈想组合的所有东西活的组合：它在自身意义、美感和精神结构上自有法则、可能的规矩和全部的智慧。就像鸡蛋中未来的器官不可分割地溶合在一起一样，这胚胎中的一切也是不可分离地溶合在一

起;但其中的一切都是现实的,主要的是,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是未来生命的基础;而未来的生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诞生之路。

十二

但是,不仅对于未来,不仅对于整个"人类",而且对于任何单独的个人,愚昧时代任何时候对自身和自我责任的崇高意识的培养只能是个别地、通过分散的努力进行的。我们仍回到儿童的话题上去。期待不靠自我的努力、不靠我们的家庭、不靠观点相近的人们,而靠遥远的、严密守护且费用昂贵的学校使我和我们的孩子得到不仅连守护者没有,而且时代本身、整个时代都缺乏的东西,这是危害极大的痴心妄想。当然,他们能学到精确的知识,会获得实用的技能或其他东西,但这只是以缩微的形式重复刚才我们说过的有关历史大世界的话:骨骼、肌肉和器官固然可以拼装,但不会有任何生命,甚至都不能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一切可能会不错,但由此决不会产生活生生的、完整的人。

如果整体看不到这一点,如果整体装出一副在创造某种活物的样子并用死板的手拼凑僵死的骨骼,那么个体可能比整体更聪明,更明智。如果给整体所需要的东西,让它做应做的事,它只能从外表上来做,而外表上的东西实际上儿童也能做。它在做的同时,为内部,为亲人和孩子保留了温暖的心灵和炽热的信仰,因为孩子们还将生活,而整体或许会灭亡。

无论这多么令人惊讶,个人就是比社会更结实,更长寿;他身边最亲近的是家庭,它可能温存如初,仍信仰宗教,在周围死气沉沉时仍生机勃勃。其原因在于家庭的神话基础中,而社会则缺少这种基础:个人正是通过家庭、而不是通过社会同整个人类溶为一体并感悟生与死的奥秘。历史学家指出过、但没能解释妇

女在愚昧的多神教民族接受基督教时的首要作用这一伟大事实。几乎是奴隶和永远的劳动者，她们没经历过战火和民族冲突，也没去过外国，但她们比所有的人更早感悟到有关赎罪和原罪、现时世界和身后世界的道理，最先高兴而又不安地接受了这个道理。那么她们是像女皇那样做的吗？这样做的女皇有克罗蒂尔达女皇，贝尔塔女皇，柳德米拉女皇和我国的奥尔卡女皇。或许像姑娘那样做的？不，是像女人，生过孩子的女人，她们在死亡的边缘又被拉回来照料出自自身的新生命。女人更完整、更清楚地了解生与死的奥秘；她们是这些奥秘的最佳卫士；习惯于她们的家庭可能还充满了这些奥秘，而周围的人已不再理会其意义了。我们再回到学校这个话题。难道学校失去了儿童？它为儿童从“自然”那里，且不说从上帝那里，讨到了生活？于是，能够也好，善于也罢，甚至只要愿意，它就会像家庭、甚至像不看教义问答手册的家庭那样祈祷，那样害怕神明。

十三

个人能够、也应该确信，有些东西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没有人能向他的孩子传授这些东西。这就是决定其生活以及个人本身的知识，主要的知识，而任何其他的知识不过是用用而已。把工具交到他手上时，应该意识到，他本身就是一个人；要使使用者和拥有者合二为一，成为一个人。捆不上绳索的地方不应该捆绳索。在准备、完善系列知识并使之配套时，如果没有确信主要的知识已被理解，即不仅拥有，而且是牢固、完全地掌握，就不能把知识传授于人。家庭唯一能给孩子的是使之健康地成长，使之有信仰，使之处事认真，这就是给孩子工具，如同给旅行者一根手杖一样。如果家庭能做到这一切，就让学校给孩子其他的次要

知识吧。

但这时我听到了来自四面八方呼之欲出的反对意见。人们会对我说："家庭绝不是您推测的那样。"现在它许多强大的敌人会这样说的，它们想把家庭从其职责范围内排挤出去并把这些职责据为己有："家庭腐败、野蛮，无知、无法。在我们给孩子的书本里，就在这些书包里，写明了家庭所忘记的所有东西。我们有知识，而它是多么的无知；我们井然有序，而它却乱成一团。"

你们有序、有知识，但信仰你们所有的知识吗？有序，莫不只是出于对纪律的害怕吧？因为你们在反对家庭和教会的同时，用纪律束缚了自己。须知我曾多年站在这纪律严明的行列中，神圣地在班级和校委会工作，孜孜不倦，循循善诱……为什么要保守束缚你们所有人的秘密？鼓舞你们队伍的不是信仰。最能鼓舞你们的不就是用有关条款来加以掩盖的对宗教、地区和民族的冷漠态度？任何一个"信教者"出于偶然地来到这支队伍里时会感到置身其中十分可笑，是多余的，不善于走方阵或装卸布景，只是一般地参与大型歌剧。远远地看来，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很美妙，观众很受感动，过于进入角色的"歌手们"自己也很感动，但在这人堆里大家不都极度疲倦吗？

学校以其自身的原则在整个欧洲到处都是持无神论观点的，虽然都延续了《圣经》的课程；它早就没有了祖国，虽然也在庆祝周年"纪念日"。这个早就忘了本且完全孤立的一种"个体"从一个地方游说到另一个地方，逢人便奉迎献媚，竭力使人相信它就是最近的亲戚并有权继承后者的遗产。它接过了所有的遗产，包括信仰，实际上还包括潜意识的秘密和欲望，它使所有遗产变得不那么健康，使生命变得不那么长久，而在生命结束后又不辞辛劳地举办豪华葬礼，宣读悼词，并把每个人的事业记入与己有关的史册中。

这就是它对现实态度的神秘方面，这明显地源自现实：在它的影响下并如它所说，没有一个国家能长盛不衰*，没有一个教堂总能济济一堂**，没有一个家庭会变得更美好，形式更精美，内容更温暖***。从战场上首先逃跑的人****，最后才被迫走入教

---

* “为什么你要打我们，你的忠实的仆人？”库尔普斯基在信中质问伊凡沙皇。在这个逃兵和叛徒愤怒质问的语调中仍能听出某种受压制的同沙皇的亲缘关系，尽管他背叛了沙皇，逃往了后来又永远离开的地方；更不用说能听出什巴诺夫式的“奴相”。这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对这事或那事敢怒而不敢言（这倒往往比爱更高尚，更纯洁），我想说，在愤怒和爱情中没有、我也从未在成年的、知书达理的学生中看到过这种热情、亲密性和“悄悄的眼泪”，而这些东西倒可能使愤怒更强烈，更猛烈，使爱情更实在，更温柔。无力的否定，至多是讽刺，而不是愤怒，这就是“一般”青少年在中学高年级或大学里对祖国的常见态度。其实，这种感情并不来自家庭，因为儿童，低年级的少年，在我的长期观察中是本能地爱国的。有一次我在五年级上古罗马史，我不由地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古罗马灭亡的必然性，因为它走过了所有可能的历史阶段并因此经历了所有发展的、天才的民族的命运。在我讲解时，我听到后排传来了某种令我不快的嘟哝声。我中断了讲解，问那个学生：“你怎么啦，科列斯尼科夫？”“您怎么能说每个民族都要灭亡的呢？”他粗鲁地说道，毫不掩饰不满的情绪。我没弄懂怎么回事，又开始简要地复述我的论据，但是他尖声地打断了我的话：“照您这么说，俄罗斯也要灭亡了？”“当然。”“这永远不可能！”这是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生性粗鲁却很聪明。当然，大学生是决不会用这种话来打断教授的。

** 在我曾执教过的 E 市和 B 市，我发现，“领”学生去做彻夜祈祷和弥撒的最好教堂中祈祷者（百姓）寥寥无几，因为所有的人都感到，学生来到教堂后产生的氛围同祈祷者所追求的教堂氛围大相径庭！这两个城市中至少前一个有较高的宗教素养。我曾看到过寒冬腊月一大群人因挤不进教堂（即不是“学生”去祈祷的那个教堂），只好光着头站在大门口祈祷。

*** 婚姻在受过教育的家庭里要比在未受教育的家庭里更难成功，而且这往往是很快会破裂的婚姻。有时（就我所知的这方面情况）在妻子刚怀上第一胎时就破裂了：丈夫抛弃了妻子和未来的孩子。

****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刚毕业的法律系学生。我看他穿着“志愿入伍者”的制服，情绪很激动。于是我就问其原因。原来他准备第二天检阅时向师长控诉连长的粗野：“……像推一个小兵一样从背后推我。”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在射击训练中，每当学生兵不慎失落武器时，走在后排的军官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从背后推搡胆小的

堂的人和欺压妻子、抛弃子女的人——他们算什么人?这种人不分国家、民族和信仰到处都有吗?

十四

这样,在关注家庭的某个方面和毫不隐讳其危险处境的同时,我们还应记住一条一般的法则,即家庭和个人的良心是历史上最晚灭亡的,最晚变得形同虚设、冷漠无情。由此出发,我们认为,至少在我们这个难以捉摸、令人不安的时代,当一切都具有欺骗性且只能指望天性时,儿童不宜过久地脱离家庭,因为只有

射手。我解释说,应该学会使用武器。“我干嘛要学步伐操练和这一套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在战场上怎么办呢?”“是啊,当然逃跑啦……”我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又转而争论国家的问题。记不清他的推理过程,但记得他长时间顽固地向我证明说,国家不是他出庭辩护的州法院,过去有的东西,他现在也应有。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学生对此一窍不通,其神色宛若看到了猎豹、黑天鹅、澳大利亚或南非来的某种奇禽异兽似的。他简直全忘了(在毕业前的这几年中),把有关祖国和一出生在信仰上就属于整体的观念忘得一干二净。上述事情尚属个别现象。为了更具说服力,再例举一些普遍的事实:一位大祭司在某大学给四个系合上神学课,选读了《基督教论辩术》。给我们五六百个中学刚毕业的青年学生提的第一个问题是:“科学”是否完整地证明了上帝的永恒,在科学中,尤其是自然科学中有没有动摇这个学说的事实?我说不出个究竟。但在第一堂课上面对一大群乳臭未干的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我惊讶得感到害怕,对著名的历史害怕。同学们在谈起这个教授时告诉我说,他在给语文系等其他系的学生做忏悔(他的忏悔是免费的,所以几乎全校的学生都到他那里去忏悔)时提了些问题。当问到是哪个系的时,忏悔者回答说:“医学系的。”(几乎是二分之一的学生。)于是他念了一段祷文,再也不提原罪,就是说,他知道——显然是根据多次忏悔的经验——这里的忏悔是对圣礼的嘲弄。当这个神甫在亚历山大二世去世后领学生去宣誓时,我记得他神情不安,极为困窘,唯恐闹出不体面的事或丑闻来。其实,我们都记得,这是一个非常自豪、毫无怯懦之气的神甫。他年事已高(在1878—1882年间),早已是大学教授,而我所举的事例不过是对他的经验的总结,并未添枝加叶。

在家里才能得到出自真心的关爱,在真实的关系中了解些东西,以便在未来的生活中持有一份哪怕是粗鲁的直率和一点热心。再重复一遍,家庭能塑造人,而学校给人的只是一根拐杖。这不是“完整的知识课程”,不是“世界观”,更不是“人与公民的义务”。我们认为,至少在现在,中学(我们指的是预科性中学)围绕着家庭、教会和大学所起的唯一作用应是不干涉他们的事务并为之留出足够的空闲时间,为学生补充提供广泛而又结构相宜的次要知识,学生就是为此而来的,支付学费、获取知识后就走了。

学校的范围要比设想的更狭窄、更有限。它在这个范围里的职责最终会被理解的,它能够履行这些职责,这样就不会陷入现在已难以自拔的虚假和内心虚伪的境地,就不会去取代孩子的家庭、教会和祖国——以所有这些作为自身的补充并以此消除其实际具有的绝对作用。这里顺便提一下,即使是艺术理论,在指明艺术的实用目的时,仍依据这些目的要求艺术,但也戕害了艺术,其原因正是它要求艺术作为自身的补充并根据艺术同自身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艺术本身的特殊目的批评艺术。在学校的周围,家庭在悄悄地、但又明显地减员,教堂日益冷清,祖国被否定,这是因为这一切在学校里只是成了教育范例和参考书的书橱,书橱在提供了所需知识并经过充分的使用后自然会被淡忘,甚至还会招来厌恶。

真实而热烈地爱,爱全部的古代世界——谁会禁止这样做?如果我带几个我所遴选的助手承担古代语言及其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和国家体制的教学任务,一方面对把孩子托付给我们的家长负责,另一方面对大学负责,有谁会禁止我这样做呢?大学可以向我指明所需的知识和对入学学生的要求,也可以指明学生因欠缺什么而不能入大学。不是“糟糕”,也不是“不相称”,这都是有疑问的、难以理解的且争议不休的,而只是不需要,这易

于理解，而且挂在招收学生以实现自身特殊目的的人的口上颇为合适。我不教《圣经》，因为我教不了这些神圣的东西；我并非想以此来否定它，只是不想装假，就像我现在装假从实质上否定我以表面形式和假面具所教授的一切。须知，我无法教给儿童对父母的感情和对自然美的感受——不会教他们欣赏星空和战战兢兢地爱母亲，但不会教就是否定吗？不，只是崇拜比我的艺术更高、比我的头脑更清醒的事物；不想玷污他们，不想玷污儿童；但是，要让孩子们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在观赏星空和家庭游戏中学点东西，也在母亲领他们去的或他想去就可以去的教堂里学点东西，而现在的"级任教员"带孩子们去教堂还不如不去，因为这样他们会在讨厌的几个小时的站立中仇视和厌恶祈祷的。我说的都是基本的东西，也不隐瞒我对目前这些东西不断受到偏废而感到恐惧，因为这如同在怪诞的想法中钻牛角尖，只会越走越远，直至精明得变为丑陋和愚蠢*，直至谁也看不到出路、甚至所有的人都害怕寻找出路。

国家能够、也应该保留在所有方面无微不至、同时又能大处着眼的领导地位，但不应涉入个人的、主观的和隐私的世界，而现在一些阿谀奉承和鼠目寸光的奴仆正把国家推入这个世界，国家进入这个世界后会不辨是非地毁坏一切，折磨一切，并激发对自己的反抗。国家的作用是收容孤儿，给穷人送去精神光明，否则这精神光明只能照耀在有钱人——显然是少数人——的身上。再重复一遍，国家只有恢复其自然的、粗线条的任务时，才能真正成为基督教的、道德高尚的和受人崇敬的国家。它应像我谈

---

* 例如，在我当级任教员的初级中学里，有兄弟两个学生请求神父在他们入校后允许他们随母亲像从前一样去做彻夜祈祷和弥撒，但遭到了校委会主任粗鲁和无理的拒绝。当时我作为级任教员曾为这两个请求者说项。

论儿童对父母的爱那样诚实地谈学问："我这里看不见，但分得清；我这就能分出这些和那些穷人，把你们给富人的东西给他们，我会奖赏你们的。"

十五

如果谁都不装出副承担家庭义务的"样子"，家庭就会从无忧无虑的生活中清醒过来，而现在家庭经常沉迷于无忧无虑，周围的环境也引诱它趋向无忧无虑。当奶妈奶水枯竭并且没人能给孩子哺乳时，母亲就会解开自己的衣襟。当家庭因承担严肃的义务必须去劳动和关心子女，家庭就不得不严肃，否则子女长大后就没人、也没有地方会需要的。家庭如果能做到自身严肃，即使很少受过教育，仍将会有教育作用，就像我们上面所解释的那样。对家庭不应要求任何复杂的知识，不要求它教授深奥的知识或培养复杂的技能。它应全身心地关注和培养子女身上的"个性"，即某种性格：该服从则服从，该反对则反对。敬仰上帝和始终热爱劳动，一个是内在性格的表达，另一个是外在性格的表达。我们认为这是家长应集中精力去做的唯一的事情。只有对这种有自己的思想、性格坚毅的人学校将来才便于灌输知识。

我曾观察过几户文化程度几近文盲的家庭。通过几年的观察，我对他们的教育成效甚感惊讶。尽管我的话在许多人看来近乎天方夜谭，但我仍要坚定地说(因为我看见过)：使孩子从不受任何处罚，使孩子在大人持之以恒的监督下受到最严格的宗教和道德熏陶，这个理想不仅是可以期望的，有时也是可以实现的(我亲眼见到过并可以作证)，即使在我们尚未开化和启蒙的民众环境中，哪怕老一辈家庭成员甚至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这也能做到。至于古代，则可以援引帕尔费尼神甫[38]著名的《漫游记》中

的童年回忆片段，这本书是研究我国人民在以前原始的、未遭破坏的形式中的精神状态的无价之宝。由于受教会的影响并对教会学说奉若神明，我国人民把教育理想确定为完全的人道主义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样就把信仰完全寓于伟大的、庄严的和神圣的学习对象中，并把对胆怯的、无助的和天真无邪的受教育者的关爱结合了起来。如果我们以最糟糕的情况——不公正的处罚，即错误采取的措施——为例，那么这种教育方法就其一般形式而言还是不错的，即使偶有失误，但无大碍。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们去接近受到不公正处罚的孩子，就会发现：正是因为他感到冤枉，比受处罚还冤枉，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弱者，当然这不是对处罚他的人，而且这也没必要，而是对其自身，这是他唯一需要的。这样"因违反某条款而被关 24 小时禁闭"的学生，虽然寂寞难耐，但不仅没有变得软弱、迟钝，反而不受寂寞刺激的影响，只是昏昏欲睡，饥饿难熬，此外，他还可能更狡猾——是由发明各种暗室和禁闭的诡计感发的。记得我童年时有一次受到非常痛苦的惩罚。我这里写这些并非出于"教育学"的利益，而是实事求是地记述。记不清是何人、因何、如何惩罚的，但至今我仍记得，穿着绿色连衣裙的姨妈走到我身边，抚摸着我身上挨打的部位恐惧地说："瞧把你打成什么样子了！"她这样安慰着我。受处罚的人总会有人心疼的，因而，他将来也会怜悯他人的*。

---

* 我当过中学教师和级任教员。经常有许多学生的母亲（总是寡妇）请求我这个级任教员鞭罚其放荡不羁的儿子（即要在学校里处罚）："又打妹妹，又不听我的话，简直拿他没办法"，云云；我当然解释说，这是条例所禁止的，但我也很清楚地知道（须知，在教育学文献中作为范例的只是毫无主动精神的学生，他们都能"被话语所说服"，这样，惩罚对他们还有什么用呢？）小男孩很有才干，属于所谓的爆炸型性格，

十六

但是，如上所述，这只是同现在决裂的象征。我的理想不是让儿童在规矩严格的家中受处罚，而是家庭应严格加严厉，在精神、家风和每个人对自身义务的理解上要严格，这能有效地防止在儿童身上孳生讨厌的恶习，如此也就谈不上使用体罚了。诚然，体罚只能用于那些家规不严、不爱劳动、缺乏自制的家庭。当子女做得过分或越轨时，往往可采用处罚；处罚的好处还在于能立即使孩子离开自己，仿佛把他同家庭隔开若干时间，即隔离于对他产生危害的主要的、不好的事物。当然，处罚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对的，但其优点是：这是一个简单省事而又能在当时情况下达到最佳效果的办法。孩子会受委屈。“我就坏到应受这种处罚的地步了吗？”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其没完没了的半意识忧郁寡欢的想法的源泉（盖源于此），这些想法不仅掠过他的思维，

一淘气就会忘乎所以。我总是劝告其母亲，还是去找邻居或亲戚什么的，狠狠地抽他一顿鞭子。现在每当我看到有钱、有教养人家中的孩子萎靡不振、百般无聊地陪着“地球仪”和其他“参考书”时，我总会回想起童年并想到：如果不用这些为激发孩子们的求知欲而到处张贴的纸条和尘封已久的矿石，而是让他们像从前那样跳跳蹦蹦，那他们就会振作、活跃起来，马上就会开始思索和感觉。一切都会马上随着“环境”变化：敏感性会复苏，对苛求会反抗，复活的正是现在在不断的学习、学习、学习和不断的解释、解释、解释伴随下正在发霉的精神。鞭打——这毕竟是事实；这是对我的强暴，它促使我全力抗争；这是我仇恨、愤怒、有时甚至是害怕的对象；对于它我毕竟不是消极的；只要躲开了挥舞树条的人，我就有了自由，即心灵和思维上的自由，除了痛苦和愤怒，我不再驯服于任何东西。我严肃地问：用什么，用那些收藏品、图书和地球仪能激发心灵这种复杂和鲜明的运动吗？能激发心灵的自身活动、力量和压力吗？至于鞭打所致的“人的本性的贬低”，要知道，它并未能贬低路德和我国的罗蒙诺索夫。它怎么能贬低我们的儿童呢？

而且还触动了他的心灵，长时间地笼罩在他的心头。“他们就那么好吗？该这样打我吗？难道我身上除了淘气、冒失、顽皮等这些使他们瞧不起我的东西外，就一无是处了吗？如果他们了解我，会为了更好的东西原谅我吗？”这就是自豪的开始，虽然还是孩子气的，但已是美好的，就其严肃性来说是极其深刻的自豪。

我们举出这些想法是想表明，体罚中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它孕育了新的教育法，而且是思想高尚、性格完美的人几世纪都未能见到的教育法。我想对自己的想法作一些补充并为已故的几代人做一点辩白，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比我们这代人更善于爱。正是他们对孩子真诚、严肃、负责并因而是困难的爱使他们在对待孩子的关系上变得有些严厉。当然，没有必要把这严厉的爱发展到体罚的地步。理想在于这样的家庭：对于它，有关理想的想法是带有侮辱性的；所以在子女劳动的家庭里是不能体罚的，因为大人们在不知疲倦地劳动；他们的子女不会撒娇，不会游手好闲，因为每分钟都有活儿派给他们干；他们以童年的精力关注这派给他们的活儿，因为他们每分钟都感觉到对他们的关注。类似的家庭无论受过多么少的教育，永远不可能是不高尚的，而这种高尚的精神是一定要体现在劳动中的。我们所指出的这一切都围绕着作为主要依据的劳动，其中还包括了形式，这只是有序的外表，它若没有主观内容就永远无法保持稳定。什么是这个主观内容呢？宗教生活的温暖、同教堂的融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周围一切事物——即自然和人——的光明而欢快的态度。家庭是小世界，是大世界的反映，它应该集大世界的所有光辉于一身。它应该像这个世界一样被照亮，这里是它对教会关系的枢纽；但就像大世界充满了永不停顿的运动一样，家庭也应处于永不停息的劳动中。家

庭里的肉体和精神应结成一体；但就像所有生物一样，精神在家庭里不仅主宰肉体，而且应赋予其无穷的意义，使之充盈永不熄灭的光辉。这两者的源泉都只在宗教里。无论我们看什么，国家也好，科学也罢，艺术也罢，都能毫不费力地发现，它们的意义不会超脱人的生活，它们的界限是分明的。因为人可以献出自己的才能为它们服务，但不是献身；当人心目中有这些东西时，是不可能对自己真正的注意对象加以蔑视的。只有当人通过宗教获得了对自己的完全认识时，才会闪现同自己本性深入而完整地溶合的念头，才会去符合自身，而不是符合环境。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地启蒙。

十七

我始终在想——我总是感觉得到——人具有宗教性，这不是在宗教追求的意义上，而是指人本身活生生的具体形象及其同历史形成的教会的密切联系，这高于一切。信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更开化，而不信教的人无论知识有多渊博，却不懂得主要的东西：他是谁，在什么中间生活，为什么而降生？前者的形象更完整，他是完整的人，这就是他同时又是开化的人的原因；相反，只是智力发达、甚至能向别人传授丰富知识的人却是不完整的人，并进而是不开化的人。他学富五车，他无可非议，但他不过是个尤莉娅·帕斯特兰娜，或者是个缺胳膊少腿或缺其他东西的畸形人。这个畸形人令人惊奇，看他要花钱买票，但他比所有买票来看他的人更不幸。我们亦如此，在智力上比别人高出一大截，但在历史上，在今天，不过是个尤莉娅·帕斯特兰娜；很遗憾，我们缺乏对自己痛苦的意识，而她毫无疑问是有这样的意识的。我们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我们的不幸，

可我们却又想引以为豪，这就是我们的缺陷——我们的自豪将会烟消云散。作为不完整的畸形人，除了这种不完整的畸形生活，我们的心计创造不出其他任何生活，因为尤莉娅·帕斯特兰娜不仅仅是我们，而是我们的历史阶段。我们的努力，我们畸形的希望和期待以及我们用自身所创造的一切都难以逃脱这个命运。看来，在后人的回忆中，我们的形象将被忘得一干二净，而这个特点却是难以磨灭的，它将永垂史册。我们是天才，是伟人——在某个方面，因而只能是畸形的——在自身；伟大是对别的东西而言的，即对外部而言，但自身却是不伟大的，甚至是可笑又可怜的。完整的人是历史的理想；他尽管不是天才，尽管不很有知识，但他却掌握了人类生存的全部法则——这就是他更好的原因，因为人类“更好”或“更坏”的概念表示的就是人是否与这些法则相适应，还能表示什么呢？这些法则在人混沌未开的降生中就已注定，并将延续到另一个在遥远未来同样混沌的尽头。这所有的一切虽未意识到我是谁、为什么来、来自何方等问题，难道就不具备其他的知识吗？这些知识连科学、国家和艺术也无从知晓或闭口不提的，这些知识照亮了我们的生活，用宗教、教会和我们同久远、愚昧的人类历史的融合来理解我们的个性。虽不博学，但却是开化的；行动有限，但思维的对象无限；人世间短暂的一刻，却是无穷无尽的未来时代——这就是信教的人，他不同于不信教的人，后者的所有定义都是逆向的，无论他在各个方面有多么伟大。

十八

教育——历史的、真实的教育——的任务是在失去完整形象的人身上恢复其形象的完整性，因为教育能影响人，使人承担

义务，给他规定至死不变的准则。我们在一开始就说过，教育的真实观点是艺术性的；现在，当我们更完整地揭示这个定义时，我们说它是宗教性的。谁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变化的条件下能完成这个伟大而神圣的使命?这不仅是为自己的民族，而且是为处于这个历史时刻的整个人类。谁对此负有使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讨论。对此我们有权期待和祈祷，并准备在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随着应该跟随的人走向应该去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还有某些珍贵的品质，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安慰:再当一次历史上的受教育者，再一次理性地看一眼自然并理智地谈论它几句。如果我们什么也没有，那这一切对我们还有什么用？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教育的黑暗那时将成为我们最好的黑暗；当一切不再需要，当一切难以判明，当我们能理解地忍受这一切时，这将是意识上最好的黑暗。

在这信仰堕落的时代会出现真正信教的人吗？当我们的所有法则都发生动摇时，他还会坚信法则吗？是他被派到我们这里来的吗？我们配得上吗？这是未来的问题。如果配得上，他就会出现，我们就跟随他，不再悲伤，有史以来又一次不再悲伤；即使不到最后，也要坚持到重又精疲力竭，并感到心满意足。所有现在不能解决或假定能解决的事情都是短暂的，因而都会引起新的痛苦，但也都会自行解决的。人毕竟不是天生无法无天的，只有确实丧失了所有的法则并感觉不到任何法则，他才会说他不要任何法则——不要他不知道的东西。如果给他看不是杜撰的、而是取自其永恒本性的真实的法则，他就会服从这个法则，因为他不会不感觉到这里有他的满足与欢乐。

欢乐显然是行动的朝气；满足显然是生活的信心。所有这一切是针对我们成年人的，因而也是针对我们的儿童的。我们实际

上不能使儿童脱离我们，把他们隔离于我们的生活和劳动方式之外。因此，谁能教导我们并号召我们劳动，指明劳动比营养身体略为重要的意义，谁能向我们阐明生活，他就能向我们的儿童阐明未来。

十九

但这尚在九霄云外，尚在历史的远方，而我们贫穷的世界还是那么糟糕、困难。我们再谈一些细节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一直使我感兴趣：究竟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时刻实施教育？难道在现在，在人进入梦乡的时候？……

我们上面列举了学生一天的时间安排，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指明了他为什么要强打精神。未必会有人怀疑，在这千百个千篇一律地排满功课的钟点里缺少了教育成分。但我几乎忍不住要说，缺少的何止是这个成分，缺少的是所有的成分，包括习得成分，即扩展精神内容的成分；它们是相互迭加和联系着的，而单个分开后它们会使所占用的时间给冷静的旁观者一种几近白痴的印象。由于学校过于脱离和隔绝于社会，使得这个现象的另一个方面仍鲜为人知：学生的时间安排是由类似的成分迭加起来的，是由这紧紧压缩在短暂时间里的印象灌输构成的，这其中包括了跨学科的、各学科的以及反艺术的、甚或没有教育作用的印象。

为了对教育——不是教育的"思想"，而是教育的现实——有所了解，我们应该研究教师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只有教育的现实是同我们有关的，而教育的"思想"只是少数人有空、也有兴致研究的东西。甚至当局也认为有必要把教师的工作年限较一般的、正常的、虽然也是智力（如司法工作）的公务劳动再减少十

年。* 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我们确信其中的奥秘不在于体力不支，而在于心理疲惫，就会接着问：在如此安排和布置的劳动中有没有或能否有某种起教育和培养作用的东西？而现在的劳动则使人体器官不仅变得不敏感、不强壮、不发达，反而使其在其他器官成熟的同时陷入了奇怪的虚弱无力，有时甚至是恶化和憔悴。要知道，铁匠的双手、猎人的双眼和双腿以及思想家（如康德、洛克、牛顿及一系列伟大的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智慧都能长时间地健康工作；只是教师，像瓷器工人的皮肤和肌肉一样，最先萎缩的正是作用于劳动对象的东西——心灵、头脑和整个心理机制。

实际上比上述已缩短的时间还要早，在教学生涯的第12—14个年头，很少在第16—18个年头，教师就已成了需要自我关心的病人，而在前8—12年间他们还能不停地、时时处处地给数百个学生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动物保护协会和保障监狱生活的慈善家们——这些你们的兄弟、杰出的人物，他们文化程度最高，很仁爱，很友善，但实际上却过早地残废了，似乎被所有的人所唾弃，比受保护的四脚或两脚动物更不幸。啊，当然了，他们外表上没有痛苦的标记，除了人人都有的普通标记：面部表情和举止言谈。

甚至很少了解教师日常生活的人在芸芸众生中，譬如在游玩、看戏的时候或在其他什么地方，遇到一个偶然来此地的神情萎靡、心不在焉、目光呆滞的人——他一定离开了社会，而且不想以愉快的心情接近社会——马上会猜出来："一定是教师。"所有人都能认出他来。没有人想同他说话，确切地说，避之犹恐不及；即使要回答他的话，也是胡乱编造些什么，接着在听到几句

* 教育部规定的退休工作年限是25年，而其他各部是35年。

也是瞎编的、但语法组织很正确的话之后，就匆匆地躲到一边去。教师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很怪，总是同别人合不来。无忧无虑地放声大笑——这在教师那里是无论如何听不到的；迅猛的运动，充沛的精力——这也是在他身上看不到的。他能阐述天文地理，但从不会讲述趣闻轶事；他从不会把欢乐带给别人，也不会使人精神振作，除非使人产生些兴趣。他只适于单独谈话，在大庭广众发言会使他手足无措。显然，他只会教书或听讲，而其他的才能和技能都已退化。但是，他其余的追求、品味和欲望并未退化。

我曾在（各种中学的）教师中生活过几年，有年纪轻的，年纪大的，经历不同，气质、智力结构和性格也不尽相同。我能（对此也有权）证实，除了到处都会有的例外情况，这个人数庞大的人群智力细腻，天资充足，善于科学思维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心灵纯洁。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真正对贫困的尊重，真正对体力上或心理上的不劳而获的鄙夷。同其他所有的职业相比，大学生活在回忆中是最温暖、最快活的，大学里爱才惜才，能探寻自己的未来命运。我遇到过一些被派发到偏僻省份的人，即使成年以后，还会认真地学习琴棋书画（我至今保藏着一位命运非常坎坷的数学教师七年前给我作的画）；尽管希望渺茫，仍会翻译塞奇[39]的专题论著（就是那个数学家兼画家）以及孟德斯鸠或古代哲学家的一些东西。这都是高尚的追求。在这偏僻的省份不求任何私利，尽管周围到处是酗酒、偷窃以及野兽般粗野的行为——这纯粹是出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或许是出于保护自我心灵的模糊的潜意识。在偶然的面对面谈话中，你会发现教师心中也经常涌动着尚未熄灭的对遥远的他乡与他无关的生活的兴趣；有时候在事情过去多年后，你会从旁人那里再听说他对人的温存（用自己的钱为穷学生买衣服或几乎承担起穷学生一家的生

活），你不禁会相信什么，希冀什么……就是这些人，在整体的活动中以各自的这些特点出现，却被学生仇视，被市民仇视，危害家庭和教会，对历史没有任何创造作用；如果仅仅是被仇视，倒还没关系；比仇视更难受的是时时处处遭到鄙视，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你了解教师的日常生活，不用走进教室去看他上课就能知道，这个文化程度很高的弱者在那里是抑郁不欢、心不在焉的，很不公平，很残酷，而且教师们对此也相互了解，大家都痛苦地不提此事。头几年还想努力克服和战胜它，最终在失去一切后多少变得有点厚颜无耻，只想隐瞒到底；但在看到这个秘密早已人人皆知时，也就不再试图隐瞒。这个令人吃惊的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在劳动的哪些特点里，在哪个特殊而又不为人知的方面？为了弄懂这个问题，需要完整、彻底地想象这种劳动实质上究竟是什么。想象一下，这种工作要比教授、院士或其他学者的工作更奥妙、更细致，不仅要阐述，而且要会用所阐述的东西去吸引人，如果听者能力差、精力不集中或有其他缺点，还要用相应的影响方法来处理每一个缺点，这样，不管怎样一定要使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需要的事物上去（这是完全必要的）并在他们的意识中加以巩固。所阐述的内容不仅应是早已熟悉的，而且应是基本的，这样只需人为地收缩发达的视力，就可以使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像小孩一样俯身拾起一件看不见的东西，并生动有趣地向别人展示这件东西。这些捡起来的东西每五十五分钟都要变换，每五十五分钟都要变换一些——不是很多——表情、姿式、阐述的方式和鼓励的程度，以免使完全年轻的学生觉得好笑或失当。但每一个不同年龄的学生，除了十分年幼的，在我们上面已经描写过的教师使然的另外一种机制的压力下会情不自禁地对他所展示的东西表示厌恶，对展示者发出嘲笑……这个延续五六个

小时的机制嵌在一天的日程里，这期间有一顿午饭，两次匆忙的茶点，读 40 至 60 篇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意义、词汇和句式十分庄重的文章*……这一天是一学年的 1/200，而一学年是由二百个这样的分数相加而成的……这些分数在剩下的、几乎始终看不见的家庭、堕落的势力、腐蚀孩子的金钱欲、对上级多年徒劳的献媚的背景上导致了对所有人的疏远和认为所做事情无用的意识。

此外还要增加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职责，这自然是指充实、巩固和改善班级工作而实际上彻底动摇班级工作的职责。教师来上课时不仅疲倦得像一匹在两条铁轨间奔跑了一天、快累趴了的马，而且正为一系列的事务烦恼：昨天在校务会上他想、却又不敢坚持己见，今天发现四分之一的报表制定有误，此外还为学生宿舍操心，为即将来临的检查担心，对是否能在即将来临的考

* 我们指批改学生的笔头回家作业(extemporalia——“回家作业”)。至少在不久前批改这种家庭作业还占用了家里很多时间。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位回校执教的老师，在他那里刚坐了几分钟，他就建议我在他“改本子”的时候读一本他所收藏的很有意思的书。在该校教务委员会会议上每每会讨论某个班级时，某个教师、委员会成员只要不在这个班级上课，就会悄悄地站起来走到边上的小桌旁，那上面摞着他从家里带来的“回家作业”(extemporalie)。他向我解释说：“只要一天批改不出所需数量的本子，就再也不可能改完这些本子。”我尊敬的老师 A. И. 斯维里多夫几年前给我讲述过他的一位年轻同事。他是某中学的拉丁语教员，娶了一位有文化的年轻姑娘。但结婚一两年后妻子和丈母娘就愤然离去，抛弃了他。那天他下班回家，发现家庭作业被撕得粉碎，撒满了一地。桌子上有一封信，信中丈母娘向他解释说，当她把女儿嫁给他时，从未想到会使女儿过上这种只能在床上看到丈夫的愚蠢的家庭生活。不知道这种情况现在是否有所改观，但它确实持续了 20 年，从 1871 年开始。其实，这里正表现了古代语言教师(他的本子最多)特有的迂腐和不开化，而这在我国古典学校的这段昌盛期间已被多次指出过。有一份通知非常严厉地指责了教师的懒惰和懈怠。根据这份通知可以判断，教育部和教区对这方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它们根本没想到会这样。

试期间与同事们处好关系感到不安，因为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会伤害他。在教室里上课不是他唯一操心的事，甚至也不是最紧要的事。如果这堂课上得十分糟糕，至少表面上很糟糕，也不会马上产生任何痛苦的结果，但是，如果没为校务会制定好"报表"，这就是难以预料的麻烦事；这无论如何得完成；无论如何每月得巡察一次学生宿舍，做许多班级工作，把所有的淘气捣蛋的事登入记过簿并加以分类和统计。这些工作都无法事先规定。又比如，成绩不好的学生很健忘，应该督促督促他，可课堂上又没有时间或干脆因其他事务把这事忘了，这不仅不可事先规定，而且作为难以发现和无案可稽的事情，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疑问，因而也不用负任何责任，除了对良心负责之外。这些未及履行和难以觉察的职责数以千计，如学生或因我的渎职、或因我的同事的渎职和恶意被逐出校门，因致使学校在检查中被指令"提高"质量的几十名学生被逐出校门——这一切都使教师心绪不宁，于是他会令人吃惊地对班级做出难以理解的姑息迁就，或对漫不经心的学生暴跳如雷，而他"自己"也变得如此漫不经心，甚至看不出学生早已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只是一个劲地说："对，对……不要太着急……"他残酷，愚蠢，不公正，但同时又很聪明，心灵遍受创伤——这就是教师。

在学生时代我像所有的同学一样，认为教师是精神最贫乏的人，因为他们对学生经常做出明显荒唐的事，有时甚至偏颇得触目惊心。后来我当了教师，看到了学生所看不到的如网如织般的关系、职责、工作和忧虑。同时，由于这些东西，教师在同学生的接触中贬为同类。我明白了，所有的指责都不甚公平，同所指责的对象简直毫无关系。"他因学生的一个错就只给一分，可昨天他就漏批了十来个错……。"但在昨天上午和今天上午之间还有昨天晚上，这期间他"听取并签署"了从某班开除其

得意门生的会议纪录，尽管这个学生很有才华，智力发达，求知欲强。虽然这个迄今为止一直教数学的、墨守陈规的老教师付出了一年的努力，虽然其他教师借口说哪门课不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教区送来的“新扫帚”还是把他换掉了。于是他的得意门生和其他几个学生一道无可奈何地从学校里“清洗”了出去。* 我明白了，这里的行为和看法的作用范围达到了什么地步，这里一切都应循规蹈矩，而实际上却无责任能力，一切都要事先提醒才能行使职责：“我真诚地、真诚地告诉你：倘若有人引诱一个幼小的生灵，最好在他脖子上挂上磨盘，让海水把他淹没。”

---

* 只能把这每所学校中或是全盘的、或是针对某门科目的周期性重复的提高水平称作对儿童的犯罪。不应允许学科或学校降低水平，如果降低了，提高则只能使自己担惊受怕并遭受损失，而不是无辜的学生；同时要为他们的前途补偿由教区所犯的错误和滥用职权带来的损失。我在文中所写的事情发生在某初级中学。派来开办学校并建立整套规章制度的第一个校长是一个作为教师既不知道上面这套制度、而作为学生也不熟悉这套制度的形式（他是富家子弟，进大学之前只受过家庭教育）的人。他的管理任性至极。例如，教现代语言的教师只是20号左右来校上课，学生在课上笑着把这事当面告诉了他；校长还把数学教师从课堂上叫去下棋，把班级留给巡察员来管，甚至对学生也不隐瞒把数学教师叫走的目的。无怪乎除了极个别为完成学业而转往邻近中学的学生之外，学生们都不能完成学业。就是在这所中学，这个校长还很年轻时又被调往他校当校长，而学生们因制度改变只能承担在他胡乱管理五年中拉下课程的苦果。市民们对此忍无可忍，干脆不再送孩子去这所中学就读，宁可送他们去邻城读书，而学校因“加工材料”的匮乏而关闭，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在1889年。为了解释得更清楚，再说一点情况：市政当局为维持这所学校曾发过补贴，但后来看到这种情况后就不发了，但仍不得不对这种状况表示认可。对此我不得不指出，市政当局是始终了解这所学校的真实情况的，它也不希望情况变得很糟或对此不闻不问；因此，唯一的维护者只有他——不断巡察的监察员（当然，这都是些相当内行的人，而不是那些通常被选作所谓的“荣誉监管员”的富豪）。

二十

于是我们放弃了伟大的《旧约》，取而代之以表达更明确、执行更容易的新规则，而且主要的是，这些新规则的执行情况随时可以得到检查。

但是，这些“规则”得到了起码的执行了吗？有没有连内容也没有的形式？或内容没有预料到它会被故意忽视？我想举一部分例子并以此分析表明，既然这一部分取自整体，那么整体也不会有任何形式，而这个形式也是众口缄默的幻影。

以上我所说的一切的意思是：即使完全地、理想地执行教学—教育培养机制中的所有规章制度，但是所造之物仍未获得人的正确形象；在这个机制中，弹性形成的个人没有生命力，形象模糊、扭曲，虽然所掌握的知识是准确的、广博的，所掌握的技能是实用的，但也不会大展鸿图。受教育者身上没有形成一个重要核心，以使这些技能得到有益的应用或至少得到保留，或使精确的知识再加以扩展并得到有效的使用。但是，我现在想说，这些知识和信息的广博性及准确性本身就是虚幻的。构思得如此精妙的机制所制作出来的东西不仅不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也根本不是完整的拟人面具，只是一堆碎片、破布或彼此没有联系的线段，总之，是一种莫名其妙、毫无用处的东西，其中所有的一切相互脱节，如果说用“大纲”、“条例”、“注解纪录”来衡量还差强人意的话，那么以人的标准来看则根本不行，因为人是生活着的，会动作，会思想，会说话。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人的培养和教育不仅仿佛漫无目标，而且把国家、地区、时代以及历史文献、生活、自然、需要、害怕等千百种事物向学成者提出的一切要求都抛诸脑后，而昨天的学生和

明天的活动家对此则不懂装懂。

一般可以肯定，完全中学的毕业生中只有极少数人能适应非宗教学校更高、更广泛的要求*；而对那些能力欠佳或家庭环境不够好的学生来说则难于达到这些要求。但这是欺骗和自我欺骗：是对社会、国民以及似乎无力达到并因而达不到要求的人的欺骗；是制度制定者本身的自我欺骗，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些错误决定了无论换哪些"执行者"，一个年级的毕业率必然只能是2％－5％或者更少，而且无原因可究。这种现象的真实原因是学生一入学就被人为地惯坏，一开始就放任自流；当学生变得放纵并习以为常后，突然（在第四个学年）又对他们要求极严，而且不仅仅针对这一年中的所作所为，甚至针对以前几年所有的过失。一开始放任自流，然后又矫枉过正，在开始和结束都没能教会所要求的东西——这就是令人吃惊而又被忽视的、简直难以理解的现状，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中学不能进行正常的课程教学的原因，而可能只是对个别人而言的，并且只是借助于教师不得已而为之的欺骗才成为可能。

实际上，就像下面会解释的那样，学生每升上一个年级时，对前一个年级知识的掌握是很不够的；每一个新的年级不过是前一个年级的发展；学生开始在有些地方不甚明白，接着对主要的东西似懂非懂，最后则一概不懂，结果在最后的几个年级里他们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留级或升级在这时已非他们意

---

* 这个比例比想象的要少得多。例如，一年级两个班入学时有40－50名学生，但八年后升入八年级的只有1－2名学生（有时甚至一名也没有）。可见，中学的学制只是对这1－2名学生来说是八年的，而对其他学生，即对所有的学生而言，是九年、十年或十一年。中学课程过快的教学速度只是人为地把十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八年，结果只使一个学生有可能尽快毕业，当然，却使其他学生全成为不正常的。

志所能，而由教师任意决定。一般是这样：1）取决于并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平均分、学季分和学年分；2）取决于中期考试成绩；3）取决于多年知识考试。

每个学年分成四个学季。每逢学季末需把学生每次课堂回答的分数加以综合，用一个能包容所有成绩的分数来代替。需要指出，假设某课程在一学季上了十六次课，其中四节有课堂提问，学生对这四节课自然要比对其余十二节掌握得更好；由于儿童自身的谨慎及任性等原因，他们对那些可能提问的课准备得比那些根本不会提问的课更仔细。假设他们这些最好的回答在四个学季末评到了如下分数：第一个学季为1，2，1，2，总评2分；第二个学季为2，3，2，3，总评3分；第三个学季为1，2，1，2，总评2分；最后一个学季为2，3，2，3，总评又是3分；从四个学季分2、3、2、3中推出的学年分为2点几分，小数由于最后一个学季分及格，被化为整数，于是学生被认为在学年中学够了升级的分数。实际上所有16个分的平均算术分是2分，没有任何小数，即在整个一年的学习中学生的成绩为不及格（1+2+1+2+2+3+2+3+1+2+1+2+2+3+2+3=32；32∶16=2）。如果我们注意到，如果昨天有准备，今天回答可得3分，那么在学季末不会多于2分，其他分数也是这样。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足够的升级年分（3）实际上掩盖了不是2分的得分，而是1分的得分，即很差的知识。同时这个虚假的分数在所有推算出它的单个评分或被撇开，或被淡忘的情况下，成为唯一决定学生是否升级的工具和手段。它表明，学生学习及格，但并没有说明他升级的问题：但它是事实，于是学生就升级了；他掌握了哪些知识——我们这才明白。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学年（后面还有六个这样的学年，依然重复着同一游戏，这游戏似乎是减轻学生的负担，而实际上是在欺骗他，往他的脖子上套绳索）的学习和课程

对于他不知怎么突然变得很困难，这也令教师大为恼火；困难的原因是同以前课程的联系不密切，以前的课程虽然只是片断，哪怕是很大的片断，但决不是连贯的整体知识，它们依然保留在日益疲倦和胡涂的大脑里。

在以后的年级里，这些精确的知识不断地在内容上扩充，要求记忆的事实、原则和方法等也越来越多，同时其本身的分门别类也愈加精细，最后分化成一些摇摆不定的浮岛，在无边的雾海里漂游。任何新获得的知识都不能牵强附会于这雾海里的任何东西，学习变得困难重重，学生对所学的东西几乎一窍不通，没有任何精力准备第二天的五门功课。作家的译文中哪怕词都熟悉，可意思就是弄不清；但是他词又认识得不多，需要查找词典，更不用说现背下来，这得占用他两个小时时间。* 他早就对历史事件、物理现象和天文观察之间的联系如坠云雾之中，甚至也顾不上问问自己有无这种联系或去查一查教科书。** 他起先会不预习第二天可能不会提问的功课；渐渐地会有几门功课不预习；最后会拼命地预习那门肯定要提问、而且老师已警告过的功课。学生早就茫然若失，疲惫不堪，对所有的课程都知之不多。同时，三分的幻影依然在向他招手，它一会儿在这门功课上落空，一会儿在另一门功课上泡汤，但在超人的努力下又抓住了。其实，这门功课通过努力后提高了，但另一门，有时甚至两门，都下降了。事实上，所有这些课程在粗线条的大纲以及“相互联系的机体”

---

* 我了解这样的情况。如果学生把预习功课的全部时间用于查找生词，功课只能在第二天课前、课间休息甚至课堂上(即在课堂上预习下一堂课的内容——对一些读者该不难想象)预习。由此而产生了参考书的必要性。

** “谁被打死了，谁胜利了？你都无所谓吗？”有一次考官大笑着问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根本没打死”(是说某个战役中的英雄)，对考官的话学生不动声色地纠正说，“那就是胜利了。”

中是一个美妙的整体;很可惜,其中被删去了些东西;可能不想破坏幻想;皇冠如果引诱的不是这个精疲力竭、体无完肤、愈发愚笨的学生,就是在引诱那些从远处观察的人,他们观察的是千百颗在这精耕细作的土地上如鲜花般盛开的童心,欣赏的是全体学生的演出场景,而不去关心其中某个人。

虚假的、欺骗性的学年分* 处处被奉为升级的依据。需要注意的是,高年级的各门课可以是满分,但在低年级不应使所有的课程得满分,因为这时学生主要是尽力适应学校的要求,即使有些副科得 2 分,学生仍能升级。他会利用优惠条款在下一年级迎头赶上的。有哪个 10—11 岁的儿童不想利用这样的机会呢?除非他智力超群。学生以为这些宽恕他的优惠条款正在放宽,可教师、学校及教育系统知道,不过是推迟而已,四年之后仍会十分严格地要求他们的。冬去春来,一次、二次、三次,于是第四年的春天来了:可怕的四年级,它的教育大纲内容比以前任何一个年级更庞杂。当学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学完后,他就来到了考场,而拿起的题签不是针对这一年的,却是针对前一年、前两年、甚至前三年的,即针对他完全是个小孩的时候。那时候他无所顾忌地玩球或铅笔刀,追逐蝴蝶等等,这要比拉丁语变位、亚历山大、马其顿[40]的功绩以及亚洲高原更有趣。考试只能是欺骗性的,学生对此很清楚,教师也很明白。前者受到后者的庇护,而前者无能为力时,后者就在按规定派来的助考官和主管校长的默许下实施了欺骗。它的实施是注定的,处处必须的,且无可挑剔地当着教师和学生的面;它源自于教育组织的整体,绕过它是不可

---

* 学年分和学季分像所有的骗局一样掩盖了现实,应予摒弃;如果需要在教学体系里保留分数,只应保留一年里答问的简单分数。在评分、测验、提问的教师面前应始终只有这些分数,这样提问就会更有目的性。

能的，而采用它则意味着毁灭了学生升级的可能，毁灭了下一个年级，即毁灭了整个学校，这如同在学校的物理结构中——从其天花板、墙壁和支柱的体系中——突然抽去一堵墙一样，会把整个学校摧毁的，这是不可能的事，谁也不敢对自己提这样的问题。

二十一

教师身体力行的欺骗体系并不复杂：笔试时允许抄书、查书、商量及修改监考官指出的错误；口试时不追究错误和叙述中大段的遗漏；口试毕竟是弊端最多的：教师用自己的讲述或解释来代替学生的讲述或解释，仿佛热衷于这个话题并赶在学生前面说，而学生只要跟着教师重复即可。这最后一种欺骗形式特别多地运用于《圣经》考试和几何定理及物理公式（在黑板上的）论证。正式的考试上也是这些欺骗形式，只不过是用于前一个欺骗有欠完备或师生间未达成默契时：例如，教师把一门 2—3 年的课程分成 30 个平均部分（题签）给班级学生，其中每个部分都内容广泛，需要花 12 个小时去寻找答案。由于整个考试不超过 12 个小时，于是老师提醒学生应准备每个题签的开头部分，约占 1/100 或 1/22 的比重，10—15 分钟用于讲述，考题就这样布置完了。题签的开头部分是不难的，答案是众所周知的（我曾使用过这种欺骗体系），而考试看上去是针对整个科目的并完全按照大纲组织的；即使陪考官对题签的其他部分贸然提问并可能使学生答非所问，但考虑到学生已经回答了很久，会认为错误可能是疲倦导致的，因此这绝不会影响学生的成绩。

在八年的学习中，这种欺骗前后共有三次，在三个危机性的年级：四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很难解释为什么这几个年级的

学生要对前四年或前两年的学习负责。* 但是这种令人震惊的极度无知早在二年级就开始了，并一直延续于整个学习过程中，其原因已在上面作了解释。这种无知程度极高，以至于无论学生多么努力，教师多么宽容，学生是不可能大比率通过测试的。如果一个叫柳德维克的七年级学生把查理八世的故事或克拉林顿决议㊶当作失土王约翰㊷王朝的事的话，教师是可以宽容的；但如果他把 Magna Charta㊸放到西班牙，如果他根本不记得西班牙的腓力二世㊹和德国的卡尔五世，或不知道何谓法国新教徒并同人文主义者混为一谈，或对教师诸如彼得大帝生活于哪个世纪的问题回答说："14 世纪"** ——这可是在毕业考试上，是 20－22 岁进大学的年龄——于是考试委员会恼羞成怒并判他不及格。学生留级了；统计表明，留级都发生在上述三个危机性年级进行多年知识考试的时候。如果留级的人数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在八年里达到一年级入校时人数的 95％，那么，读者

*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中学采用了由同一组织体系对前四年或前两年知识测试的方法，而这种组织体系后来掌握了大学里的生杀予夺大权，取消了大学里的年度考试，用半年(学期)测试取而代之，即不相信 22－26 岁的大学生会有如此远见，在年初时就考虑到年终时会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却相信 10－16 岁的中学生倒会有这种甚至四年的前瞻能力。

** 在我十二年(从 1881 年到 1893 年)的中学执教生涯中遇到的最高程度的无知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刚调去任教的 E 校，一个七年级学生被叫到欧洲地图前去指出莱因河的发源地，他指不出来。我对他说："在阿尔卑斯山。"但是他依然不敢把手指向地图。"瑞士在哪里？"我问他，这回我有点搞不懂了。于是他指向了地图上地势最平坦的地方，大约是在梁赞省和卡路什省之间。还是在这所学校里，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在历史课上被要求在历史地图上指出古代高卢的位置，但他没能指出来。我说："这是今天的法国。法国在哪里？"他也没指出来。我启发他说："在比利牛斯半岛和德国之间。"但他却连德国和比利牛斯半岛都找不到。得了一分后，他认为受到了我的不公正侮辱并向校长告了我的状——但没能如愿以偿(不公正的是上历史课时讲的是民族迁徙，而打分时问的是地理名称)。

不难看出学生对内容广泛的知识掌握的程度。

再谈一个细节问题，一切就会明白了。对在危机性年级进行测试人们会旁征博引并信誓旦旦地说："它绝不能是对记忆力的测试或对细节知识的检验。"现在一个15岁的男孩站在不想测试这些低级能力、只想据此决定学生是否能升入五年级的考官面前，手里拿着四个年级地理课的题签。题签号指出他应回答的下列课文：

"泉水根据口味和气味分为：淡水泉，酸水泉，咸水泉，苦水泉，硫磺水泉，石油水泉，渗碳水泉和粘性水泉。它们统称为矿泉水。泉水的口味和气味取决于它所渗过的地壳层面。酸水泉、咸水泉、苦水泉和硫磺水泉称为疗养泉。渗碳泉很有特点，如果在这种泉水里放入铁器，其表面会覆盖上一层铜。粘性泉的特点是，如果把木材放入泉水中，过一段时间后会覆盖上一层石灰。迄今为止已知，欧洲的矿泉水最多。最有特色的矿泉水是酸水泉，如卡尔斯巴特酸水泉，捷普利茨酸水泉，谢尔捷尔酸水泉和高加索酸水泉，还有基斯洛沃德酸水泉、热列兹诺沃德酸水泉和叶先图克酸水泉。"(摘自《地理教科书》，斯米尔诺夫，一年级教程，第30页；四年前用于10—12岁学生；有些地方在5—6年前用于复习教程。)

"荷兰人在东印度占有：1)几乎全部的巽他群岛，2)马鲁克群岛。在巽他群岛中引人注目的有苏门答腊岛(8000多平方公里，略小于法国)，邦加岛，爪哇岛，马都拉岛，婆罗洲(略小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和西里伯斯岛(3500平方公里)；在马鲁克岛中有安汶和班达。荷兰人的统治地域约26000平方公里，人口约2千3百万，是荷兰最大的殖民地，也是所有欧洲殖民地中最好的。如今对荷兰人最重要的岛是爪哇和马都拉。爪哇无愧于荷兰皇冠上的珍珠的称号。从那里荷兰人获得了大量的咖啡、糖、

大米、铅、靛蓝染料和烟草，尤以咖啡为多。咖啡输出的价值几乎相当于所有出口商品价值的一半。以前马鲁克群岛，尤其是安汶和班达，十分重要；安汶岛为石竹产地，班达盛产肉豆蔻。邦加岛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锡矿。婆罗洲岛以黄金和钻石闻名。在巽他群岛的海岸边栖息着著名的金丝燕。著名的城市有：西里伯斯岛上的马加撒，爪哇岛上的巴达维亚[45]和泗水。泗水市现在是第一大商业城市。”(同上，二年级教程，第 24 页；供 11－13 岁学习；好的学生提前三年学；其他学生 4－5 年后学；在学年结束时复习一次。)

“英国特别著名的河流有：大不列颠岛上的泰晤士河，伍兹河，特连特河，泰那河，特维特河，福尔特河，泰河，克莱伊特河，梅尔塞河和塞维伦河；爱尔兰岛上有沙农河，帕洛夫河，波依恩河，奔河和丽菲河。著名的湖泊有：大不列颠岛上的罗赫－罗蒙湖和罗赫－聂斯湖；爱尔兰岛上的尼斯湖。著名的运河有：连接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最古老的布里奇沃特运河；从利物浦到诺丁汉的格莱特－特洛伊克运河，它把爱尔兰海和德国海联结了起来；从格莱特－特洛伊克运河流出的分支在离伯明翰不远的地方分成两条：大运河通向伦敦，牛津河通往牛津；苏格兰有格拉斯哥和卡累顿运河；爱尔兰有女皇河和大运河。英国所有运河的通航里程总计近 600 英里。在运河长度上能与英国相比的只有荷兰。”(同上，三年级，第 123 页，供 12－14 岁学习；2－3 年前使用，同时复习一到二遍。)

“产粮区把多余的产品运往北方，因为只有萨拉托夫、伏洛聂什、哈里科夫、波尔塔瓦、基辅和波多尔诸省的南部地区才能把农产品销往黑海地区。这些地区年均发往黑海地区的商品价值 9 百万卢布。最主要的发运地点有：布梁斯克，基辅，克列缅楚克，沃洛聂什。同时还有 3700 万卢布的货物运往北方、里加、莫

斯科、彼得堡。发货的城市很多，如伏尔加流域的卡梅申、萨拉托夫、伏尔什斯克、赫瓦梭斯克、萨马拉和西伯利亚城等，苏拉河流域的奔萨和普洛姆齐诺，茨纳河流域的坦波夫和摩尔尚斯克，奥卡河流域的奥寥尔、姆岑斯克和勃尔霍夫以及叶列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发出的货物总值(45211637卢布)中有三分之二(29720596卢布)是粮食和酒。

“产粮区在国内贸易上的特点是集市性的，这同乌克兰缺乏道路以及乌克兰人懒于出门有关。据正式资料统计，在整个俄罗斯集市最多的地方是哈里科夫和波尔塔瓦省。哈里科夫省有集市425个，输入货值2450万卢布；波尔塔瓦省有集市372个，输入货值2300万卢布。但在乌克兰，批发集市只有11个：哈里科夫市有4个：克列肖恩集市是乌克兰货物流通的主要仓库；特洛伊茨集市专营西班牙羊毛和波兰货物；乌斯边斯集市专售铁器和低值商品；波克洛夫集市是蔬菜食品集市；波尔塔瓦市的伊里营集市以毛纺织品、羊毛、皮毛和顿河马销售为主；罗姆内市的玛斯梁集市是特别重要的旧货市场，该市还有沃兹聂先市场；库尔斯克市的科莲娜娅集市是俄罗斯商贾和厂商云集的地方；克洛列夫佐市有克列斯托沃兹德维任市场；伊丽莎白格勒有格沃尔基耶夫市场，主要商品为牛羊和辅助农具；在苏梅尔市有维简市场。此外，著名的市场还有基辅的克列肖恩或康特拉克特集市，贝尔及切集市，它们都很有特点。”(列别杰夫的《俄罗斯地理》*，供13—16岁学习；在考试那年使用，部分复习一次。)

---

* 上述列举的教科书中数斯米尔诺夫的书最差(却也出版了20次左右)，现在被杨琴先生的教科书所取代。这本教科书构思很好，但我不止一次地听学生家长反映，说这本书不知为什么很难学(我相信，正是由于构思方面的原因)。列别杰夫的教科书被认为是俄罗斯最好的地理教科书(或之一)。我在文章中提到过，所有的课程

在4、5、6年中学生要记住这类课文中的细小地方，而这种课文在四年教程中的数量达到了418页（一年级58页、十二年级88页、十三年级142页、十四年级130页）。每年要用57至60个课时来掌握它们（这是上限，考虑到节日和国定复活节重复的可能），或把家庭预习的时间增加一倍并把课时用于复习，达120个课时。如果把这些分布在一学年里的课时联结起来，就是整整五个昼夜（120:24=5），其中只有2½的时间是真正能用于家庭预习的。这个数量，即2½个昼夜，准确地反映了一年中用于掌握课文的时间，相当于有数百个名字的100页课文，其中每5—6行表述一个新的精确事实，学生或能掌握或不能掌握，但不会改变或模糊原有的知识。如果有人想看着钟用少于按年度计算的时间背出我所援引的课文，那他很快就会相信，早在那6年、5年或4年以前，学生未必能在第二天、更不用说在学年末记住它们。就在这一年，离倒霉的测试还有两天，在通过了四门考试之后，学生要在记忆里恢复以前背出的全部课文的418页。"不测试记忆力"对他有何意义？"决不只注重学生对细节知识的掌握"对考官又意味着什么？学生应在考官面前表述的"对事物的一般观点"又究竟何在？没有知识又如何"评判"事实？完全弄不懂的是，制定这些"指示"、"解释"的人偏偏没有留下大

都要复习，除了一年级的以外，预计会有人复习的。但我在12年的教书生涯中虽然尽了努力，但仍只能在一年里复习二年级的课程一次，四年级的课程三次，这都要归功于有关班级里幸运的学生。我只在一年级的课本里删除了一些专有名词。我算了一下，书中有800至900个专有名词（还不包括诸如赤道、轨道、冰川、冰碛、信风等术语）。这样，经核准教科书、确定年均课时的有关部门批准，10—11岁的一年级学生一节课要掌握一页课文，大部分对他来说是意思不明、近乎抽象的；要记15个名字和地图上与此有关的15个地点。显然，即使对于很有才华、特别勤奋的学生来说，要在一个晚上在准备其他三门功课的同时掌握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

名，仿佛对眼前的事毫不搭界，仿佛只是按规定题目做雄辩术练习。与此同时，这个儿童雄辩术通顺、完整的复合句都是法则；省略暗示法就是辞格，提喻法就是规则；热情洋溢的部分就是命令；一切都很严肃并恐怖地决定了最阴森可怕的现实。就这样，这个在自己的法则和雄辩术中挣扎的阴森现实成了无知和欺骗：杰姆扎河忘了，记住了“特连特河和乌兹河”；爱丁堡没有了，曼彻斯特消失了；就是只有简短的四个字母的“罗马”也在提问时唤不起学生任何思想与回忆。我们可能回忆起些东西，而对于学生，这个简短的词像千百个其他词一样，已经从所掌握的词汇中消失了。于是我们就会惶恐，就不会让学生及格。“曼图拉、佩斯卡拉、维罗纳和莱尼亚诺组成了易守难攻的四角阵势……。”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不能原谅他不知道这一个词，而他可是知道其他四个词的。*

---

* 最近十年，在 И. Д. 杰利亚诺夫伯爵[46]所在的部里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列举一些能够改善学校状况、但不能改革和提高教学的简单措施：1)在各年级恢复年考，成绩不及格的学生不能参加考试，成绩最优秀的可以免考。2)严厉的要求不应像现在这样朝上，而应朝下，即针对基本的东西，针对学生最初接触的并使自己努力去适应的学校要求，以此而衡量劳动成效；因此从一年级起并在三四年期间允许一年中各科平均成绩为 3 分、而语文和数学为 4 分的学生参加考试。这两条措施真正减轻了我们中学的负担，从千万个脖子上摘下了现在正在勒紧的绞索。3)每个学生的考测不超过半小时，不用题签，由助考官根据部颁教学计划按照全年课程的各个部分主考，但教师必须参加，对助考官的问题提出修正，由考试委员会主席评分，其他成员均可表示反对。4)从入校的第一天起，任何学生如果游手好闲，就不能在学校里呆下去，因为学校不是为了消磨时间，而是为了学习和劳动而设立的，对此每个人都应明确认识。在要求无条件劳动的同时，学校本身就应无条件和完美地劳动。5)教师的报酬由日常薪金和年终一次性薪金组成。日常薪金不应低于其他部门职员（如法院侦查员、法庭成员、司厅公务员）的工资，而年终薪金根据每个教师成功教育学生（升级）的数量发放。6)每所大学都要附设一所中学。将要当教师的大学生应在中学里实习，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并在至少为期三年的大学学习过程中考评

二十二

这样，教育中也有文牍主义的东西，它除了要求数页码、看时间并使之相匹配外，不要求任何其他东西，这导致了极严重的错误，扼杀了成千上万名教师的劳动，并把全国儿童的黄金时代变成了痛苦的、受欺骗的和无谓劳动的岁月——这样还能指望这些有才华的人对文化和历史问题有所贡献吗？这无异于指望一个不会钉鞋掌的工匠去建造一座人们想在其中祈祷或藏身的教堂，这显然是徒劳的。这是一个徒劳的、同时答案又十分明

从事此项工作的能力。只有其中确有才华的人才能被关注这项培养工作的教区录用。7)每门课程的年教学时间分配和教科书的更换应由教学委员会决定，以使之完全相对应。每门学科应选择其经典和基础著作(略作修改，但保持原文及精神)，据其制定大纲，并把教学时数加以协调，这要比取消教科书编纂行业要有益得多。8)教师每天的课时量不应超过3节，因为他毫无疑问要在家里准备每一节课。9)教师有权拒绝在10个以上学生的班级上课(学生不是听众，而要在课堂上接受训练和检验)。10)教师有权拒绝做任何与其课堂教学无关的事(如受警察局指派监视学生在家里、剧院里以及在街上的活动，拜访毫无用处的教育委员会，编制各类报表和报告，记录处罚情况等)，就像校长应对所在学校进行实际研究一样，教师应摆脱没完没了的公文写作。现在教区给教师的这类写作太多，使成堆的形式资料掩盖了对学校真实状况的冷漠态度。11)学费应有全额、半额和四分之一之分。第一类太高，而最后一类应与减轻家长负担以及鼓励他们监督孩子相结合，并改为一月一付。学费应全部缴纳给学校。让那些没钱供子女上学的家庭以纳税形式付学费是不公平的(应对那些富裕而又没有子女或单身的人征收学校税，因为他们也在使用学成的医生、法官等等的知识，而且这种税收是国家和民族对个人子女教育增加投入的唯一办法)。12)圣诞节、复活节假期以及北部地区暑假的一部分应予取消，因为它们只能鼓励不学无术，而应设立受到教会推崇的节日；同样，谢肉节的庆祝应改在斋戒期第一周的祈祷日(因为学校现在以此来表明比对基督教更重视基督教以前的多神教)。学习时间总的来说应加大同宗教的协调；应把春季，而不是夏季，用于健康恢复性的休息。13)每堂课的时间应为一小时，最好是一小时一刻刻钟或一个

确的问题……

没人、也没必要去谈论家庭、教堂和历史。工匠为学校建起了宫殿并从中搬出了十字架(在法国);或者在我国从儿童手中夺走了《圣诗选集》*,并建议他们在圣咏时学会《圣神的精神特性》(参见科尔夫男爵[50]的书)。他们建起的宫殿很漂亮,用的是公平买来的结实砖瓦;圣像的特性已牢记心头;工资按时发放。学校看门人在履行职责;履行职责的还有石匠和木匠,虽然他们实际上在学校里很少有什么事做。但是,学校当然没有开成。

半小时;每天最多四节课,最好是三节;这样可使课堂教学和讲解尽可能地完整,对学生产生吸引和教益的积极作用。14)上课时间应从中午改到上午,根据一年四季的时间变化作适当调整,低年级不晚于日出后一二个小时上课,而高年级的上课时间最好挪到傍晚,以使学生学会白天积极地学习(预习功课),而晚上在教室里上课,这样还可以制约学生随意去做不允许做的事。15)谁也不应被强制去教堂(现在学生对做礼拜颇有反感,因为监督教师带学生去做礼拜是出于责任,缺席者将记录在案并作为行为不轨者受到处分),而应该吸引和教育所有的学生去教堂;应该分散去教区教堂,这比大批地去或只去学校自设的教堂要好,因为教区教堂里的人们比学生更虔诚,而且那里人多,这对学生也会起作用,但在学校自设的教堂里许多不信教的学生会对他人产生负面影响。16)看来,中学作为非完整性学校只应培养青少年进大学,因此其自身活动也应服从大学的要求;这赋予了整个教育事业崇高的精神。我们粗略地、不加诠释地照搬了这些条款,只是想了解,在未来的改革中应把注意力投向哪里。再重复一遍,所有这些措施并不涉及教育的**精神**和**意义**。

* 众所周知,《圣诗选集》在乡村学校是排除于同《福音书》和《圣经》一样可用于课堂和家庭阅读的书本之外的。居里·费里[47]在法国学校实施的改革引起了我国保守人士愤怒的轩然大波,这令人十分难以理解,因为类似的改革在我国,在Д. A. 托尔斯泰伯爵[48]主持的部里也在悄悄地进行,却很少遭到众人的攻讦。所谓的宗教教区学校是反对国民学校"世俗化"的一股弱流,因为国民学校在我国的推广是大刀阔斧、一竿到底的,仿佛我们从未有过历史,从未有过教会,学校没受到过庇护,民众没见过神甫一样,而神甫可能会鄙视和抵制没有文化的建筑者,因为后者只感到自己是tabula rasa[49],就像他们把周围的历史形成的现实也理解成tabula rasa一样。

二十三

悲观的批评可以同现实一样持久。在进行这样的批评时我们已经从最小处着眼。现在我们回到真实教育的思想上来。为了使教育中的一切都能明白无误，都能生动活泼、精神饱满，究竟还缺什么呢？天才的头脑是否需要这种远见卓识？不，还有比这更难的：纯朴的爱心，仅此而已。

这比智慧更重要；同时，这也是各个时代都能做到的。我们若以此为依据，就不会失去对感兴趣的问题的希望。要知道，有时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中会有这样的情况：在更换了几十个“外语保姆”和“家庭教师”后仍认为孩子朽木不可雕，这时我们会突然意识到需要什么——需要老保姆，需要被忽视的仆人，虽然他也许连自己的事都做不好，却突然会无师自通地做好一件没人要他去做的事。历史的道路扑朔迷离，历史的规章尚未发现；我们往往在最欢快的喜庆之日的前夜绝望，而在喜庆的时候却又身临灭亡的边缘。

每个时代实质上都有与之相应的学校。建立学校的思想同我们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教育和培养儿童。更确切地说，学校是我们内心中“我”的综合表征。这是忐忑不安跳动着的脉搏。当疾病在我们身上深入膏肓时，我们能清楚地触摸到它的跳动。

粗暴的时代，残酷的时代，在各方面都浅尝辄止的时代是不配拥有比我们已分析的学校更好的学校的。学校只是在细节和外部结构上被极为笨拙地承用，这真是莫大的幸事，否则它内部的痼疾将隐藏得更久，或许被井然有序的外表遮掩得更严密。对

在教室里自杀的学生*,教育界只会表示惊讶,并说道:"但是,不是我们害了他。"但是,学生从无知的城堡里溜了出来;而教师在和学生一起欺骗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体制——这对每一个人都十分简单明了,具有说服力。

学校的症状不仅是最明显的,同时也表现在十分敏感、疼痛无比的器官里,这就是我们有义务要治愈它的原因,而且要自己动手治。治疗要有明确的意图:它来自于哪些充斥我们头脑的否定深渊,而且要对儿童持有最大的同情心。也许我们没有信仰,很坏,很滑头,但在对孩子的关爱之中我们不会耍滑头,不会凶恶地对待他们;我们可能没有信仰,但还没发展到剥夺儿童任何信仰的地步。

如果我们我行我素,我们不能、不会也无权进行教育;由于教育毕竟是需要的,这是每个父亲都要面临的问题,是个时刻让人操心的问题,那么,对我们本身进行伟大改革的问题就摆到了我们面前。"或者把孩子交给命运任意处置,躲避他们,或者自我改变。"这本身就很明确,很有说服力,就像一具尸体悬挂在教室里,而教室里摆满了按第 9.187 号《通知》所附的最新样式重新油漆的课桌。可怜的《通知》,没有忘记课桌,但却忘了学生;可怜的父亲,淫佚放荡,亵渎神明,挖苦嘲笑,而他面前的儿子在说:"给我信仰。"而女儿又说:"保护我的童贞。"

信仰、童贞和爱情——这就是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儿童寻找的东西;这一切在自己的心中,然后在全部的活动中,最后(别无可能)在学校里。这就是历史召唤我们去走的阳关大道。才思敏捷并拥有蚂蚁在建筑时从不出错的下意识,这或是我们不具备

* 儿童在学校里自杀的现象正是在 1871 年改革后出现的。已故作家 Ф. 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的一封私信中曾详细地描述了一次自杀事件。

的，或是我们做不到的；上帝也不要求我们这些东西。纯洁的心灵，对上帝的信仰，互相怜悯——这是上帝所希望的，是人能做到的，仅此足以挽救一切。

译　注

① J.C.席勒(1759－1805)　德国剧作家，诗人。

② 法语，意为“商品推销员”。

③ 艾弗克利特，古希腊数学家。

④ 阿斯提亚格(公元前585－前550)　古波斯米迪王朝最后一个国王，后被居鲁士二世推翻。

⑤ 居鲁士(约公元前600－前529)　古波斯帝国国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创者。

⑥ 卡尔卡河，今称卡尔契克河，在乌克兰境内。

⑦ 拔都(1208－1255)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钦察汗国的创建者。

⑧ P.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　古罗马诗人。

⑨ Q.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　古罗马诗人。

⑩ 赛诺芬(公元前430－前355)　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

⑪ 克利阿胡斯(？－前401)　古希腊军事将领。

⑫ 波利克拉特斯(？－前523或522)　古希腊萨莫斯岛的僭主，实行有利于工商阶层的政策。

⑬ 科内尔·内波特(公元前100－前32)　古罗马诗人，历史学家。

⑭ 李锡克－塞克斯都法律是由古罗马护民官G.李锡克和L.塞克斯都实行的对平民有利的法律。

⑮ 由格尔为古罗马面积单位，约合2500平方米。

⑯ 锡韦，古希腊城市名。

⑰ 派洛比德(公元前410－前364)　古希腊政治活动家，军事统帅。

⑱ 伊巴密浓达(公元前418－前362)　古希腊政治活动家，军事统帅。

⑲ 锡安，山名，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据《圣经》记载，是大卫王的行宫所在地，也是雅赫维圣殿所在地。

⑳ 约书亚，《圣经·旧约》中摩西的仆人和继承人。

㉑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㉒ 门托耳，希腊神话中阿尔喀摩斯的儿子，奥德修斯的朋友。雅典娜曾几次变化成他的模样引导忒勒玛科斯。

㉓ 乌利西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

㉔ 忒勒玛科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的儿子。

㉕ I.康德(1724－1804)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㉖ D.狄德罗(1713－1784) 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文学家。

㉗ J.洛克(1632－1704) 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

㉘ 彼得大帝(1672－1725) 俄国沙皇(1682－1725)，1721年起称皇帝。

㉙ 亨利四世(1553－1610) 法国国王。

㉚ 伊凡四世(1530－1584) 即伊凡雷帝，俄国第一个沙皇。

㉛ 古斯塔夫·瓦萨(1496－1560) 瑞典国王。

㉜ 伊丽莎白女皇(1533－1603) 即伊丽莎白一世，英国都铎王朝的女王(1558－1603)。

㉝ 梅兰希顿(1497－1560) 德国人，德文名字为菲利浦·施瓦泽德，梅兰希德是其希腊文名字。德国路德改革活动家，人文学家，神学家。

㉞ 伏尔泰(1694－1778) 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

㉟ 罗兰夫人(1754－1793) 法国大革命活动家，后被雅各宾派处死。

㊱ G.J.丹东(1759－1794) 法国大革命时期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㊲ 吉伦特派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派别，主要代表共和派工商业和农业资产阶级。

㊳ 帕尔费尼(1807－1878) 俄罗斯作家,曾当过修道院的见习修道士。

㊴ 塞奇(1818－1878) 意大利天文学家,天体光谱学先驱者之一,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77)。

㊵ 亚历山大·马其顿(公元前356－前323) 马其顿国王(前336年起),国王菲力二世之子。

㊶ 克拉林顿决议制定于17世纪,共有16条,主要内容是限制宗教法庭的权限并使之隶属于皇家法院。由英国大法官、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王党首领克拉林顿主持制定,故名。

㊷ 失土王约翰(1167－1216) 英国国王,1199年起为金雀花王朝英国国王。1202－1204年间丧失英国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地。

㊸ 英语,即为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

㊹ 腓力二世(1527－1598) 西班牙国王。

㊺ 巴达维亚为雅加达的旧称。

㊻ И.Д.杰利亚诺夫(1818－1897) 伯爵,俄罗斯国务活动家,1882年起任国民教育大臣。

㊼ J.费里(1832－1893) 法国政治、国务活动家,律师,政论家,国民学校改革的倡导者。

㊽ Д.А.托尔斯泰(1823－1889) 伯爵,俄罗斯国务活动家,1866－1880年间任国民教育大臣。

㊾ 拉丁语,意为"干净的板"。

㊿ M.A.科尔夫(1800－1876) 男爵,俄罗斯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

城市和学校

一

从80年代起，人们对古典教育的充分性开始失去了信心。70年代甚至开设在纯粹的工厂地区的古典中学和初级中学停止了发展。其原因很特别：它们招不到学生了，家长们不再向这些学校输送子女。我们还记忆犹新：在四年制初级中学的毕业班里，两条凳子上仅坐着五个学生，而分科教他们的教师则有八个。学校有些近乎笨拙地忙于招收学生，竭力在本地，对市民隐瞒事实并对中央和州长官胡乱解释一番——这一切成了这些初级中学经久不退的恐慌点。为了吸引家长把子女送往初级中学，学校在入学、升级和毕业等方面都降格以求，但仍无济于事。由于所学科目简直毫无用处，因此，无论教学多么廉价，多么轻松，我们仍不能忘记一句十二年前听到的感叹，它曾引发了教师们的哄堂大笑。一位初级中学的学监作为"家长"快步走进教师办公室说："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能不能让我的儿子免学希腊语？它对我们做生意毫无用处。"我们的教师对这句话感到特别

好笑，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这门科目的地位：不仅是必修课，而且是主课。而他却把希腊语同学生可以“免修”一门的现代语相提并论。笑声产生自观念的分歧。我们有大学和“普通”教育的观念，饱览了许多有关这个科目的文章，经常听到有关的争论，也看到了社会和文学界为之所作的斗争。但实际上，除了这个观念外，还有日常生活和地区性的观念，这是我们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的观念，但它在日常实际生活中却很实用。就是从这个观念出发，“家长”发出了半是不安、半是希望的感叹。他想，他儿子其他功课都学得很好，会让他免修毫无用处、也毫无需求的希腊语的。这声感叹中有自身的逻辑。那个男孩很有才华，后来在希腊语中也迎头赶了上来，后来似乎还上了大学。这么美满的结局不是总有的，确切地说，是很少有的。

这所四年制古典中学在奥寥尔省的某个城市里，靠近著名的布梁斯基炼钢厂，离马里采夫斯基车站仅几步之遥。在这里，我曾听到一群女市民的谈话：“如果没有犹太人，我们连靴子都穿不上。”事实上，这个城市里的所有行业或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被犹太人垄断了：靴匠，裁缝，熟皮匠等，更不用说在整个俄罗斯都是犹太人的钟表匠了。一切都在犹太人的掌握之中，或正被掌握之中。作为中学的教师且主要同莫斯科有关，我不了解当地的需求，而且作为初出茅庐的教师对此也不感兴趣；但她们的谈话不能不使我感到震惊和深思：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派我们来这里？无论我们的教学活动成效如何，甚至很差，我们一年的工资约达一万三千卢布，其中有三千卢布是这个仍比较贫困的城市支付的。显然，城市也参与了这笔开销，因为在我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五年中，市政当局不止一次地想收回支付教师工资的承诺，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我继续有关靴子的必要性和唯一能满足这个必要性的犹太人的话题。当然，这么谈论靴子是有些夸

张，因为靴匠中也有俄罗斯人，夸张只是因怒而生。喧嚷的人群很快又议论起现在的学校并愤怒地对初级中学展开了抨击："还是市专科学校好。"确实，市专科学校的学生已人满为患。"有什么好？那里也不教什么手艺！"

我还曾在这个省的另一个地方——更东面的地区——的一所古典的八年制中学教过书。就在这座城市的城区里，而不是在其郊区，有许多皮革厂；虽然规模都不大，但重要的是数量很多，自古以来就星罗棋布；而且有一家厂的皮革还大量销往法国。该市的女性市民大多从事于花边织造。女孩刚到八岁，甚至刚满七岁，家里就会给她购置线轴，于是她就开始为自己勾织(挣)"嫁妆"。我非常熟悉这座城市，留恋在这里度过的四年生活，喜爱它那富有生命力的、欢快的工业化精神以及严格有序的宗教生活。该市虽有四万市民，但没有一所实科中学或宗教中学，只有两所古典中学：古典的公立中学和女子中学，后者由市政拨款开设，即州和教育部分文不给。女子中学的校舍很大，一幢两层楼的建筑，大门很漂亮，颇有一些建筑特色，比起一般的公立学校建筑来要好得多；从莫斯科来的巡查员们说，这是州里，即在莫斯科周围十一个省里，最好的学校。这样，我在该市执教的几年中，饶有兴趣地观察了这所同城市类型格格不入的学校是如何同当地生活产生半侵蚀、半寄生的关系的。我从女子中学的创立开始讲。那里的一切从一开始就被为所欲为的官僚体制所破坏。市政当局在出资修建了宫殿式的校舍后还要给全体教师、级任教员和校领导支付工资，但同时，它自然也时时想以自己的"宠儿"为豪。我深深地确信，所有的迹象也表明，市政当局并不想袖手旁观，对学校建立后开始的长期而积极的生活过程不闻不问。"应该与学校共呼吸。"这样，在一开始这里并没有丝毫想掌管和统治的愿望，再说，也不会统治。但是："别赶我们走，哪怕让我们

看一看。"该校有一特别之处：暑假期间不给教师发工资。市政当局根本就不明白，放假"没活儿干"怎么可以拿钱；但在教学时间发的工资是与男子学校同样的，即对市财政来说是很大的一笔支出。我说出这个细节是想证实学校确确实实是由市里建造的，没有城市的付出，学校就"一无所有，无法生存"。但是，令市政当局感到大失面子和弄不懂的是，学校所有的师生从一建校起就根本不听市里的话，而是同州里的衙门，即设在莫斯科的州办公厅一鼻孔出气。在我工作的那四年期间，莫斯科一次也没派员来巡查。于是，在这种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敌意，城市的"宠儿"变成了痛苦、不安和恼火的根源，最后竟成了侮辱市政当局的根源。知道吗，这就是基特·基德奇们的城市，对学校当局来说，最值得骄傲的快慰就是毫不隐讳地坦言，这就是基特·基德奇们，这是"开化的"观点。幸好，基特·基德奇们还能"嗅得到"行政关系的紊乱。"这成何体统！女子中学的学生在冰上跳康康舞。①"我记得一位"家长"就是这样愤怒地提出意见的("在冰上"就是冬天溜冰)。基特·基德奇们对这个基本事实自然是了如指掌的；可以理解，基特·基德奇们哭诉的不是教育学学科，而主要是对学校同州里的关系及同自己的行政隶属关系感到不平。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微笑和紧贴着鼻尖关上的门。当然，全部事情可以同市政当局携手共同解决的，但是，鄙视别人意见的快感和"向邻居打喷嚏"的愿望是无法抑制的，以致于围绕着女子中学在所谓的"监护人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之间始终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因为前者花费了许多金钱，却连一点权力都没有，而后者是执教的，自然而然就拥有全部的权力。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些天资聪颖的教师，即教师中极小的一部分人，想同市政当局更好地和睦相处，即为城市工作，却被教师行政协会认为是"叛徒"，在校领导那里也得不到好评("沽名钓

誉”,“搞阴谋诡计”,“拍市政当局马屁”),是令人讨厌和不安份的人。是“蒙特奇”和“卡普鲁季”吗?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洛维奇的争吵”吗?是人永恒的命运吗?……只是原先面目慈善、虔诚的市政当局在学校的影响下在对待学校体制的这种细节问题上换了副面孔,仿佛不屑一顾的样子。

二

我没有在女子中学教过书,不过是从旁观察了该校的生活及其方方面面的事情。由于我的同事在那里执教,因此我了解该校所有的女行政人员和教育人员。我是在男子中学教书,并看到了那里徒劳无奈的处境。这里也同样鄙视市政当局,但更根深蒂固,更直接了当,因为教师的工资也来自市财政拨款。一般来说,中学和市政当局间的相互敌意是极为普遍、却又十分怪诞的事情,很难说清孰是孰非。市政当局其实并不是由基特·基德奇们组成的;首先,在基特·基德奇们中间有许多“绝顶聪明”的人,他们能对任何教师“给予致命的一击”,不是就其教育职业,而是就其关于一般事务的谈话才能和成熟性。此外,在基特·基德奇们身旁同学校有密切联系的还有医生、农民、退役军人、法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同样敌视学校。在各地我几乎毫无例外(除了一个非常好的、值得赞许的例外情况,这是在一个离铁路线 110 俄里的 7000 人的偏僻小城里)地发现,中学是城里所有人都去过的、并在需要时要与之建立关系的国有单位。学校行政在保持资金来源及培养和教育方法的完全自主独立性和赢得周围居民的欢迎和爱戴的同时,并没有采取走某种中立路线的策略。教师是神经质的人,同时受劳动和贫困的刺激与折磨,在自己的教学小天地里不敢乱说乱动,对州行政唯唯诺诺,对校长敬

而远之。同时在这仅存的自由缝隙里——很遗憾，只是相对于市政当局、市民和“家长”的自由——他根本不想克制自己，他想忽视和鄙视——我想以此解释他对基特·基德奇们的鄙视态度，因为在自己的圈子里，当他孤身独处时或在家里，教师的思维常常是深刻而发达的，最主要的是，他们是崇高而纯洁的人。我看见过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秘密帮助，即物质上帮助最贫困的学生。在中学里及其在中学周围我看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人们各自分开时是聪明而诚实的，这些基特·基德奇们也名副其实，教师们也心地善良，校长也是又有善心、又有头脑，就连州当局也很“关心”，当然是遥远而又抽象的关心。但是我想说，在这些分开时才变得优秀的人之间确实有某种东西使他们的相互关系变得恶化、痛苦和反常，使他们的努力化为乌有。这或许在隶属关系中，或许在事务处理中，或许在其他难以捉摸的地方。

鞋匠、花边织工、神甫、公务员、手工业者的子女心地都很善良，营养也都不错，但进了中学以后他们很快就变得脸色苍白，病恹恹的。我忘不了其中两个可怕的、死气沉沉的人。一个在三年级，一个在一年级。他们脸色阴郁，胖乎乎的，对学习有一种默默的反感。他们是兄弟俩。不知为什么，正因为他们的阴郁脸色和反感的情绪，我非常喜欢这兄弟俩。最主要的是，我看到，这两个孩子很聪明，却不知为什么根本不想学习。你无论对他们说什么，指责也好，“羞辱”也好，他们不仅能感受到，而且对周围的一切，对你的话语甚至语调都理解得很好；一切都能理解，但却孤僻地、沉默寡言地坐在课桌旁，对今天乃至明天的功课一无所知——这是一种痛苦。“这兄弟俩有多痛苦，”我对一个当监督员的本地居民说，“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衣衫褴褛。我猜想，大概是手工匠的孩子。“瞧你说的，瞧你说的，这可是全俄罗斯赫赫有名的果树栽培家的孩子，就是说，他们的父亲有远近闻名的果树苗

圃。”他说了一个60俄里外的小城名字。后来，当我住在彼得堡时，我曾读到一篇署名文章，我当即惊讶得不知所措：“他们做的事有多伟大啊！这可是财富，有这样能栽培出实用的珍奇水果的专家真可谓是当地的殊荣！可我那时还大发雷霆，对他们不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②忿忿然。”“可兵役怎么办呢？”监督员反驳说：“他们是为了兵役而来读书的，因为中学里有各种发展道路……”“各种道路！但他们面前的道路可能是俄罗斯最好的，而他们却从这条道路转向了被所有人看不起、折磨所有人的一般知识道路。”这时我又不禁想起了我大学生活中的一件事。

有这么一个大学生，他总喜欢于课间休息时在一群听众的簇拥下讲一些有关教授们的不太礼貌、略带恶作剧的奇闻轶事。他像观景殿上的阿波罗一样英俊，除了说俏皮话的本领外，他确实很出众。他对周围的人总是彬彬有礼。他来到了一群学生旁，其中也有我，大约五六个气味相投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但都很喜欢哲学，除了哲学，别无所好，主要是不想喜欢其他任何东西，所以在选课时没有选修古典语言，因为那里的问题总是令人难受：德摩斯梯尼的③《论喀罗尼亚》的第一个句子在三种可能的形式中选用了哪种：是现在时，过去时还是将来时？但我想自我辩白一下，我们不仅仅喜欢哲学：我们也喜欢历史和文学中的哲学。上帝就是这样创造我们的。这时“阿波罗”加入了我们的圈子，我们都以“你”相称，对“阿波罗”也一样。他确实是个好小伙子，即没有“一点天赋”，但是不会变节和背叛的同志。我第一次去他家时被他丰富的藏书所折服，而且大部分是英国的硬皮书，直接从伦敦买来的。他向我介绍了如何从英国购书的方法。有许多书是哲学方面的。在他喜欢学习和写字的木桌上刻着几个方块字，即真正的埃及文字，他对这些文字很感兴趣。他能用三种语言说话和阅读。我不想扯得太远，我只想说，他记忆力极

好，涉猎广泛，但同时又致命地、显然又是无可救药地知识面偏窄，这完全同那两个我认识时是中学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的果树栽培家相反。有一年夏天我在上课时突然感到百无聊赖，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抑郁伤感的信；一周后，我收到了回信，显然他是花了一周时间来写这封信的。这封信比谈话更清楚地反映了他令人惊讶、难以挽救、也难以充实的知识贫乏，就像一块光滑的薄木板，其硬度和木质不允许雕刻一个字。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虽没有吹，仍保持着友好的样子，但实际上是疏远了。不过是他没有任何吸引人的东西，他也不能使你对他有任何留恋。

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上大学靠的是同父亲的争吵而如愿的，即不说别的，光是失去遗产的可能就是巨大的代价。他的父亲是皮毛商，生意很大，同西伯利亚有直接的业务往来。父亲把儿子送入了商业学校，可儿子却对上大学产生了兴趣并以难以置信的努力真的掌握了古代语言，即掌握了整个八年的课程，最终考进了大学。他在毕业考试时几次未能通过语文考试，就是说，他连三页纸的作文都不能连贯、通顺地写出来。这是最能说明他才能的典型事例。从其文字判断，他的文章组织混乱，矫揉造作，一派胡言乱语，根本弄不懂他在讲什么，更不要问其动机：为什么讲这件事或那件事？他的思维有点死板，读到的知识在脑子里乱成一团，缺乏组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什么课程，他都是死板地学习（因而有耐心坚持学完了八年的古代语言课程），而且从不表示不快。有一次我问他："你喜欢数学吗？""是的，和方块字一样喜欢。"无论读什么或学什么，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他总是忙忙碌碌，总是在阅读着什么；然而为了讲述学者们和教授们的庸俗故事，他还会去寻找或买来他们的像片并带给同学们看。但就是在这个极其平庸的人身上燃起了教育之光，就是说，教育那对他难以理解和极富魅力的光芒吸引了他。他光明磊落，也循规蹈

矩，显然，他心中“燃烧”着对意义颇为遥远的科学的热情，也正是在这方面显示了他的愚蠢——就是那种浅薄而致命的愚蠢——知识贫乏。他没有任何纨袴习气，和漂亮姑娘的来往（姑娘在追求他）也只安排在和朋友喝茶的时候，而且同朋友谈话时丝毫不装模作样；但是，同他谈话是有点枯燥的事，他的话空洞无物，没有任何特点。希望我的好友会原谅我为了解决这巨大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的问题把他作为夏波夫④所说的“社会教育”的分析对象：皮货贸易这可是财富，这是一条道路，而对于“知识分子”，如果可能的话，是“治病良方”。“土地”——我们总是在谈论它——只是、也正是工作，是对人类生存伟大殿堂里的某种东西的修理，而且会产生愉快的想法：人们需要你，你没有以你的多余存在使人们感到累赘。在我所分析的这个例子和上面那个果树栽培家的例子中，重要的是一切都已形成规矩：“多姆比”的署名已经有了，但不能再加上“和儿子”：“多姆比和儿子。”我不是商人，也不是实业家，但是，俄罗斯人当然需要穿皮毛衣服，西伯利亚也需要出售皮货，重要的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应能不靠别人的帮助完成这同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间不太复杂、但很重要的任务。“我亲爱的哲学家，我要杖笞你。”我后来是这样想我的朋友的。但在大学里，我对生活知之不多，也很少感兴趣，脑子里自然不会有像这位青年——“完蛋了，但可爱的造物”——所能想到的东西。

生活就是这样以这些小线条、小点子和小石块组成的。兵役把所有的人推入了中学；但同时又自然使一起长大的朋友离开了许多行业和已经形成的“事业”。儿童们学完“ABC”后就会感到基特·基特奇们已被抛在背后，而前面是他们已经踏上的罗蒙诺索夫的光辉大道。过了几年，国家会彻底慌了手脚：怎样才能使这些知识分子重新劳动，重返土地和工厂，怎样才能振兴这

些行业？这些尝试使人极感不安，但更令人悲哀的是，它们不会在各个部门，如国民教育部，宗教领域，财政部门，农业部门等，取得巨大的成功——一切都来自那里，唯一的目的就是治愈我们在那考虑欠周的年代——70 年代——里在统一的挽救教育的系列改革取得胜利时给自己留下的危险隐患。

三

同时，有些人正在宣扬的不是现有的两种学校——“实科学校”和“古典学校”的原则，而是另外一种原则。这种东西可以称之为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疯狂或教育的最大失误。学校没有、也不可能有创造新文化、由自身制造文化或使已自然存在于该地区的文化服从学校的任务。学校应该帮助生活，而不是反对生活；它应当崇尚和指明理想，引导学生向理想攀登；即向更好的东西发展，但这须是现实已有的，而不是觊觎不可企及、而且也不需要的新东西。现在学校把农民、牧民、手工业者、鞑靼人、公务员、土耳其人、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等所有的人收拢于一堆，实质上，它妨碍了所有人，没有教育好任何人，或只是有条件的、不正确的病态教育。学校就其真正的任务来说是蜡烛，在它的光辉照耀下每个人都能更好地看清自己的优点并进行“更好的”分析，就是说，对所有的人更有益，而首先对自己又不无益处。啊，不无益处是在高尚的精神意义上的，这不仅不贬低学校，而且是学校的真正理想：我在学校里寻找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宝藏，我将孜孜以求，直至我确信在学校里所获得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能全面帮助我和保护我的宝藏。当然，这样的学校能教会医生看病，而不仅仅是上医学课；但它也能教给皮匠制皮手艺，就像教会未来的讲师进行细致的抽象思维一样。由此可见，学校的类型决不

限于一二个，它们的类型相当多。诚然，每个城市应有符合自己主导类型的学校，就是说，城市应该塑造学校，或者说，学校应该依靠城市而建立并与城市协调发展，这就像答案对于问题、一定的满足对于一定的需求一样。如果一个小城市在主导类型非常明确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同的情况并因而存在着不同的需求，那么我们认为，其中心学校应该集实践性的、半实践性的和抽象的课程于一身，这样每个人可以各取所需，获得真正是他所需要的、与日常生活相适应的“蜡烛”。这样的学校当然不能从彼得堡照搬而来。但所幸的是，不管是受过病态教育还是受过健康教育，反正受过教育的人在我国遍地皆是；到处有神甫，有医生——这些人所受的教育足以帮助当地有关学校解决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而手上长满老茧的劳动人民不善表达，常常不能回答自己需要什么的问题；当我们不能使学校招满学生时，他们的回答是不再把子女送往学校读书，要求“允许其儿子免修”希腊语，抱怨没有“靴匠”；父亲不知不觉地与儿子产生了分歧。这一切都是痼疾，是苦难，是根本没用的东西。知识分子如果腐化的话，正是由于无所事事所造成的，处处想作公式化的工作，把当地的“内在”痛苦加以清晰的表达。但讲到“知识分子”时，我指的只是地方上的教士和兽医，即具有清晰判断能力的工作的人，与“土地”和“土壤”打交道的人。在城市里这则是公务员、医生和神甫。没有人能像神甫那样贴近民众(通过圣礼仪式)，而且我们的神甫幸好都是讲求实际、悟性很强的人。这样，教育应该是生命机体中活的血液循环。整个国家应协同参与教育，以各种委员会的命令、选举等形式来参与，让全体民众来参与。国家应该切实地脚踏实地，同现在的不着边际相反，处处去努力，处处去适应，主要是去关怀和帮助每一个人。神甫的作用特别丰富，他通过每个家庭及其所有的家庭成员去了解他们最困难、最痛苦和

最决定命运的选择:谁需要什么?如果你在城市里创办一所高雅艺术学校,那么一个只会生孩子、然后喂养孩子的母亲在孩子长到相应的"学龄"时会请求你接收她的孩子入校;我们十分之九的民众还处在这种彻底的盲目之中,他们当然知道"学习则明",而主要的是他们对学习所要寻求的工作毫无概念,而且还会提出许多奇怪的问题。可不呗!连国家都不知道果树栽培家需要的是植物学,而不是布匿战争[5]。但正是这十分之九的民众的子女有时会具有惊人的天赋,因此他们无论如何应该受到教育,受到应有的教育。对此神甫是能助一臂之力的。他们是把孩子送往学校的自然人选,送往我们所想象并指明的中心学校——各取所需。在我们的学校里,差生的比例很大,这除了有教育大纲本身存在的各种弊端的原因外,还有如下的原因:第一,学校本身的类型根本不符合城市鲜明表达的类型;第二,它所招收的学生按成分可以分到十来个不同的学校。我们有关学校的概念本身就有某种历史形成的错误,有某种死板的、极度静止的、根本不会变化的东西。什么是学校?何谓在城市里开办学校?所有的部门乃至每个路人都会对你说,这是幢两层楼的砖房;略作思考后又会补充说,当然啦,这是编制、工资额、退休金,然后是不慌不忙、严格、沉闷的刻板公式:"圣经 2 堂课,俄语 3 堂课,拉丁语 6 堂课,希腊语 5 堂课,数学 3 堂课,历史和地理各 2 堂课,书写 1 堂课。"这就是学校,它在敲打,而不是工作;它在刺激,而不是教诲,常常害人不浅而又极少启蒙。学校——这仅仅并全部是教师:第一是教师,第二是教师,第三仍是教师,只是在第四或许有些什么东西,比方说教学大纲、编制以及一座比茅舍稍好、但绝非宫殿的楼房。著名的伊里敏斯基[6]在喀山省专教外国人的孩子,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这项事业。对各种学校这个死板的方面他曾经极为恼火,认为它根本不能使教师全身心地投入教

学。他拒绝了发给他的津贴，只是为了拒绝大量麻烦的“报告”、“报表”和各类“统计”，因为这些东西当然是在刚给他发完津贴后就要求他做的。然而，完全没有“死板的”东西也是不行的；但是应该把它减少到最低限度，即没有它学校就不能生存的自足限度。它应想方设法、竭尽全力表达成既不使教师的注意力束缚于事务上，也不使之游离于事务之外；它应该为他服务，而他则不应喧宾夺主。在我们的中学里，我曾观察到校长的奇怪作用：似乎这应是一个学校的领导者，教学的观察者和儿童的培养者。实际并非如此，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更多的是学校办公室的领导，十分之九的时间在处理公文，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教师和学生的身上。要按时送往州里的文件有严格的时间表，类似于“课程安排表”，但这是书面写成的，而且只能由校长亲自去执行。这张“安排表”就挂在他的办公室里，就像每个学生要面对的挂在教室里的“课程表”一样。那个最起码的功能可微妙地用“创造学校的精神”这一术语来表达，但是它并未得到执行，或在学生的努力参与下，确切地说，是在学生的欲望的参与下，偶然得到执行；而校长所做的工作却是每年花个 600－800 卢布请一名编外公务员就能完成的。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弹性，没有回旋余地，更谈不上学校和“当地”的精神需求之间的协调。学校不能像我们所说的那样脚踏实地地去倾听一切和适应一切，因为它没有合适的办法、机构和方法。这仿佛产妇在痛苦地叫喊，而先生却在边上走来走去，他——无论是谁，即便是大夫——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摘下勋章和绶带，甚至脱下常礼服，卷起袖子，套上围裙，在声嘶力竭的产妇旁做一点起码的、至多不过是不干净的事。这使我们想到，教育的任务根本不可能由臃肿的国家机构来完成：教育是胚胎学，这是机体极小的、微乎其微的组织中的过程；而部门林立的

国家则是解剖学。由此可以得出新的结论：教育中属于国家的只有组织和帮助，它只是最一般的最高领导，而主动性、所有实际的措施以及全部工作应属于社会组织中更小的单位：城市、阶层、教会或家庭，更应该、也最好是属于目光敏锐、terre à terre⑦而且机智灵活的个人。受过高等理论教育的人，如教授、院士等，如果去领导开设纯理论课程的学校，根本不会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们总的看法是，全部教育任务可以这种方式完成，对国家造成的痛苦最小，学术成果会更好，能完全适应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最主要的是适应这个地方在当时的需要。作为事实根据，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巴甫洛夫教授⑧40年代开办的寄宿学校和Л.波利凡诺夫⑨有四个设计完美的宿舍的古典学校，还有拉岑斯基教授的学校，它有长期的经验和学校的区域——在学校附近和在学校里成长的"儿童"，还有我们上面提到过的伊里敏斯基的工作。这就是例子，只能去效仿这些例子。学校里的个人有"自己的眼睛"，他"什么都懂"：这样，这里的盲区和死角就小得多，而这正是行政机关在处理学校内部事务时所欠缺的。但除此以外，市政当局已同个人"约定"和"谈妥"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又"用自己的眼睛"监督约定的执行。这样，同一切都是有名无实的国家学校相反，这里无论什么都是实实在在的。

译 注

① 康康舞为法国娱乐场所的一种黄色舞蹈。

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31—前404年间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

③ 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322) 古希腊雄辩家，民主派政治活动家。

④ A.П.夏波夫(1831—1876) 俄罗斯历史学家，政论家。

⑤ 布匿战争系公元前264—前146年古罗马与迦太基因争夺地中海西部而发生的几次战争。

⑥ И.И.伊里敏斯基(1822—1891) 俄罗斯东方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70)。

⑦ 法语,意为“讲求实际”。

⑧ П.В.巴甫洛夫(1823—1895) 俄罗斯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教授。

⑨ Л.И.波利凡诺夫(1838—1899) 俄罗斯教育家,文艺学家,社会活动家。

家庭是真正的学校

不久前(1897年2月)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重要通知:国民教育部认为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具有更明显的优越性并扩展了考评实施家庭中学教学大纲人士的规则范围,从仅有的八年级推向了所有的八个年级,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而且两种学校类型——古典的和实科的类型以及所有的级别——中学和初级中学都包括在内。修改后的规则如下:男孩(当然还有女孩,对女子中学这更加重要)冬天在家里学习时,应在家庭的监督和帮助下进行,春天回校时只需通过升级考试,如此一直到学业结束。在这方面学校是家庭的助手,把家庭的工作分成八个年段,每年记录和证明工作的情况,如果工作完成的质量很好,可不再重复。家庭以及用这种方式学习的青少年现在不再像以往那样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学习了八年之后他的学习突然会变得毫无用处并面对生活感到无所适从,彻底绝望。迄今为止所有的人就是被这种担心驱赶到学校里来的,并且愈早愈好,几乎童年尚未结束就被赶入学校。

这就是可称之为在学校问题范围内的文化工作:这不

是更改教学大纲和重新设置课程的权宜之计，这是对学校的完整的看法和完整的观念，从中产生了重要的措施，虽然这只是部分，目前只有一个、也是第一个具体办法。这样，人们可以在对美好未来的希冀中轻松地喘一口气了。

一

我们以前曾提到过（可能阐述和肯定得不够明确）新型学校反文化和反文明的做法。那时我们也曾指出，这种做法对历史的伟大因素——宗教、家庭等其他一些因素——会产生间接的和侧面的影响。现在我们以家庭为例。读者未必知道，但我却十分清楚，在一些（女子）中学里开设有所谓的预备班。学校吸收了从8岁到17－18岁所有年龄段的女孩（以“复习课程”）。男性居民方面也是这样，所有年龄段的男孩都被招收入学。于是家庭只剩下了生孩子和喂“头奶”的事，或许还有些很快会中断的学习。从9岁开始家庭只给孩子过夜，晚上提供一个房间和一盏煤油灯，早晨备好茶点，下午3点供一顿饭。家庭只是给自己的子女提供住房，但这里住房者的“权利”被限制了，在学校的各方面要求——无论学校要求的是什么——面前退居末位。家庭变空了，被架空了，它有点蜕化了，至少变得空空如也，甚至有点，即又有点，又稍微有点愚昧。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因素，这里的“稍微有点”所引起的后果是最“得意”的学生即使按照最巧妙设计的教学大纲用最出色的死记硬背也无法消除的。

家庭的成员，尤其是女性成员，变得有些无所事事。至少它变得不再温暖，因为正是儿童使家庭得到了温暖。这只要看看无子女家庭是多么地枯燥、不舒适即可明白。儿童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被培养成人，就像成人培养子女一样。他从成人那里获取事

实、知识和训诫(教育最悲哀、无能得毫无益处的方面),但又以自身的天真、欢乐、游戏、玩耍以及新生的缺点教育成人,也威胁着成人。一切都极有意义,富含表情,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内容丰富,情操高尚。现在这一切都被学校取代了,只留给家庭教育的机械部分:准时开饭,早晨准时叫醒孩子,以免"课前祈祷"迟到;秋天要买课本,春天好的母亲会暗暗祈祷,希望儿子,比方说阿辽沙,希腊语或几何不要不及格。一切都难以觉察地动摇了,但毫无疑问地稍稍朝虚假的方向动摇。同时由于同一个原因,中学已人满为患:教师为了在人头济济的教室里"开出课"使尽了浑身解数(即扶一把瘫倒的、体弱不支的学生);而"在课堂上学会第二天的功课"(对此已有披露)是州教育机关用于自我安慰的空洞和骗人的幻影,教育杂志上甚至还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而且总是冠以"报告"的名称。但这实际上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说都因决定一切的"没时间"(在55分钟的课堂上)而无法完成。

后面所说的,即到处都无法完成的这些"学会"是极为重要的,值得为此多说两句并加以证明。两分钟用于记录"没来上课的学生"并把要上的课记载入教学日志,然后是课堂提问;在中学里"读讲义"固然很轻松,但这是敷衍塞责,需要大量、频繁地提问,复习以前早在年初就学过的东西,需要对差生(成绩下降的学生)提问,即要等待他们的语塞、沉默和"想起来",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回答。如果这样提问,认真地对一个或四五个学生进行教学,意味着至少要耗费30分钟,而在高年级里则可能要花去40分钟;剩下的13至23分钟用于"学会第二天的功课"。这时可以做点欺骗和手脚,"学习"就无法完成了。当然,应该是让差生一起学会第二天的功课,否则他们第二天学起来将很困难,但他们不理解教师的解释,记忆力又差,于是整个学习进行得很粗糙,使学生害怕(因为发现了对以往知识的不知),使教师恼

火。不难理解，满满一教室 15－20 名学生一起学习功课，第二天在家里只需花 20 分钟、甚至 13 分钟“复习”在课堂上学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煞有介事地装装样子：叫一个最好的学生到黑板前去，为了让全班集中注意力，教给他下一堂课的内容，解释公式或演算一道习题，指出地图上的位置，教师这时会特别提示或暗示答案，而学生只会点着头或目光炯炯有神地重复似懂非懂的词——“学习”就大功告成了，谁也不恼火，皆大欢喜，但这任何好处也没有。

但这只是学校技术方面的细节问题。我们要谈的是家庭作为学校的伟大文化意义。

有人对我们说，而且不止一次地(就学校的问题)说：“家庭退化了”，“对家庭不能有任何信任。”是的，但你们不要剥夺它履行义务的权利，在做出判断之前就剥夺，这只会使家庭更趋退化，因为你们在将其子女收入预备班时就已经 à priori① 认为家庭已经退化了。因此你们是正确的：家庭退化了，但没有学校退化得多。你们需要学会不偏不倚。家庭中毕竟还有一些爱，比师生之间的爱更多一些，而师生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双方穿着制服在做自己或大或小的工作时产生的。家庭中还有真实的关系，哪怕只有一点点，它比按参考书预习功课的关系更真实。从出生、生命最初几个月的相互接触到 8－9 岁，其积极意义在任何家庭里都是不可抹杀的，也是任何学校所不具备的，这是事实。这里的一切更温暖，更密切，虽然更有些真实，这就是为什么家庭的教育作用更大的原因。最后，家庭，任何家庭都会以无法控制的下意识、难以克制的需求以及最基本的、近似动物的羞耻感会在对待孩子方面有所收敛，有所改进，有所净化。这是一般规律。在某个文化时代，家庭会顺应时代意义的高度或相反的堕落程度，但仍保持在比学校更高的高度上。这是其神秘本性使然，而这神

秘本性正是学校所完全缺乏的。

二

家庭如果不再仅仅向子女提供房间和桌子，而是视其为自身重要而永恒的成员，家庭就会因为孩子而变得温暖和欢乐。这就迫使成人在家庭生活中必须目光更敏锐，更热爱劳动。但至于儿童本身：只有家庭、也唯有家庭才能培养儿童最重要的文化品质，教给儿童最高尚、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说的都是难以觉察的、有规律性的、宗教性的、且富有诗意的东西，无论这涉及什么方面：知识，教会，学校，祖国以及这个家庭。凡事皆有两个方面：外表的和机械的，内部的和主观的。在学校的基本成素——课程、课本、教了25年书的教师，在这些基本成素方面的工作只能是对教育的外部和机械工作。能背几页《圣诗选》，记住布匿战争，解几道方程式；但这一切的目的和“学习”的目的，诸如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祈祷，热爱祖国和建立功勋，对神秘的科学高峰的隐隐憧憬——这些就外表方面的本质来说是做不到的，因为它是由僵硬和略显死板的基本成素组成的，并将永远如此。“知道”整个神学却毫不相信，这就是学校里司空见惯的事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学校的标志。各方面都如此。生活中是爱吹牛的人，课堂上却成了古罗马人：

他若在罗马会是布鲁特②，
若在雅典会是彼利克列斯。③

嗨，我们知道何谓“会是……”。

当然，奇怪的是，为什么家庭能比学校教给孩子们更多的爱

国主义或宗教的知识?它没有直接做这件事,但它给了这方面的自由,营造了培育和培养这种东西的温暖环境,所以这一切以其难以察觉的本性总是不知不觉地、偶然地并以难以预测的方式在人的身上出现。学校除了用课程和教科书粗鲁地管理外,为此没有提供任何环境;所有这方面的想法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相反,家庭以无声无息的温柔关系和连绵不断的印象掘松和准备好了土壤,虽然没能制造种子,但种子会悄然而来的。怎么来的?来自哪里?这是上帝的秘密,是培养所有杰出人材的秘密。我们曾对他们的生平进行了最细致的研究,但仍不能发现他们这种或那种突出的品质来自何方。切尔尼亚耶夫④的英雄主义来自何方?罗蒙诺索夫去莫斯科学习的欲望来自何方?这些都无人知晓。但要让男孩(或女孩)有时孤身独处,不要过于或不断地干涉其生活。如果他们身上有某种特殊的东西,在这种条件下会更好地生长的。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让我们15-16个小时强打精神,不要胡乱地分配时间:这一小时去这里,下一小时去那里,第三个小时做这事等等,用这种方法只能一事无成,就是从罗蒙诺索夫身上也培养不出什么。而学校正是在忙于此事。家庭却不能、也不会这样做,其自发的怜悯心和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的敏锐性也使它不想这样做。

为了节省篇幅,仅举一例:级任教员监督学生去教堂。我曾观察到,市民不喜欢去中学生常去的教堂,尽管这个教堂里有全市最好的"咏唱"。教堂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在椭圆柱形的祭坛前站着中学生。细节我不说了。我因职务的关系站在后面,把这一切尽收眼底(嗑瓜子是屡见不鲜的)。总的来说,没有一个人像模像样地祈祷过,都只是"干站着"。但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普遍的心理气氛是不允许瓦尼亚或柯利亚祈祷的;这300个男孩有一种心理气质,当然,就是不想祈祷的心理。疲倦,枯燥,有时焦躁

不安或嬉皮笑脸，摩肩接踵，无言无语，一动不动，于是这种心理就蔓延开了。当一个同学悄悄地向另一个同学示意自己的口袋时，那个同学不用说就知道那里有瓜子可以拿来吃；如果他把视线投向某一方向，就是说，那里就有什么有趣的事。这样，在教堂里，在 $1\frac{3}{4}-2$ 小时的弥撒里存在着独特的、无言的生活，但它同教堂格格不入，只是在为神甫和秉烛的助祭闪开道路时才会暂时忘却这个生活。现在想象一下这个瓦尼亚或柯利亚，比方说，一个冬天偶然地、漫无目的地去了两三次教堂，去听天使颂歌或“我信仰”的圣诗咏唱。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还能祈祷；毕竟不能耍滑头；没有这样做的条件和氛围。他现在站在 300 个比他更笃信宗教的人中间，他们的情绪感染了他的情绪；感染了他，并可能使之服从。一丁点的宗教信仰，但确实有了。在伟大的事业中亦是如此，小的事物可能具有重大的意义。若借用著名的寓言，我们可以说这里没有抑制庄稼的杂草，也没有啄食“路上遗弃的谷粒”的飞鸟。上帝知道神甫的哪句呼喊能渗入他的心灵；上帝也知道学生是否能把，比方说，这个不久前掩埋了孩子或妻子的市民的祈祷作为榜样铭记在心。

三

现在我谈一些实际的看法。中学应当在整个家庭—学校世界中心成为注册的、辅助的、指导性的学校。但是，家庭即使很有教养，在教育技术上是极为薄弱的。我曾（在一个省份，甚至相当偏僻的省份）观察到，许多母亲只知道法语字母的笔划，在帮助子女学一二年级的拉丁语时，为他们在书里查变格和变位，查词的意义。帮助的愿望是无底洞，但帮助的手段却屈指可数。我认

为，为了未来的母爱，应在女子中学开设拉丁语、希腊语和几何，这比任何学科都有益——这是最重要的东西，随着时光的推移，当她们的雏鸟在这些东西上磕磕碰碰时，她们会为此无限感激学校的。把所有所谓的“卫生学”、物理学、多余的神学和古罗马国体统统换成一门“道德学”；14 岁的姑娘还在玩娃娃，却在她们躺下睡觉后匆匆忙忙地教她们李锡尼的农业法（四年级）；格拉克兄弟[5]被打死了，明天的母亲命名日会有鱼筋馅饼。这样说吧，谁若从生活的后门观察到这些，那么对他来说，庞杂的教学大纲使儿童的头脑乱成一团甚至大为退化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触目惊心的。女孩已经得了贫血症，大夫要求她完全休学一年，但由于家庭的情况这无法做到；十一点半了，忍着剧烈的头痛，甚至一天都没玩过，她还在学习教育学的功课，而那里却告诉她，不应使能力过度疲劳，或预习卫生学，那里又告诉她，清新的空气和充足的睡眠是必要的。当你一走出教室忘记课桌椅时，这所有的谎言就会涌入头脑。

食指，学习的一切特征……

这样，未来的母亲如果抛弃了克利斯梯尼[6]的法律，以后会教好其子女的拉丁语基本变格，那时她们会对学校感恩不尽的；子女在课堂上也不会卡壳；母亲已经相当严厉地管教过孩子，并且预先传授了些对付教师的不得已的花招：第一次欺骗总是因为害怕使然；最终她是有事干的。这在各个方面都是有益的。但后来，家庭的力量对中学的大纲仍不堪重负。这就要求学校能机动灵活，能适应周围各种躁动不安的人，即力求简单。学校应该有一位非常聪明和认真的校长，并赋予这位校长很大的自由。

所有所谓的“俄罗斯课程”，即中学大纲的整个课程，数学和语言除外，都应该、也能够在下课前上完，家里则不仅不费力，还可以极其仔细地学习，消除每个学生和中学在着手毕业考试时普遍存在的大量无知。但家庭对数学和语言是无能为力的。机动中学的机动性表现为在继续其他课程的同时只是在春天记录家庭在冬天所做的工作，而在家庭无能为力的那些课程上视男孩或女孩为自己的学生，换句话说，因为在家中自学的儿童一定会很多，而家庭无能为力的课程不会很多，而且对所有的家庭都是同一类型的课程，学校可以毫不费劲地开设古代语言和数学的晚间课程，比如说为现在的四到八年级。

需要指出，现在中学里的一切似乎都安排得不妥当。最好的学习时间是早晨，学生却无精打彩地坐在课堂上，由于上述分析的机制，在家里预习得很好的学生没什么可学的，而根本没预习的学生则什么也学不会，因为完全听不懂课堂教学内容并且往往只是害怕叫他回答问题。相反，在晚间，虽然学生有些疲倦，至少是体力上的疲倦，虽然需要在临睡前镇静神经（睡眠好的条件），男女生仍在努力工作；他们只有在这个时间才能学习，并且临睡时神经仍很兴奋，经常还因挫折（“题没做出来”）而焦躁、激动。学校的课程最好改到傍晚或午后，使学生在早晨能积极地工作——预习功课。而在低年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不能这样做的，这就是如果家庭能以自己的教育工作完全排斥这些课程则是莫大的好处的原因。但在高年级，学校的晚间学习就是从次要的考虑来看也是大有裨益的，这里恕不多作解释。正是可以把那二三节数学课或语言课改到晚上，放在临睡之前，因为学生可以用自习或家庭学习来对课程加以补充。

四

愿读者能原谅我简短的插叙。已故的彼罗戈夫⑦在其《军事战地外科医学》的前几页中，在解释各种疾病和治疗方法之前，阐述了对大医院恶劣的水质和不好的病源需加以特别和特殊预防的概念，他还指出，简易病房条件不好，资金不足，但却没有这种特殊的毒源，因而医疗效果更好。这对学校是极为适用的：保护小学校，资助小学校，不要迷信任何大学校，尽管它有二三层楼房，是个教学庞然大物，拥有数百名学生和数十名教师。可以确信，这里所说的学校的所有缺点是有些夸大其辞的，“所有疾病的流行都是很糟糕的”。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想使读者有这样的看法，中学和私人家庭学校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恰当的，因为教学大纲没有连续性，比方说，个体教师领导的中学有$\frac{1}{2}-\frac{1}{8}$的教学课程是不完整的，而家庭却认为是对自己的帮助，在其无能为力的科目上，例如数学和语言课程方面，可以获得帮助。在这样的学校里，学生的任何缺点都可及早被发现并及时地得到纠正；任何母亲都可以要求这样的学校必须注意自己子女身上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里可以进行家庭——极小的世界和中学——极大的“高度智慧”世界之间的交流。如果这样的学校不是由大学刚毕业的人来指导（为什么不呢？），它们就不会有缺点：谁了解中学教学任务的制定，就能观察到，许多刚刚大学毕业的教师在向“学者”类型靠近的同时，作为教育者并经常作为教师却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倒是一些根本没上过大学的教师却成了教育能手，“学者们”如果聪明的话，会对他们表示惊讶和由衷的敬意。甚至有时不知为什么“学术”和“教育”

常常是反比例的——这是一个细腻而又复杂的心理问题，我们这里不拟分析。

这样，总的来说，过去城市的教育情况不太符合规律(照章办事)，但比现在更活跃，更高尚，更丰富多彩，更波涛澎湃。教学应深入生活，而不应作壁上观，像一座人人都想攀登的特权山崖。家庭在劳动，整个社会在劳动，儿童也在成人身边劳动；一切都很熟悉；一切都甚至有点严厉：它不会因此失去真正的教育作用，进而可以说，文化作用。

译 注

① 拉丁语，意为"先知先觉"。

② 布鲁特(生卒不详) 古罗马人，谋刺恺撒大帝的凶手。

③ 彼利克列耶(？—前429) 古希腊鼎盛时期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

④ M. Г. 切尔尼亚耶夫(1828—1898) 俄罗斯军事、社会活动家，在国内、外战争中战功卓著。

⑤ 格拉克兄弟俩均为古罗马保民官，他们试图通过民主土地改革防止农民破产，最后为此在同元老院贵族的斗争中牺牲。

⑥ 克利斯梯尼(公元前6世纪) 古希腊政治改革家，法律制定者。

⑦ H. И. 彼罗戈夫(1810—1881) 俄罗斯科学家，医生，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法律的界限

哪里有这种幸福的时代?当人们学习时,可以不扪心自问:“我们按哪个条例学习?”当人们喜爱自己的教师时,也不曾想过:“按哪个条款我们喜爱他们?”

当我们从各个方面研讨教授协会对1863年和1884年颁发的条例的议论时,这种想法就会在我们脑海的某些阴暗角落里闪现。在教授协会的议论中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亲身感受了两个条例的作用,而且亲自用这两个条例中的所有条款、注释和小注释来操刀——请原谅这粗俗的表达。当然,他们对这些粗糙的、部分地方逻辑混乱的条例的感受不仅是准确的,而且有时甚至是神经质的,极为痛苦的。看来,准确地说,人们对1884年条例的评价是否定的。这个从普鲁士照搬过来的条例是糟糕的extemporale①。它用八个半年的学期替换了历来的四个学程,把“候选生”改成了“一类学生”,恕不一一举例……当然,这个条例不能用自己的思想和准确的内容回答任何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里是这样或那样规定的,而不是另一种规定?当时需要进行修改,因为政治生活以及思想

生活的航向已经改变或应该改变,从而产生了一定的修改。修改中不需要任何组织工作,同时也不需要独辟蹊径的见解,只需缩减一些条款,扩充另一些条款并对日期作一些改动。

重复一遍,各方面都表达了许多重要的意见。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Н.Г.先生的文章及其对俄罗斯大学生活的独特想法,尤其是一位署名"老教授"的先生意味深长地指出了与大学生活有关的仕途"优越性"的毁灭性后果,因为中学"毕业"的青年们正是为了这些优越性,而不是出于对科学的追求,在逃避"学术的兵役"。但"条例"毕竟是"条例";我的朋友们,人在哪里?为什么你们对人不抱有任何希望?

国家及其规章制度;连篇累牍的条款;又一个委员会,又一部法律……于是我们就有希望走向繁荣。这莫非是骗局?我们没有作古?我们会勇敢的,会勇敢地正视真理。

"国家"是一切,而"我们"什么也不是。请宽恕,最终请宽恕国家。各方面对国家纷纷提出要求,各方面对国家纷纷加以指责,但是它却在指责声中胆怯地退避三舍,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公文堆……

一

当格拉诺夫斯基[②]、库德里亚采夫[③]、卡维林[④]和索罗维约夫登上大学讲台时,这正是俄罗斯大学生活的黄金时期。有人能否定吗?但这是发生在什么年代,在什么条例的实施期间?在40年代末尼古拉一世[⑤]严厉统治的年代里,政府的反应十分沉闷,在大学生活的领域里不仅不会出现1863年的条例,而且谁也无法料想到会有这个条例。但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斯特洛冈诺夫伯爵[⑥]。他受过欧洲教育,以一个工作者,而不是业余爱好者的

热情热爱科学，并在自己的周围扩展这种热爱科学的氛围。他每天到大学里去听课，不是去“监视”精神状态，而是为了自身学习，为了同情善，为了对想象和预测中的大学生的未来喝采。他总是亲临考试现场，敏锐地发现有才华的学生。任何有才华的人都知道自己正在被注意，而任何没有才华的人也知道他的平庸无才在被注意。没有任何命令，但一切都在上升，跟随着这个真正开明、真正高尚的人渐入佳境；我们不了解，但多少能猜测到，在这短暂的幸福时日里师生们都忘记了他们是按哪个“条例”而存在的……

法律的界限是狭窄的。我们最终应意识到，国家有一定的本性，无论它如何努力，都不能逾越其自然界限，就像人永远不能跳过自己的影子一样。国家只是形式和封面，不是活的精神。它根本没有任何主观的东西，而只有活的主体才可能有创造性，因此国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创造性。这是可怜的哨兵，为我们所有人在站岗，以防我们打架或逃跑，以防我们尔虞我诈，最后，以防我们相互影响——这是它最细致的工作，仅此而已，纯粹的守卫作用，极为保守的作用。为使我们成为艺术家，可怜的哨兵能做些什么呢？为使我们成为诗人、思想家……——它对此一窍不通。如果我们进了文科大学却不从事学术研究，它也不会吱声；但如果我们开始搞政治活动，想从它手里夺过枪来，它马上会意识到这是它的职责权限并把我们推到一边去。

这就是我们永远难以走出的事物本质。不幸的深渊正起源于我们不懂这个本质，想揽国家的职责于己身，而把自己的职责推给国家。由于我们——单个的人——比国家更有灵性，因此我们在思想领域更会创造，更会发明。一般而言，我们能使它相信什么是我们幻想中最具有灾难性的东西，因此它抽搐似地努力想按我们虚假的要求做点什么事，但又根本无法做到，因为我们

的要求同它的本质是互相排斥的。

二

但是，国家的人则是另一回事。诚然，他为条例而工作，仿佛只是在监督其条款的执行情况。但是，现代文明是以古罗马人、古希腊人及犹太人的原理和神的启示为基础的，由于其无限的复杂性和极为深奥的神秘性，现代的人——如果他与所属的文明多少有点相称的话——只是以其很少的一部分进入国家，而在其他部分上则是自由的创造者，或可能是艺术家。恺撒[7]或地米斯托克利[8]同当今多少有点才华的人相比显得可怜和渺小。他们了解自己的共和国；冷酷和外部的宗教并不能鼓动他们去做什么——古代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闪光的封面，是漂亮的兽皮上的一根毛，而这兽皮就是他的祖国，任一古代的祖国。这样，这种人一旦掌管"条例"后，或严格地遵守条例，或以法律的程序对其条款作一些修改。古代世界法律的极大的执行权力莫非就是从这里来的？德拉古[9]的那些"血腥的法律"——即便这是传说，但有意义的是，这个传说确曾有过；这个被剁成碎块并按债务比例分发给债权人的欠债者；这都是事实。古代人若失去法律，就丧失了一切；他珍视法律就像自己脚下的土地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唯一方法。但现代人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公民；他是艺术家或思想家，但比公务员（国家的活动者）更热情。请学会利用这个，使用现代人身上的这个复杂性和深奥性；请注意，从中可以产生如泉喷涌的思想、欲望和行动，不要关闭这眼涌泉，而要预测它的力量和方向，测算完毕后就任其自由喷放。

恺撒，这个作古的恺撒——屠格涅夫在《幻影》中对他的理解多么深刻——没有微笑，也不皱眉，似乎随便教授在大学里读

什么,随便大学生们做什么,只要他们不在民众会议上出声就可以了;因为他不会同喜同乐:同情的秘密是现代世界的秘密;吸引力是展示给信仰基督并因而充满现代文明精神的人的。大学——universitas litterarum[10]——像所有的科学一样,像全部的神学一样,其中也包括教会,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力量基础上的。或许,这就是对我们欧洲教育最初阶段的大学的解释,这就是大学的想法是永远不可能产生自古代世界的原因。那时有柏拉图学园,有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学校,有图书馆,如亚历山大图书馆,但没有任何类似这种精神骑士的东西;有的只是特殊的巡回辩论,禁欲主义,苦行者,没有任何类似现代奇怪的"科学联盟"的东西;而这种科学联盟像《12 个小领主的审判》一样在相当遥远的地方,诞生于欧洲所有活跃的大中心,已经形成了风气,形成了独特的世界并保留至今,虽然也在日益失去其主要意义。

三

需要用古代温柔的体制来支持这个想法,而这用不断新推出的条例是做不到的。我们提到过小领主们的审判,这在欧洲几乎是和大学同样古老的体制。再举一个例子,或许能从新的方面向我们表明,我们的世界在生活、行为和改善的方式上同古代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如同古代世界中的人追求法制一样,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追求是永恒的需求和进步的唯一途径。这个审判的实质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它同古罗马众所周知的、用已经颁布的法律规定来对待过失的做法相比,这就特别清楚了。其实质就是"小领主们"不一定按法律审判,有时甚至根本不用法律,他们是真理活的主体,他们自己制造辩护或审判的事实,而不是从别处

获取这个事实;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法律(“杀人犯是无辜的”),这仿佛在审判的紧要关头冒了出来,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个时刻,然后当他们解散后就消失了。个人占得了优势,对客观现实的优势,对现行法律的优势,对形式模糊的国家的优势。但永恒的追求丝毫不会宽恕他。“重新按事实审判。”古罗马的这个审判看起来是多么地荒谬!让睡眼惺忪、对连基督教世界都知道的良心不安无动于衷的悭撤来如此审判是多么地荒谬! 法规,法律,尤其是“条例”,这是欧洲文明中逐渐消失的东西。又例如,古罗马人还在蛮荒时代就制定了最为完整的法律和注解,即对法律的注解,制定了每个贵族的职责,难道这是无缘无故、毫不需要和没有必要的吗?不甚清楚的是,法律在那时是否像面包和祈祷一样为每人每时所使用,而没有它,任何人连一天都无法生存。在英国的昌盛时期,其法律尚不健全。当时提出了奥吉亚斯牲口棚[11],主要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谁也不想打扫。难道没有其他的或相反的原因吗? 我们所有的人——最小的个体——根本不为法律担心,不太会运用法律,也不努力去运用。我们似乎无所不懂,能感受到法律不是为了日常生活制定的;这是当不幸、受辱或其他恶性事件发生时采取的极端措施。在生活的十分之九的部分中,每当我们企盼好的结果时,我们不去寻找法律依据,只是寄希望于别人,总是看着别人行动,依靠别人,并且认为这种依靠胜过其他任何东西。就像一个罪犯——请注意这个重要的例子——向“小领主们”如实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仿佛坐在他面前的是身披托加[12]的古罗马大法官,尽管“小领主们”可以“无罪判他有罪”。

这就是生活中的神经,切断它是十分危险的;这就是生活特殊和新的动机,失去它是不行的,就像基督教民族的法官是权力活的主体和时时刻刻的创造者一样,任何领域中的,尤其是精神

领域中的统治者是生活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当选”，而不仅仅是“被召唤”。他能够并且应该是发明者，ποιήτης[13]：须知，“诗人”实际上像“制作者”、“创造者”一样，在古代词源中并不表示其他的意义。有文字和思想的诗歌，也有事业的诗歌。诚然，这是诗歌主要和最高的境界——生活本身，事业的内容，而不是声音或颜料的内容。有些人很特殊，有语言才能；还有些人有思维的才能；但另有些人更主要、更优秀，有干事业的才能。他们不比前两类人少；他们同样地孜孜不倦；做事业对于他们也是美妙的休息和享受，就像前两类人不断地推出新的思想和不断地宣读新的作品一样美妙。

四

我们提到过斯特洛冈诺夫，讲到过他一天不去大学就会寂寞得发慌；亲临考场，关注起身发言的天才青年并不是他的职责和“工作”。他的脸上没有劳动的痛苦。他正是以做事业的诗歌和率先垂范使大学得到繁荣。这就是可以用来替代任何条例的人。还有格拉诺夫斯基，授课对于他也不是痛苦；还有索洛维约夫，洋洋29卷的《俄罗斯历史》并未使他疲倦和憔悴。这就是事业的诗人。虽然事业的形式不同，但追求的目标大致是一样的，他们图的不是生活，他们不仅不妨碍事业的振兴，甚至还帮助它，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其实是献出了每个求实的活动家所应做的一切。

遴选这种人是国家的任务，因为在当代世界里一切都归结于人及其主观力量；这也是每个在国家的大锅里享有或大或小一杯羹的人的任务。现在总结一下我们的思路。我们把现代世界的国家和国家的人加以区别并指出，由于其本质所决定，国家

在国家的人身上始终像在古代世界那个时代一样狭隘、软弱，甚至模糊、没有生气。但是国家的人在古代世界是与国家不可分割的，他在国家中像所有人常穿的一般衣服上的一道转眼即逝、毫不起眼的褶子，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没有独立的活动，没有独立的思想，而在现代世界里，他同国家只是一般地接触，就像割线接触圆周后无限伸向远方一样。他在现代世界里还是历史的活的主体，尤其是国家生活的主体，即是承载者和建造者。是他，而不是法律，不是规章，不是体制，也不是"条例"。所有这一切——在今天和很久以前——对于人只是一根扔在地上无人问津的拐杖；在技艺高超的艺术家手中，这根拐杖，一根平常的棍子——我们想说，任何条例和法律——就成了历史乐队指挥手中有魔力的指挥棒。这种相互关系是不能改变的，就像不能从整个现代历史里抽去意义一样。感谢上帝，人已经苏醒了，法律则已死亡或几乎死亡，至少已黯然失色，疲软无力。我们仍将活着，将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文明。闭上眼睛不看条例——这是过去的事情；睁开眼睛看人——这是一条新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别无选择的唯一道路。万事皆如此，尤其在教育中也是如此，而在我们大学的问题上则更是如此。

译注

① 拉丁语，意为"非预谋"。

② T.H.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　俄罗斯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

③ П.Н.库德里亚采夫(1816—1858)　俄罗斯历史学家，文学家。

④ K.Д.卡维林(1818—1885)　俄罗斯历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

⑤ 尼古拉一世(1796—1855)　俄罗斯沙皇(1825年起)，严厉镇压

革命运动。

⑥ С.Г.斯特洛冈诺夫(1794－1882) 公爵,俄罗斯国务和军事活动家。1826年至1847年曾促进俄罗斯中学和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

⑦ 恺撒(公元前102－前44) 古罗马国务、政治活动家,军事统帅,作家。

⑧ 地米斯托克利(公元前525－前460) 希波战争(公元前500－前449)期间雅典国务活动家,军事统帅。

⑨ 德拉古(生卒不详) 雅典执政官,公元前621年编纂第一部雅典法典。该法典以严峻著称。

⑩ 拉丁语,意为"文科大学"。

⑪ 奥吉亚斯牲口棚出自希腊神话,据说其中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来赫丘利引来两条河流,一日之间冲洗干净。现喻藏污纳垢之所。

⑫ 托加系古罗马的男外衣,以一块布从左肩斜搭缠在身上。

⑬ 希腊语,意为"制作者","创造者","发明者"。

论俄罗斯学校的无根基性

人们对教育的需求郁积已久。俄罗斯作为欧洲教育最贫困的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是最少的。法庭、军队、铁路部门等在提出自己的需求时，都说是“不可拖延的”。但作为这一切的基础——知识的光辉——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其需求总是可以被拖延、“讲好的”东西最后总是被忘却的事情。我们可以一本书及其学者为例，也可以一本杂志及其作者为例，但首先当然要以学校及其教师为例。我们看到，这一切的生存和斯文都已扫地，这一切都蜷缩到我们辽阔的、似乎对一切都辽阔的祖国的某个角落里去了，蜷缩成一团同时又感到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们对教师的理解是纯粹多神教式的和粗糙的古罗马式的：“教师”有点是“奴隶”，当然是有学问的“奴隶”，他总不敢同学生的父亲平起平坐，他是为后者效劳的，而后者对于他则有点是“主人”。按照基督教的理解，教育是世界上最崇高的事业，它能美化和充实人。而我们却同这个概念格格不入，在各方面都格格不入，在科学、文学方面，而首先是在学校方面。

外表的畏葸可能只是物质方面的，但却导致了内心的

沮丧；教育在自身以及周围感受到的蔑视促成了它不愿和害怕自由表达的心绪，而这正是在普希金和卡拉姆津之后；这正是在我们有了泛斯拉夫主义，即完整的有民族意识的学校的时刻；但是，这民族意识也被抛到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后院里的某个角落里去了。

我们的教育该卸去“奴隶的形象”了，而它现在却以这种形象同其他部门称兄道弟，并肩共事。这件事不应该只在中央做，而应把这种精神振奋推向直接从事此项事业的一大批人，即推向整个教育界，尤其是推向教师队伍。我们理解教师，我们理解教授，他们几乎已沦为我们社会和国家生活的贱民。如果事先不向人们交代完成要求的方法就向人们要求，这是不理智和不通人情的。提高我们教师阶层地位的最好办法就是为之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即不让教师中积极而有才干的人流失，可迄今为止他们正不断地从教师岗位跳往其他安置更自由、生活更有保障的职业中去。我们说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所亲眼目睹的事，但我们的社会却知之甚少。教育的物质简陋是我们在理想领域中接连惨败的根源。这是教师内部的、家庭的状况。如今成家的教师是万万不能生病的，否则就要债台高筑，几乎难以还清；成家的教师扔下自己的孩子不管，迫使妻子在边上或悄悄地做同样的教育工作，或做某种家庭的“手工业”工作，而教师自己则在课堂上气喘吁吁，批“作业本”批到身心憔悴的地步。显然，他是在痛苦地批改作业本，就像痛苦地上课一样，既疲惫又恼火。教师几乎成了神经衰弱者的同义词，这是学生的看法，在他们身上也感染性地反映了教师的神经质。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卢布，被从教师身上挪给了那些认为教育“一文不值”的衙门里的官吏。同时，所有看到教师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这里蕴藏着多少唯唯诺诺和苦难深重的理想主义。我们的“乡村教师”以其温良

恭顺和任劳任怨几乎成了经典人物；请爱护这已经点燃、但尚未熄灭的冲动；它不是永恒的，如果受到粗鲁的冷遇和无情的嘲讽，它可能受损伤，它可能会变得寡廉鲜耻。而一旦熄灭后，就不可再重新点燃，因为它是自发地、在各种偶然的历史因素综合作用下点燃地。有一些国家像俄罗斯一样“愚昧”；但到处这都被认为是不幸；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以咄咄逼人的愚昧姿态出现，而且令人感受到这姿态下有相当厚实的基础。教育部的“公务员”生活成了问题，已经是社会风气的加数：他如果“蜷缩”，周围的生活就会更厚颜无耻地向他进攻，其远期后果是：面对着蜂拥而来的消费税签条，书籍开始蜷缩，报刊开始蜷缩，思维和文学也在内部和精神上开始蜷缩。这样，从琐碎小事中形成了国家精神面貌及其历史发展的轨迹。

我们提到过卡拉姆津和普希金，提到过学校的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在自己的历史上以自身的努力创造了比我们现在培养或官方使用的人才更优秀的人才。我们的条例，无论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都是按外国的模式编写的，甚至还要简单：从德国的条例翻译过来。但问题要严重得多，因为全国青少年所直接接触的教学材料中有十分之七不是俄罗斯的，亦即我们执著地在使俄罗斯的心灵结构潜移默化成“外国式的”。为了言而有物，我们要指出，作为连续性课程的俄罗斯历史在四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的第一学季每周上一节课，总共是五十六个小时，就是说，如果把它算成一段时间，那么在八年的学习中俄罗斯历史仅占用了二昼夜零八个小时，相当于五个正常学习日。在八年中学学业的一千六百个学习日中这只占了学生所接受材料的三百二十分之一，由此可以说，只占了他全部注意力的三百二十分之一，而这正是在他成形的年龄，他正在形成终身不变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近的”和“远的”前景。应该说，这只是在八年的

回忆中逐渐消失并化为乌有的东西。化为“乌有”的还有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心中历史回忆的作用。我们在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所有舞台上展示了民族意识的弱点，我们没有俄罗斯的习俗，没有俄罗斯的思维，最后，我们根本没有哪怕是作为“人类”思维注意的对象的俄罗斯实际材料，在作如此切中肯綮的解释时应该惊讶吗？我们以法兰西的“荣耀”、关心家事的范例、用关于瑞典人和中世纪德国人的历史故事来学习爱国主义。我们会混淆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拜占庭的王朝，也弄不清本国帝王的宗谱，而我们实质上十分详细地了解这些国家的地理——如果比较空间度量单位的话，就像了解我们“没落的”祖国的地理一样。学校在最善于接受和最敏感的年龄强加于人的这个精神在尚不强壮、柔如软蜡的心灵上变得僵硬起来，并且在以后的生活中，在自然还不太“成熟的”活动中维持原状。伊凡，彼得·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兄弟，霍米雅科夫，尤里·萨玛林等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某些理论至今在我国仍是“空中楼阁”，因为它还只是我国历史和国家实际结构的拓本、模型和精神反映，就是说，这个历史，这个国家从我们的脚底下滑了出去，以致于我们在空中晃荡着双腿，双手抓着就算是“社会大门”口的栏杆，一切与我们的文明没有切身的关联，我们把一切有切身关联的东西都想象成“思想”，对我们极为怪异、不可企及的思想。我们根本不想否定古代世界的意义，也不想否定欧洲历史、文学、哲学和科学的意义，但是我们认为，这一切所能牢固和正确扎根的只是正统形成的心灵，而不是各种心灵的大杂烩，就是我们所预言的“真正的泛人类心灵”。每一个人，至少从古希腊人到与我们同时代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正是在少年时代和青年初期受到了正统的民族精神的教育，或许，这个坚实的基础使后来的精神迷惑更有依据，更惹人注目。我们的格拉诺夫斯

基、别林斯基[1]、赫尔岑[2]以及更早的茹柯夫斯基[3]、卡拉姆津及所有这些人的原型——彼得大帝——都受过俄罗斯的正统教育。他们因此知道要否定什么，而且是痛苦地去否定。这同我们今天庸俗、冷漠的折衷主义是泾渭分明的。

一大批人埋头于"故纸堆"里，使自己重新成为俄罗斯人，绝不能说萨玛林、阿克萨科夫和霍米雅科夫是不可靠的、才疏学浅的"公民"。不，无论作为公民，抑或是社会成员以及家庭里的父亲，他们都是典范，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故纸堆里有一些"典范的"东西，它们可以用来培养真正的公民和真正有教养的人。尤里·萨玛林在逝世前不久写道，正式公布的有关我国森林每年损失的比例的消息使他接连几天彻夜难眠。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人不是罕见人物，如果这就是社会的气质和精神，俄罗斯就不会遭受内政外交上最惨重的失败，就会使自己成功的锁链上再增加几个重要的环节。问题在于，按古典方法研究和传授的我国古代历史本身就是古典教育，不过是本国古典教育，因为"古典"的实质很少在于对象，更多地在于方法。但这是遥远的幻想，不过，其中一部分现在就可以实现。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在各种流派互不相让的报刊中，近几年可以看到人们希望在教学大纲里有更多的篇幅能留给俄罗斯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愿望。我们对此略作收缩和限定，坚持认为这应是历史文献和古代及现代文学的文献。在本世纪 70 年代，俄罗斯不仅经受了蓬勃的创作冲动时期，而且这是自 18 世纪——蒙眬的世纪——之后对自己的精神发现：它建立了自己独特而美妙的 Renaisance，即编年史、修道院、壮士歌、无数的诗歌和公文《纪实》的复活。虽然这种独特和美妙的精神只是影响了为数不多的人，但对所有被影响的人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印象，同时也并没有从谁那里从"泛人类"的东西中夺走了什么。如果我们把本世纪创作的古典诗歌和散文

也归属此类，那么我们将会有丰富的教学材料，不仅形式优秀，而且有丰富的深刻思想。我们不想说这就是一切，甚至也不坚持这就是主要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学校应该对这一切予以更多的关注，这是没人能否定的，这就是我们不足挂齿的想法。重要的是，学校无论在追求什么“长期”目的的同时，不能在国家已经达到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上停滞不前。毫无疑问，我们学校里的所有人对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历史了解得又少又差，学校根本不配它所在的时代。

译 注

① В. Г. 别林斯基(1811－1848) 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哲学家。

② А. И. 赫尔岑(1812－1870) 俄罗斯哲学家，作家。

③ В. А. 茹柯夫斯基(1783－1852) 俄罗斯诗人。

教育的两种类型

一

有两种纯智力教育类型：形式的和实科的。

婴儿刚生下来时是什么都不懂的；但同时，当他接触了世界上第一批印象时，他会贪婪而连续地吸收这些印象并不知不觉地把它们转化成知识。这一切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哪些影响下、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放在一边。事实上，在人的生活这个最初时刻，其头脑本身是一个空空如也、空无一物的形式。我们以此想说的正是：小孩在降生前是一无所知的。这样，在认知中内容就是世界，智力仅仅是形式。

教育者的努力首先可以用于精选学习内容，注意其对生活的价值和必要性以及其内在优越性的比重。这就是实科教育。受教育的智力和受教育者本身在这里被忽视了，仿佛预料到他不能、不应当或不值得受教育。重要的是他身上的东西；他是谁，这无关紧要。几乎不同解释，这种教育类型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根本不是教育，而人所付出精力的劳动

也不是艺术，不是什么难做的事。这只不过是在教学最有益和最实用的东西时的体力劳动，不过是制定最重要的知识范围时的体力劳动，是文选编辑者、百科辞典编纂者的工作。虽然它要求对历史的广博知识，要求广泛涉猎所有的科学，但它根本不需要对人的知识。

这种教学的结果要么很好，要么很糟，这不取决于教育本身，只取决于儿童的习得能力。如果习得形式天生就很好的话，如果这个形式是灵活的、有才能的、工作很好的话，如果儿童很有才能甚至很有天才，他就能成为有教养的人，受到扎实和良好教育的人。天生有才的人在古代有苏格拉底，[1]在近代有牛顿，在近现代有法拉第，[2]在我国有罗蒙诺索夫——这就是在大千世界面前不会手足无措、不会黯然失色、也不会迷失方向的伟人，而且能以自己同样完美的精神同美丽的世界相吻合。他们成为伟人是在没人密切关注他们的努力和工作能力的情况下实现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同这些人形成反差的是另外一大批人，他们在知识的广博性上并不逊色于前一种人，但如果你听上他们一二个小时的谈话，观察一下他们的生活，你就会以不快的感觉对自己说：这是一些爱闲扯的人。这种人到处可以碰到：在文学作品中，在社会中；到处都挤满了这种人，他们通常大量地读啊，听啊，写啊，读啊，总是能使自己和读者得到极大的快感。这是些能使人产生点好感的人；没有他们，生活就会变得枯燥乏味，就像我们所走的道路两旁没有花草一样，就像天空中没有以嗡嗡的叫声使人心旷神怡的昆虫一样，或者就像家中没有令人厌烦、糊里糊涂、使你哭笑不得、但毕竟能活跃气氛的主妇一样。当你无事可干时，所有这一切伴随现象都是不错的；只是在你烦躁不安的时候，在你需要说出别人能理解的话时，或者当你想从别人那里听到投机的话语时，抑或你需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它才

会对你碍手碍脚。

我们说过，他们的知识面很广。这实际上是无数的文选，只是纷乱无序而已。如果你想探讨一下这无序的原因，你马上就会懂得，文选的编者根本不会区分轻重缓急、有益无益；他没有嗅觉，没有味觉，这就是他总是大量"吞食"的原因，我们是说，总是大量地认知。他感觉迟钝，不会组织，他软弱无能，这就是他不寻找、不选择、在生活和书箱不断地增添新的负荷时只是消极地拖着双腿的原因。他是可怜的人，他是可鄙的人，当然这是从严肃意义上讲的，出于严肃的目的。

婴儿具有老人的经验；确切地说，婴儿悄悄地看到了其祖父所做的一切，虽然还不能理解，但会去摹仿。这就是对这类人的定义；这就是对提供了纯实科教育、把学习内容作为注意对象的准确表达。

头脑会学习，实质上它只不过是形式。关注这个形式的精明性的教育是形式教育。几乎无需解释，它本身就是教育。

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知识面很窄、但说话总有无穷魅力的人。在生活中你可以依靠他们。你可以把任何事情交给他们去做，甚至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事情，而且不无根据地期望他们在经历二三次小挫折后能掌握它，能完成它，而他们自己也不会惊慌失措，不会对所托付的事情造成任何损失。

这是聪明的人，不空虚，知识不渊博，但很精明能干；这些人大多是谦虚的人，因为他们掌握的策略妨碍他们深入所不擅长的事务，妨碍他们展开意义不明确的谈话。他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都是需要的。人们在寻找这样的人，但这样的人往往很难寻觅到，尤其在今天，因为现在到处是似是而非的教育手段，很难见到真正的教育。

在形式教育中，教育材料被忽视了，确切地说，被遗忘了。它

不关心其内容、内容的价值、益处、必要性和趣味性。有一点颇为重要：这些知识的外部形式的性质应在学习中使头脑变得精明，同时使它变得有才能、顽强并富有朝气。这里重要的只有一点：谁将在未来掌握这些或那些生活赐予的知识，或者他从书本里自学；至于他有哪些知识，他的任务是什么——这都无关紧要。

二

古典教育的思想（我们这里只谈思想，关于实践在下面会谈到的）正是形式教育的思想。人们说，学古代语言毫无益处，无用武之地，古代文学则内容贫乏（这对拉丁文学是非常正确的）；但这根本没有触及这种教育的题目，因为它不以教会实用的和需要的东西为己任，而是把智力磨砺得更精明，使它将永远能自行区别何为有用，何为无用，何为主要，何为次要。问题只在于，对此选用无益的科目是否正确，它是否含有所需要的形式性质，这种性质是否比其他任何课程都多。毋庸置疑，古希腊语是没有这种性质的*：它在中学里的地位是有完全不同的根据的，即历史文化的根据。古希腊人在所有方面都是创造者：在几何发明方面，在建立国家体制典型形式方面（共和国和君主政体，民主和贵族政体，寡头政治和暴民统治）；在赋诗的技巧方面以及哲学学说论述方面；在建筑和雕塑方面，理想艺术（如尼多斯的阿弗洛狄忒雕像）和现实艺术方面。任何事从头开始总要比从中间开始好；如果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不得不只是继续或只是结束，那

---

* 我们这里不拟解释和论证，但是，懂希腊语的人也不要反驳我们。我们认为，古希腊语的句法略欠严谨，词尾变化贫乏，词身和前缀的音变过于复杂，（动词的）词首字母重迭太多。古希腊语在形式教育意义上未必能有多少，即很少，超出现代语言。

么我们在思想上作为回忆、传统并常常作为典范保留这个原理将是弥足珍贵的。在古希腊人的许多方面(如雕塑和部分哲学理论)迄今依然是无人能媲美的。

无论如何,古希腊语不具备形式教育的意义,而这直接决定了它的学习和教学方法。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能遵循这种方法:语法知识只是阅读原著最必须的部分,语法绝对没有独立的意义,而阅读原著应博览,并加以实用的注解。我们应记住,这是实用科学,把它列入课程是没有引入其他古代语言的那些动机的。

具有形式意义的只是拉丁语和数学,它们是方法性的课程。为什么不是实用科学中的一门,不是物理、化学或生物?有两个原因:在这些科学研究的现实事实和其他任何事实中,其内部逻辑不如语言逻辑那么清晰,而且这些事实本身不那么容易分析,不如语言那么易于激励受教育者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你可能观察过动物的器官,研究过物理现象,但你不能像遣词造句那样把它们的成份无限自由地组合和再组合;而且不能就每一个独立成分令人信服地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想说,人对于自然界现实事实尚不是完全的主人,而教师在把学生带入门时,如果他十分实事求是,如果学生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会不知所措,语无伦次,并且经常信口开河——自以为是,并且同时还装出一副样子,仿佛什么都懂。* 相反,在人类言语中,以主语和谓语组成的简单句为例,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

---

* 例如,在谈到个别尚不明了的现象时教师会说:"这或许是由于粒子分布的缘故",或者"这可能产生于部分吸力。"这就是学生们不得不大量掌握的解释。他们在童年、青年时代以类似方法充分掌握后,到了成年就不会再感到知识贫乏了。其实,连如此著名的 J. 廷德尔①也曾被迫在课堂上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物理老师做实验用的毛巾湿的一端的颜色比干的一端深?"

它复杂化，然后再恢复成简单句，或改变其原来的意思(被动意义改成积极意义)等等。在你面前是这样一朵鲜花：你可以让它开放，也可以让它拢成花蕾，缩成幼芽或让它停留在任何生长阶段上。而这一切都能在任何时候指明所有实际存在的关系的隶属性，并从逻辑上十分彻底地证明这种隶属关系，不遗留任何模棱两可的东西。当然，这是自然的唯一事实；当然，那些从中摸索到使头脑变得精明的最好方法和手段的人没有错。那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拉丁语？

在西方现代语言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变格，即没有根据句子意义变化的格形式，而这在拉丁语中是十分丰富的。这是一种琴键模糊不清的乐器，最主要的是，琴键本身就很少，比琴弦还要少；我们是想说，语言的形式比藉以表达或可能表达的意义更贫乏。只有四个格，况且各自没有独特的词尾形式；只有两个变格，而拉丁语则有五个；没有那么丰富的时间和式的变化形式。这是——请原谅我们粗俗的表达——只有三四根琴弦的琴，用它来学习音阶组合规律无异于瞎子点灯。

显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现代语言琴键的缺点可以用其本身丰富的内容来弥补。但我们应该记住，所研究的语言是严格的客体，就像某个身体器官之于生理学家一样，掺杂任何主观成分都会使研究的明确性变得困难和模糊不清。考察在眼前绵延流淌的溪水是容易的，而研究我头脑中正在推导的思想则是困难的，何况它又同其他次要的、有关正被研究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想法纠缠在一起。这就像从句法和词源来分析俄语句子一样，教师和学生的言语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毫无疑问，古罗马人研究拉丁语没有形式和方法上的价值；这个价值只是在后来才被发现：只是当古罗马灭亡之后，其语言成为使用另一语言的民族的死的遗产时，这个价值才表现出来，而这个遗产因不使用是死的，

但因其中保留的逻辑和精神则是活的。

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俄语体系中根本不具备拉丁语所有的、并且唯其所有的逻辑。Dux ducit ducentos milites 就是"统帅率领着二百名战士";当然,十二岁的男孩都很清楚,统帅率领的正是数量为二百的战士,而不是抽象数字二百,而在俄语中"战士"是以定语和二格的形式从旁依附于这个数词的。Deus mundum regit——上帝管理着……当然不会是玩具(五格)。他管理着的是世界,是我们民间言语中所用的更严格、更正确意义上的、而且只是用于过去时的"管理":"他管理了自己的家","他管理了国家、城市"。拉丁语无可挑剔的逻辑也与此相应:Deus mundum regit——上帝管理着……字面上是世界,翻译成不太准确的俄语:世界。④通过这两个例子足以理解为什么在众多语言中正是拉丁语成了形式教育的工具,而不是其他什么语言。

三

数学是中学学业中第二门具有形式教育意义的课程,但其意义要比拉丁语小得多。题目给出了,学生可能解答得出,也可能解答不出,但这要运用其能力——有的人能力很贫乏,有的人能力很活跃。题目不像任何句子那样可以任意或无限简化或扩展的,而句子可以扩展成一个完整的复合句,或简化得只剩主谓关系。这样,你就会明白新的公理:这是不变的事实,虽然它富有逻辑性,可以完整切分,但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儿童的思维应能理解它,而它,这个事实,则永远不会顺从于学生,不会帮助他理解,但是拉丁语的句子在有经验的教师手里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了解一切的。"悟性"和"颖悟"在成功的数学教学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这是课程反教学法的方面,因为"颖悟"是思考快捷而不清晰*的路径,是思维循迹下意识的某种跳跃,没有明确意识的依据——是基础教学中天才的火花。这时学习的是一群大部分能力较差的儿童,学习正是为了使这较差的能力得以提高和巩固,当然,能无限引发这些才能的火花的教学方法是不存在的。

我们结束了想就这个理论问题所说的一切,并且作了必要的证明。古典教育不仅在思想上是真实的,而且是唯一真实的,同时可以毫无例外地运用于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时代。就像代数是解释所有数量关系永恒的手段一样,拉丁语法学派是磨砺人的智慧的手段,它可以被愚昧无知所抛弃,但不能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

译 注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 古希腊哲学家。

② M.法拉第(1791—1867) 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③ J.廷德尔(1820—1893) 英国物理学家。

④ 拉丁语中的"世界"在句子里是宾格,而俄语中的"世界"在句子里是五格(工具格)。

* 举一个我所遇到的例子,它能以极鲜明的形式肯定我所说的话。在中学八年级,我和我的同学怎么也列不出一道代数题的方程式,尽管我们都知道答案(从习题集所附的答案中可以找到)。我的一个熟人,П先生,他于5—6年前辍学了,遇到我后想了一会儿,问我条件,当我说了以后,他仅脑算了两分钟就说出了答案。我很惊讶,请他解释他是怎样处理题目中的数字和条件的。但他说,不能、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告诉我说,在中学里学习时他总能解出各种各样的题目,但能向教师解释出解题过程的只有简单的题目。总之,他很有才华,很聪明。但在拉丁语中则不可能有类似的情况。

夏里亚宾[1]音乐会观后感

总是“票已售完”，而要使“票已售完”，售票窗口前就得蜿蜒排着二十俄丈左右“渴望”的长蛇阵……而这一系列情况使我几乎没能听到“我们的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演唱，在昨天的音乐会上我左边的邻座就是这样称呼夏里亚宾并呼唤他上台的……整个欧洲和整个俄罗斯都听过了夏里亚宾的演唱，他的听众有老有少，有富有贫；而我只听过他一次演唱——当他八年前在《浮士德》歌剧中出演角色(梅菲斯托费尔[2])时；而他扮演的伊凡雷帝的角色我却无缘欣赏，虽然我十分地想看，也许以后会看到的。恕我仅凭这一丁点新鲜的印象斗胆地谈论他几句……我不是作为音乐家，甚至也不是作为听众，而“仅是观众”。

是的，正是“仅是……”他刚从舞台边一扇看不见的门里走出来，我的邻座就推搡着邻座的女士们热情洋溢地站了起来：“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出来了！”我一看到他洋溢着幸福和青春(要知道他已 40 岁了)、有些初出茅庐但可爱至极的脸庞时，就立刻也成了“热衷”于这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人了……“祝你成功！愿你的嗓子发挥出色！”我不由自

主地轻声说道。夏里亚宾刚一上台，所有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祝愿他成功。为什么?!

为他的青春，为他的幸福……

当观众热烈的祝愿同他同样自然的愿望汇合时是不可能不“成功”的。夏里亚宾和不成功是互不相容的，不成功是不合乎情理的，会不成体统的，不仅违反美学，而且有悖道德……

从门口到舞台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路。从我坐的地方能看到他的全身。于是我就看着他是怎样“走出来”的……没有任何的拿腔作势、得意洋洋和“贵族派头”。他步履不太雅观，像“自然人”一样迅疾而又匆忙地走向他的观众，一会儿抬起眼睛(看合唱演员)，一会儿看着前面(看大厅)……他有点笨拙，但这却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使我们觉得“在我们面前”没有任何老掉牙的、“一般音乐会”的东西，仿佛没有舞台，就是说，没有“演戏用的假发”，这里没有那种很破坏艺术幻觉的“假发”，于是他扮演了“自己最新和最美妙的角色”。

歌王匆匆地走向了自己的地方……他额头上蓬起的一绺头发是任何人都没有的……大家都熟悉这绺头发。它同下面的脸部线条极为和谐，甚至与更下面的身段也很和谐。可以把夏里亚宾想象成无手无足的人，但若没有这尚不浓密、直立蓬起的一绺头发，就很难想象他，就很难对他进行思索。这就像参孙[3]的长发一样：是某种个性的、特殊的东西，是“实质”的东西。没有这一绺头发，夏里亚宾就不成其为夏里亚宾，他就失去了可爱之处，大利拉[4]就会背叛他——观众就会背叛他。头发表达的是：“我就是这样。”表达的是完全无意识的、不太适宜的、但又极为自然的、天生的任性和任意。

“他想这样，上帝！就按他的。”

观众为了这一绺头发愿为他做一切事，只要能看见这绺头

发，就始终会为他竭尽所能。“这是我们的雏鹰，我们的小鹰。他马上就要唱了。”

他唱了起来……

一开始是独唱，然后和着四重唱，接着又是独唱，就这样交替着。当他站在众人之间和其他同样极为优秀、经验丰富、非常擅长歌唱艺术的歌唱家一起引亢高歌时，可以看出差距之所在。他们本身都很优秀，独唱时都很优秀，只是在四重唱时，在他的周围成了平庸的演员，他们的歌唱成了平庸的歌唱，而他的歌唱像风高高地掠过树叶的沙沙声。他们唱歌是“迎合观众的口味”，是“唱给这个大厅里的人听”的。夏里亚宾则似乎根本没感觉到“这个大厅里的人”：他不过就是在唱……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在唱，他的声音不是投向大厅，而是在上空回荡后再飘落于大厅，使大厅里的观众能以这种方式近乎“偶然”地听到他的歌声。这确实是他演唱的独特之处，不是做作，不是卖弄。或许他自己都没发觉这个独特之处。他的“高空歌声”“从天而降”，就是这产生了主要的印象，形成了一种雄伟的东西。夏里亚宾的歌声是很雄伟的，不是他的嗓音雄伟，而是歌声。“一切尽在歌声中”，而“他本人”就是这样歌唱的。这就是吸引观众的魅力，以或许还不十分明显的诱惑力迷住了观众。

我的邻座激动难捺，又一次站了起来，不顾是否打扰别人，不断地说：“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一个人唱！这样的人是欧洲没有的！！”

他转向邻座，对说他的人陪了个笑脸，继续天真地喊道：“他全部在这里！忘情地在唱！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演唱！”

不是投向观众和听众，而是投入了演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

夏里亚宾的嗓音，确切地说，他的音调是极其优美的，其低

音实质上是嗓音粗厚的部分。他唱起了抑扬而婉转的男高音，正是它使观众着了迷。说实话，昨天的演出令人惊讶。夏里亚宾，一个男低音歌唱家是怎样使人入迷，怎样产生如此的印象并获得如此殊荣的？秘密在于夏里亚宾的低音里没有这个声部的粗厚特性，没有任何粗糙、僵硬的东西，同时，保留的正是男低音的力度。正是力度和优美的音调非凡的溶合，几乎是男低音和男高音在旷世奇才身上的结合产生了这一切。我想借用古代神话说，这是"躲在石榴裙下的阿喀琉斯[5]，在他年幼时，其关怀备至的母亲忒提斯为了使他躲避兵役，把他乔扮女装，藏于一个王公的女儿堆中，但他的嗓子仍是男的。夏里亚宾也是这样。在他的身上融合了两种天性：他的男低音没有"马蹄"，没有"角"，而穿着则相反，美丽的沙裙，拖着曳地长后襟，具有女性全部的线条美和形象美……这很形象。如果把这转换成声音，你们就会明白：什么是夏里亚宾，他以什么使人入迷。

但这还有一个纯粹俄罗斯的缺陷：选择的歌曲很糟。让他这奇妙的嗓音唱他所唱的那些小曲是不可宽容的。他唱的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没有任何不同凡响、引人入胜的东西。或许，额头上蓬起的发型妨碍他听取别人的意见或同别人商量。但他，这个长发的参孙，"自己一切都知道"……啊，他远非一切都知道，他不了解自己的大利拉——不了解自己的观众，他们对这些不值一提的小曲十分懊丧，只有个别几支不错：《沿着母亲河——伏尔加河》，一支关于伊里亚·穆罗梅茨[6]的壮士歌，还有一支强盗歌曲……其他的歌词都听不清楚（有时歌声压得很低，因此部分歌曲听不懂）或根本没意思，令人索然乏味……

但俄罗斯歌曲感人肺腑的特性发挥了作用，人们鼓着掌，呼喊着"再来一次"、"再唱一遍"……"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再唱一遍！"于是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又唱开了。他完全是"我们的费

多尔·伊凡诺维奇"，甚至不会挑选唱什么。就像B. B.安德烈耶夫[7]可算作为提高自身素质和改造周围世界而勤奋顽强工作的天才一样，夏里亚宾可以称为"额头上翘着蓬松、凌乱的头发"的天才，他"天知道想要什么"，但不服从他是不行的。当时就能看出，他不爱惜自己，不考虑自己，不加工自己。他周围没有文化，他是奇人。夏里亚宾是奇人，罕见的奇人，如"晴天霹雳"或"天边彩霞"；安德烈耶夫全部是工程艺术，"用鼻子挖土"，在砖石、沙土以及天知道什么东西里建起美妙的通道。应该有一个人在夏里亚宾身边关爱他，像果戈理所说的"这个轮子能驶到喀山"或者"驶不到"。什么东西会"折断"，而且必定是"突然地"？就像安德烈耶夫身上"什么也不可能发生一样"，夏里亚宾身上"什么都可能发生"。阿喀琉斯的豪华马车正是在宽阔的弯道上像果戈理小说中的二轮轻便马车一样突然翻入沟渠，倾覆，散架，害死了一个优秀青年，"像"他——他的天才那样的青年，高傲，自信，"不同任何人商量"和"不想……"

一切就像古希腊人的"神"……

但他们的"诸神"也有背运倒霉的时候……想就"额头上翘着头发"说一句：要防备隐藏在这中间的狡猾的力量和变幻不定的命运……

但暂时一切都光明灿烂。俄罗斯优秀的"神"——又是古希腊人的"神"，又是壮士歌中的"神"——身材健美，颀高，极有天赋，不做作，长大成人了，他笑容满面，喜气洋洋……看着他身上的一切，我不由地想到：所有的俄罗斯人早就变成了德国人、法国人，变成某种国际性的、世界性的东西；至少它的音乐家、雕塑家、演员已经变成了……舞台和戏台上的人变成了……而这个人似乎来自神秘的伏尔加河沿岸的森林，穿着不合身的燕尾服……但又忘记了燕尾服，忘记了我们，把脸颊贴在俄罗斯宽阔

的手掌上唱了起来……就像伏尔加河沿岸所有苍翠、温馨的森林同他一起、在他的心中唱了起来。

这就是欧洲和俄罗斯喜气洋洋地聆听夏里亚宾歌唱的原因。我们喜气洋洋地听着，而他“自由自在的心灵”也在“刚逛入的绿色小林子”中心花怒放……我们昨天就是这样“逛入”他的歌曲的；“小林子”为红粉手帕、细纱头巾、俊美少年以及“整个辽阔的俄罗斯”感到兴奋不已。

谢谢“昨天”。

1913年

译注

① Ф. П. 夏里亚宾(1873－1938) 俄罗斯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

② 梅菲斯托尔系欧洲一些民间故事和民间艺术创作中的恶魔的形象。歌德利用他作为《浮士德》中的人物。他是浮士德的伙伴和诱惑者，欲以权力、知识、尘世的幸福来换取浮士德的灵魂。

③ 参孙，《圣经·旧约》中力大无比的勇士，其力大无穷的原因在于他的长发。

④ 大利拉系参孙的情妇，被非利士人收买。她从参孙口中探知其力大无比的原因后，趁他熟睡之际剃去他的头发，于是参孙被非利士人虏获并遭到戏辱。

⑤ 阿喀琉斯系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出生时被母亲握住脚踵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除了踵部外，他的身体其他部分刀枪不入。

⑥ 伊里亚·穆罗梅茨系俄罗斯12－16世纪壮士歌中的主人公之一，其形象体现了人民的理想。

⑦ B. B. 安德烈耶夫(1861－1918) 俄罗斯音乐家，善弹俄罗斯的三弦三角琴，俄罗斯第一个民族乐团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纯真无邪的舞蹈

（关于艾谢多拉·邓肯[1]）

我的标题写得不对，不准确——由于怯懦的缘故，应该说“纯真无邪的民间舞蹈”，但又对这种东正教式的手臂挥舞和欢呼感到惶恐不安。“你是谁？上哪儿去？”不由地低下头胡诌几句，想借别人的幌子使自己的真实思想暗渡陈仓。由于读者已不害怕“纯真无邪的舞蹈”这个标题——因为，比方说，四年级女生的“舞蹈”当然是“纯真无邪”的，每一个东正教大司祭都会同意这个说法——于是我现在趁读者不会因为一个“可恶的标题”而把报纸扔掉的时候谈一谈民间舞蹈，而不是“舞蹈”。前者也是蹦蹦跳跳，也同样纯真无邪，天真自然。当然不是赤身裸体，而是模仿。这是一个可能把舞蹈表演得“淫荡”(这是对大司祭们的让步)的真人。关于邓肯女士我绝对一无所知，但她所表演的东西、所模仿的东西和所重现的东西是贞洁的，美妙的，纯真无邪的，虽然也是女人穿着我们只能用于作画而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穿在身上的“纯真无邪的服装”跳跳蹦蹦，而邓肯穿着这衣服在

千百个男人和女人面前，在闷热的小剧院（圣彼得堡）里……场面极不寻常。

还是从头说起吧。邓肯的名字在全世界都如雷灌耳，大概没有一家杂志和报纸没有报道过她，没有一个作家和艺术家没有对她发表过个人见解。所以，说实话，“题材已挖掘完毕”，但这是在对汇合成流的知识分子言论加以总结的意义上的。我想，我不会重复这些“言论”中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是用我多年发表的有关性以及对人类文化中同性有联系的部分的观点来看待邓肯的，因为分析邓肯和研究她的舞蹈完全像初次所见那样，仿佛这种场景是第一次出现。确实，我是在三年或四年前看到她的演出的，那时她第一次来到彼得堡，由于票价太贵，我只能坐在庞大的音乐厅大约二十排的地方，像十分之七的观众一样，除了舞台上来回蹦跳的女人身影，什么也没看清，没看清动作的细节，没看清脸部的特征，而且，像十分之七的观众一样，我不能对演出妄作结论。许多人议论纷纷地说：“这与古代毫不相干，诱惑来自女人的裸体。”这时我也不敢反驳。“所有的人都去”看这个演出，不吝出高价购买戏票（二十几排的位子超过七卢布）。我想，这种观点正是在那什么都没看清的十分之七的观众中形成的。这些人数占优、根本没看清邓肯的观众只是凭传闻在议论，但其中正确的部分是她“半裸地跳舞”。“哈，我们懂！”观众捻着小胡子或捋着大胡子说：“我们懂！”而这时大司祭们对他们摇头叹道：“懂了吗？！”

我现在坐在第一层从舞台数过来第二个包厢里，甚至不用望远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细微之处。大厅里已人满为患。我不否认，在第一次来看邓肯演出的人中，即以前没看过、也根本不知道她演什么的人中间有这样的动机：来看舞台上半裸的女人。在售票处周围挤着一大堆人，大部分因票已告罄而遭回绝，

其中有许多是没文化、略显粗犷、较为平凡的面孔。但是，再说一遍，这是在街上围在戏剧院门前并且进不了剧院的一群人。这是“我们的人”，“俄罗斯人”，在邓肯之前和没有邓肯时就已经有了。由于我下面的议论将从文化历史出发，因此需要明确地指出这一点。“看裸女的冲动”正是我们的冲动，是彼得堡、莫斯科、俄罗斯甚至可能是欧洲的冲动，冲动并愿“付出任何代价”，以一睹或远睹如此这般、如此裸露的舞女，而“其他地方再便宜也看不到”。看一看，然后骂上几句，树上道德牌坊——这是“自有主张”的人最俄罗斯化的议论，或许，正是这掀起了诋毁邓肯的轩然大波。

大厅里很安静；老老少少都有，男女参半，但根本看不到那些挺着肚子、下唇耷拉着的老头，在会有“裸体”的演出时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大厅里根本感觉不到有、也没有望远镜以及对所盼事物的渴望——这种“我的隐秘渴望”。我接连去了两次。第一次去时，几乎紧挨着舞台的第一排圈椅不知为什么全被一些将近中年的妇女占了，她们娴静文雅，不着“盛妆”。有一些青年士兵和大学生，有母亲带着少女，还有些少年学生，显然是家长带来的。在第二排圈椅中我看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②俊美的身影。人们回答我说，邓肯的所有演出他都来看，一场也没漏掉。我以为，这一点就意味深长，艺术剧院的奠基人当然知道该看什么；当然，这是一位思想深邃、品味很高的人。所有的观众显然是有头脑的、严肃的……

众所周知，所有的舞蹈均有音乐伴奏。第一晚的演出是在——至少一部分是在古代音乐的伴奏下进行的。舒缓的丝弦音乐是那么地美妙，令人耳目一新。手指弹拨着琴弦，于是音浪富有节奏地回荡在大厅里，立刻把人们带往了古代庙宇，带往了古代的民众会议，那里的人们穿着长衣衫和托加，发型别致，发

色黝黑，眼睛比我们黑，面孔比我们秀气，秀气得多。我一边遗憾地看着铺着灰色或淡绿色呢毯的舞台，一边想，他们怎么就没想到在什么地方放上些冒烟的祭品呢?这无须很多，但会给音乐增色不少，也是音乐所要求的!……这第一个晚上的“古典音乐”比第二晚的“现代音乐”更令我喜欢。第二个晚上演奏的是贝多芬③和肖邦④的乐曲，虽然也同样是用古典舞蹈来形象表达的。

现在邓肯上台了。舞蹈者总是踩着芭蕾的舞步——一般都是这样的——从幕后迅疾地跳着舞出来，在舞台上来回不断地跳啊跳啊。这真令人乏味、单调，似乎本身并没什么意义。邓肯是从舞台深处的边上出现的，几乎紧挨着后面的悬幕走了很长时间，流露出一种谦虚、可爱的东西，不想夺人耳目，不急于兀现在观众面前。同时音乐仍在继续。这时，就在这个地方以这种节奏“开始”了一切，艾谢多拉·邓肯舞了起来。

这可不是“舞蹈”!有着最深刻的差别!!在舞会和芭蕾舞中，在我们到处可见的舞蹈中，主要的和几乎全部的东西都归于双腿。“舞蹈”是一种“双腿的练习”，是腿与“足”运动的抒情——这是公理，但这看来只是当代的，而邓肯也是以古典舞蹈的重现来表达这一点。我们的一切都属于腿与“足”，男子踏着节拍的鞋跟和芭蕾舞女演员踮起并旋转的脚尖。“芭蕾舞女演员”和“鞋尖”是不可分割的概念；没有这个“鞋尖”就难以想象芭蕾舞女演员，但如果去想象鞋尖，那真是什么也想不出：鞋尖就是鞋尖，没有更多的东西，无论向前或向后。接下去是普希金在《奥涅金》中描写的著名的伊斯托敏娜：

一会儿扭转身，一会儿舒展身躯，
一只脚快速地拍打着另一只脚。

这两行前面还有：

一只脚擦着地板，
另一只脚慢慢地旋转，——
突然一跳，突然腾飞，
像埃俄罗斯⑤口中落下的绒毛。

这是芭蕾，即至善至美的舞蹈的两个成分，舞会上的“平民百姓”是不会看不懂这种舞蹈的。一个成分是单腿旋转，这时芭蕾演员的一条腿同另一条腿形成直角，好像圆规的两只脚，而另一个成分是弯曲身躯，抬起一条腿形成直角后，从演员的后脑到抬起的足尖构成了一条水平线，它架在另一条直线，即站在地上的腿上……但是，我的天！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很难，可以同意这一点：大脚姆趾应该是一块骨头构成或变成了一块老茧。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表达了什么？这令人称奇，但美丽吗？对此都难以回答！观众对动作的难度、身体几乎不自然的弯曲表示出惊讶，因为身体自身从不会做出这种姿式，芭蕾演员自己也不会做出这种姿式，她一个人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决不会这样跳舞的！这都是跳给观众看的，为了吸引人，为了使人惊讶。这是极不自然的舞蹈，确切地说，在这种舞蹈里自然已经忘却了自身，所以才会令人惊奇！这个芭蕾，它不自然的清心寡欲，同时又像所有的清心寡欲一样富有感情，因为芭蕾演员踮起脚尖把那条抬至腰部甚至更高的大腿旋转给观众看。这能意味着什么？从舞蹈艺术上来讲，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但观众看到的只是半梦半醒的自然女神把身体最神圣的部分旋转给观众看！无怪乎涅克拉索夫⑥曾就此写道：“拿起望远镜看吧。”虽然一切都蒙在蒙胧的细纱和透花纱中。

舞会的舞蹈是永恒的“舞步”。当男伴的一只手搂着女伴的腰部、而女伴的肘部搭在男伴靠近肩膀的手臂上时，大腿划出了美妙的花样。抱非抱，只是某种近似；是拥抱到一半嘎然而止，不再进一步。同时大腿在令人头晕眼花的“舞步”中移动。由手开始，由手结束，因为手看得见；由脚继续，因为脚看不见。一切都由音乐衬托，它甚至是舞蹈中唯一重要的。它为男伴和女伴代“言”，传递着他们的激动之情。但请注意：男伴和女伴身体的上半部分，即腰以上的部分，都是静止不动的；双手，胸部，脖子，头，整个躯干都纹丝不动，仿佛麻木了一般，而脸部则经常是茫然的，无精打彩，没有表情；全部的精力都用于腰部以下，那里有大幅而急骤的运动……一切都得到了女伴必穿的袒胸露背的衣服的烘托，这是对躯体和身段上令人激动、能引发强烈的情欲和肉感的部分欲擒故纵般的遮掩。总而言之，一切都富有刺激，意犹未尽，未中止的欲望虽不太肆意，但也满怀希望……但不能说这希望是纯洁的。

一切都是“真正的基督教式的愉快”，包括舞蹈，包括芭蕾！……天哪，又能怎样呢？这可是整个文明、几世纪的生活方式和风气、细腻化的个人隐秘的品味和提高了的品味所塑造的！“手这样放”，“胸部一定要袒露”，“要戴手套，最好长及肘部”；手臂肉感的部份，即从肘部到肩部并包括肩部，坚挺着的细嫩白净的脖子——这一切都应裸露，这一切都应让男士一览无余。男伴应被勾搭着，以使女伴能看见他富有弹性的苗条身材，因为女士对男士的身材比对其面孔更敏感。对面孔她只是认识而已，尔后是对紧绷着的结实强壮而又威严的身材进行感知。这是紧裹着的燕尾服、常礼服和礼服，没有任何那些装饰性的皱褶……

欧洲人身穿燕尾服。

而古代人穿着不露身材的托加！

*　　　*　　　*

这时邓肯光着脚走了出来。她很漂亮。她在肖像画上容貌姣好，很有点“古典美”，而其本人是聪明而有教养的典型的英国人、美国人——具有萨克森的血统，但由此怎么会有古典的特征呢？不，一张普通的德国人的脸，没有任何古典线条，头发优雅地披散着，像古希腊人那么纯朴、美丽。当头发略微被风吹散时，也很美丽，跟花瓶或硬币上的头像简直一模一样。脚实际上是光着的，半透明的长衬衫是灰色或淡黄色的，确切地说，是一种脏兮兮的颜色或烟灰色，它使膝部以下的小腿甚至在不移动时都暴露无遗。这是双骨结粗大、干瘦但结实的腿，皮肤既不好看，也不细嫩，甚至根本不白净。她为什么没有往大腿上抹白粉或涂白？化妆的手段可是无穷无尽的，但实际上她什么也没有往腿上抹；脸不好看，腿也根本不好看：是欧洲人和法国人以古代艺术挣钱的腿。胸部……邓肯穿的是阿耳忒弥斯⑦狩猎时所穿的众所周知的长衬衫，是一种长及膝盖的男衬衫，中间扎着皮带，衬衫在腰部上面分成了两半，紧裹住两侧腰部、胸部和背部的一部分，这两块大三角形的布实际上使三分之一的背部和胸部完全裸露在外。长衬衫料子很轻薄，是用细麻纱布或其他这类布料做的，但由于在腰部这里是折成褶子系着的，因而所形成的皱折把腰部和臀部（但只及臀部上边）遮得较为严实，毫不透明。但是，被遮得看不清的只是躯干，即身体的整个腹部和骨盆部分，同时，这种遮掩也是漫不经心的：阿耳忒弥斯的衬衫自然是下摆宽，而且从上到下都很宽大，于是其结果自然是这样：帮助阿耳忒弥斯漏夜狩猎的狗以及小剧院里的观众什么都看不到。但在躯干和臀部以下，在不动的时候透过长衫是能看见整条腿、甚至下腹部的，使人能看见美妙的人体、世界上最优美的体形的全部的美！就是菲拉列特⑧对此也不会持有异议：人是“世上万物中最美丽

的”。邓肯说:“嗨,看看我,这就是人!”

她很谦虚,虽然一双腿不太漂亮,而且未施粉黛,但她很美!如果她略施粉黛,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向她吼道:“您说人本身是美的,而您自己却揸上了面粉!”大家都会弃她而去。但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贪婪地看“人”“而已”。

我没有立刻发现,但当我注意时,我惊讶地看到,她随意披挂的衬衫在右边和左边的乳房外形成了一个小口袋似的东西,或者说,小口袋又“自然而然”地在阿耳忒弥斯小巧的处女乳房外形成了。同时由于她是在森林里奔跑,如入无人之境,所以她自然不会想到有人会看见她的整个胸脯,整个轮廓以及透过长衫隐约可见的深色乳头。当她慢慢移动时,这两个深色乳头在衬衫里微微地颤动。“嗨,整个人体!”我在包厢里惊叹道。无论芭蕾女演员、戏剧女演员以及女歌手展示什么,无论她们想使人感受什么,她们从不会、无论如何不会暴露这一点——乳头!对此都是心照不宣的。或许这样做不雅观——很难有另外的解释。因为逾越了任何羞耻感之后就不再会有“羞耻感”!我不会解释、也不知如何解释心理学的这条法则和原理。因为给婴儿哺乳的器官就像哺乳行为本身一样,当然不可能那么神圣、洁净,这甚至就是哺乳。为什么要引以为耻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女人自己都认为它不美观,大概认为它讨厌,过于生理化。但阿耳忒弥斯不会有这种怪诞的想法。邓肯不露也不藏。对自己不美的双腿和不美的处女乳头都未刻意掩饰。

她的胸脯既不丰满,也不漂亮。但也不是不漂亮,就是像普通姑娘一样。

在舞蹈过程中她一次也没用手去提裙子。有几个舞蹈她只是穿着长衬衫跳的,另外几个她是穿着波普罗斯跳的。这是一种长及地板、非常宽大的衣服,当然,也薄如蝉翼。像古代人一样,

一切都源于酷热难熬的气候。那时由于烈日炎炎，是不可能加厚织物的。就这样，她一次也没用手去摸过衣褶，也没有拉展和提起衣服。这种对"连衣裙边的"以及更通常的对"裙边"的"手痒"她一次也没表现过，而这是当代妇女在日常生活里、舞台上以及各种场合里都特有的。连衣裙之于她就像搭在椅背上一样——纹丝不动，毫不引人注目。她没感觉到身上有连衣裙，而且她心理上也不存在任何衣服：她同衣服毫无关系，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罢，对衣服"不感兴趣"，也没在衣服上加过工。不过，希腊毕竟不是非洲：清晨，尤其在山区和森林里，还是有阵阵寒意的；她披上了一件衣服或类似衣服的东西，碎布片或一块布；当寒冷的感觉消失后，就根本不在乎身上是否有衣物，又像没穿衣服那样活动起来。

这时，太阳冉冉升起来了，古代的赫利俄斯⑨（舞台前角的装饰灯光芒四射）……这使她兴奋至及，开始迎着阳光翩翩起舞，仿佛用双手在捕捉或用双腿在弹拨光束；仿佛想把光束搂于怀中。"我爱你，太阳。我吞食你的光线——这是我生命的源泉。"她有些生理化的心理模糊不清，一厢情愿的舞姿仿佛在祈祷，古代起源于迦勒底人的关于"有个姑娘曾受孕于太阳"的信仰是可以理解的。古代人就是为此登上了七层高的庙顶，在那里过夜并迎接日出。邓肯长衬衫上不长的布条迎风飘舞起来，她正是用双腿在搂抱光束，微微地弯曲，高高地抬起，几乎超过了腹部。一切都变得粗犷有力、精力充沛——非常漂亮的大腿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直到臀部。嗨，森林就是森林，巴比伦的迦勒底女人是不讲究礼仪的，赫利孔山⑩上的古希腊女人也是这样，但没有一点"故意"的东西，一切都是因太阳而发……这个既不施粉黛、又不穿紧身衣裤的女人的舞蹈毫无蓄意、预谋之嫌，整个人体像姑娘独浴或没有观众时那般纯真无邪，虽然同时又有点性感。"是怎

样,就该怎样。"但这只是一个舞蹈,是面对着奥罗拉[11]或古希腊人的"金色卷发的厄俄斯"[12]的晨舞;而其他的舞蹈则不性感。

它们表达了什么?"植物生长着,长大了。"姑娘生长着,也长大了。整个民族也生长着,就像他们的香桃树,像那时的柏树和油橄榄树一样。而这个成长和成长的感觉本身是极其幸福的,生理上令人心旷神怡的。须知,呼吸一口清晨的空气完全要比欣赏拉斐尔[13]的油画更美妙。有一种不亚于精神惬意的生理舒服,尤其当这是第一个、最早来临时。然后是烟雾、冷战和炙烤。但最早呼吸到的是自然!这时你会旋转起来,一个人旋转,没有伴舞,也没有合唱。你跳舞并非是"学会了"跳舞,而是自己要跳舞,要发明舞蹈。邓肯表现的就是这些像清晨、食物和水一样"原始"的最初的舞蹈,但又像食物和水一样,"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起始于人的生理和自我感觉!但是,这个自我感觉的中心又在哪里呢?

现代舞蹈把这个中心放到了人体的下半部,或者说,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舞蹈的是小腿、大腿和臀部,虽然是经过掩饰的。但为什么要这样?生理上的幸福感同时也发生在大脑里和心理上。幸福的时候会"昂首挺胸",听到好消息时会"击节鼓掌",目光炯炯,但眼睛也能表达恐惧、忧伤和愤怒。所有的表情、所有的感觉都发生在人体的上半部。与此相应,如同我们在无数古代花瓶上的遗画、古代石棺上的浮雕和古代硬币的图案上看到的一样,古代舞蹈更多用手、颈、头、胸等,而不是用腿来舞蹈,即靠人的上半部,而不是下半部;双腿不过是移动这个舞蹈着的身体而已,几乎是像轮子在移动演员一样,不会有更大的差别。因此在邓肯的舞蹈中完全没有我们的"舞步"——这种包容一切的"舞步"。随着音乐和节拍翩翩起舞的不是邓肯的双腿,而是整个邓肯;最与音乐合拍的是她乐感敏锐的身躯,由腰到头的线条。肩、

胸、脖子——脖子的动作很多——和头在轻盈地前俯后仰，舞蹈的就是这些部分。舞蹈的是人的精神，是古希腊的灵魂。像现代舞蹈中双腿片刻不得安宁——腿足片刻不停地运动——一样，邓肯的双手也片刻不停地运动着：它们始终在优雅地运动，始终在做着姿式，舞蹈的正是它们，主要是它们！只是当姑娘的自我感觉变成了兴奋的冲动时，她才像在草地上或森林里一样野性而又纯真无邪地踢抬双腿，充分地暴露双腿，但这也完全是纯真无邪的！这是优雅而大方的。舞蹈着的是人性——不是堕落、混沌的人性。

狄安娜[14]身边的扁角鹿就是这样跳跃的。邓肯也是这样迎着太阳起舞的。她裸露的大腿和隐现在透花纱里的乳头于此有何相碍？这就像从山上滑下的冰块一样，不会使人难堪和激动，不会使人入迷或厌恶。这是永恒和自然。

"感谢上帝创造了人。"你会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仅此而已。别无其他。

*　　　*　　　*

作为老教师，我现在有个想法，应该把所有的学生都领到这里来，然后把邓肯的舞蹈作为课堂内容加以讲解。如果不展示一点古代世界，如何能讲解它？这是不明智的，"按德国人的说法"，是愚蠢的。邓肯以幸福的思维、幸福的感悟、显然是多年的呕心沥血的研究以及"英国人式"的执著练习使古代生活的"焦点"——她的这个舞蹈得以问世。在她的舞蹈中反映的是整个人，是整个文明的生活气息，是文明的造型艺术、音乐、线条、心理以及一切！一经展示，就令人不由地赞叹。她通过眼睛，通过"经验"，以"真正英国人的品味"和"英国方式"所做的事情胜似一百个昆奈尔，比所有的托尔斯泰、列昂契耶夫和卡特科夫更有力地推动了"古典教育"的事业，因为读柳普科尔《古典词典》里

的古代舞蹈和看舞台上的舞蹈是有天壤之别的。哪怕这舞台是被帷幕遮掩着的，有多余的东西妨碍观看，但舞台上毕竟有古希腊的姑娘、宙斯[15]和阿耳忒弥斯的崇拜者。她一会儿弯弓射箭，一会儿骑马作战，一会儿又以难以言传的婀娜舞姿在草地上嬉戏。

这高高举起的美丽双手在摹仿着吹奏或弹奏(很遗憾，可能是我弄错了，邓肯在摹仿演奏一种实际上没有的乐器)，这双手在空中击打着节拍，还有那像扁角鹿鹿茸弯曲的细长强健的脖颈(这是邓肯唯一美丽的部位)……真想对所有这一切致以古典式的深深鞠躬。

毫不混沌——一切是这么的透彻！

毫无罪孽——一切是这么的贞洁！

这就是邓肯和她所做的事业！

她的个性和流派在当代文明的思想斗争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她正出现在可以称之为伟大革命的时代。这场由中国波及比利牛斯山脉的革命的实质在于整个旧世界的大灭亡，新世界的大诞生。

当各民族、各类人物和各种文学流派在指路明星——回归本性，回归自然——的引导下跳着大型圆圈舞时，这个勇敢的姑娘的娇小身材虽不引人注目，但却是不可或缺的。

1909 年

译 注

① I. 邓肯(1878－1927) 美国女舞蹈家，现代舞奠基人之一。

② K.C.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 俄罗斯著名戏剧家。

③ L. 贝多芬(1770－1827) 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④ F.F.肖邦(1810—1849)　波兰作曲家、钢琴家。

⑤ 埃俄罗斯,希腊神话中的风神。

⑥ H.A.涅克拉索夫(1821—1877)　俄罗斯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

⑦ 阿耳忒弥斯,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

⑧ 菲拉列特(1554—1633)　俄罗斯政治活动家,大主教,诺曼诺夫王朝第一个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的父亲。

⑨ 赫利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⑩ 赫利孔山,希腊神话中缪斯所居住的地方。

⑪ 奥罗拉,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厄俄斯。

⑫ 厄俄斯,希腊神话中的黎明女神,曙光女神。

⑬ S.拉斐尔(1483—1520)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建筑师。

⑭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

⑮ 宙斯　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果戈理及其对戏剧的作用

作为叙述的文学和作为抒发胸臆的文学是与展现场景和景观的戏剧截然不同的。这就是小说和诗歌从古至今占据着文学几乎所有的地盘并只给戏剧留下一小块空间的原因。戏剧只是旁通于文学，但它极为独立，自成一体。它亦旁通于音乐和绘画，由于戏剧是场景，因此它是图景或在某些地方是图景；舞台上的某些动作和演出中某些热情奔放的地方需求诸音乐并在音乐的伴奏下臻至完善。戏剧演出中甚至有一种类型，即芭蕾，只是由音乐和绘画所组成，由一系列音乐片断和随之变换的无声图景所组成。我们讲这些话的目的是想请读者记住这一原理：戏剧是完全独立的整体，有自己的精神，有自身的内在规律，而不是文学的一个部类，不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形式之一。遗憾的是，戏剧的完全独立作用远未得到承认，大部分文学作家视之为自己创作的次要领域，把它当作休闲之地、自我炫耀的舞台和玩笑、娱乐的消遣之所。我们把现实情况故作夸张，旨在更鲜明地强调实际存在的状况。如果把我们的抱怨和指责加以缩小，就可以得出完整的现实情况。

像莎士比亚、莫里哀或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的人纯属例外，他们是完全的戏剧人，确切地说，他们只是旁通于文学。但托尔斯泰的《教育的果实》、《愚昧的统治》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相比意味着什么？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对于他的《死魂灵》以及普希金的《波利斯·戈冬诺夫》对于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及诗歌意味着什么？无论这些戏剧作品多么优美辉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上述诗人和艺术家们的消遣之作。

果戈理的休闲之作，或确切地说，放在次要地方的财富除了《钦差大臣》外，还有一些更小的剧作：《争讼》，《婚姻》，《赌徒》。确实，从时间顺序上来讲它们早于《死魂灵》，但实际上这就是《死魂灵》，不过被搬上了戏台罢了。同样的场景，同样的风景主题，同样描绘的情节——拿《死魂灵》同《钦差大臣》相比或拿《钦差大臣》同《死魂灵》相比，都没有任何新意。

因此我们可以说，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其他戏剧是最初的轮廓，是这位伟大的作家的试验画稿，他想借此试验自己的力量，并适应和酝酿长篇巨作《死魂灵》。《死魂灵》耗尽了整个果戈理，表达了全部的果戈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使《钦差大臣》沦为习作，就像果戈理的朋友、画家伊凡诺夫[①]一样，画了大量的习作来酝酿《基督现世》。这一切都是"预备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勾勒了主要的、最后的画稿。但在审视这些习作时我们发现，有些习作在画家瞬间迸发的灵感作用下画得令人瞠目，极为成功，比他最后大作的相应部分还要高出一筹。对于研究伊凡诺夫的艺术个性的人来说，这就是这些习作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这里也蕴藏着它们对于观众和对于俄罗斯绘画史的某种"绝对价值"。

《钦差大臣》同《死魂灵》的关系与此一模一样。

这里描写的是和《死魂灵》中一样愚昧，确切地说，肮脏、混

乱和破败的俄罗斯偏僻地区……充满昏庸、愚昧及舞弊行为的一道“生活缝隙”为艺术家浮想联翩的恢宏想象提供了一系列首先是可笑、有趣的场景——展示了接二连三、难以言传的冷嘲热讽。这就是整个剧本的基本实质，也是后来重复于《死魂灵》中的实质。但是在文学以及整个艺术中，天才不是反映在主题中，而是反映在创作中，不是表现在“一般”中，而是体现在“细节”里，不是表现为作者所描绘的东西，而是体现在作者如何描绘的方法中。

在这方面，果戈理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伟大技艺是无止境的。德国一位著名的批评家写道，《死魂灵》的前几章堪与古希腊的最佳作品媲美，即他的乞乞科夫、彼特鲁什卡、玛尼洛夫、萨巴基耶维奇和普柳什金像古希腊天才普拉克西特利②和菲狄③在宙斯、阿波罗④、帕拉斯⑤、阿佛洛狄忒诸雕像中所展示的人物一样是永恒的，但这些是人类中的卑劣人物，而那些是夸大了的和理想化了的人性典范。果戈理和古希腊人拥有同样的技法、艺术和同等程度的魔力，而这技法的魔力充分地展现在《钦差大臣》之中。赫列斯塔科夫、邮政局长、开场人物奥斯普以及那个时代、那个小城里的所有官吏被如此惊人的技法展现在俄罗斯戏剧、俄罗斯观众以及后代的面前，就像索福科⑥用俄狄浦斯⑦、安提戈涅⑧、克瑞翁⑨等为整个人类表现的古希腊人及其生活方式一样永恒、典型。此外，果戈理还创立了流派，创造了舞台运动。如果我们对普希金的《波利斯·戈冬诺夫》、《寂寞的骑士》以及《莫扎特和萨尔耶莉》记忆犹新的话，就会感到，俄罗斯后来的戏剧运动是由果戈理传承的，而不是普希金。不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全部戏剧，就是托尔斯泰的《教育的果实》和《愚昧的统治》也依附于《钦差大臣》，他们所表达的东西与果戈理所表

达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和果戈理一样从同一角度来观察、讽刺和担忧俄罗斯生活中的肮脏与黑暗。

相对其他许多品质而言，果戈理征服读者的力量来源于他对俄语出神入化的感觉。没人能像他这样了解俄语，感受到它的精神和形式。可以说，他把俄罗斯人物看成了俄语的形式，似乎这是披着词语和话语面纱的人。他能准确地辨听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言语；对词的理解之深，只须根据语音的微小颤动就可对人物的个性、个人或人们的性格和生活做出结论。他把这种语言知识也运用到了他的伟大喜剧之中。菲狄的价值不在于他刻划的正是宙斯，即不在于主题，而完全取决于是怎样用刻刀和锤子雕琢大理石，怎样勾勒一根又一根的线条，果戈理也是这样，《钦差大臣》令人惊讶的方面是语言的造诣，是赫列斯塔科夫或斯克沃兹尼克-德姆汗诺夫斯基的谈吐及其语调。剧本中几乎没有场景和过场，如果有的话，它们实质上是很愚蠢的。那种技术上称之为复杂情节或故事情节的东西几乎没有，或它们本身一文不值。一切都在于人物和造型艺术上。果戈理为我国的戏剧开创了造型的喜剧，但这里造型的材料是语言，而不是大理石。因此他的剧本最终可以说是一幅画。他正是在这个方面属于戏剧，即由于戏剧旁通于绘画，它是最缜密意义上的场景。

这样，他把俄罗斯戏剧推上了题材和表现日常生活的道路。在这方面，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他的伟大之所在。但到这里他又适可而止了。题材和日常生活永远只是伟大的戏剧技艺的章节之一，而不是戏剧艺术的整部书。就莎士比亚及其《哈姆雷特》而言，这已不是题材，这已不是日常生活。这是思想和舞台上的一种永恒的训诫，这是不能忘记的。

奥斯普在《钦差大臣》里话讲得多吗？就一段独白。

"绳子……拿条绳子来。绳子能用上……"

这个饥肠辘辘的仆人在饥肠辘辘的老爷身边就是这样说的。于是整个俄罗斯都记住了这条“绳子”。这就是语言的造诣所在。奥斯普讲了一段空洞无物的话，但他说成了这样，仿佛他说的话的精粹和精神是这样的，使几乎所有看过《钦差大臣》的人都清楚地记住了奥斯普，胜过了他们所了解和所记住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许多喜剧中的人物。这是完美的模压，这里的一切属于形式，而非内容，因为内容中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果戈理用菲狄的技法雕刻一个历史小片段中一个小城中的几只小虫，这些青铜的小人物可以全部收入掌心。擅写鸿篇巨作、但才学更疏浅的作家们会、并且永远会惊讶和羡慕地翻来覆去地端详它们。

“拿绳子来……”

这样，在这句话中刻划出了整个人及其饥寒交迫、居无定所的全部生活，正是居无定所的生活，这取决于老爷行踪不定的习惯。果戈理就是这样擅长于用一句话来刻划一个完整的人。向这个才华惊世的艺术家致敬！向他的天才致敬！因为他用不朽的喜剧装点了我们的戏剧。就算这只是《死魂灵》的初稿吧……果戈理没有全身心地投入戏剧，戏剧也不会依赖他。戏剧只能依靠那些全副身心并且终生投入戏剧的人，就像英国戏剧与莎士比亚完全融为一体一样。奥斯特洛夫斯基时代在俄罗斯戏剧历史上也是这样。果戈理献上的只是一朵花……戏剧感激地收下了这朵花。但是它懂得，这是比任何舞台作品更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首先是绘画，而不是场景。而戏剧没有场景等于身体没有灵魂。戏剧不能不寻找自己的这个灵魂，不能不了解它，不能不希望找到它。但我们的戏剧暂时远未找到自己的灵魂，它还在竭尽全力、忐忑不安并望眼欲穿地在寻找——不能对这个现实视而不见。

戏剧的使命不仅在于造型和讽刺，它还能教诲和感动人。它能唤发人的理想、人与人之间更理智、更高尚的态度和人与人之间更友好的关系。戏剧是强大有力的；它能在五分钟内使观众激动起来，而有时甚至一本书都不能使读者受感动。这是由于戏台上的一切都是摸得着的，一切都是看得见的。它不是用推论，而是用事实来使人相信。不利用这个强有力的道德杠杆是不行的。戏剧应在果戈理之后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它不仅仅是上演剧目，刻划事件，它应能在社会中促成新的思想，使社会中涌动的民情变得紧张而炽热。如果学生们不能超越自己老师，只是在老师的地方原地踏步，那么作为戏剧界伟大导师之一的果戈理是不会"感谢"他们的。果戈理洞察一切的智慧对此不会赞赏的。他在莫斯科达尼洛夫斯基修道院黑暗的坟墓里祝福我们走向新的困难而漫长的道路。

1909 年

译　注

① A. A. 伊凡诺夫(1806—1858)　俄罗斯画家。

② 普拉克西特利(约公元前 390—约前 330)　古希腊著名雕塑家，在女性人体的雕塑上造诣很深。

③ 菲狄(公元前四世纪初—约前 432/431)　古希腊雕塑家。

④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⑤ 帕拉斯，希腊神话中特里同的女儿，被雅典娜在无意中杀死。

⑥ 索福科(公元前 495—前 406)　古希腊历史上第二个悲剧作家。

⑦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因杀父娶母而刺瞎自己的双眼，流浪而死。

⑧ 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女儿。

⑨ 克瑞翁，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伊俄卡斯忒的兄弟。

保罗·特鲁别茨科伊[1]及其亚历山大三世[2]纪念像

在画家桌子上堆得乱七八糟的绘画用品中我看到了一幅不大的、绘在硬纸板上的画稿，画的是一位强壮的骑士，他骑在一匹极丑陋的马上，脸部轮廓看起来很眼熟。我记得，这大约是在1901年或1902年，是在佳吉列夫[3]的《艺术世界》编辑部里。

“这是什么？”我惊讶地问道。

“是亚历山大三世纪念像的画稿。”

“纪念像的画稿？……流芳百世？……沙皇统治的主要思想？！”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画稿。

“您喜欢吗？”佳吉列夫问道，他是个笑容满面、聪明含蓄、善于察颜观色的年青人。“但画得很不成样子，虽然我也喜欢，但是非议很多！……怎么能为帝王竖这种纪念像？！作者是巴维尔（他还说了父称，但我忘了）·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自称保罗·特鲁别茨科伊。我见过他：极有独创性，很有天才，但书读得很少。想想看，他连托尔斯泰的书都没读

过。”

“没读过托尔斯泰?!”

“当他去托尔斯泰在雅斯那亚·波梁那的住处时,托尔斯泰为了教育他,以自己的作品相赠。但他却在临走时忘了拿了。”

这在我看来是讽刺和夸张。怎能忘了托尔斯泰亲手赠予的礼物呢?这是一种做作,是一种精神卖弄。

于是我又重新拿起画稿,更不忍释手了:

“这画得多好啊,多好啊!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从1881年到1894年的整个俄罗斯都在这里面,夙愿和笨拙的理想,政治和舆论上的‘驾’、‘吁’,其时我也曾努力过……是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有多么多!!!天哪,这多么真实!这多么准确!这里有格林姆特,有主管新闻事务的М.П.索洛维约夫,有Л.А.基霍米洛夫④,有接受老信徒派教徒莫洛佐夫资助的没有读者、只有亏损的《俄罗斯观察》。流了多少汗水……一晃到了1902年,只是现在回首才能看得清这一切往事……”

“……像纪念像吗?”

“我不懂行,但在这些年代我也在竭尽全力地工作,但现在一看到这个,一看到这匹秃尾的马——一定是秃尾的!——就要哭,就要发怒,就要‘由衷地’深情大笑……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在这匹马里,在这个骑士里,在纪念像里!……真令人叫绝!”

“我很欣赏您的印象,因为我也极喜欢保罗·特鲁别茨科伊。我认为他是极有才华的人。但遗憾的是,我应使您失望:您的想法可能是错的,因为他不仅一直住在意大利,而且根本不过问政治,您对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事很关心,但他在佛罗伦萨根本就无动于衷。他是个怪人,古怪的人,不读书的人。他是佛罗伦萨人。您虽然住在彼得堡,但看到过罗马,而他一生住在佛罗伦萨,没到过罗马,只是因为懒,还因为不感兴趣。简直令人难以相

信……”

我仍认为这是讽刺和做作：怎么不从佛罗伦萨去罗马？这位雕塑家的个性没有引起我的好感。

“我不懂行，但我十分喜欢纪念像。”

“特鲁别茨科伊本人对画稿也很满意。当时我对他恭维两句说：‘彼得堡将得到仅次于法尔康内特⑤的彼得大帝纪念像的另一座艺术纪念像的装点。’他斩钉截铁地打断我说：‘我希望做点比法尔康内特更好的东西’……”

佳吉列夫微笑着，他特有的微笑中总是混杂着温存、嘲讽和“小”聪明……

“但是，要知道，他没有说大话！在对待法尔康内特的这尊雕像上，在对待这奔驰向前的雄伟而壮丽的俄罗斯上……就像要去挪开这尊雕像……俄罗斯在彼得大帝后的二百年里失去了多少希望……巨大的，强大的，丑陋的，甚至乱七八糟的，还有被割去的马尾巴——这被割去的马尾巴是何等的重要！似乎这是克雷洛夫⑥寓言里某个动物被割去了尾巴，不，是老鼠咬去了活狗鱼的尾巴。难道俄罗斯就没被‘咬去尾巴’？尽管它有参政院、国务委员会、权力无限的法院、各种军队机关、退休和未退休的老人、海军部门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像老鼠一样。‘他们的名字是你，上帝啊’……特鲁别茨科伊什么也不读，这是对的，什么也不知道，这也是对的。但又意味着他不读书、不看报却能掌握事物的实质，就像狗凭‘气味的嗅觉’能知道空中飞过的鸟……特鲁别茨科伊不了解事实，不关心政治，不谈论时事，也不听人们对时事的议论；但这只是每天、每周、每月的‘树叶’，并不能妨碍他看见‘森林’……他不仔细地听和看，只根据俄罗斯人的外表、俄罗斯人的体型、俄罗斯人的脸色和谈吐，就像狗凭‘气味的嗅觉’一样，就能了解那个国度，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历史发展，

可能产生和正在产生的幸福与灾难、希望与绝望，正是这些东西把一些俄罗斯人逐出了国境，从而使他有幸见到！我不认为他在这里表达了俄罗斯，如果您向我解释被割断或被咬断的尾巴或从他的劣马身上夺去的尾巴……要知道，这是纪念像！天哪，谁知道纪念像常常是雄伟的，谁知道'建造纪念碑'和'建造雄伟'是同义语？有什么能激励他，赋予他的手以灵感来刻划线条……如此可怜、忧伤的线条，但又是多么地优美！我同意，这位艺术家没有刻意做什么，如果特鲁别茨科伊否定我现在的想法，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但艺术家的手比他的头脑懂得更多，就像狗只要一个鼻子就可以拥有狗本身所没有的动物学的大量信息。真正的艺术就像真正的诗歌一样，就其事物本质的深度来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真正哲学，是薄雾一片，是电，但它会产生强烈的闪电和耀眼的光芒，透射和彻底照亮物体。特鲁别茨科伊毕竟还是看到了俄罗斯的一隅。他一半血统是意大利人，佛罗伦萨人，从事但丁[7]塑像的雕塑，看见过佛罗伦萨的晴空，根据俄罗斯人的体型以及外表就可感觉到这些人来自哪个饱受蹂躏、严酷、危险和狡诈的国家，他们是饥寒交迫、备受压制的艺术至上主义者，是专写忧郁诗歌的诗人，他们无所不能，却又一无所有……我不懂行，但他在纪念像里令人吃惊地表达了所有的事实……法尔康内特的纪念像对我来说是歌剧，是表现未知现实的童话剧，而特鲁别茨科伊的纪念像是如此亲切，是'我的'、'我们的'、'全俄罗斯的'，令人欲哭欲笑，就像我看着这尊纪念像时想笑又欲哭无泪一样！……"

实际上我看到的只是一块纸板。从这时起，在作者许可和适当的范围内，我成了特鲁别茨科伊的崇拜者，无论在哪里看到他的作品展览海报，就会赶去看。

他为但丁创作的纪念像很雄伟。И. E. 列宾[8]曾经问他："您

是如何创作的?您研究过《神的喜剧》吗?”他表情厌恶地回答说:“嗯,我会读这个令人乏味的东西的。”列宾是笑着向我讲述这件事的。对不起,如果他能把但丁表达成这样,仿佛他一生只研究但丁,满脑子只有但丁,那么,作为“不谙也不问政治”的他为什么不能——不带任何倾向和任何意图——在亚历山大三世的纪念像上,确切地说,在整个沙皇统治历史的纪念像上,反映这种统治的实质甚至我国二百年历史的“总结”?!!他只是作为诗人、艺术家和有先见之明的人反映了“真理”,不加注解,事先也未作学术准备;只是你们在看到了这个“真理”后被它的真实和深刻所震撼,并想对它作长篇累牍的注解。他是无意识地反映,我们却是有意识地悟到了这一点。但我回过来再谈谈但丁的纪念像:雕刻精细,风格独特(在这方面同亚历山大三世的纪念像相反!),就像整个18世纪一样独特和严谨,侧面洗炼凝重,整体在振奋向上!当我在佛罗伦萨参观别人为但丁树立的纪念像时,我想起了特鲁别茨科伊的这件杰作。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选择,怎样理解这尊纪念像所表现的意大利人的艺术耻辱?这可是为古罗马之后现在意大利历史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所树立的纪念像。我现在仍感到惊讶,我只是在想,莫非我看到的只是已经决定拆除并准备让特鲁别茨科伊重新设计的但丁纪念像?这样就清楚了。但丁是多么地孤独,不仅他的精神是孤独的,而且他在他的时代里也很孤独、忧郁,回避一切——特鲁别茨科伊在但丁的纪念雕像中就是这样极力地、令人叹为观止地渲染了这种自命清高的孤独。天哪,这表达得多么好,多么准确!特鲁别茨科伊身上散发的正是产生哥特式艺术的灵感:须知,在他的但丁纪念像上没有一处是尖突的,没有一个锐角,就是说,看起来是脱离了哥特式艺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实则更哥特式,具有哥特式艺术的灵魂!!这是以侧面的压缩和同比例地缩小基座的高度来

表达的。看着它会不禁入迷并感到这就是哥特式艺术的真谛。同样，基座的高度与其说从视觉上，不如说从想象上——通过基座下这一片平静浩淼的湖面——表达的，因为在这个湖里堕落的灵魂遭到了灭顶之灾。这一切是多么的准确，仿佛没有任何东西被这位“老是丢三落四”、“漫不经心”的艺术家所遗忘……

如果把如此独特、优雅的但丁纪念像移到亚历山大三世纪念像跟前，从它们无法比拟的巨大差别中可以看到，特鲁别茨科伊的才华是多么的包罗万象，用钟表匠的术语来说，他的“摆幅”是多么的巨大。现在谈谈这座我一周前实地看到的纪念像。它的台座使它丑陋难看：粉红色的大理石，而且是“高雅的粉红色”，像一个卖给贵夫人的铮亮、洁净的精美糖果盒，而在这上面耸立的是“祖国俄罗斯及其沙皇”。

马两脚蹬着地……头倔犟而又愚蠢，鬃毛略微直立。马不知道要被赶向哪里，它哪儿也不想去。马是可怕的自由主义者：头既不向后，也不向前，更不转向侧面。“让我改革，否则我寸步不移”——“才不让你改革呢！”……马痛苦万分：马嚼子可怕地撑开了马嘴，下颚同脖子几成直角。这是全世界任何纪念像中都前所未有的东西。请解释这试试看！但这是特维尔市的罗季切夫[9]和彼特伦克维奇[10]，不是哪个聪明的罗季切夫，而是那个总是嘟囔着“把所有人都关起来！”的罗季切夫。我说马的头“像我们所有人”，“像俄罗斯”，“像我们知识分子”，桀傲不驯而又才学疏浅。“放我走！”但尾巴又没有，这个聪明人咬断了尾巴。在尾巴——确切地说，“缺少的尾巴”——和面目狰狞、呲牙咧嘴的头之间是庞大的身躯，它那肥硕的腰肚和大蹄子是任何马都没有的，而特鲁别茨科伊……刻划的显然不是马，而鬼知道是什么？“灵感”，无意识！……要的就是这样：嗨，俄罗斯算什么马，是猪，不是马。是肥硕的“怪物”，特列基雅科夫斯基[11]曾这样说过，而

拉吉舍夫[12]则把这句话写进了《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我完全同意。特鲁别茨科伊没听说过什么拉吉舍夫，但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鸡舍、饥荒和愚昧仍同拉吉舍夫见到的时候一样；而特鲁别茨科伊扫视了一眼这所有的一切，虽未"读过但丁"，却如此准确和下意识地为皇帝的座下选择了"肥硕的怪物"，而不是马；臀部，主要是马的臀部有多大！你们注意到俄罗斯人的艺术品味了吗？注意到俄罗斯贵族的马车夫都不知为什么往长衣衫里塞进一个大枕头，使臀部变得奇形怪状吗？这是什么想法？请解释一下！或许是某种历史潮流，是"世界"品味之类的东西——"人靠臀部(应该粗俗点说)，而不靠头脑生活"——或许人们就是这样说明马车夫大臀部的主导潮流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不信任理智"，这是比马车夫特别的品味更广的东西，尽管这又令人惊讶地与之十分协调。甚至在这马的"臀部"中表现了宁可自焚也不愿使自己的名字落入花名册的分裂主义分子。特鲁别茨科伊当然看到过马车夫的大臀部，也感到惊讶，也曾听说活埋分裂主义分子，也曾听到过——虽然没有仔细听——俄罗斯自由主义者的争论，他把这一切都混合于自己伟大而无意识的幻想之中，结合于自己盲目的才华和智慧之中，并把倔犟的大红色的类似毛驴("像驴一样犟着不走")的头装在了半马半……的身上，天知道是什么，驴和马的混合种，还有牛的血缘……"不会跳舞"。是的，这种混合种是不会跳舞的；无论马嚼子如何往上提，"祖国俄罗斯"根本不会听谁的指挥或在音乐伴奏下起舞……彼得大帝已经"去世"，法尔康内特的纪念像只是实现不了的希望和幻影……

骑士说："没办法，哪里也去不了。都怪自由主义者，同他们在一起一事无成"……沙皇气度高贵，忧心忡忡和仿佛自省般的目光巧妙地表达了他在我记忆中的形象和"风格"，这被奇妙地

捕捉住并用青铜这样粗糙和僵硬的材料表现了出来。这是由于亚历山大三世的目光是他形象的艺术中心，或许，最能表达他的内心——在手势、动作以及脖子和胸脯的姿式中表现出来的“统一的内心”，以至于只要看着青铜雕像的这些部分，就会想起他的目光……我不擅言辞，但只要从尼古拉车站向这座纪念像看去，虽然会觉得脸部线条同沙皇本人难忘的面容不十分相像，略有不同，但“整个沙皇”却不同凡响地酷似曾经见到过的唯一的、不会混同于他人的身影，不仅身材相似，而且头部尤为相似，特别是目光……我以为，人的“目光”不单单由眼球组成，而是由整个身体形成的；因为当初次相遇的人走进房间时，我们看不清他眼睛的色泽，他的目光只是从这儿映入我们的眼帘。“目光”是“人如何看”，是看的方式和方法。特鲁别茨科伊使亚历山大三世像我们曾见到过的那样“看着”。

“毫无办法！走不了……”脚下的道路曲折而遥远。尼古拉车站是通往西伯利亚道路的起点。“许多各色人物都去过西伯利亚”——从彼得大帝时代的分裂主义分子到“十二月党人”等等……倔犟的马不会在马靴的踢刺和音乐的伴奏下起舞。在这个“肥硕的怪物”身上威武地坐着庞大的身躯，仪容高贵、忧郁，根本没想到必须制止谁或把谁驱赶到某个地方去，虽然“只须去某个地方”……在骑士善良、“美好的计划”和呲牙咧嘴的凶马之间有某种误解和不协调的地方。马显然不理解明显善良的骑士，认为他有“恶意”，想让它跳入大坑，摔下深渊。马愚钝得看不到骑士，可是却与他一路同行，这就是说，他并没有“恶意”，也不可能有恶意。但遍读经卷的老人不相信花名册不是由基督的敌人制定的；特维尔市的罗季切夫也什么都不信。另一方面，骑士看到马在嘶鸣，认为它是疯马，是危险的野马，即使不能骑它，它也应安然地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一切就这么停顿了，不再挪

步了……

在粉红色的精美糖果盒上！天知道这是什么！一年或二年后佳吉列夫又对我谈起特鲁别茨科伊，说接近皇室的人强制他“修改”，他不得不让步，为此他很苦恼。已故的弗拉季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对画稿很不满意，于是从细节上作了改动。骑士在悬崖前的缓坡上勒马要好得多。这使整个思想更为完善，这实际上表达了 1904 和 1905 年以前的“俄罗斯”和沙皇统治。当然，这一切都很好……像法尔康内特的雕像一样，只是风格不同，完全不同！

“一切开始得多么巧妙，但结束得多么笨拙。”历史学家在思考这两座雕像时会这样想。

“这是那个时代！”凡夫俗子在看到议会广场上的这座雕像时会这样说。

“这是现在！”当他看到新的雕像时又会这样想。

“沙皇脚上的靴子是我们军需部门做的。”那是当然了，不会是巴黎产的靴子，小靴子；但正是这样的靴子，大靴子，踏遍了俄罗斯。整个俄罗斯对我们是多么地亲切可爱，靴子也一样，甚至包括军需部门，我虽不曾在那里供职，但我的外曾祖父在那里工作过。那又怎样？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是天使。工于心计、善于撒谎的人在需要的时候也会讲述下流的轶事，也会唱唱忧郁的歌曲。让人们为威廉二世⑬建造雄伟的纪念像吧，但是但丁的纪念像就其细节部分而言是世界上唯一的——正是我们俄罗斯的纪念像。对它的诽谤者，不懂行的诽谤者，我们要用普希金回答恰达耶夫“精辟”言论的话来作答：“我们不需要另一个俄罗斯，不需要另一部历史。”

我们亲爱的母亲不够漂亮，苍老多病，衣着普通，但我们不会用任何人来取而代之。这就是一切。

1909 年

译 注

① П. П. 特鲁别茨科伊(1866—1938) 俄罗斯雕塑家,印象主义代表人物。

② 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 俄国沙皇(1881 年起)。

③ С. П. 佳吉列夫(1872—1929) 俄罗斯戏剧和艺术活动家。

④ Л. А. 基霍米洛夫(1852—1923) 俄罗斯政论家,革命民粹主义者。

⑤ Е. М. 法尔康内特(1716—1791) 法国雕塑家。1766—1778 年在俄国工作,在彼得堡创作了彼得大帝纪念像(《青铜骑士》)。

⑥ И. А. 克雷洛夫(1769—1844) 俄罗斯寓言家。

⑦ А. 但丁(1265—1321) 意大利诗人,意大利文学语言的缔造者。

⑧ И. Е. 列宾(1844—1930) 俄罗斯画家,巡回展览派成员。

⑨ Ф. И. 罗季切夫(1853—1932) 俄罗斯地方自治活动家、法学家,立宪民主党首领之一。

⑩ И. И. 彼特伦克维奇(1843—1928) 俄罗斯地方自治活动家,法学家。

⑪ В. К. 特列基雅科夫斯基(1703—1768) 俄罗斯诗人,语文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745—1759)。

⑫ А. Н. 拉吉舍夫(1749—1802) 俄罗斯革命思想家,作家。

⑬ 威廉二世(1859—1941) 德国皇帝兼普通士国王(1888—1918)。

关于“俄罗斯思想”……

T.阿尔多夫先生在《俄罗斯早晨》杂志中就俄罗斯的现状与未来发表了一些极有意义的文章……不仅仅是有意义，甚至是激动人心。作者从转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少年》中的一个片断开始：某个克拉夫特饮弹自杀了，他是个完全俄国化的德国人，年纪很轻，大概是大学生。当人们了解到他为什么自杀时就开始说，死因似乎是这个克拉夫特最后一段时间一直不能释怀的想法：就是按照他早已成熟的观点，俄罗斯在历史上只能屈居“次席”，不承担任何世界性的使命，不能发挥任何世界性的作用。充满幻想的青年人非常热爱自己的第二个母亲，以致于不堪忍受这种悲伤的想法而自杀身亡。需要指出，对俄罗斯如此热爱的正是德国人，这种情况是常有所闻的！小说《少年》中的这个地方也曾使我像阿尔多夫先生那样大为震惊。通览一遍后，我又重读了在开头部分的这两三页。情节之所以能令人震惊，是因为克拉夫特这个人物并没有展开叙述，只在某一页里谈到了他“喝了许多茶”，或对某人说：“我会去您那里的。”这样，这张从侧面贴上小说的印刷文字极为类似人们在夜间放在你

们枕边的纸条，你们整个晚上都会梦见它……阿尔多夫先生极为精辟地指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但不是他的一贯思想，因为他还是支持“俄罗斯伟大使命”论的，但是……他内心“一隅”的思想，他把这个思想也塞入了读者内心的“角落”……

“简直令人发疯……或许，我们有关俄罗斯伟大使命的所有想法都是痴人说梦……这样的话，就是铅锤对太阳穴的一击……永恒的黑夜……因为对我来说，永恒的黑夜比对俄罗斯将无所作为的想法还能忍受些……而看起来，是无所作为了。”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魔鬼》中的话；是他真正的“恶梦”和“魔鬼”(《卡拉玛佐夫兄弟》)……是“自己的想法，但令人厌恶”，就像他在《魔鬼》中对我们解释说：“穿着灰色上衣、寄人篱下的先生”……“我的卑鄙的我，恨不得打死它，但又无力下手，它是超验的，它是永恒的。”克拉夫特为这个想法而自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他彻底相信这个想法，即彻底不相信“俄罗斯的未来”，那么不得不使自己的全部文学活动改头换面，谦卑温顺地去做 M. M. 斯塔秀列维奇[1]、斯帕索维奇[2]、格拉多夫斯基[3]和佩平[4]的“寄人篱下者”……

“嗨，费德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可说过，所有的事业都在西方，而俄罗斯不过是空地一块，可您却暴躁不安，因为这反映实际的真理而羞辱我们。散文总是比诗歌强。您非常喜欢诗歌，这是有害无益的，主要的是：它使真理黯然失色。”

于是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拉夫特呐喊道：

“不，宁可开枪自杀……宁可肝脑涂地，也不要这斯梅尔佳科夫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克拉夫特为之殉节的崇高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为崇高的人)就是促使斯梅尔佳科夫创作著名“言情歌

曲"的思想。"弹吉它"的人描述了这个仆人同未婚妻一起愁眉苦脸,一会儿"使她舒眉开怀",一会儿又用歌声使她入迷。"玛丽娅·伊凡诺芙娜,俄罗斯只有愚昧,俄罗斯需要被占领。法国人会来征服它的,那时我就可以在巴黎开理发店了。"

这就是传授给"寄人篱下的卑鄙小人"和《抽烟》中魔鬼的"克拉夫特思想"。这个魔鬼比所有穿着披风、发着萤光的魔鬼更可怕,这是唯一的、真正的魔鬼,啊,绝对真正的!

"我的卑鄙的我,但是超验的。"

"魔鬼在同上帝作战,而战场是人的心灵。"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不断地为自己的"上帝"助阵:

"您知道吗,只有一个代表上帝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当各个民族开始混淆他们的上帝时,上帝就消失了,因为任何民族都会在历史上确立自己,仅仅确立自己以及自己的上帝,否定和消灭其他所有的上帝和其他的民族……"

"不,萨托夫,"斯塔夫洛金纠正他说,他"以前的思想"是由平庸的朋友阐述的……"不,我现在不笑了:我以前说得更威严,更自豪,更绝对……您的'上帝'成了一种人民性的象征,成了它的幻想或'思想',成了它的'组成部分'……要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在他的面前所有的民族什么都不是,而这是他,永恒的上帝,选择了这个或那个民族作为子嗣来传宗接代"……所以你们所说的"俄罗斯民族代表上帝"的思想应该反过来理解:真正永恒的上帝因为我们恭顺、忍耐、没有地位和名气而选择了我们贫穷的民族,使之与自己联盟,他将靠这个民族使全世界顺从于自己的真理,而其真理正是恭顺、卑微、朴实、开朗和善良。

由此而产生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呐喊:

"顺从吧,高傲的人!"即"不要背叛自己的上帝,恭顺的上帝,他召唤你作为他的子嗣。"因为那时没有理想和上帝的帮助

我们就会完蛋。

还有——

温柔、寡言的塔吉扬娜的形象，她顺从于“自己的”命运。他把这个形象在普希金节日里抛给了所有的人。

这样，可以说，围绕着克拉夫特思想“跳舞”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他在《魔鬼》中围绕着自己“痛苦的思想”和“对整个生活的忧伤”跳舞一样……“等等，等等”，《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检察官”说：果戈理的“三驾马车”如此威风地疾驶而过，“所有的民族”都对它退避三舍，但如果把这“伟大史诗”中的主人公，如萨巴基耶维奇、乞乞科夫和诺兹德列夫塞进这辆马车，那将会怎样呢？……这样的“三驾马车”是走不远的……是的，要知道，“大概所有的民族在俄罗斯面前都退避三舍”，但都是出于厌恶，出于讨厌。人们早就在思考如何防范这个野蛮，防范这极端的罪恶，规避我们所有的弊病和恶劣行为……如何束缚和制服这“疯狂疾驶的三驾马车”，防止这疯狂的“崩溃”和“虚无主义”……

又是克拉夫特和斯梅尔佳科夫的思想……而“检察官”既不像克拉夫特，也不像斯梅尔佳科夫……“检察官”不过是个“正派的人”，有点法制感和义务感，同时又是讲求实际和头脑清醒的人，能看清周围发生的事情。他是小人物，并不聪明；但这不大的、在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义务感和法制感以及正派作风使他能为俄罗斯致……悼词……斯塔秀列维奇和佩平算不上天才，但他们很强大，不可战胜，这是因为他们总是在谈论“无法回避的很实际的小思想”——这时发生了奇怪的 qui pro quo[⑤]：“温顺的塔吉扬娜”的角色落到了斯塔秀列维奇和佩平的身上，这是一个在“乡村墓地”上谈论外省的陈腐真理的平庸而不惹人注目的角色：1）不能欺侮农民，更不能欺侮孤儿；2）要建更多的学校；3）应给农民及其妻子治疗。是的，这不是“振聋发聩”

的真理，也非“尼采式”的高调，没有外衣、羽毛和火焰：

“不要偷手帕。”

这是“朴实的真理”，穿着“塔吉扬娜的连衣裙”，和自己“代表上帝的民族”在一起呼唤：“顺从吧，高傲的人！”而在它的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扮演着“悲哀的魔鬼”的角色……

悲哀的魔鬼，被逐的精灵
在罪孽的土地上盘旋……

并用无言的允诺“上帝收你为子”来迷惑它……但在贫瘠的大地上“孵蛋的母鸡”——就是这个斯塔秀列维奇，就是这个佩平，蜷缩起翅膀保护着“一窝凡夫俗子”并勇敢地呐喊道：“不要！不想要！谁也不给，无论如何、无论许什么诺也不交出贫困的农村、受侮的乡村、农妇和农夫以及需要修理的道路。”

“我们是修理工，尊敬的阁下，因此我们还没空听您的日祷赞美诗……”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塔秀列维奇之间的对话，是斯塔秀列维奇和克拉夫特、斯梅尔佳科夫及“检察官”之间的对话……

*　　*　　*

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年轻的时候当过教师，我有一个同事叫С.И.萨尔基索夫，如今已经故世。他是亚美尼亚人，聪明、热情，是教希腊语的。他如痴如醉地迷上了一位俄罗斯妇女，唉（按俄罗斯方式），是个有夫之妇。和她在一起他感到很幸福。同时，他又是一个热情极高的亚美尼亚爱国主义者，编纂了亚美尼亚语法书并在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他认为我的、同时也是他的导师Ф.И.布斯拉耶夫⑥具有极高的语文天赋并把他和德国语

言学家博普[7]和本国编年史专家摩西·霍连斯基并称为神。有一次他对我说：

"您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有一个地方论及了历史上的民族吗？"

我当然知道的。他讲起了"代表上帝的民族"的观点，用南方口音热情地朗诵着。临结束时讲了下面这段话：

"这是历史的《福音书》……是所有受欺压民族的《福音书》。我没想到人类语言还能作这样的表述，这是预言家对本国人民说的话。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是《圣经》。"

他不知为什么非常欣赏冈察洛夫《悬崖》中的维拉，说全世界的文学作品中没有比她更好的姑娘。实不相瞒，当时我曾被他"迷住"。是的，我想，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但这先放在一边，尽管下面还会有用。暂时先回到阿尔多夫及其"围绕着克拉夫特"的想法上来。

*　　　*　　　*

他举了一段威廉国王颇为著名的话。当时有人提醒威廉应注意"斯拉夫人的威胁"，而不是"黄种人的威胁"：

"得了吧，阁下，您想用黄种人威胁来恐吓世界，它还远着呢。整个德国处于斯拉夫民族的包围之中。斯拉夫世界才是隐藏着会殃及德国的祸水的地方。"

这时威廉好像是把这个人领到一边，低声对他说：

"不！……斯拉夫人不会造成任何威胁……斯拉夫人根本不是民族，只是真正民族的肥料。真正的民族是我们，德国人，而斯拉夫人的使命只是给大日耳曼帝国将要扩展的土地施肥。"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8]的说法也与此相应——我六年前在报纸上读到了他对一些斯拉夫议会代表的回答的原话：

"我宁可在德国议会和德国军营里当一名哨兵，也不要你们

或任何斯拉夫民族的'国王'头衔。”

同样的鄙视，同样的思想：“这是一块不毛之地，我根本不感兴趣。”

可以假设或猜测在魏耳日勃洛夫那边这种思想像公理一样占据着国家统治地位。“斯拉夫人是雾霭，将被德国的太阳所驱散。”斯拉夫人将在精神、人文等各方面灭亡，世界根本不需要他们，因为他们一无所有。

这是克拉夫特、检察官和斯梅尔佳科夫的思想，这是斯塔秀列维奇的思想……“有什么特别之处？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到”……

“而我却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叫喊着指出了阿尔多夫先生将接着说什么以及俾斯麦⑨在他之前所说的话。

俾斯麦曾出使彼得堡，研究过俄罗斯人的性格和俄罗斯人。像果戈理这样天才的人只要在“国内走一圈”，就能发现“那里的人”一生都熟视无睹的重要东西。果戈理“在俄罗斯走了一圈”后发现了；而俾斯麦只是“出使彼得堡”就也发现了。

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件趣事：他在猎熊时迷路了，刮起了暴风雪，道路看不清了。俾斯麦陷入了波兰人和苏萨宁⑩的境地，森林，沼泽，雪地，没有道路。他认为自己完了。

“没关系!”农夫在赶车夫的座位上转过身来说。

他单身一人和这个农夫在一起，不会讲俄语，只知道个别的几个词。

农夫不断地转过身来安慰“铁血老爷”：

“没关系，出得去!”

“出得去”他就不懂了，但只记住了这个重复多遍的“没关系”。当他当了首相后，在困难的时候总喜欢用莫名其妙的语言说：

"没关系。Nitschevo。"⑪

流行的说法是:"上帝不把你交出去,猪也不会吃掉你","大限未到不会死,大限一到逃不脱。"总之:"没关系。"

这个俾斯麦就是经常这样说的。

"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女人腔。在同男性化的日耳曼人种的结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或将会提供美妙的人类历史材料。"

这是俾斯麦的思想,而最终却成了克拉夫特、斯梅尔佳科夫、斯塔秀列维奇和"检察官"的思想。阿尔多夫先生非常有趣地发展了俾斯麦的这个思想:

"日耳曼人是凶狠的民族,整个日耳曼是建立在牺牲的斯拉夫民族、波莫瑞波罗的海北方沿海地区的西斯拉夫部族和易北河沿岸'奴隶们'的遗骨上的……德国的'公爵'头衔起源于'掠夺'一词并表示'抢吧!'这一意思和思维的活动,而德语动词haben,即'有',是同'抓'、'夺'、'偷'等词同根的。德国是男性部族,有强烈的暴力、统治和掌权的下意识。这是一方面,这个方面在德国西部强大的、同样男性化的克尔特部族中受到了抑制。在东方则不同:德国在这里把庞大的身躯斜倚在温柔、顺从、软弱的女性化部族的身上,靠在了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的身上。利沃尼亚骑士⑫和德国强盗'公爵'把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人变成了奴隶,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早晚一定会在整个斯拉夫民族身上发生,包括波兰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slavi⑬终究还是slavi,就像他们的名字:'斯拉夫人'就是'奴隶'。一定会的,因为这是性格、种族和心理的相互关系使然。"阿尔多夫继续说道(从这儿开始了他的有趣的想法):"请看看,我们民族的心理确实与之相符,尤其是它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中得到了最鲜明、最意味深长的表现。我们的民族心理很优良,但请注意其"优良"的基

础。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等一系列民粹主义小说家们都惊人的一致，毫无例外地把既不会斗争、也不会生活和创造，总之什么也不会做的弱者的道德美和精神美奉为珍品；看到了吧，多么悲壮地赴死和忍受！！！这是多么可怕的心理！……可怕，它是真实的，“出自本性的”，能令人头晕。塔吉扬娜说：

我已委身他人，
将一生忠实于他

“这是可怕的，实质上是全世界奴隶、所有‘忠实的奴仆’和‘少年侍从’的话，根本不是骑士、战士以及独立的‘我’说的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人物名字本身就包含了多么可怕的意义：玛尔卡·捷福什金[14])及其《诚实的小偷》(在整个俄罗斯很畅销)中，在普拉冬·卡拉塔耶夫身上，在屠格涅夫笔下失去自由、永世为奴的主人公身上，到处都贯穿了一个呻吟：从哪里去找到‘主人’，获得对自己的‘统治’……这起源于古罗斯的诺夫戈罗德公国：‘来控制和作为大公统治我们吧。’从留里克[15]和特鲁沃尔[16]直到19世纪，我们在巴甫连科夫所有这些先进的出版物中，在这纯女性化的委身于巴克尔[17]、斯宾塞[18]、德拉佩尔、路易斯、摩莱肖特[19]以及早先的黑格尔[20]和不久前的尼采和叔本华的思想中看到的不是这种‘大公的使命’，不是塔吉扬娜的回答，也不是永恒的醒悟：‘我本身什么也不是；是个傻姑娘，乡村姑娘……但骑士会来的，太阳会来的，我会为他生一个将成为壮士的孩子。’”

噢，真正的玛尔卡·捷福什金！……连这个男人的名字都挑了个姑娘的。哎，如果这“源自留利克”，有什么办法呢……

*　　　　*　　　　*

但会想起俾斯麦所说的"没关系"。

在转到"没关系"之前，我们先讲完阿尔多夫的想法。

阿尔多夫也说："连整个俄罗斯文学及其背后我们全部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趋势都是女人的，女性化的。对男人的，比方说，德国男人的长期叫喊"我想要"；俄罗斯民族至少假文学之口回答说：'把我拿去吧！'"

显然，"威廉的梦想将完全实现"，如果那位安慰大使的农夫不说这番话的话：

"没关系，老爷，出得去。"

阿尔多夫在下面的话中反驳了威廉的梦想：

"请看看俄罗斯的历史，不是现在的，而是一开始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只是现在才来的，要知道，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了某种东西。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卢亭，都有屠格涅夫的'神经'……在俄罗斯历史上有多少铁腕人物，有多少男人，这些青铜式人物'拼成了俄罗斯'，这是德国人所没有的，他们只是在近17世纪时拼成了普鲁士。苏沃洛夫[21]，这已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诚实的小偷；波罗底诺[22]的战士们不是玛尔卡·捷福什金之流；与叶卡杰琳娜女皇[23]和彼得大帝共图伟业的战友在坚韧、意志、精力、才华和力量上决不比弗里德里希大帝[24]和老威廉逊色。"

*　　　　*　　　　*

指出这一点后，他在文章的结尾又抛弃了这种"铁腕人物"，把自己的全部同情转而倾注于薄弱的"文化工作"上。一般来说，他的思想在开始时要比结束时更有意思。"克拉夫特的难题"依然没有解决。德国人的"文化创作"比我们做得更好，于是斯梅尔佳科夫的思想就是正确的了："让聪明的民族去征服愚笨的民族

吧。”阿尔多夫认为俄罗斯应在“亚美尼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波兰人、犹太人、芬兰人等之间”起某种实际并不需要、且难以解释为什么需要的联系作用。这种作用纯粹是机械性的,根本不是精神上的。这一切又归结为克拉夫特的“思想”,而克拉夫特是“崇高的人”,为自己的思想自杀了。顺便问一句,为什么是克拉夫特,而不是伊凡诺夫[25]?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把“赫尔琴施图贝”称为最高尚的医生并在一个地方写道:“如果您病得很重,去请有德国名字的医生。”“这是我作为最正宗的俄罗斯人对您说的”,他又补充道。

克拉夫特就是那个达里[26],就是那个哈里费尔丁,就是那个格洛特一家。“忠诚的德国人”——“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和追求,忠实而且一贯坚持自己的思想。他因此而自杀,达里或沃斯托科夫[27](也是德国人)“如果不再相信俄语、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的美丽与未来”,也会自杀的。

* * *

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

俾斯麦在出任驻彼得堡大使时曾深入了我们的社会,仔细地观察了俄罗斯人的性格,说他们是“极为女性化的”,并补充说,“在同男性化的德国人的结合中他们成了绝妙的历史材料”。俾斯麦的这个思想尚无贬意,而威廉国王却表述为:“斯拉夫人不是民族,只是供另一个负有历史使命的民族成长的材料和土壤。”他指的是未来的德国。两种说法都提出了历史上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问题。

“丈夫是一家之首”……是的……但是,妻子是他的女主人。在法国,女子出嫁后就失去自己的名字,不能支配自己的财产甚至工资。但是和在俄罗斯及任何地方一样,法国的妻子使整个家庭充满了“自己的氛围”,使家居美丽或脏乱;或吸引所有的人,

或使他人掩鼻而去;她终究"管理着"自己的丈夫,就像头颈以自己的运动把头摆布成这样或那样,使眼睛往这里或那里看,而在更深的层次,则悄悄地制定家庭的思想和决策……

就算丈夫是"头脑",但是他在决定"头脑转动"的"脖子"上。

威廉和俾斯麦不是说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具有"女性性格"并根据我们的"女性化"预言我们未来悲哀的附属和被奴役的作用吗?这就是给他们的回答。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的未来"思考了很久,但没有提出我这里所谈到的说法。这种说法是观点鲜明,不可推翻的,因为它有生理方面的基础,同时又具有精神方面的基础;但是他就是朝这里发展,指出了"俄罗斯人的全球性同情心",他们能"在自身溶化欧洲文化的矛盾",当俄罗斯人摒弃自我时,最宜于承担世界性的使命……他用这些语调说的明显是普希金的话;但在《少年》中有一处地方则要模糊得多,即韦尔西洛夫与儿子背着农奴姑娘的对话,在这段对话里,这个思想表达得极富诗歌魅力,极其温柔和深刻,极具世界性的美,他以后再也没能说出这样的话……多年来我一直念念不忘地想分析这段对话:这里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灵中的"至圣之物",他不亚于、甚或高于《宗教裁判官的传说》和萨托夫与斯塔夫洛金关于"代表上帝的民族"的独白……这是一个悲情满怀的俄罗斯漫游者,几乎是为了躲债而出国的贫困潦倒的俄罗斯漫游者,而实际上则是由于寂寞和出于"无事可干"而出的国;他高傲地下结论说:"他们(欧洲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真正的欧洲人……因为在所有的人里面只有我意识到了欧洲的悲哀,意识到了欧洲的命运,等等",真令人惊奇。但这里不能转述,因为诗歌是不能讲述的,而只能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思想里也表达了自己心灵中的"至圣之物",指出了俄罗斯在欧洲、基督教以及整个世界历史中的

内在使命，就是“盖完”它的房子和建筑，就像女人作为一家之主的“未婚妻和妻子”走进男主人的房子时就结束了其光棍生活一样。

女人随和谦让，对男人说：“把我带走吧”；但他刚一“带”上她，马上整个人都变了。“一结婚，人就变”，这是世代流传的意味深远的说法。这不是妻子失去自己的名字；这只是文件上的，只是对于警察局、大院管理员和宗教事务所而言的；实际上失去名字的，最主要的是失去特点和灵魂的是男人，是丈夫。一般丈夫的父母很少同他住在一起；但岳母常同“出嫁的女儿”住在一起。妻子不仅仅是“走进丈夫的房子”，她最初是作为温柔体贴的妻子进来的，但随后就变成了“女主人”，准确地说，是丈夫把“统治权”拱手让给了她，并且是心甘情愿地相让。

历史上也是这样，例如，“女性化”的俄罗斯人在历史生活中没有、也觉察不到任何“瓦兰吉亚人的历史阶段”或“日耳曼人的历史阶段”（男性成分）。应“女性化民族”的召唤去征服和统治的是好战、强硬的日耳曼人，来了以后，似乎自己把权力交了出来并再也不提他们的“权力”、自豪和压制，他们不过是“迁居”后就开始“设宴庆祝和狩猎”以及同“游牧民族作战”，互相通婚，生儿育女，成了“俄罗斯”——俄罗斯人，好客的人和东正教徒，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和祖国，忘记了自己的风俗和法律。应该读一读奥古斯汀·蒂埃里[28]的《日耳曼人在英国的占领史》，就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样的恐怖，什么样的血统，尤其是恐怖的长期压迫给以后的英国历史带来的扭曲的特点。但在我国却根本不会这样！……

如果我们从这种我们不熟悉的久远时代转而看我们俄罗斯人重又同“男性的”西方因素频繁交往的18～19世纪，就会看到这个历史的重复。仿佛从外部一开始就“征服了俄罗斯人”，但随

后发生的则是对征服者更内在的统治，吸收和包容他们。“女性品质”就在面前：随和谦让，温柔体贴，但它表现为力量、征服和统治。唉，不是丈夫“统治妻子”，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是妻子“统治丈夫”，甚至到了吸收的地步，而这不是用权力，不是直接的，而是以这神秘的诸如温柔和美貌的“没有意志”去诱惑“有意志”和粗犷的人并征服之。请相信，我以为“可爱”的就是我说的“法则”，这就是俾斯麦和威廉所忽视的东西，甚至俾斯麦发现和记住了当他在林海雪原狩猎迷路时安慰他说“没关系”的“可爱的农夫”，但农夫未必会记住这德国老爷，此外，他那时“救”了俾斯麦一命，而且“谢天谢地”，还得到了五个卢布的小费。在农夫生活中没有“俾斯麦时期”，但在俾斯麦极为复杂的人生经历中毕竟渗入了俄罗斯的观点，即俄罗斯人在绝望的境地说“没关系！”的方式。米尼希[29]难道不是强硬的人？但他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影响”？他是严厉、甚至残酷的指挥官；骂人，诅咒，只会这些。但就是他的儿子用俄语写了《曼施坦因[30]先生随笔补遗》，像俄罗斯爱国者一样，像俄罗斯的公职人员一样，像在俄罗斯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辛勤劳作的人们一样。现在有了完全和“伊凡诺夫”一样平常的姓名为米尼希的贵族。

* * *

俄罗斯人会忘我地置身于他人影响之下……就像未婚妻和妻子置身于丈夫的影响下一样……但这个“置身”越忘我，越纯洁，越无私，甚至达到了“自尽”的地步，它就越有力地对所“置身”的人产生神秘的影响。在夫妻关系中统治丈夫的不是轻佻的妻子，而是最温柔体贴，最任劳任怨，最“全身心”服从的妻子……相反，丈夫为了“忠实的妻子”而“死”——这是宽宏和勇敢的规律。这里发生的实际上是相互哺食；但是，历史学家们没有考虑到它的力量，他们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力量和利益的竞

争，是权力的竞争，仅此而已。回顾历史，我们要指出：我们在俄罗斯某个思想家，譬如诺维科夫[31]、拉吉舍夫、恰达耶夫、赫尔岑等人的著作上花的精力和热情比得上我们在巴克尔和斯宾塞著作上所花的精力和热情吗？我们读了多少他们的著作，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而在尼采的晚期著作上呢？现在人们援引他的《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就像引用心爱的诗歌一样，像讲述世代流传、能驱赶睡意的童话一样；普希金除了在其黄金时代迷恋过尼采外，从未再迷恋过别人？在这之前不久对叔本华也是这样。这个事实是极为普遍和常见的，以致于难以想象“俄罗斯社会的形象”在“迷恋俄罗斯”的影响下将会如何：如果俄罗斯人迷上了普希金的著作，开始在十字路口，在每一期的报刊杂志上引用普希金的话……简直难以想象和设想！“俄罗斯人将不再像俄罗斯人”，因为如此迷恋的只能是来自欧洲的什么东西，这是俄罗斯人之所以“像俄罗斯人”的唯一特点……这是老是在寻找“未婚夫、主人和丈夫”的女人。

现在还完全看不到这将会产生什么；目前对此寝食不安的只是泛斯拉夫主义者，他们“几乎不是俄罗斯人”。但由此一定会产生某种巨大的事物。我认为，经过一个世纪或“一又二分之一世纪”后由此一定会产生俄罗斯人对整个欧洲文化巨大的“窃窃私语般”的影响。在这充满如此忘我精神和热情的可怕的自爱不断影响下，已经像“小市民”那样感到孤寂的欧洲将不得不摒弃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态度以及求实的功利主义。这是不能预言的。只能指出“米尼希”、达里、沃斯托科夫、格洛特以及收集俄罗斯歌曲的犹太人舍因[32]等人的名字，并补充说，像沃尔孔斯基[33]、玛丁诺夫[34]和加加林[35]那样的“俄罗斯天主教徒”是为数不多的，主要是他们的作用较小……主要的结果是：如此痴迷献身他人的俄罗斯人在这种“献身精神”里保留了“女性的我”；一

定要求所献身的对象温柔体贴、宽宏开明；毫无疑问，俄罗斯人从不会崇拜和“献身”于本性“粗野”的对象，连沃尔孔斯基、加加林和玛丁诺夫们都不会的。相反，当欧洲人“献身于俄罗斯的东西”时，他们则是献身于最核心的东西，即这个“温柔的女性因素”，亦即摒弃欧洲因素——自豪、掠夺和统治的因素中最实质的东西。对这个差别应予以极大的关注：俄罗斯人在“献身”中保留了自己的灵魂，掌握的只是他人的身体和形式。在天主教里他们不会“举起剑”；在接受路德教派时不会对新教更加冷漠和严厉，相反，会处处更加温顺柔弱。西方人迷恋的正是我们身上的“女性气质”……在屠格涅夫那里寻找它，在托尔斯泰那里寻找它……这样，当我们在“自己祖国悲哀的现实”中找不到符合内心理想（总是柔弱、温顺的理想）的东西时，却迷恋上了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对俄罗斯的迷恋”总是“内心理想”的变化……有“俄国化的法国人”，决不是因为他们在我们这里找到了热爱la gloire[36]的基础……但“法国化的俄国人”不会对自己说：“我或者我的子孙会跟随新的拿破仑走遍天涯海角。”从不会的！不会抱有这种幻想！！

俄罗斯人接受的是身体，而灵魂则不接受。他人的东西在同我们结合时接受的正是灵魂。虽然我们说起来是似乎迷恋欧洲的“理想世界”……但这只是看起来是这样。你们会指出“欧化的俄国人”，他们欧化到热衷于“权力”、“掠夺”、“抢劫”，热衷于像“抢劫”、“攫取”一样的grafen和haben[37]；为了使我们出于运动、征服和创造的动机而德国化、法国化……

我们套上欧洲的靴子，以为它会比“家制便鞋”更不夹脚。但欧洲人在脱下靴子时却知道要穿上根本不夹脚的“俄罗斯便靴”——但实际上并不属于鞋类。他们抛弃了；我们却“愈加肯定”。薇拉·菲格纳[39]在喀山看到心爱的教师受到当局侮辱时就

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参见她的《回忆列斯加夫特》[39])。这就是俄罗斯的动机。但我不认为德国人在接受东正教时会想:“我现在的哲学功课会更好了”,或“工作会更稳定”,或“我能写出比《浮士德》更高明的东西来”。德国人的动机消失了,但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动机(怜悯、同情心)则加强了(即当他们获得欧洲人的气质时)。

佩巧林[40],一位40年代奇异的理想主义者,皈依了天主教。如果他对路德派教徒“搞阴谋”会怎样?而他加入了耶稣会,不,在一家爱尔兰医院成了“慈善的兄弟”。“俄罗斯的动机”加强了。

整个俄罗斯社会主义就其理想的、纯粹的基础和初衷而言是女性化的;只是对“俄罗斯的怜悯心”、对“不幸的、穷苦的、家徒四壁的且无力战胜生活中的丑恶的人的同情心”的扩展(参见杰巴高里·莫克里耶维奇的《札记》)。但一切动机都是乌里扬娜·奥索尔金娜的。对此克柳切夫斯基[41]在《古罗斯善良的人们》的讲课中已经论述过。还可再看一下屠格涅夫的女性人物(“叶莲娜收容病猫和病鸟”)或托尔斯泰的《复活》中走向西伯利亚的“政治”人物:“来吧,我来背您的病孩,您已累了。”而社会主义是欧洲的、同时又非常硬性的、货币性的和精打细算的思想(马克思主义)。

使俄罗斯人暗自倾心“达尔文学说”的最主要原因是它“打掉了人的傲气”,使人与动物一起“起源”并起源于动物。这是“俄罗斯的谦和温顺”,别无其他。俄罗斯人在“西欧主义”中处处保持着自己的灵魂;准确地说,俄罗斯人冲出了对他始终是粗暴和残酷的“俄国国情”(虽然这要比西方国情远为“女性化”),在不了解和不熟悉的西方、在假定的西方寻找更能高度抒发俄罗斯感情的环境和可能,而这在国内则是要冒着“坐牢”的危险的。

*　　*　　*

俄罗斯文学给西方人展示了道德观的新世纪。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人从不对西欧文学的道德特点感兴趣，如果这不是“补充俄罗斯人灵魂”的特点……例如，科尔德莉娅很招人喜爱，但她是怜悯父亲的拟人化。狄更斯[42]的主人公也很引人入胜，但这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甚至是果戈理《外套》中的卑微人物。需要指出的是，狄更斯“歌颂”和喜爱的不是典型的英国理想，不是吃“牛排”和从事大量工作的人。狄更斯本身是祖国的叛徒，“几乎是俄罗斯作家”（参见《古罗斯的善良人们》中的乌里扬娜·奥索尔金）。俄罗斯人因此而喜欢他，但不喜欢拉辛[43]、高乃依[44]、维克多·雨果[45]、大仲马[46]等作品中的国王和大臣们，更喜欢欧仁·苏[47]作品中的偷儿。在指出这一点后，我们再回到西欧。西欧根本不崇拜在译文中相当难理解的俄国作家的精湛技艺，但却崇拜俄罗斯生活场景和俄罗斯人性格中所展示的新的道德观念。去年我在挪威虽未亲耳听到，但也是通过第三者听到了有关俄罗斯文学对“处于不幸”、“生活受挫”和“命途多舛”的外国人，如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等等，所产生的非同寻常的“救治”功效。

“我不了解她什么……她总是戚戚哀哀。她长期以来经常给我讲俄罗斯文学，最常谈屠格涅夫。她熟悉他最小的作品，知道他不引人注目的箴言。例如，屠格涅夫是如何看待生活和人——这使她极为激动，使她着迷，显然又使她感到慰藉和镇静。她向我援引了他《浮士德》和《九封信小说》中我都未注意到的片断，而我是熟悉并热爱屠格涅夫的。”

后来，我在慕尼黑听瑞典人说：

“我们了解俄罗斯的生活，因为我们读过托尔斯泰。你们的农村，你们的农夫，你们的宗教对我们毫不陌生。”

实际上，“文学就是生活”，尤其在我国，尤其在我们的“自然

主义流派"中……他们读了文学作品，我们全部庞大的生活就展现在他们面前……懒惰、宁静、不为人知且深刻思索的生活。

"实际上，俄罗斯的便鞋不夹脚。"

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有嘲笑"被抛弃的姑娘"、儿童、母亲和贫穷的现象吗？哪怕一页？就是"偷儿"也是"诚实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诚实的小偷》）。俄罗斯文学是对被压制和被侮辱的事物不绝于耳的赞歌，因为这种人总是很多，到处都有，在高傲和辛勤劳作的欧洲很多很多，所以可以想象，当他们所有的人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从未有人欺侮"孤儿"——不是财产意义上，而是道德意义上——欺侮地位和命运不济、生活遭受挫折的"穷人"时，会感到莫大的兴奋。这种人太多了。雨果的国王，以及西欧日常故事中所有明显"虚构的情节"能告诉他们什么呢？但俄罗斯的故事，尽管也是我们生活中很"平常"的，却以不容置疑的"真正忠实现实"的特点给人几分安慰："有这样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和广袤的土地，在那里我不会被鄙视的"，"不会受到如此粗暴的欺侮"，所有的人都会"挺身袒护我"，"拉起我的手，扶我站起来"——"我天地难容，但只是在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在整个地球上。"

这就是俄罗斯文学的作用，其重要意义不在于西欧批评的反响，不在于它鹊起的声誉，不在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辉煌成就，而在于看不见摸不着的、谁也没想到的同普通读者、全世界读者在一定的精神结构和心理状况上的相似……"总有人喜爱俄罗斯歌曲"……不，要更多，更好些："有这样的心灵，对于它们只有俄罗斯歌曲才是世界上唯一需要的，最亲切的，就像跌倒的孩子需要母亲，生病的孩子也需要母亲，尽管她可能不漂亮，甚至是品德不高尚的女人。"当然，要求俄罗斯人"品德高尚"有些不合情理……"三驾马车"……但这就是俄罗斯永存的东西：同情心。

它之所以能在俄罗斯产生，在俄罗斯扩大，是因为各类“三驾马车”在各地轧死了太多的人。但无论如何，许多人想“在俄罗斯昏昏入睡”……嗨，还要穿我们的便鞋……

*　　　*　　　*

“女性化”减少了男性化并吸收了它。“女性”和“男性”就像“水”与“土”，或者像“水”与“石”。人们说“滴水穿石”，但不说“落石穿水”。石头只是妨碍水流向应该去的地方，“阻碍”和“滞留”它。“男性”在任何情况中都是力量，但它弱于温柔，温柔总能征服力量。“条顿族的进攻”在俄罗斯会像泥牛入水，虽能弄浑水，但“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将依然故我并战胜一切。威廉和俾斯麦自然有“军事将领”以及一般“首领”的观点，但还有“臣民”的观点，而这十分重要。威廉和俾斯麦根本看不到这种观点，他们若能看到它，就会理解“威廉之梦”是何等的不现实、不可能甚至很可笑。路德派教徒达里、希尔菲尔丁、萨布勒来到了俄罗斯；很遗憾，我叫不出沃斯托科夫的德国姓。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德国性”，以这样的损失到俄罗斯来自然会黯然失色的。但这并未发生，发生的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在保留实干精神、形式的规矩和德国人的“身体”的同时，使之充满了东方“女性的心理”，这时他们才智迸发，变得更耀眼了……最终在接受我们东方宗教后又留下了自己的宗教——毫不拘束，毫不勉强，甚至不为诱惑所动，是自觉自愿的。简直难以想象俄罗斯人到德国后会成为“多棒的卫队长”！就是说，俄罗斯人根本不会接受德国人的心灵，而只会接受形式。这样，对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宁可给德国议会站岗，也不当斯拉夫民族的国王”的说法可以回答说：“喂，殿下先生，我们知道有许多德国人宁可当我们的十品文官，也不愿当你们的上校。”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萨布勒成了宗教事务所公文处理的热心人？为什么达里，彼

得堡某部的公务员和路德派教徒，开始收集谚语、俗语以及整个俄罗斯的“生动语言”？为什么舍因毕其一生云游乡村，收集日常生活和红白喜事的小曲和曲调？他是犹太书呆子？！为什么格尔申宗[48]在莫斯科以如此热心还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以本来面目？到处都渗透着“女性的心灵”，还有些“便鞋”（可能也是男子款式），绝没有破坏他们男性的“形式”和男子的“身体”，反而使之更健壮，更昌盛。他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就是比俄罗斯人强。因此萨布勒当上了总检察官：不小的事业。他们都以俄罗斯的精神、为俄罗斯的目标而工作。他们精确地、精力充沛地干着俄罗斯的工作。这就是 miracula ethinica[49]中一些小小的真理，若对之加以关注就能像森林中的那个农夫一样回答俾斯麦、威廉和弗兰茨·约瑟夫：

“没关系，老爷……出得去的。”

1911 年

译 注

① M.M.斯塔秀列维奇（1826—1911） 俄罗斯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社会活动家。

② B.Д.斯帕索维奇（1829—1906） 俄罗斯法学家，国际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专家。

③ A.Д.格拉多夫斯基（1841—1899） 俄罗斯历史学家，自由派政论家。

④ A.H.佩平（1833—1904） 俄罗斯文艺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⑤ 拉丁语，意为“什么代表什么”。

⑥ Ф.И.布斯拉耶夫（1818—1897） 俄罗斯语文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860）。

⑦ F.博普（1791—1867） 德国语言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通讯院士，印欧语历史比较和比较语言学创始人之一。

⑧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48年起)。1867年把奥地利变成奥匈帝国,1879－1882年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三国联盟。他的扩张政策促使一战爆发。

⑨　俾斯麦(1815－1898)　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

⑩　И.苏萨宁(? －1613)　17世纪初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英雄,科斯特罗马县的农民。1613年冬为波兰干涉者部队带路,将他们引进无路通行的森林沼泽地,因此而被虐杀。

⑪　Nitschevo为俄语Ничего(没关系)的德语音译。

⑫　利沃尼亚骑士系指13世纪在德意志利沃尼亚成立的僧侣骑士团。

⑬　拉丁语,意为"斯拉夫人",与拉丁语的"奴隶"一词同根。

⑭　捷福什金(Девушкин)派生自俄语"姑娘"(девушка)一词。

⑮　留里克,据编年史记载,原为瓦兰部队统领,留里克王朝(9世纪末—16世纪)的奠基人。

⑯　特鲁沃尔系留里克的兄弟。

⑰　H.T.巴克尔(1821－1862)　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社会地理学派代表人物。

⑱　H.斯宾塞(1820－1903)　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证论创始人之一。

⑲　J.摩莱肖特(1822－1893)　法国生理学家,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代表人物。

⑳　G.W.F.黑格尔(1770－1831)　德国哲学家。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系统的辩证法理论。

㉑　A.B.苏沃洛夫(1729/30－1800)　俄国统帅,大元帅(1799)。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战功卓著,未曾打过一次败仗。

㉒　地名,1812年俄罗斯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军队在这里彻底击败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

㉓　叶卡杰琳娜女皇系指叶卡杰琳娜二世(1729－1796),在位时大力巩固俄罗斯专制制度并侵占了大片领土。

㉔ 弗里德里希大帝系指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国王(1740年起),大统帅,大肆推行侵略政策。

㉕ 伊凡诺夫为俄罗斯常见的姓名,作者此句意指:“为什么是德国人,而不是俄罗斯人?”

㉖ В. И. 达里(1801－1872) 俄罗斯作家,词典编纂学家,民族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㉗ А. Х. 沃斯托科夫(1781－1864) 俄罗斯语文学家,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㉘ A. 蒂埃里(1795－1856) 法国历史学家,浪漫主义流派奠基人,写有关于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的著作。

㉙ Б. К. 米尼希(1683－1767) 俄罗斯军事和国务活动家,陆军元帅。

㉚ С. Н. 曼施坦因(1711－1757) 回忆录作者,1744年在俄罗斯供职,著有《1727－1744年俄国札记》。

㉛ М. Н. 诺维科夫(1777－1822) 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共济会会员,曾任乌克兰总督办公厅主任。

㉜ П. В. 舍因(1826－1900)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民间创作研究家,民族志学者。

㉝ 这里指:П. М. 沃尔孔斯基(1776－1852),俄罗斯国务活动家,大元帅,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С. Г. 沃尔孔斯基(1788－1865),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少将,参加过1812年的卫国战争。

㉞ А. Е. 玛丁诺夫(1816－1860) 俄罗斯演员。

㉟ Г. Г. 加加林(1810－1893) 俄罗斯写生和素描画家。

㊱ 法语,意为“荣誉”。

㊲ 德语,意为“掌管”和“拥有”。

㊳ В. Н. 菲格纳(1852－1942) 俄罗斯革命女活动家,作家。

㊴ П. Ф. 列斯加夫特(1837－1909) 俄罗斯教育家,解剖学家,医生。

㊵ В. С. 佩巧林(1807－1885) 俄罗斯社会活动家,哲学家,诗人,

具有F.拉门奈思想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㊶ B.O.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 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㊷ C.狄更斯(1812－1870) 英国作家。

㊸ J.B.拉辛(1639－1699) 法国剧作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

㊹ P.高乃依(1606－1684) 法国剧作家。

㊺ V.M.雨果(1802－1885) 法国作家。

㊻ 大仲马(1802－1870) 法国作家。

㊼ E.苏(1804－1857) 法国作家。

㊽ M.O.格尔申宗(1869－1925) 俄罗斯文学史家和社会思想家。

㊾ 拉丁语，意为“奇妙的人种”。

重返普希金

(纪念普希金逝世七十五周年)

1837 年 1 月 27 日—1912 年 1 月 27 日

它，这个重返，尚未成现实，但却非常希望它实现。诚然，

……蠢人的评判和人们的冷嘲热讽

都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它们确曾在普希金生前迫害过他并在 60～70 年代“开怀畅饮”，庆贺胜利。普希金又恢复了自己的地位，这个俄罗斯第一诗人的地位已非他莫属。但这是全俄罗斯的公认，是庄严的、民族的、几乎国家性的、文学的以及学术上的公认，远非人们所幻想和所需要的；需要的不是他，而是我们。真希望他能像朋友一样走入每一个俄罗斯家庭，成为孩子们的讲故事叔叔，成为年轻母亲们高尚而儒雅的朋友，成为老人们的交谈者。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各种年龄的人都能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各取所需，

于是，把普希金的作品加以分类并出版“儿童”、“青年”和“成年”分类读物的想法便油然而生。但这已属技术问题，我们暂且不论。现在这种“进入寻常百姓家”的读物少得可怜。能“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主要是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作品，俄罗斯十二岁、最晚不超过十五岁的颇有天赋的少男少女们都读遍了他们的全部作品。然而，许多成年人却对普希金的《戈留辛诺村编年史》或《骑士年代的故事》一无所知或“不屑一读”。我们不止一次地在调查和谈话中了解到，他的许多精品抒情诗仍鲜为人知，或被淡忘，或要费劲地才能记起来，甚至一些文学泰斗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普希金更多的是成了珍本收藏家的详细研究对象。他们为他的每一行文字争论不休。但这些伟大的“文本校对者们”，确切地说，妨碍了他的作品进入寻常百姓家。没有合适的普希金读本……为了“把普希金作品从书架下取下来”，需要高高的个子和强壮的手臂，因为这些学术性卷册会折断手臂，会使女大学生、女中学生和小男孩的手臂骨折。大学生因为书“太学术化”而绝不会去读它；“11 岁的彼佳”绝不会在这注满解释、完全是学术著作的十大卷中去寻找有关萨尔坦王或雇工巴尔德的“宝贵的童话”。畅销的读物完全没有；没有一家“媒体”加以推介。没有可以“塞入枕下”、“放在床头柜上”、“丢了也不可惜”、“和心上人散步”时可以遗失或去林中采蘑菇和浆果时可以放在篮子里或口袋里的“普希金读物”。最后，没有人们就是冲着封面来购买的装潢迷人的读本。我们的封面设计高手，如画家兰谢列①，“能把莎士比亚的著作的封面装潢得豪华精美”，“能把歌德和席勒作品的封面设计得奔放、雅观”，却从未把自己的魔笔伸向“普希金作品的封面”。显然，为了顺从订单这个主人的要求，他们在为当今那些完全死气沉沉、却又自命不凡的诗人和小说家装饰封面。科学院和大出版商们早就该利用画家们的才华

来为普希金和其他经典作家服务了。

倘若普希金不仅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而是作为朋友进入千家万户——人们喜爱读他的作品，不，每个15至23岁的俄罗斯人都非常激动地去感受他的作品，那么他的作品就能防止和杜绝如今在文学作品和报刊杂志中泛滥了十余年的低级趣味。普希金的智慧可以预防一切愚蠢的东西，他的高尚品质可以预防一切庸俗的东西，他的心灵和兴趣的多面性可以预防那个可称之为“心灵过早专业化”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八年前全体青年学生都迷上了它，这对熟悉普希金作品的青年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而这正是在学者列昂尼德·麦科夫编辑普希金著作的“学术版”的时候，正是列尔涅尔在选编其《普希金的生平和著作》以及人们为《美人鱼》的真实性莫衷一是的时候。这得归咎我们的家庭，因为阅读普希金作品在家庭中根本“未成风气”，但部分也得归咎于名气响当当的国民教育部。它囿于“雷布尼科夫[2]收集的壮士歌”和查尔查文[3]的作品，根本没顾及普希金的作品。它遵循“广闻博识”的方法，把“各种范文都弄一点”灌输给各年级学生，让他们去读《治家格言》中的范文，去读卡拉姆津的范文，“还不忘捎上作为克雷洛夫前辈的 И. И. 德米特里耶夫[4]的两则寓言”，于是当学生好不容易学到普希金的作品时，已被“前面的课程”搞得精疲力竭了，同时对“西里韦斯特神甫们[5]和尤里·克里扎尼奇[6]”厌恶至极，以至于把普希金也当成了克里扎尼奇，关于他的知识仅限于“所要求的范文”，升入中学八年级和大学一年级后，干脆把他归于能“代表”一切、能包容莎士比亚的《曼弗雷德》以及所有一切的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7]之列。中学的任务远非是学术研究和培养对事物，包括对文学的科学态度。少年时期和青年初期是培养美感和爱好的年龄，而非培养“冷静观察的头脑”的时候，但是官僚的教育部却把这个东西过

早地、按老年人的方式强加给了学生。如果把这几年用来培养爱好，而且是我们俄罗斯的忘我的爱好，如果一共“吃”三个，只是三个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奥多耶夫斯基公爵⑧，而且以别林斯基的全部热情、列尔涅尔的刻苦精神和安年科夫⑨对往日的缅怀情愫在七年里学完他们，那么俄罗斯的家庭，俄罗斯的社会以及我们不幸的报刊杂志就可以避免成百上千个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肮脏龌龊的举动。但是，我们的教育部却“愚不可及”——它什么也不懂。算了，随便它吧。希望就寄托在父亲和母亲身上了。让他们学会使用教育学的原则：“宁精勿滥。”让他们学会预防青少年在文学上漫无目标，因为一个普希金就可以学许多年，这就是口号，这就是途径。

普希金是安宁、光明和平衡。普希金是一种奇妙的永恒。当我们现在不愿再读歌德的小说或读起来乏味至极、味同嚼蜡时，《黑桃皇后》和《杜勃罗夫斯基》读起来却情趣盎然，仿佛它们是现在写的。在语言和语流中，在作者接人待物及对待社会关系的心理方面，没有任何过时的东西。这是奇迹。普希金一点也不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则有些过时了，他们紧张的神经、一些思想和观点已经过时了，而普希金却丝毫没过时。你们可以看到，再过二十年他会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年轻，更现代。就像他对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都有某种合适的东西一样，他（我们预感到）对各个时代和每一代人也会有某种合适的东西。“就是一个诗人”，他是这样给自己下定义的（《回声》），对一切高尚的事物他都会赞美的。有人会问：这什么时候会终止，什么时候会“不再需要”？这是不可能的，就像白桦树林和潺潺春溪不会“失去其美丽和存在的必要”一样。普希金是最不专门化的，由此而产生他的永恒性和普遍教育意义。他下意识地绕过了所有的“偏差”和“偏颇”；他还略微讽刺了《浮士德》和但丁的《炼

狱》——如此世界性的作品——中“偏颇”的东西(在他的讽刺性模仿中)。“好吧,为什么,比方说,这个佛罗伦萨的诗人这么阴郁和恐惧!为什么这个阴郁的德国人陷入沉思而不能自拔:

……当没人思索的时候,
你在思索。

普希金始终和自然在一起,在他回避自然的地方他必定会回避人。在人的身上他只取了自然人的东西——动物中最具智慧的半神、半动物的特有东西:这就是老年,这就是童年,这就是少年的娱乐和姑娘的憧憬,这就是妇人和父辈的劳动,这就是我们的祖母。普希金撷取了各种年龄;他对每个年龄的人都悄悄地说了心里话,都说了一番同情、安慰和支持的温存话语。一切都是言简意赅。噢,一切又多么温柔和隽永!普希金的著作应“从头读到尾”,他的

我为凭空杜撰而悲哀痛哭

这一番话既是遗嘱,又是对我们的指责——光明磊落、但又不刻薄挖苦的指责。你们还会看到,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没有一点刻薄挖苦的东西!这简直是奇迹……可他又是多么会愤怒!但他没在任何一页文字里洒上毒汁。这就是他的作品具有教育作用和有益身心健康的原因。他的全部作品中没有一页表现出对人的鄙视。如果我们计算一下他所缺少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跟我们所能计算出来的他所拥有的东西几乎一样多。垃圾,糟粕,忌妒——什么“致命的罪孽”也没有……一种极为纯净的血液——这几乎就是普希金的本质。他的作品未被《俄语语文课

程》所采用，而却是全部的俄语语文，但这不能是有那么多“错误举动”的长官布置，而应是高尚的第一任务。我们应该热爱他，就像“失去天堂”的人热爱和盼望“天堂回归”一样……但却“愚不可及”……不管它。先生们，现在快去给孩子们买“合适的普希金读物”吧，把他们手中的各种“新潮作品”都收去……收去后锁进书橱，最好把钥匙也扔掉。“新潮作品”的特点在于其益处只体现在当你把它们扔掉或忘记在朋友那里的时候，或者“借去不还”的时候，或者当某一本不会燃烧的《诅咒》(Л.安德烈耶夫的作品)最终烧掉时，哪怕是在房屋失火时烧掉。

好吧，够了。这都是“失去天堂”的想法。先生们，去读普希金吧！重读普希金吧！……他会对我们的恼怒吹一口冷气的，而我们的恼怒就会化为微笑。于是谁也不会对“现代作品”感到愤怒，但也没有人再会去读它们……

1912年

译　注

① E.E.兰谢列(1875－1946)　俄罗斯画家。

② Н.Н.雷布尼科夫(1831－1885)　俄罗斯民俗学家，广泛采集历史歌曲和壮士歌。

③ Г.Р.杰尔查文(1743－1816)　俄罗斯诗人，俄罗斯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

④ И.И.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　俄罗斯诗人，感伤主义，代表人物。

⑤ 这里指两个西里韦斯特神甫，第一个(？－约1566)为莫斯科报喜大堂的神甫，审订出版《治家格言》；第二个(？－1123)为作家，米·维杜别茨基修道院院长，1118年起为南佩列亚斯拉夫利主教，《编年纪事》编者之一。

⑥ J.克里扎尼奇(约1618－1683)　克罗地亚人，作家，赞同“斯拉

夫各国的团结一致",并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力是俄国。

⑦ Л.Н.安德烈耶夫(1871－1919) 俄罗斯作家。

⑧ А.И.奥多耶夫斯基(1802－1839) 俄罗斯"十二月党"人,诗人。

⑨ Н.А.安年科夫(1802－1878) 俄罗斯"十二月党"人,陆军中尉。